

廿一世紀文庫

明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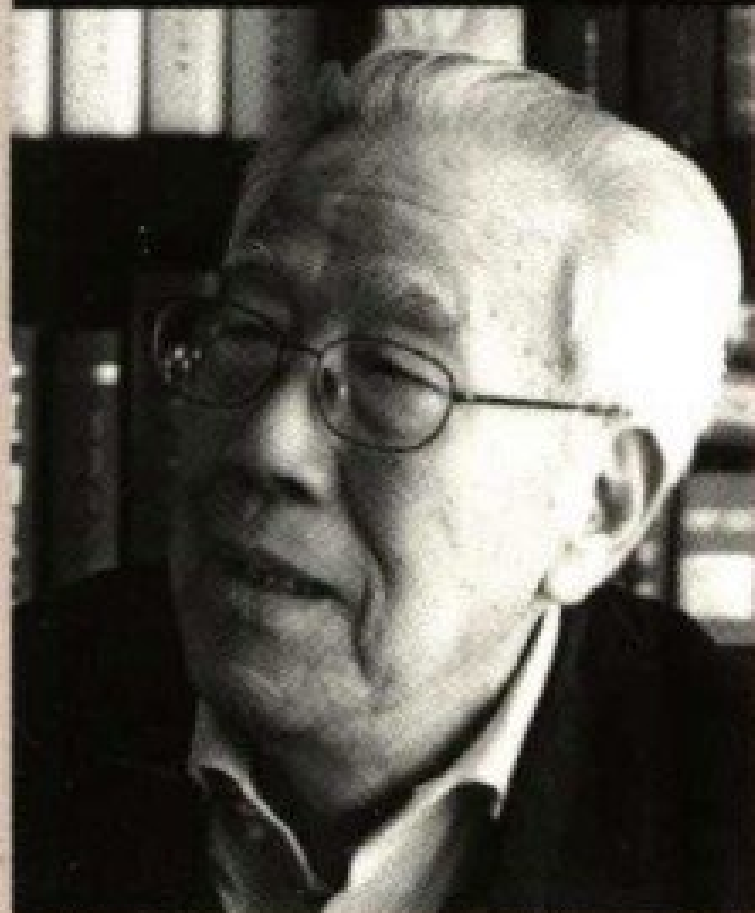
結合何方先生的經歷，反思中共走過的道路和對今後的展望。

# 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

——何方自述（下）

何方 著

邢小群 錄音整理



文化大革命和九年幹校生活

經歷又一次「甄別平反」

籌辦日本研究所看中日關係

國際與外交問題的撥亂反正

六四事件的回顧與反思

如何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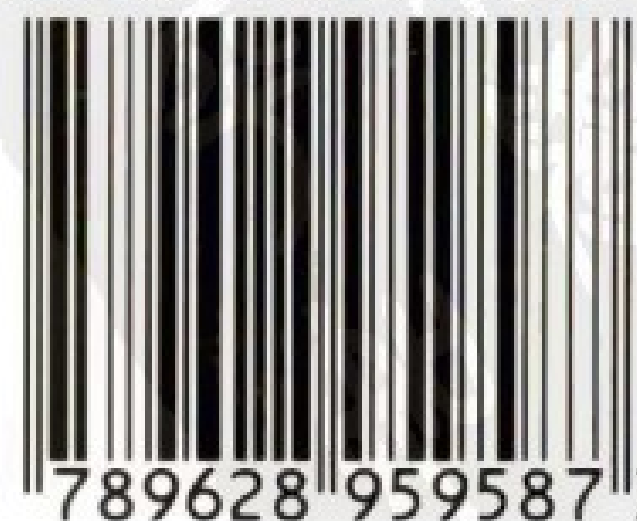
# 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

——何方自述（下）

何方，國際問題和中共黨史專家，特別是研究國際形勢與對外關係達五十年，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他跟隨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從東北到外交部，一起工作十餘年，養成獨立思考、鑽研問題的習慣。文化大革命後，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退休後改行研究中共黨史。他參加共產黨七十年，有豐富而複雜的經歷，又長期從事研究工作，善於從世界背景看中國。所以本書名為自述，實際上主要是對延安時期以來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反思，有大量撥亂反正、打假返真的說明。特別是對人們正熱烈討論的中國應該確立什麼制度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作出了系統的分析 and 回答。這就使本書不但留下了許多珍貴史料，而且提出並回答了當前受到各方面關注的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者面對它，是理論探討和黨史資料；一般讀者面對它，可以了解到過去的許多故事和真實歷史的細微末節。所談到的事件、人物、細節，都很珍貴。

作者不論對歷史，對人物，對事件，對理論，都不肯人云亦云，而堅持獨立判斷，並以豐富的閱歷為依托。本書的內容可謂滲透着作者直面真實的勇氣和洞察歷史的見識。他一直從事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長於理性反思和分析概括。這一特點使他的自傳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常常能給人以醍醐灌頂的啟發，一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ISBN 978-962-8959-58-7



9 789628 959587 >

CE12

HK\$ 84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廿一世紀文庫

主編

潘耀明

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

——何方自述（下）

何方 著

責任編輯

趙潔儀

封面設計

李錦興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〇七年九月初版

ISBN 10：962-8959-58-1

ISBN 13：978-962-8959-58-7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TEL：2595 3215 FAX：2965 4715

<http://books.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mailto: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承印



# 目錄

總序：「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從《2000年文庫》到《廿一世紀文庫》

潘耀明

前言

第一章 少年時代（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年）

（一）改名換姓

（二）家住臨潼

（三）我的家庭

（四）並不幸福的童年

（五）偶然上學

（六）走向革命

（七）奔赴延安



## 第二章 延安歲月（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

### （一）進入抗大

初到延安

蟠龍入黨

轉三分校

### （二）緊張的學習

當了助教

學習俄文

### （三）整風前的延安生活面面觀

清貧簡樸的物質生活

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遍地的歌聲

經常的集會

活躍的文體活動

民主的氣氛和實踐

平等的人際關係

軍事化生活片段

四九

五〇

五〇

五五

五八

六〇

六二

六八

七一

七一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九

八一

八三

八六

(四) 勞動生產	九〇
(五) 延安整風	九六
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	九六
關於王明路線	九八
駁所謂整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風	一〇一
普遍整風	一〇二
張聞天找我談話	一〇二
學習整風文件	一〇五
批判王實味	一〇六
(六) 搶救運動	一〇八
何時開始	一〇八
我被搶救	一一二
甄別前後	一二二
(七) 告別延安	一三二
輕裝上路	一三二
回顧延安	一三四



第三章 東北四年（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一）到東北去

行軍路上

被留承德

前往瀋陽

轉赴北滿

中蘇友協

（二）在雙城作地方工作

初到雙城

「準備犧牲」

下鄉工作

兩項「業餘」工作

（三）南下土改

南下工作團

進軍遼南

分配到遼陽

改做青年工作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〇

一四三

一四六

一五〇

一五四

一五九

一五九

一六四

一六八

一七三

一七五

一七五

一八二

一八五

一九二

跟張聞天工作

一九四

對張聞天的初步印象

一九八

一段短暫的婚姻

二〇一

#### 第四章 在駐蘇使館（一九五〇——一九五五年）

##### （一）待命駐聯合國代表團

二〇八

代表團緣起

二〇八

談朝鮮戰爭

二一一

代表團解散

二一三

##### （二）跟張聞天去駐蘇使館

二一五

張聞天整頓使館工作

二一六

##### （三）當研究室主任

二三一

寫研究報告

二二三

##### （四）跟隨張聞天回國述職

二二八

國內參觀

二二八

戀愛結婚

二三一

張聞天改行不成

二三三



(五) 參加日內瓦會議

二三六

龐大的代表團

二三六

我的工作

二三九

一些花絮

二四一

(六) 離蘇回國

二四五

參觀列寧格勒

二四五

告別莫斯科

二四九

第五章 回到外交部（一九五五——一九五九年）

二五一

(一) 坐上了張聞天的「特別快車」

二五二

不是秘書的「秘書」

二五五

我的職務和兼差

二五九

(二) 主編幾種內部通報和刊物

二六一

《每周通報》

二六二

《國內情況通報》

二六三

《外事研究》

二六三

《外事動態》

二六四

《業務研究》

(三) 起草和修改各類文件

二六四  
二六五

參加起草國際問題文稿的「秀才」班子

二七〇

(四) 跟張聞天視察駐外使館

二七九

(五) 外交部的運動

二八三

從清查「胡風分子」到肅反

二八四

反右派

二八七

大躍進

二九四

(六) 張聞天的外交思想和幾個相關問題

二九六

張聞天同周恩來

二九七

張聞天和陳毅

三〇一

兩種大不相同的外交思想

三〇七

第六章

禍從天降的反右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

三一—

(一) 捲地而來的反右傾風暴

三一—

參加批鬥張聞天的全國外事會議

三一—

聽取中央領導講話

三一—



我對張聞天的揭發

三二〇

外交部內開始反右傾運動

三二五

批鬥劉英

三二五

批鬥許文益

三三〇

### (二) 對我的批鬥

三三二

接受批鬥

三三二

運動中的一些潛規則

三三五

### (三) 對我的結論和處理

三三七

## 第七章 飢餓線上掙扎的一年（一九六〇年）

三四五

### (一) 下放安徽

三四七

### (二) 農村情景

三五三

一貧如洗的農村

三五三

死一樣的沉寂

三五六

面對死亡

三五八

### (三) 「躍進」種種

三六〇

「繼續躍進」

三六〇

婦女能頂整個天

三六二

處處冒煙

三六四

風調雨順與顆粒無收

三六五

「庶民不議」

三六七

#### (四) 下放生活點滴

三七〇

組織生活

三七一

飢寒交迫

三七二

兩項紀錄

三七四

#### (五) 告別安徽

三七五

不辭而別

三七五

倖免留下

三七七

幾點體會

三七八

下放結果適得其反

三七八

對毛澤東思想的一點反思

三七九

困難時期與對外關係

三八〇

第八章 「文革」前五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

（一）調理身體 三八五

住進醫院 三八五

飢餓纏身 三八八

（二）出任綜合組組長 三九〇

服務外交鬥爭 三九一

中蘇關係 三九三

中印關係 三九六

雜務種種 四〇〇

（三）甄別和輪訓 四〇二

甄別平反 四〇二

參加輪訓 四〇三

進行甄別 四〇七

（四）參加「四清」 四一〇

調走又收回 四一〇

談談「四清」 四一六

「四清」經過 四一八



幾個問題

四二二

「三農問題」

四二二

農村幹部

四二五

關於工作隊

四二六

關於向貧下中農學習

四二九

## 第九章 被投進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

四三三

### （一）對外交部「文革」的一些看法

四三四

外交部「文革」的幾個特點

四三五

外交部「文革」經過三個階段

四三七

### （二）被投入「文革」

四四四

一回到外交部就成了牛鬼蛇神

四四四

抄家與破四舊

四四五

參加了兩個月「文革」

四四八

### （三）在被隔離的日子裏

四五三

形勢發生根本變化

四五三

對我的批鬥

四五五

隔離時期的生活

四五九

特殊身分

四六一

(四) 對造反派的一些看法

四六二

什麼是造反派

四六二

造反派的錯誤

四六四

造反派成了大籬筐

四六六

造反派的下場

四六九

第十章 九年幹校生涯（一九六九——一九七八年）

四七五

(一) 幹校探源

四七七

從辦幹校的決策談起

四七七

農村化的必然步驟

四七九

(二) 淒涼上幹校

四八二

押解去江西

四八二

專政下的幹校生活

四八六

先談勞動

四八六

次談監督

四九〇

再談批鬥

四九二

「群眾」新解

四九五

(三) 抓「五一六」

四九六

一般情況

四九六

抓「五一六」在幹校

五〇二

(四) 幹校的後五年

五〇五

開除黨籍

五〇五

後期的幹校生活

五〇九

後期幹校生活另一面

五一四

北京見聞

五一九

再回幹校

五二三

自行結業

五二五

第十一章 艱難平反路（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

五三一

(一) 等候復查

五三二

外交部沒有「平反」之說

五三二

等待復查

五三四

臨時工作

五三六

(二) 復查的交鋒

五四〇

第一次交鋒

五四〇

變與不變

五四三

「討價還價」

五四五

《審改決定》

五四八

(三) 幾點思考

五五〇

歷經三次甄別

五五〇

整錯了人要不要負責

五五三

黨內講不講平等

五五六

平反是否表示黨的寬大

五五八

爲什麼要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

五六〇

第十二章 恢復工作（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

五六五

(一) 離開外交部

五六六

(二) 爲張聞天平反

五六九

先向劉英作檢討

五六九

參加起草悼詞

五七一

編輯張聞天文集

五七三

成立編輯工作小組

五七六

維護張聞天的歷史地位

五七七

### (三) 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

小組簡介

五八一

加入小組

五八二

參加對外學術交流

五八六

參與上書中央

五九一

寫作小組的解體

五九四

### (四) 籌建國際片

五九八

## 第十三章 日本研究所（一九八〇——一九八八年）

### (一) 受命籌建

六〇四

偶然上馬

六〇四

與美國所共進退

六〇六

組建科研隊伍

六〇八



注重學風建設

六〇九

精簡行政事務

六一一

在任命所長上的小波折

六一三

### (二) 學科建設

六一五

有沒有一個日本學科

六一五

學科建設和機構設置

六一七

在學科建設中練兵

六一九

### (三) 全國規劃和學術交流

六二一

出任日本學科全國規劃組長

六二一

國內的合作與協調

六二三

對外學術交流

六二五

對台工作

六二九

### (四) 我的研究工作

六三三

研究生生活

六三三

關於日本研究

六三四

關於國際問題研究

六三九

幾個理論問題

六四一

關於和平與發展時代

六四一

關於鄧小平理論

六四八

(五) 幾則紀事

六五〇

一次免職事件

六五〇

一次拂袖退席事件

六五三

和鄧力群一席談

六五七

(六) 離開日本所

六六〇

第十四章 國研中心（一九八八——一九九五年）

六六五

(一) 崗位變了

六六六

兩頭兼顧

六六六

送走宦鄉

六六七

工作概況

六七〇

(二) 科研工作

六七三

蕭規曹隨

六七三

個人的研究

六七四

課題舉例

六七五

政策建議

六七九

科研活動

六八一

江澤民召開座談會

六八一

創辦年終討論會

六八三

「懷柔會議」

六八五

### (三) 關於「六四」事件

六八七

經歷「六四」

六八七

反思「六四」

六八九

一次和「四五」性質相同的群眾運動

六九〇

一次採用非法手段的宮廷政變

六九一

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一次轉折

六九一

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對外影響受到嚴重損害

六九二

損害了鄧小平原來的崇高威望和歷史地位

六九二

### (四) 十年政協委員(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

六九三

社會活動的重點

六九三

每年「兩會」

六九四

小組討論

七〇二

外地視察

七一〇

專項調查

七一六

(五) 離開國研中心

七二三

第十五章 離休以後（一九九九——二〇〇七年）

七三一

(一) 改行

七三二

學習黨史

七三二

「自傳」從口述變手寫

七三七

(二) 如何看待抗日救亡運動

七四三

問題的提起

七四三

一次廣泛深入的啓蒙

七四四

中華民族的最後形成

七四六

(三) 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

七五〇

過去對馬克思主義並不清楚

七五〇

對馬克思主義的幾點看法

七五二

馬克思主義掀起了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

七五三

馬克思主義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七五四

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回事

七五六

#### (四) 如何看待社會主義

七五八

兩大流派和兩種實踐

七五九

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七五九

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七六〇

兩種實踐，兩種結果

七六一

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

七六四

兩種社會制度的趨同

七七〇

#### (五) 如何看待共產黨領導

七七七

從列寧的建黨學說談起

七七七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背景

七七九

黨領導的歷程

七八二

「黨的領導」存在的問題

七八六

對存在問題的不同看法

七九六

#### (六) 關於中國的發展前景

七九八

中國現在是不是社會主義

七九八

問題不在稱號而在實質

八〇二



首先必須從黨的改革做起

八〇四

政治制度和政府機構的改革

八〇六

改革補課，任重道遠

八一四

總的看來還是有希望的

八一七

## 後記

邢小群

八二九

第八章

「文革」前五年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



北京，在安徽六安蘇家埠得浮腫病，回京後留影，  
一九六一年

## (一) 調理身體

從安徽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拖着浮腫得眼睛變成了一條線的重病身子去外交部報到。部領導章漢夫、姬鵬飛和辦公廳主任韓念龍大概看我這個樣子怪可憐見的，所以就安慰了幾句，說你現在先別忙着工作，把身體調理得好一點再說。我當然只有表示感謝。至於下放勞動情況，他們沒問，我也不便說，大約屬於心照不宣吧。韓念龍後來還特意來我們家看過我，帶來了一聽罐頭，使我感念至今。我當時也覺得這副尊容值得記錄在案，就去照相館照了一張浮腫相保存下來。

當時醫院好像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下放人員一回來得先打腸寄生蟲。我也很快吃了打蟲藥，第二天就打下蛔蟲好幾十條。那次也下放的丁民（後任駐日本公使）給我打電話，說他打下了一大碗「麵條」，還開玩笑說，我們本來就缺營養，還讓這些傢伙剝奪了一部分去。蛔蟲還好對付，鈎蟲和絛蟲可就麻煩了，要吃很長時間的藥。我是怎麼解決的，已記不清了，也可能是住院後才檢查處理的。

## 住進醫院

回到北京，生活和下放時比，已經到了天上。除每月糧食定量從十二斤提高到三十斤外，

更重要的是憑證購買一定數量的食油和其他副食品卻完全是從無到有，何況還享受到行政十三級以上幹部的一些特殊優待。由於建國後等級制日臻完善，司局級幹部在吃住和醫療上還有一定特權。給我的處分結論中央又遲遲批不下來，我也就只好繼續享受。那時司局級幹部還被稱作高幹，高等院校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也享受同等待遇。所以著名哲學家金岳霖在生前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就說，他直到「文革」都一直認為自己是高幹，為此還同梁從誠爭辯過。後來大概由於司局級幹部已多如牛毛，這高幹的稱謂才提升到部級。不管怎樣，我當了一陣高幹卻並不是瞎吹的。其實，自從部黨委對我做出撤職處分後，我就已自感心虛，下放回來後也不敢再去北京醫院看病了。因為按當時規定，非司局級十三級以上幹部的醫療關係在朝陽醫院。等結論一批下來，我就只能捨近求遠，跑到東郊的朝陽醫院去看病了。但這時候怎麼辦呢？由於心虛，先去請示韓念龍。他說，你的醫療關係在北京醫院，那就還到北京醫院去看病。到醫院一看，大夫說是缺乏營養，身體一些功能失調，給開了維他命B12和酵母片。我說這酵母片是幫助消化的，我現在是不夠消化，哪裏還要幫助。他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酵母片是高蛋白，正是你目前需要的。於是我就拿回來當藥吃。

這類藥實在治不了病，身體仍感到極度虛弱。一天早上正在刷牙，不知怎麼搞的，撲通一下跌坐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宋以敏趕緊把我送到了阜外醫院。因為北京醫院當時正在大修，所以就一時把阜外醫院變成了北京醫院。醫生看後竟說查不出什麼特別毛病，讓我先回家



觀察幾天看。過了幾天，倒是可以站起來走幾步，但其他病情未減，再去看就留下住院了。雖然我是待罪之身，但醫生和病友們並不知情，對我毫無歧視，使我過上了一段好日子，特別是伙食比家裏強多了。那時住院吃飯也是有定量的，每人一份，由護士送來。我那一份總是不夠吃，但也有些人吃不完，如著名教授何思敬、號稱話劇和電影界「四大名旦」之一的舒繡文（另三人為白楊、秦怡、張瑞芳）等，他們的飯量就小些。可我總不能把別人吃剩的飯菜拿過來吃呀，即使有此想法，也只能忍耐。住院沒有別的事，白天看看書報、聊聊天，晚上看看電視（那時北京醫院有一台小電視機，只給幾十名「高幹」看。一陣直播在北京舉行的世界乒乓球比賽，大家興趣很大），教練氣功或講其他保健知識。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感到日子過得蠻舒適。

在醫院大約住了兩個月左右，經過幾次會診，始終沒有得出最後結論，也沒開出有效治療藥物，但身體還是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和恢復，於是就被醫生判定可以出院了。因為當時浮腫帶有普遍性，只要面部沒有明顯浮腫或其他嚴重毛病，單是兩腿浮腫是無需再住院的。我雖然病癒出院，但這兩腿浮腫卻持續了好多年，醫生也一直沒有說出個病名和病因。直到現在，遇到節氣變換時，浮腫仍然要復發一陣，只是不大礙事。這算是三年困難給我留下的長期紀念。那次住院，雖然沒有治好我的浮腫，但是改善營養和每天治療，還終於使我的身體基本上得到康復，達到可以進行正常工作的程度。另外一個附帶收穫是，學了點自我按摩並一直堅持下來。

這對於我至今能夠做到耳聰目明、發不脫、牙不掉、腰不駝、腿不癩，可能多少有點關係。出院後不久，我的醫療關係就被轉到了朝陽醫院，從此也就和北京醫院永遠告別了，雖然那裏還有我的病歷檔案。

### 飢餓纏身

回到北京，供應已大為改善，但還是整天感到餓，總是吃不飽，飢餓的感覺一直纏繞了許多年。腸胃功能不知發生了多麼巨大的失衡和紊亂，好像什麼東西都能消化，不但在下放期間一天可以吃一大堆蘿蔔，就是回到北京後也表現出驚人之舉。例如一次延安老同學付克、何路夫婦請我和同時下放回來的羅焚吃飯，是慰勞一下我們的意思，把他們積攢的一大碗鴨油拿來拌菜吃。結果我和羅焚竟把那碗鴨油一勺一勺地舀着喝光了，引得大家瞠目結舌。我們的腸胃後來也沒因此出現過任何不適。

一九六一年，全國仍然處在嚴重的饑荒中。我雖然生活大有改善，但也還是一天到晚感覺餓得荒。幫我們看小孩的保姆范耀榮極為善良，她自己忍着餓，總要讓我和孩子吃得多一些好一些。我當然不忍心多吃多佔，所以吃飯時總要適當照顧到她。大約有好幾個月我還沒班上，就整天呆在家裏讀書看報。飢餓可以使人降低道德和倫理標準。我就有好幾次在家裏偷吃過東西。當我感到實在餓得不行，又戰勝不了廚房「剩」飯「剩」菜等食品的誘惑力時，我曾

趁范耀榮不在家的機會去偷吃過幾口，然後將現場復原，使她看不出來。這種偷吃自家東西的行爲，我也從來不好意思對人談起。

雖然毛主席絕不認錯，在那種嚴峻形勢下仍然要堅持高舉「三面紅旗」，但爲了喘口氣，也不能不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讓點步，例如允許某些國營商店限量出售高價糖果和糕點（要糧票）、一些飯店供應高價食品菜餚。這樣一來，我的生活又有了一點改善的餘地，買點糖果糕點存放起來必要時解饑。記得一次老同學李則望來看我，我就拿出糕點招待，不想這位老兄一塊又兩塊、兩塊又三塊地一直吃到快完。我不但沒敢陪他吃，還真有點感到心疼。另外，每個禮拜六接大兒子從幼兒園回家時，總要在金魚胡同的和平飯店一人吃一盤二兩炒麵（因要糧票，不能多買）。而這小傢伙每次都是吃着他的看着我的，嘴裏還一直喊着「我還要，我還要」。我往往只好忍痛再分給他一點。但問到他在幼兒園吃飯情形時，他也和我們下放幹部說一樣的話：「吃得飽，吃得好。」只是有時一不留神會偷偷講，老師讓這樣說的。可見幼兒園也在教孩子們說謊話。除國營副食店和餐飲業開了一條小縫外，也有些農民進城偷賣少量農副產品。例如就有農民在街上偷賣羊肉。宋以敏得知後，也花錢買了一隻羊腿，拿回來給我補充營養。但不久，外交部黨組織又專門抓應該如何正確對待困難的問題，要大家交代有沒有私自購買食品等行爲。宋以敏政治上膽小，就在爲此而召開的會議上作了交代，也挨了批評。所以當時改善生活的活動餘地還是極其有限的。特別是我們這些「犯錯誤」的人，更得嚴格要求，

注意自律。

這種一直處於飢餓狀態的感覺，延續了四年，逐漸有所好轉，一九六五年參加「四清」後又加重了。不過這是後話。現在要說的是，在這四年中，我還當了兩年多的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組長。

### （二）出任綜合組組長

經過半年多的調理，我的身體已經恢復到可以進行正常工作、和一般人差不多的程度。正好這時部領導找我談話了。記不清是哪幾位，大概還是章漢夫、姬鵬飛、韓念龍吧。談話的中心意思是要我當綜合組組長，簡單介紹了一點情況，就讓我盡快上班了。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因為他們說我是「駕輕就熟」的。我當然也沒有什麼意見，第二天就去報了到。到辦公室一了解，我原來所在的由專員、科長級幹部組成的綜合組已解散，人員另行分配工作；新的綜合組完全是新人，其中除一名科長田進主持工作外，其餘均為科員，就是說在等級上降了一級。至於工作任務，除重要文件的起草把關和政策研究外，其他業務如編寫內部通報刊物、起草某些一般性文件、處理綜合性外交事務等，還是一仍其舊。我個人除管綜合組外，也常被拉去參加辦公廳原來的一些工作，以致上下許多人長時間以為我還是副主任。因為批鬥後的處理始終是暗箱作業，一直沒有向全部群眾傳達給我的處分，所以知道的人反而很少。但我自己心裏明



白，並且採取了「低着頭走路，夾緊尾巴做人」的方針，甚至見人也不先打招呼，實行被動制。工作上嚴守分工界限，決不越權和議論份外的事。對這一方針，人們當然都能理解，只是勸我不要揹包袱。在一九六二年處理中印邊界衝突事件時，耿飜和黃鎮兩位副部長就專門找我談話，要我在工作上大膽放手，不要有什麼顧慮，說部領導是充分信任我的，等等。在綜合組的支部生活會上，大家也希望我放手領導，副組長田進還特別表明，全組同志對我都是尊重的，願意得到我的幫助和培養。一次在街上碰到時任亞洲司司長的章文晉，我照例採取被動制，結果被他半開玩笑地大訓一頓，說「你裝什麼蒜，見了人都不理」。但我基本上還是按既定方針辦。經過全部黨員群眾性的批鬥和幾乎是人人人口誅筆伐之後，在外交部我已經不願見人，也有點抬不起頭來，倒不一定是真的感到自己一切都錯了。至於工作，我從來都是認真負責的，決不會消極怠工或馬虎敷衍。這點，直到現在也還不會有人否認。所以在那些年月裏，不管叫幹什麼，也仍然是認真對待，全力以赴。到綜合組，也是一天到晚忙個不停，只是感到有點悶。因為我是個直來直去又喜歡說話和愛開玩笑的人，曾被張聞天批評為「調皮的中學生」，現在要自我克制，保持沉默，有話沒處說，實在有點悶得荒。

### 服務外交鬥爭

由於要編內部通報刊物和負擔一點綜合性的外交後勤事務，所以就需看許多有關外交和

國內情況的電報和機密材料。這就使我在中斷一年多以後又對外交鬥爭和國內形勢有了一個稍爲全面的了解。總的印象是，無論內政還是外交，一九五九以後都發生了帶有轉折性的變化，就是繼續和大幅度向「左」轉。我在任上的幾年（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向駐外使領館通報的國內情況，內容可概括爲：經濟上，在堅持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的一些調整，使國民經濟得到逐步恢復；政治上，從反右傾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奪權」（當時估計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基層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上面有些組織也「爛了」），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尖銳，引起的黨內鬥爭也愈來愈複雜。當然，我們的主要任務還是爲領導了解形勢和開展外交編點資料，也做一些外交的後勤服務工作，所以更多接觸和注意研究的還是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我當時的感覺是，在一九五九年後的那幾年裏，我們的對外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改變，同國內大抓階級鬥爭相呼應，對外逐步展開了打倒「帝修反」的全面出擊和加強了對世界革命的支援。這個時期反的帝，當然是美帝，包括一九六〇年起的援越抗美，反對美帝製造兩個中國和侵犯我國主權，加強反美入侵的備戰。再就是對美國的成千次警告和不斷的大規模群眾集會遊行（一九六二年就有十來起，例如二月四日集會抗議美國迫害剛果共和國代總理基贊加，一年前也曾爲抗議殺害該國總理盧蒙巴舉行過五十萬人的集會遊行和全國下半旗致哀），這些主要還是起造聲勢的作用，以表明我們帶頭反帝。因此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也還是在物質上大力支持兄弟國家（朝、越、阿爾巴尼亞等）和世界革命。不過從我和綜合組所做的那點後勤工作看，這



幾年的外交，主要還是同蘇聯（「修」）和印度（「反」）鬥。一個涉及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一個影響到民族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所以值得分別說一說。

### 中蘇關係

對蘇關係的「一邊倒」，本來是毛澤東為新中國外交政策定下的基礎。他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承認，說我們從一九五八年起才開始實行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以前只能學蘇聯靠蘇聯。但從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上的表現人們已明顯看出，他已經不再把赫魯曉夫放在眼裏。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了東方，領導世界革命的重擔歷史地落在毛主席的肩上。這是幹部的普遍認識，也是中蘇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當然，這方面的問題很多，在看法上至今也還存在原則性的分歧。例如對蘇方背信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設計資料，現在就應當重新看待。因為中國後來把蘇聯當成主要敵人，準備和它打仗了。按照鄧小平所說，國際關係的基礎是國家的戰略利益，既要維護本國的戰略利益，也要尊重別國的戰略利益。既然如此，那就應當承認，蘇聯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起碼就不合乎它的戰略利益。又如在我們有了原子彈以後，一次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訪華，提出要借我們的原子彈在他們國慶檢閱時展出，嚇唬嚇唬美帝和蘇修，然後立即歸還。這個問題連我這樣的小幹部得知後都覺得太可笑，中央自然給謝絕了。不過對中蘇關係怎麼看，這裏先不談它，只講幾個在工作中遇到的特別難辦又必須掌握的問題。

一是黨國不分。對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來說，黨和國家是一回事，是根本不分的。因此，兩黨之間的爭論，也就是兩國之間的爭論。上面的決策，本來就出自同一個人或幾個人組成的小集團。所以從一九五九年兩黨領導人爭吵後，中蘇關係就隨之惡化，整個國際共運也走向分裂，到一九六〇年更完全公開化了。在我們編寫發給駐外使領館（《外交通報》）和國內領導機關（《外事動態》）的資料中，黨國關係也是從來不分的。只是必要時加注一句「對外表態按公開口徑」。因此，後來說「蘇聯領導人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實在是站不住的。

二是「內外有別」。這個詞彙要打引號，因為除了人們一般的理解外，更重要的是還有兩個特殊含義。第一，這個「內」，只是指黨內最高領導層和一些具體執行的人如寫作班子和有關單位，其他就都算「外」了，包括黨內相當高的幹部和廣大黨員群眾。所以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在最高層，中蘇關係已經走向破裂，但在下面的反右傾運動中，包括外交部，還有因為說了蘇聯的「壞話」而受到批判，甚至給戴上什麼帽子的。第二，公開說的和表面做的並不是實際的認識和政策。例如一九六四年就已經認定蘇聯加緊了對我國的軍事威脅，我們也把備戰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搞大小「三線」的調整，但一九六五年毛劉周朱在十月革命節給勃列日涅夫等的賀電中，還要說中蘇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是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在這種「內外有別」的條件下，我們這個小單位也並不了解全面的真實情況，就是對了解到的情況也不能全盤

托出，所以在編寫內部資料時，對於哪些能寫，哪些不能寫，就要再三考慮，仔細斟酌。何況上面並沒有專人把關，出了問題只能首先由我負責。這對一個才受過嚴重處分的人來說，確實感到很為難。

三是變化太快。建國後十年，我們對國際形勢的主要看法和執行的對外政策，基本上還是「一邊倒」，把美國看成主要敵人，處理其他國際關係也以美劃線。但是進入六十年代，對形勢估計和外交政策就發生了根本變化。昔日的敵人仍然是敵人，昔日的朋友也變成了敵人。在國際上同時以美國和蘇聯劃線，使中國對外處於全面出擊狀態。一九六五年陳毅外長在人民大會堂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就曾經在世界上引起一陣轟動。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的：爲了反對美國侵略，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歡迎他們早點來，明天就來。讓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印度擴張主義一起來吧！趁着我們這些老傢伙還在，乾脆打完了再建設。還說，聯合國必須徹底改組，憲章要重新審定，帝國主義的一切傀儡都要驅逐出去，等等。實際上六十年代上半期還是個過渡時期，就是從「一邊倒」最後過渡到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和以蘇劃線。正因爲是過渡時期，所以一切做法和提法的變化就顯得突然和迅速。例如蘇聯在三兩年內就從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已經復辟了的社會帝國主義。又如對印巴衝突，我們原來是支持印度的，一下子就變成支持巴基斯坦了。我們一直強調和堅持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現在連和平共處這個詞彙都不能再提了。變化之快讓人眼花繚亂。但不管你思想

認識如何，工作上還必須緊緊跟上。

四是以蘇劃線。這已在上面提到，現在要談的是中蘇關係不只是兩國之間的關係，而是涉及到中國的全面對外關係。撇開西方陣營不談，直接影響的就有三大塊。一塊是社會主義陣營，分裂後大部分國家跟蘇聯一起反華，少數幾個國家持不同偏向的中間態度，只有阿爾巴尼亞完全和中國站在一起。一塊是發展中國家，原來那些選擇非資本主義道路和執行和平中立外交政策的國家，多數同中國關係變得疏遠，少數採取敵對態度；原來那些親西方的國家多持觀望態度，在看西方國家態度的變化。還有一塊就是國際共運，除少數幾個小國小黨外，幾乎整個國際共運被認為變修了，也幾乎所有大國大黨和它們的領導人都受到指名批判。

單從以上談到的幾點就可以看出，一九五九年後中蘇關係的急劇變化影響是多麼地大，不但使中國在國際上處於空前孤立狀態，而且對國內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連國內宣傳教育等意識形態方面原來照搬蘇聯的一套也都想改過來（實際辦不到）。這該是多麼大的工程呀！這種局面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我主持綜合組工作時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所以一九六一年回到外交部再上班後，一次遇到李匯川，他還頗為幽默地說了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 中印關係

建國後的十年，可以說中印關係是中國同所有民族主義國家關係中最友好和最突出的。但



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形勢發展急轉直下，印度成了中國要打倒的「帝修反」中「反」的代表。中印由友變敵，一下從「印地—秦，巴伊巴伊」的兄弟友好關係，變為兵戎相見的敵對關係。這既是中印矛盾激化的結果，也是中蘇分歧加劇的反映。印度本來就總想繼承英帝國在西藏的利益和特權，達賴出走後，它又讓達賴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還干涉中國的平叛活動。這時赫魯曉夫在中蘇會談中也批評中國不應該放走達賴，又說是中方挑起中印邊境衝突的，特別是塔斯社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更使毛主席感到惱火。於是中印衝突和中蘇分歧就繞在一起，迅速地升溫了。進入一九六二年，中印間更不斷發生邊境衝突和打起相互抗議的筆墨官司。直到十月，中國發起自衛反擊作戰，長驅直入，把印度邊防軍打了個落花流水，一時傳說印度首都準備搬家。打了一個多月，中國宣布停火和後撤，結束了邊境武裝衝突。中方不僅撤出作戰中收回的地區，還從戰前的實際控制線單方面後撤二十公里（李一氓曾私下對我說，這實在是幹了一件愚蠢的事）。

中印兩個大國之間的武裝衝突，自然會引起國際上的密切關注和強烈反應。很自然，反應對我國不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是站在印度方面的，認為印度是受害者。爲了闡明中國的立場，周恩來總理給亞非二十多個國家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同時抄送其他八九十個國家的領導人。這樣一來，我也就增加了一些不屬於綜合組的份外工作，其中一項是參加辦公廳主任領導的輪流值夜班。因爲毛澤東一定要堅持他在打仗時養成的白天睡覺晚上辦公的習慣，

所以各單位也不能不重視夜間值班。周總理和他的辦公室就經常問到當天外交部工作的某些情況和給佈置什麼任務，找誰呢？自然是外交部辦公廳。可當時辦公廳除主任韓念龍外，副主任好像只有賴亞力和岳良兩位。由於輪流太快會影響白天工作，於是拉上我應卯，他們也知道我比較熟悉。爲了說明這值夜班的具體情況，這裏只談中印鬥爭中的兩件後勤工作。

一次是周總理接見亞非友好國家大使。在中印衝突緊張期間，印尼、埃及、緬甸等國積極進行斡旋。一天大約已到晚上十一點前後，總理辦公室突然通知，總理要緊急約見亞非一些友好國家駐華大使，向他們解釋中方對中印衝突的立場。爲了尊重有關各國，除通用的英文翻譯外，還要配備印尼、緬甸、埃及等國語言的翻譯，並通知有關司領導陪見。這可抓瞎了。當時外交部除英、俄、法等通用的大國語言外，沒有幾個小國語言的翻譯，即使在有關的地區司。要找小國語言翻譯，只能找有關地區司和向中央廣播電台借。而所有翻譯家裏也都沒安裝電話，要他們出來工作必須派車去接。但全部夜間值班的汽車又只有四輛，找其他司機，也得派人到家去敲門，因爲北京根本沒有出租車。還有一件麻煩事，就是通知地區司領導陪見，可誰願意半夜三更去幹這類事呢？例如我打電話找亞洲司司長章文晉，半天沒人接，最後他起來說，他今天有點不舒服，要我通知何英（副司長）去陪見。我又給何英打電話，何英也是過了一陣才接電話，說他頭疼得厲害，還是請文晉去吧。而且有的司長晚上乾脆把電話掐斷了，根本撥不通。弄得我實在沒辦法，只好矛盾上交，把常務副部長章漢夫叫醒來。漢夫辦事

歷來認真，而且就住在外交部斜對門，所以他乾脆穿好衣服走到辦公室來了。他一坐鎮，事情也的確好辦多了。其實，具體操作仍然是我在那裏打電話，只是用他的名義。有的也請他直接說幾句，如給廣播電台領導說，讓他們派車把緬甸語翻譯按時送到總理接見大使的地方，對方當然只能照辦。至於在部內的調人派車，就不用麻煩他了。通知司長陪見，只要說，漢夫同志要你某時前到部裏來一同乘車去陪總理接見幾位亞非大使，也就很靈了。事情辦完，章漢夫臨走前還開玩笑說，「你這是書生辦事」。實際上他也知道有沒有他的坐鎮和用不用他的名義是大不一樣的。

另一件事是，發送周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給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對建交國比較好辦，送交它們的駐華使館或由我駐外使館轉交都行。問題在於那時同大多數國家沒建交，得用國際郵件發去。但寄信必須寫明地址，這就難辦了。不光許多國家外交部所在城市特別是街名搞不清楚，甚至一些小國的首都也不知在哪兒，鬧了不少笑話。總理又要求限期發出，急得辦公廳和地區司到處查詢打聽，最後還是漏掉了一些小國。

從歷史角度和實際效果看，把印度當局當作要打倒的反動派來鬥爭，特別是進行所謂自衛反擊作戰，都是國內極左路線的延伸，不但導致當時在國際上的孤立，而且給中印關係和雙方民族感情帶來長期的消極影響。兩國間再也無法恢復頭十年那種友誼，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更難解決了。可惜這方面的教訓並沒有得到重視，更沒有汲取，後來又發生了對越南的所謂自



衛反擊作戰。

### 雜務種種

綜合組的業務，除調研和寫作外，也還起辦公廳內「不管部」的作用，凡是其他單位不管的事情就都「綜合」到我們這裏來了。我把這些通統稱之為雜務，名堂還真不少。這裏只舉兩個例子。不然說起來也沒完。

一是審定有關稿件。外交部文電的把關，和周總理報告及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我自然沒資格再參與了，但是有些沒人管的審稿工作卻指定由綜合組承擔。例如當時組織全國力量編纂《辭海》，按照統一規定，有關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詞條要經外交部審定。我們擔負的工作有兩項。首先是詞條來後由我們分類交部內有關單位去審，雖然有時也發生扯皮，有些單位退回來說不歸他們管，但總還比較好辦。費事的是分不出去的詞條得由我們審，其中就有不少麻煩。有些屬於學術爭論的問題還容易些，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於何時，你寫上兩種說法或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問題都不大。但屬於政治爭論的問題可就難辦了。當時談論緩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甚至和平這類詞彙，實際上都屬於禁區，報刊上已經很少見。但你《辭海》總得有吧，有了，怎麼寫釋文，誰也沒把握。於是只好請示中宣部。好在我和先任國際宣傳處處長後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姚溱原來就熟，拿起電話和他商量。他的答覆也許現在人們很難相信。他說，可以考慮緩和、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類難度大的詞條乾脆不要上書。我們

當然樂於照辦。後來出版的限於內部發行的兩卷集《辭海》（未定稿）果真就沒有了這類詞條。

二是處理國慶賀電。每年國慶，建交國領導人都要來賀電，許多是明碼，新華社都可收到。但不管是怎麼來的，都得由外交部統一處理，如哪些必須登全文，哪些只登摘要，哪些綜合成一個消息提到名字即可。另外，見報和廣播的次序也有嚴格規定，哪家在前哪家在後不能亂來。我在綜合組的那兩年，處理賀電指定我負責，再調禮賓司的羅思源和新聞司的劉蘊清協助，幫我跑腿。按那時的規矩，賀電發表順序是阿爾巴尼亞第一，朝鮮第二，越南第三，羅馬尼亞第四，其餘電報也得先分類，分類後再按來電時間先後排列。而打頭的阿、朝兩國，又都是電文最長、來得最晚，使《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總是不斷催問。我們也只好從白天等到晚上，必要時也要催問使館。一次是直到後半夜才處理完，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也沒能按時印發。每次國慶後，我方還要以相應領導人的名義回電答謝。復電由禮賓司或有關地區司草擬，交辦公廳統一交外辦上報審批。一天晚上我值夜班時，只見外辦將全部復電送回，每份都是時任外辦副主任李一氓批的「照發」。我一看，覺得不妥，立即給李一氓打電話。我說，「氓公，按照歷來的規矩，凡是毛主席署名的電報都得報請主席本人審批，這次不知是誰授權由你審批了？」他說，「這些純屬禮儀性的東西也用得着送毛主席嗎？」我說，「看不看是他的事，但總理是歷來送批的。不但用主席名義發出的電文，就是一些重要宴會的邀請名單和菜

譜，總理都不敢做主，要寫上『請主席批示』送呈，毛主席劃圈或修改（如增加出席的人）後才算數。」氓公一聽，隨即說，「那你趕快派人給我送回來。」從這點小事也可看出周恩來所說「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含義和毛主席集權的程度。

### （三）甄別和輪訓

#### 甄別平反

我到綜合組的前後，大約是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就已經發出一個指示，要求對一九五八年以來批判和處分錯了的幹部、黨員進行甄別平反。這是由於兩年多的嚴重饑荒已餓死幾千萬人，經濟幾近崩潰，國際上又極為孤立，而廣大幹部在反右傾的陰影籠罩下，也不敢大膽放手積極負責地工作。面對這種情況，提出甄別平反，就是想減輕反右傾這股惡風對幹部、黨員的威脅和壓力，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克服困難、走出危機。但是由於還硬要維護三面紅旗和堅持反右傾的正確，就使這次甄別缺乏明確的是非標準，加上一貫執行的保護積極分子政策（整錯了人不但不會受到批評處分，還往往得到提升重用）和缺乏自我批評的傳統（各級領導多以一貫正確自居，對製造冤假錯案主動承擔責任的很少，進行懺悔的幾乎沒有），所以這項工作阻力很大，拖拖拉拉，很難推動。運動中對人進行批鬥和戴帽子容易，可事後要給人平反

就不易了，要自己認錯和承擔責任更難辦到。由於進展遲緩，影響經濟的調整恢復和社會生活的正常化，中央又於一九六二年四月發出加速甄別工作的通知。過了一陣，鄧小平總書記乾脆提出，凡搞錯或基本上搞錯的，一風吹，不留尾巴，一次解決。這樣一推動，到八月份全國就有六百多萬人得到平反，縣以下基本上都是一風吹了。但是各機關、各系統和各地方，主要還得看有關領導的態度，開明一點的就會處理得好一些。根據我個人的親身體會，外交部就沒有認真進行甄別平反，不但時間推遲了將近一年，而且採取的方法也是暗箱作業。在反右傾運動中的批鬥是公開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甄別工作卻只由專案組幾個人按照領導指示暗地進行。所以外交部的黨員群眾包括絕大多數各級領導幹部，都沒有聽到過有什麼人得到平反，仍然是是非不分，更不存在搞錯或基本搞錯的問題了。這樣一個全國性的活動，又在外交部這個因張聞天而成爲反右傾重點的單位，進行了一兩年的甄別平反，竟然悄沒聲地，在大家不知道的情況下算是結束了。以至於身爲部長助理的宦鄉始終不清楚我受的處分，在一同參加「四清」時還向當地組織介紹我是辦公廳副主任，因而在「文革」中受到地方造反派的追查。

### 參加輪訓

由於外交部的甄別平反是極少數人的暗箱作業，所以對我的甄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怎樣進行的，直到現在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在中央提出甄別平反後大約一年左右，都沒人找



我談到這件事，也沒聽到有什麼人得到甄別平反。可見外交部對這項工作並未抓緊進行，而是採取了觀望態度。在中央提出甄別平反三個月後又做出輪訓縣團級以上幹部的決定，外交部倒是比較早一點地執行了。所以我在得到甄別前先是參加了一次輪訓。

在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發出輪訓幹部的決定後，外交部領導很快就做出了安排，並於一九六二年初開始了科長以上幹部的輪訓。我參加的記不清是哪一期，反正時間為二三月，有百餘人左右，包括部領導的姬鵬飛、韓念龍等人，地點為東交民巷十五號。輪訓的目的不是要總結大躍進、公社化的經驗教訓，而是要提高幹部對三面紅旗的認識，克服在實際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錯誤。所以輪訓期間，大家的發言都很小心謹慎，可以談點具體缺點，但沒人敢涉及三面紅旗。我當然也不敢隨便亂講，連下放勞動時幾乎餓死都很少提到。後來領導上決定拿出幾天時間議論一下外交部的反右傾運動，而且承諾言者無罪。於是我也真的實事求是地「言」起來了。這樣做的結果是不用說你也會知道的。

由於我是反右傾運動中，在全部受批判時間最長和受處分最重的一個當事人，所以一開始聯繫實際，大家就讓我先發言。我雖然對三面紅旗沒敢碰，但是關於個人的問題，還是決定把兩年多來一直憋在肚子裏的悶氣吐一吐。我有意避開全國形勢不談，只講外交部黨委給我作的結論，一樁樁一件件以具體事實提出反駁。例如說我「猖狂地、系統、全面地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還「狂妄地要毛主席作檢討」，就都是無中生有；把我為部領導傳

送文件的正常工作和應負責任，說成是「背着組織」爲張聞天提供「反面材料」；說我「完全同意和積極支持張聞天在外交路線方面的一整套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則是本身就定性不正確，等等。我在發言中最後概括爲一句話，就是「部黨委在反右傾運動中給我做的結論，沒有一句話是有充分根據的」。在我發言後，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和更正，確實也沒有人公開在會上支持我的發言和要求給我平反。但背後議論中多數人是同意我的申訴的，也有人私下跟我談過。例如曾經和我一同當過辦公廳副主任的林申，就是一個。他不但同意我的發言，也申訴他的冤枉。由於一時相互同情，又一起工作，了解情況，所以上學習班期間我同他的私下議論也最多。

由於對待黨內鬥爭和黨內生活的態度不同，所得結果也完全兩樣。林申就採取了和我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態度。他雖在下面和我議論發牢騷，但在會上不急於發言表態，而是最後作了一個沒有內容卻表情沉痛的檢討。他承認犯了錯誤（其實，無論從當時的觀點還是現在的觀點看，他都沒犯什麼錯誤，只是因韓念龍毫無根據地說他是張聞天安在辦公廳的一顆釘子而倒楣），既不說犯了什麼錯誤，更沒講錯誤的性質和後果，只是一再空洞地說，自己參加革命這麼長時間，還犯這麼大錯誤，實在辜負了黨的培養教育，對不起犧牲的先烈等等。我乍一聽林申的發言，大吃一驚，下面不是說得好好的嗎，在會上怎麼來這一套？後來人們才看到，兩種態度也帶來了兩種結果。林申被認爲態度好，輪訓後不久就被派出國當了參贊，「文革」期間

又升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我則被認為態度不好，姬鵬飛找談話進行批評，問題也就掛起來了。

在我發言後不久，作為輪訓班主任的姬鵬飛一個晚上把我找到他家進行個別談話。他的態度倒挺好，勸我端正態度，着重挖掘思想上受張聞天的影響。他也承認，過去對我有些問題上綱過高，處分也過重，本來就打算減輕一點，「但你也應該以正確的態度對待自己的錯誤呀！」我還是照直講，認為我同張聞天只是工作關係，並沒有跟他反黨反毛主席，也沒有反過三面紅旗，結論上給我列的罪狀都是沒有根據的。

正談着，當時出任駐敘利亞大使的徐以新來了。他是回國述職，先要看看部領導。按道理，我見客人來應當退出，但我沒有。因為當時心想，你這是禮節性的拜訪，無非是問候問候領導，送點國外帶回的禮品；而我可是生命攸關的大事，好不容易能跟姬部長談談，所以坐着沒動。他們先寒暄了幾句，又談了一陣閒話，徐以新大概看我根本不想走，於是他只好先行告辭，說聲你們繼續談，然後站起來從書包裏拿出兩瓶多種維生素送給姬鵬飛，要姬保重身體。徐以新走後，我們還談了一陣。姬鵬飛只說些大道理，不具體回答我對結論的意見。

事後想來，他的用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希望我學林中的榜樣，給人以態度好的印象，以有利於減輕給我的處分。但認為我有錯誤（思想右傾、跟張聞天搞宗派），必須給予處分，不能平反，則是在外交部領導思想中根本沒有動搖過的。要不然的話，中央提出甄別平反後，對



我完全可以一風吹。因為即使按當時的標準，對我的處理也是一件冤案。而且爲我這樣一個司局級幹部平反，上面肯定不會追究，也正合乎陳毅先前說的張聞天問題不能連累身邊工作人員的承諾。那部領導爲什麼對我堅決不放手呢？因為黨內還有一個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傳統和潛規則，就是沒有人願意對整錯人的運動和運動中整錯的人承擔責任，因此也就不願意爲自己製造的冤假錯案平反，更不用說進行檢討和懺悔了。正是在這個傳統和潛規則的支配下，凡是參與批鬥過張聞天的外交部部、司兩級領導人和大使們，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當時批錯了和作檢討。中央爲張聞天平反了，但在外交部，長期以來仍和沒平反一樣，連有些扭曲的史實都沒糾正過來。對張聞天尚且如此，對我還能怎麼樣呢？要不是「文革」後胡耀邦搞平反冤假錯案，那也只能冤沉海底了。

### 進行甄別

外交部是怎樣進行甄別的，有什麼人得到平反，我不知道，但對我進行甄別，政治空氣已發生重大變化。外交部黨組織對我的甄別觀察等待了一年多，現在解決問題的機會來到了。

面對人禍造成的三年嚴重災難，毛澤東不能不容忍一些不滿的言論和牢騷，在政策上作點有限的讓步，但心裏是並不高興的，一有機會還會老帳新帳一起算。在七千人大會上，站在前台的劉少奇，面對三年困難的慘景，不得不承認是「七分人禍」（其實已經打了折扣）造成



北京，外交部傳達七千人大會學習班辦公廳組，前排右起何方、楊廣仁、韓念龍、  
姬鵬飛、林中等，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

的，但爲了照顧毛澤東和維護廬山會議反右傾，又毫無根據地說彭德懷陰謀篡黨和裏通外國。這迫使彭大哭一場，寫出了八萬字的申訴書。而這時，也就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三年困難已經得到緩和，毛澤東不再忍耐了，於是提出大抓階級鬥爭和反擊「三風」，即所謂「翻案風」、「黑暗風」（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單幹風」（包產到戶）。還明確講，「近來刮平反之風不對，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這是寫在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上的原話。想想看，在這種形勢和氣氛下，對我的甄別能有個好？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對我進行了甄別。所謂甄別，並不真的要核對事實、分清是非，也不是提交原來進行批鬥時參加的人去討論通過，而是由機關黨委辦公室一位女同志拿出給我改寫過的結論，徵求我的意見和要我簽字。內容是，在定性上有所緩和，如將右傾機會主義改爲嚴重的右傾，將反黨宗派改爲宗派活動，就是說戴的帽子比原來小了點，但是帽子仍然戴着；處分也有點減輕，將留黨查看一年改爲嚴重警告，撤職改爲降職，行政十三級恢復到十一級，就是說只增加了一點工資。我看後覺得所列錯誤缺乏根據，定性和處分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因此要求核實事實、改變定性。大概先後談了好幾次，雖在文字上有些修改，但定性和處分因爲是部黨委早有指示，她是奉命行事，所以只能盡量勸說，爭取同意簽字。但我仍然認爲，我沒有任何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行，同張聞天也是正常的工作關係，希望結論能盡量實事求是。後來可能是部領導不讓再拖了，讓辦案的同志改勸說爲施壓的做法，所以機關黨委書記找我談話就



來了硬的一手，警告我說，現在正在反擊「翻案風」，你要再不醒悟，會因為態度頑固不化而得到加重處分，那可就後悔晚了。這時已傳達了九月召開的十中全會精神，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大批所謂「三風」。在這種形勢下，我知道又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同時也真怕加重處分，所以對改定的結論就有保留地簽了字。外交部對我的所謂甄別就這樣算是結束了。

#### （四）參加「四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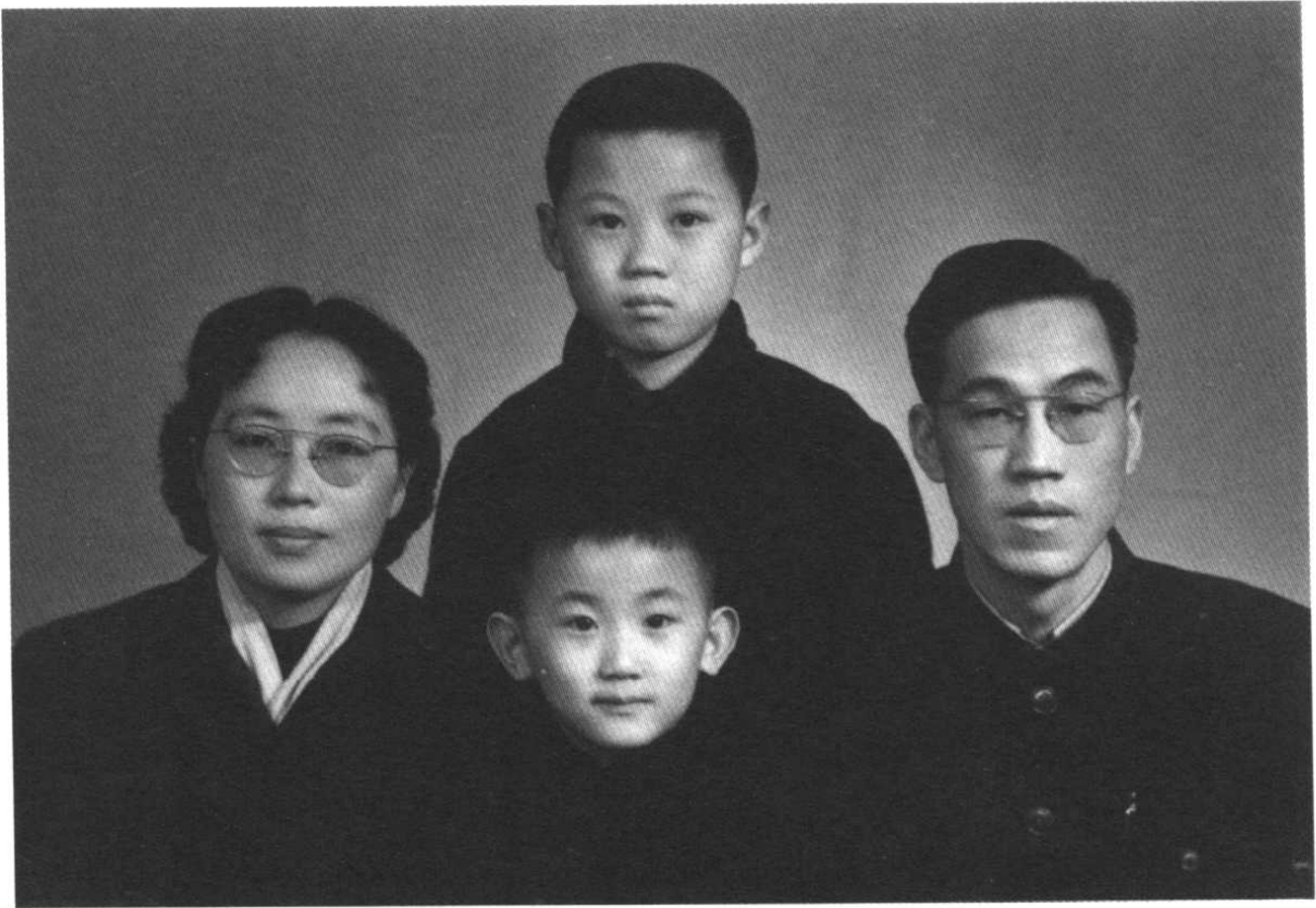
##### 調走又收回

甄別結束後，我又在綜合組工作了一年多，前面談過的那些工作大部分都是甄別後的事。隨着階級鬥爭的弦愈繃愈緊，外交部黨委在對我處理上兩種不同意見的分歧也愈來愈尖銳。一方面，是羅貴波、喬冠華等人認為我是政治問題，堅決主張將我調離外交部；另一方面是章漢夫、姬鵬飛、韓念龍等認為我是思想問題，作為一個筆杆子，還有點人才難得，同意讓我繼續留部工作。但是一九六三年後，喬冠華等就一再提出：像何方這樣有政治問題的人不宜接觸外交機密，如果還想利用他的筆杆子，也可不調往外地，但起碼應調離部內，分配到部屬單位如國際關係研究所、世界知識出版社等單位去工作。據代替我任黨委秘書的王凝事後告訴我，由

於羅、喬的堅持和直接主管綜合組的辦公廳主任董越千的起哄，章、姬、韓也不好再堅持，於是黨委決定將我調往研究所。

當時擔任所長的部黨委委員孟用潛，是位曾經當過省委書記等重要職務的老革命，也可算得我的一位忘年交。由於在全國合作總社副主任崗位上不同意實際上是剝奪農民的統購統銷政策，和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一起受到毛澤東點名批評並被解除職務。一九五六年中央決定他去天津當南開大學校長，但他不願意去，要我向張聞天反映，說他願意來研究國際問題。這時張聞天正在為找不到適當的人當所長發愁，聽我這麼一說，當然高興。因為孟用潛一九五〇年也曾調到駐聯合國代表團當代表，張也了解，所以當場就給劉少奇打電話。劉表示同意，只是說了句「南開是好幾千人，你那個研究所頂多不過百八十個人」。接着就通過中組部安子文把孟調進了外交部。那時外交部的幹部大多不願意去研究所工作，長期以來孟用潛都一直喊着缺人，要求部裏派人加強，因此這時對部黨委決定我去研究所仍然表示非常歡迎。我也認為除去研究所沒有其他出路，就答應了孟用潛。當人事司正式通知我時，我只說讓我考慮考慮。

後來孟用潛把我調去研究所的事告訴了時任國務院外辦副主任的李一氓。這又是我一生中僅有的三兩個無話不談的忘年交之一，對我也一直很關心。他聽到這個消息後就讓我去他家一趟。我去後，他就直截了當地談起了我的工作調動，認為不宜再繼續留在外交部，不如乾脆改行去地方工作。他說，你在外交部是不會是有什麼作爲的，因為將來不管情況怎麼變，批判過



北京，被調離外交部，在家坐等分配時全家合影（後赴河北昌黎參加「四清」），一九六四年



你的人也總是不願意讓你出頭，而他們是多數，是主流。到地方上去也許可以不再措這個包袱，能找到一個發揮你的作用的機會。我一想也對，留在外交部本來就抬不起頭來，部屬單位在人們心目中又低人一等。至於地方工作，十多年前也曾幹過四五年，覺得門類很多，活動餘地較大，那時才過四十歲，就算從頭來吧。但是孟用潛還是力爭我去研究所，不想放我走。於是李一氓就把我們兩人都找去，勸孟用潛放人，說你不能光從你那個單位着想耽誤人家的前途。孟聽了來龍去脈後也完全同意氓公的意見。決心一下，我就回去給部黨委寫了報告。部裏自然不會挽留，並答應爲我聯繫地方。這是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事。我就這樣離開了工作兩年多的綜合組，下崗回家待命了。

不知是外交部沒抓緊還是聯繫地方不容易，我在家裏等了好幾個月仍然沒消息。後來又不知是什麼人建議，與其讓何方在家賦閒，還不如讓他先到農村去搞「四清」。這時正有外交部下農村的「四清」工作隊，我就在一九六五年初的中途插到他們的隊伍中去了。按規定，國家機關幹部輪流參加「四清」以半年左右爲一期。但是一則我已無處可回，二則外交部又正在聯繫留我在參加「四清」工作的河北省唐山地區工作。因此，當外交部大隊人馬結束了一期「四清」打道回府後，我就一個人被留在了地方，歸地方領導，繼續參加又一期「四清」。這時有些老同學認爲我還是回北京工作好，讓宋以敏寫信勸我回來向外交部領導「燒燒香、求求情」。我經過半年多在「四清」中跟當地幹部打交道，發現這時的地方工作和人事關係，已經



同岷公和我當年經歷過的大不一樣了，情況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其他不說，單是這外來幹部，就很難被吸收同化。但是由於我的脾氣倔，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要我去燒香求情很難作到，而且也是不想學和學不會的。於是我就回信宋以敏說，人各有志，前面無論怎樣艱難困苦，我也不會托人求情。

在第二期「四清」進行中間，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地委書記馬力（「文革」後調任貴州省委書記）約我談話，說省委研究決定，打算讓我到設在昌黎但直屬省轄的果樹研究所出任黨委書記兼所長。理由是，這個所歷史悠久，很有發展前途，日本佔領時期就出了名，對外活動和學術交流比較多，正需要能獨當一面和有對外工作經驗的人來領導，我正好適合這個工作。我當然了解工作分配時總要強調這一崗位的重要、給你戴點高帽子的組織工作傳統，但實在沒想到要叫我改行做技術工作，而在這方面又自己知道文化不高，沒有基礎，過了四十歲再從頭學恐怕也來不及了。我原來設想到地方搞點宣傳教育工作，辦個報紙學校什麼的，還算是揚長避短，現在卻正好翻過來，成了揚短避長。但是自己總不能提出要作什麼工作當個什麼長吧！那時周圍又沒什麼人商量，也沒長途電話和宋以敏聯繫。一個人想來想去，別無出路，只好答應下來。當時想得很簡單，我一個人下來也行，宋以敏如有可能就留在北京，而且兩地相距很近。她要願意下來，地方上安排個工作也很容易。反正外交部不要了，不想改行也得改行，決定後就去看了一下。這果樹研究所佔地很大，一半在平原，一半在山坡。這山就是曹操

《步出夏門行》中的名句：「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中說的碣石山。環境實在優美，誰去都會流連忘返。我看時，正是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四月天，只見滿山遍野桃李盛開，一時心曠神怡，覺得留在這裏也好。當我回到外交部辦理調離手續向部領導辭行時，大家都覺得才非所用。喬冠華還哈哈大笑地說，「何方能當個果樹研究所長，真叫人笑掉大牙！」後來聽說外交部也要求河北省委給宋以敏安排工作，地方上給定了個昌黎縣委秘書。當時外交部已將科改爲處，科長副科長一律改稱處長副處長，但她的副科長卻不予改變（因爲縣委屬於處級，部裏用意在於無形中取消她的縣團級待遇，只能當個縣委秘書）。在一段時間，新聞司只好專門爲她一個人設了個「副科長閱」的傳閱文電夾。

正當我打算搞完這期「四清」就去果樹研究所走馬上任的時候，一九六六年三月前後，外交部又向河北省委提出將我調回，並動員我回部。原因是《世界知識》主編吳景崧得腸癌住院，估計已無恢復工作的希望，一時又找不到合適人選，部領導一些人又想起了我。很可能是出於部黨委分工兼管世界知識出版社的孟用潛建議（等我回到北京時，孟已被部領導作爲「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拋出，使我再也無法從他那裏得到證實），得到章漢夫、姬鵬飛等的支持。由於去的是部屬單位，羅貴波、喬冠華也沒有理由反對，於是就作出決定調我回來。我當時也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最終還是覺得地方上分配我的工作實在無法適應，只好走回頭路，表示了同意。宋以敏的職務也隨即從副科長改成副處長了。

## 談談「四清」

所謂「四清」，原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城市叫五反（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農村叫四清（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是根據中央一九六三年九月的決定全面開展的。實際上後來的發展哪裏是什麼清帳目、清工分等，而完全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實踐他反修防修的理念，對中國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又是一場災難。這不僅是現在的看法，確實也是當年的預感。因為一方面，我剛從農村的饑荒死亡線上爬出來不久，那位貧農老大娘的「毛主席爲什麼那樣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言猶在耳。同時也看到一些農村幹部雖然多吃多佔了點，但總是對黨對毛主席忠心耿耿，而且晝夜奔忙，萬分辛苦。他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幹部比，依然是梁漱溟說的天上地下，更不能和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比了。對這樣一個可憐的群體，那樣大動干戈，不惜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值得嗎？合適嗎？我還沒有下鄉就常在心裏嘀咕，只是個人的處境不容許表現出來，不敢和任何人談就是了。另一方面，我在下去前就已從看文件、聽傳達、政治學習中了解到一年多來「四清」的進展情況，有些問題更加重了我的疑慮。一是覺得中央對形勢特別是對基層的估計過分嚴重，如估計全國三分之一左右（劉少奇比毛澤東還要估計得多些）的基層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而在敵人和他們同盟者手裏，「四清」已

不是清帳目、查多吃多佔的問題，而是奪回被敵對勢力篡奪去了的領導權的問題。這不就是又一次奪取政權的革命了？似乎這革命是愈革愈窮，愈窮愈要革，看不到能讓老百姓有個吃飽穿暖過安寧日子的遠景了？當時實在想不通。二是劉少奇搞的指導原則和「桃園經驗」（王光美在河北省撫寧縣桃園村的「四清」報告，經毛澤東同意，由劉少奇批發全國學習並參照執行），包括撇開基層組織和幹部，由上面派來工作隊包辦一切，採取的方法又是訪貧問苦、扎根串連，比土改還神秘。在桃園就揪出了我曾領導過的外交部辦公廳信使隊的「階級異己分子」董國柱，因為他給黨組織寫了一封反映家鄉「四清」過左的信《回鄉見聞》，被工作隊要求外交部給予開除公職察看一年的處分，送回家鄉批鬥（這一冤案後來得到平反）。說老實話，對於這一套，我在當時就接受不了。三是已經感到中央領導的分歧，特別是「二十三條」（一九六五年初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共二十三條，所以有這個簡稱）的頒布，已經使毛劉之間的矛盾在黨內的相當範圍內公開化了。我當時並不怎麼同情劉少奇，覺得他在延安整風後往往比毛澤東還要「左」，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和這次「四清」。所以連一直反右的毛澤東後來也只能給他創造一個「形左實右」的罪名。中央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分歧的表面化當然不是什麼好兆頭，不能不讓人感到擔憂。要我去「四清」時，「二十三條」還沒向地方基層傳達，是李一氓專門到我家裏先向我吹的風，好讓我下去後心裏有個底。



現在看來，「四清」實際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是全國幹部群眾遭受更大災難的預演。問題是，爲什麼從上到下不少幹部已經對這樣搞法和發展下去的前景感到不安，表現了懷疑甚至抵觸，但還要跟着偉大領袖跑步前進呢？根本原因就在於，延安整風後進行了長期的個人崇拜宣傳和更加強了一元化領導體制，也就是毛澤東從領袖進而爲先知，人們只能完全迷信和絕對服從，各級黨委也是第一把手說了算。同樣重要的是採取了「露頭就打」的方針，對一切不同意見和反對苗頭，一出現就進行批判和堅決打壓。在這種情況下，誰都懂得「出頭的椽子先爛」，哪個還敢說半個不字？經過一九五八年的反「反冒進」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黨的上層領導也都變成不但要像陶鑄說的「從一而終」（陶鑄在廬山會議上寫給黃克誠的信，說做個黨員要像舊社會女人嫁了人一樣「從一而終」），爲毛主席盡忠一輩子，而且還在競相緊跟，互相比着爭着向前（也就是向「左」）趕。跑得快的升賞、如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陶鑄、王任重等；跟得慢的挨批，如周恩來、陳雲等；不跟者嚴懲，如彭德懷、張聞天，還可算上鄧子恢。應付得法的還有點活路，如幹部中流傳的「周恩來檢討，陳雲生病」。不善於應付的死路一條。這就是劉少奇的結局。

### 「四清」經過

我就是在那種嚴峻的形勢下，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去北戴河加入了宦鄉率領的外交部工作

隊。到時宦鄉正和工作隊駐紮在北戴河附近當時還屬撫寧縣管的撥道窪村，按劉少奇主持制定的所謂「後十條」和「桃園經驗」在搞「四清」。「後十條」全名叫《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是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文件。我到後先向他們轉告了「二十三條」的精神，並被任命為隊長，率領由外交部和當地幹部混合編成約一百多人的工作隊。後來地方上也正式傳達了新精神，工作隊跟着進行了一個短時間的學習整頓，就很快結束了撥道窪村的「四清」，轉戰到昌黎縣。

由於這「四清」是在全國全面鋪開的，所有農村都得輪流由工作隊清查一遍，經過驗收才算完事，所以唐山專區就組成了以地委書記馬力為團長的總團，各縣成立分團，下轄若干工作隊，一個村一個村地向前推進。搞完一個村算一期，大約需要三到五個月。如果不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引發全面內亂，這「四清」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算完。以昌黎分團來說，大概只有十多個工作隊，而村子少說也上千。宦鄉被任命為分團團長，隨我這個工作隊行動。其他工作隊由副團長、縣委書記王家樹領導。我這個隊分工包有幾百戶人家的城郊東關大隊，前後工作了三四個月，沒查出什麼大問題，只有大隊幾個幹部的一些生活問題。根據新的精神，改選了領導，安排了今後工作，就結束了這個大隊的「四清」。這時宦鄉和外交部下來的幹部算是已經完成任務，就告別地方回北京了。只有我一個人留下，一面聽候分配工作，一面先帶地方幹部組成的工作隊，同縣委大本營一起，轉移到昌黎縣團林鄉，當時叫公社，有東西團林兩個大



隊。我和王家樹各帶一個工作隊包一個大隊。這個地方就是現在與南戴河相連的著名避暑勝地黃金海岸。六七年前在北戴河休假時還去團林看了看。

我在兩期「四清」中，是根據我的理解貫徹執行「二十三條」精神的。這可以舉下面幾個例子。第一，「四清」已改變了過去的內容，明確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挖他們的根子。我主持的兩期「四清」，都沒挖出什麼走資派。你想，在大躍進和公社化中，包括鄉、村幹部在內的一切自留地、小商販、生產單幹如下海捕魚撈蝦等，都已經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基層幹部還能有什麼辦法走資？我同縣委同志的關係也相處得很好，發現他們都是生活艱苦、作風樸實，堅持執行上面不管是錯的還是對的指示，在拼命苦幹，一年到頭沒個休息日。在他們中間怎麼可能挖出走資派，更不用說做下面並不存在的走資派的根子了。第二，我們利用「二十三條」提出的不搞神秘化和人海戰術的精神，擺脫了劉少奇的「後十條」和「桃園經驗」一些過左作法，一個村子的工作隊人數已從原來的幾十人減為幾個人，也不再搞那些扎根串連的秘密活動了。第三，根據「二十三條」中估計「幹部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和「盡快解脫他們」的精神，我們在團林對大小隊幹部就不再搞無限上綱和群眾批鬥的作法，而是着重教育和提高。開群眾大會，也只是由群眾進行批評，他們作檢討，群眾通過後，再進行改選。團林只是換了幾個人，而支部書記和大隊長得到連任。我回到北京後，支書、隊長因到北京辦事，還來過我們家看我。我招





昌黎「四清」工作隊，前左四宦卿，身後為何方，一九六五年



離開昌黎受歡送時合影，前排左二為何方，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待他們吃炸醬麵，發現他們飯量驚人，一人吃了兩大碗，送出門後還笑着說其實他們沒吃飽。組成新班子後就是全村上下討論和制定今後的計劃和安排。根據「『四清』要落實在建設上的精神」，我們除抓提高農民覺悟的文化學習等活動外，主要還是大抓生產，如貸款給他們造了幾條船下海捕魚撈蝦。印象特別深的是仿效大寨成立了個鐵姑娘隊，大膽突擊搞生產，還學文化 and 演戲，在我們走前竟演了一次《白毛女》。總而言之，我是有意識地盡量利用「二十三條」中一些糾偏的積極因素，回避了抓階級鬥爭和整走資派這一主要精神。所以這兩期「四清」，事後看來還過得去，在「左」的運動中沒有犯嚴重「左」的錯誤。

### 幾個問題

「四清」給我的感觸很深，也觀察和體會到好多問題，這裏很難一個一個地詳細去講，就談幾個想到的主要問題吧。

#### 「三農問題」

現在談的關於農民、農村和農業的所謂「三農問題」，我看並不是在湖北監利縣當了七八年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給朱鎔基總理寫了一封信時才發現的，其實老早就有。我在三年困難時期和下鄉參加「四清」所看到的，情況肯定比李昌平說的還要嚴重。產生「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全國解放後我們黨對農村執行了一條極左路線。土改使貧下中農分得土地，但所

有權不歸農民而屬於集體實際上是國家，這就妨礙了農業的集約化以至正常發展。後來的高級合作社和公社化就已經不但土地，還把農民的其他生產資料以至大部分生活資料給「化」掉了。從前幾年下放的安徽六安到這次來到河北昌黎的情況看，說農民一貧如洗都不過分。每戶農家沒有幾件像樣的傢具，幾乎常年累月食不裹腹。經過我們黨十五六年的統治，把像昌黎這樣好的地方竟然搞成那個窮苦樣子，實在說不過去。

昌黎除北邊有座不太高的碣石山外，是一眼看不到邊的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瀕臨渤海，盛產魚蝦。按道理，那裏應該是發展得很快很好，但實際上每戶人家都窮得叮噹響，確實是家無隔夜之糧，只有一些白薯乾用來糊口。工作隊實行「三同」，和貧下中農一起吃住。頭大半年一直吃的是白薯（當地叫地瓜）。年初下去時吃的是白薯乾磨成面熬的糊糊，不但稀而且沙子多，還吃不飽。這種飯，不吃，餓得不行；一吃，就反胃吐酸水。而且一直吃到秋收，有大半年光景。宦鄉下去一個多月回北京開會，找秤一稱，體重減了八公斤。他返隊給大家說，沒有人不信。夏收，有一部分小麥，但基本都交了公糧，我們沒吃到幾頓麵食。吃稀糊糊還有個效果，就是晚上起夜多。第一期「四清」時我和宦鄉、他的秘書和地方上配的警衛員睡一個炕。炕前凳子上放一個大尿盆，往往是宦鄉先醒來，尿完喊一聲「何方，尿」。我接過尿盆，用完再依次傳過去。這還被地方幹部說成我們的階級友愛表現得如何深。

第二期「四清」已是初秋，新的白薯開始下來，這時才改吃糊糊為烱白薯。就是在鍋底下

放點水，用大碗扣上，上面放白薯，等水熬得差不多快乾了，白薯也就熟了。菜只有大葱蘸醬。天天如此，頓頓如此，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後來玉米成熟，又改吃玉米。老百姓再把白薯拿去切片後晾在房頂上曬乾。冀東農村住的都是平房，在房頂上曬白薯乾，颶風下雨也不收，所以很不乾淨，但這就是今冬明春的主食。工作隊和群眾一起多數時間吃白薯，少數時間吃玉米的日子，一直過到我離開昌黎。不過臨走前，王家樹卻在晚上偷偷請我吃了一次對蝦。說偷吃，是因為上面有明文禁止。一隻對蝦，市價一元，那時的一塊錢真是很貴的了，但誰也買不到。其實，我第二次「四清」的團林，就在海邊，以前是多數人一半時間種地，一半時間下海。公社化後下海專業化了，村民們的漁船已被「化」掉，也不准隨便下海了。而那裏盛產的對蝦、海蜇、螃蟹，全部用於向日本出口換取外匯。外貿部門每天派車來收，當地嚴禁買賣，任何人也不得私自吃。王家樹是從公社違法要來了十多隻，所以不敢白天公開吃，只能晚上偷着吃。

據農村幹部和老百姓說，他們的生活還不如解放前。我看也確實如此。這使我感到非常難過。我們當年參加革命是懷着一顆為人民求解放的赤心的，在作群眾工作時向老百姓宣傳也說革命是為他們過上好日子。現在革命勝利十多年了，這「三農」卻被我們折騰成這個樣子，能對得起農民群眾和革命先烈嗎？但當時並不知道大折騰還在後面等着呢！



## 農村幹部

「四清」主要就是整幹部，也附帶整一下原先劃的地主富農和後來稍微富裕一點（多是勤勞致富）而被認為是漏劃（所謂「補漏」）的人。改革開放前的農村幹部，一茬一茬地被整幾乎成了一種規律。解放戰爭時期，劉少奇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前後提出了「搬石頭」和「三查」（在地方是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部隊是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許多農村幹部不是被當作阻礙土改的石頭給搬掉了，就是「三查」過不了關。其中很多是在戰爭中做出過貢獻，特別是一些受委派擔任偽職而為革命工作的，他們被整真是冤枉。

解放後由於農村不斷在變，所以幹部隊伍和他們的適應能力也跟着變。大躍進時鬧騰得歡的幹部大多已被換掉，到「四清」時留下來的幹部，確實像「二十三條」估計的，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說他們作風生硬、強迫命令，倒是真的，而且普遍。那主要是因為農村沒民主，再加上上面交下來的任務不強迫命令也很難完成。說他們多吃多佔，也是有的，但是一則並不普遍，二則在那種苦日子下多吃一點實在情有可原。至於貪污和多佔，即使有也是極少數，實際上可貪的東西和機會都很少。那時物資匱乏，又盛行平均主義，不斷的運動無形中起了上下兩邊監督的作用，幹部很難冒尖和露富。「桃園經驗」是極左的產物，多半為無限上綱和胡亂定性。毛澤東和劉少奇估計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基層政權不在我們手裏，也是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憑空想像。當時搞出的許多奪權典型，如甘肅的白銀礦、天津的小站等，事後證

明都是在「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精神下製造的冤案，也都得到了平反。

在我看來，當時的農村幹部不但大多數是好的，而且屬於農村的精英。對他們不是打擊，而應當是愛護、培養和提高。這也是在我為縣委寫的第二期「四清」總結報告中明確提到的。人們絕對不能用現在許多地方的農村幹部去衡量他們。農村幹部的變化主要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後。例如我在十年（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的全國政協委員任內，先後參加了十多次對貧困地區的視察，看到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一個村子擁有最好住房和其他最好設備的，基本上都是支部書記。這在「四清」期間是無法想像的，更不能和十多二十年來出現的一些新情況相比。例如由於體制上的原因，在經濟建設中，對土地的徵用愈來愈多，使農民失去土地卻得不到應有補償，反而成爲許多幹部變成暴發戶和跟各方面勾結的資本，使他們走到了農民群眾的對立面。這也是導致農村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 關於工作隊

「四清」派工作隊，也同其他運動派工作隊一樣，是站在群眾之上，爲群眾包打天下的表現。我們黨長期以來，一直宣傳群眾解放是群眾自己的事，講着「人民當家作主」，唱着「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但是實際上，我們把群眾看成了群盲，不相信他們能自己救自己，因此必須由我們來當他們的家和作他們的主。毛主席被奉爲人民大救星，他自己也以先知兼領袖自居，各級黨的幹部都成了按毛主席指示辦事的小救星。「四清」工作隊起

的就是這種作用。這哪裏有半點相信群眾的意思？我們國家不能實行憲政，不能實行民主和法治，只能實行「訓政」和人治，實質上就是由於不相信群眾，擔心一旦實行民主，權歸於民，黨的領導地位就不保險，八成會丟，所以必須把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實質上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或權貴階層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這又聯繫到一個群眾路線問題。「四清」工作始終強調走群眾路線，但是工作隊專政和秘密串連等一套作法，本來就是凌駕於群眾之上和不相信群眾的表現。我才下去的時候，工作隊正按「後十條」和「桃園經驗」的精神進行工作。他們把生產隊所有的帳本都收繳上來，由一批工作隊員背着幹部和群眾，關起門來，帶上幾個算盤，一筆一筆地查帳。農村的帳本來就亂，沒有規格，查帳的人又不大懂行，差不多每天都要熬到半夜以後，十分辛苦，但效果並不大。作為「四清」頭條內容的「清理帳目」，最後往往還是一筆糊塗帳。另一部分是找群眾了解幹部和帳目、工分的情況。他們白天跟老百姓一同勞動。那時還是集體化，一大堆人在一起，即使對幹部有什麼意見也是不可能當眾說的，所以只能靠晚上挨家訪問了。可晚上，老鄉已經勞累一天，而且饑腸轆轆，實在不歡迎有人來打攪，加之對幹部情況不是不了解就是不願意對公家人講，免得惹出是非得罪人，所以工作隊員訪問往往空手而歸。倒是有些過去挨過幹部整，對幹部有意見和好管隊上事的人，會反映一些情況。但這些人類似土改時的勇敢分子，群眾一般不大願意跟着他們走，他們談的事情也不一定真實。所以發動群眾並不容易，只

好由工作隊包打天下了。

第一期「四清」，工作隊人多，除外交部和本縣幹部外，唐山地委還派來了一批機關幹部、中學教員和大專師生參加，工作之餘也特別熱鬧，我還抽空給他們報告時事和上政治課。由於人多，我和宦鄉就可以超脫些，每天開一次小組長會議，聽聽各組彙報，商量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也就行了。白天或開群眾會，或到各組去檢查，比起隊員來還顯得有點清閒。宦鄉早早起牀，到野外學他的法文，高聲念。我由於已告別外交部，不想再學什麼外文了，有空時只讀些古文詩詞或其他閒書作為精神調節。我們兩人也經常在一起聊天，古今中外，海闊天空。在這段「四清」中增進了相互了解和友誼，為我們在「文革」後的長期合作奠定了基礎。最後他以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總幹事辭世，我以副總幹事離休。

第二期「四清」，工作隊的人已經很少，運動的高潮和人海戰術的作法也都過去了。「四清」怎樣搞更可以自己作主了。這時我就把工作重點放在生產建設上，以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為中心，整頓農村組織、進行群眾教育。我的這個主意，不但得到縣委王家樹他們的贊成，也得到村幹部和群眾的擁護，所以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到後來作總結時，我已取得縣委的完全信任，以至於起草以昌黎縣委和「四清」分團的名義給省地委的總結報告時，可以採取流水作業的辦法。當時縣委住在一個四合院裏，正房三大間「一明兩暗」，中間為堂屋，兩邊是帶炕的兩大間寢室。縣委在左邊的屋裏開會，炕上炕下坐了十多個人。我一個人坐在右邊起草。寫好



一張，由秘書拿到左屋去念，念完大家議論議論，或扯些其他閒話。有時王家樹也叫秘書：「去看老何下邊一張寫完沒有？」就這樣，從早到晚，一份七八千字的關於團林也是昌黎第二期「四清」工作總結報告，寫完並經縣委（也是分團委）一字未改地討論通過，打印上報了。這不但說明縣委對我的器重和信任，也表現出我們關係的融洽。

#### 關於向貧下中農學習

但是在這期間，我總還感到有點孤獨和惆悵。原因除了不能和妻兒團聚共享天倫之樂外，一個不能忽視的現象就是舊戲上常唱的產生了「失群孤雁」的感覺。宦鄉他們離開前，這種感覺還不太明顯，大隊人馬一走，就頓時感到孤獨寂寞了。而且類似情況過去作地方工作時也曾存在過，那時主要是保持着延安整風時灌輸的認識，總覺得這是由於自己改造不夠，還沒有發生毛主席說的那種思想感情變化。但這次卻不信毛主席說的話，而另有自己的想法了。

這可得多說幾句。因為這涉及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就是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感情以及向貧下中農學習和同他們結合的問題。我雖然只有初中一年級的文化程度，本來算不得知識分子，但是參加革命後一直生活和工作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結果沒有工農化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給知識分子化了。所以感到置身於知識分子群中就有說有笑，如魚得水。一旦周圍完全是缺少文化的貧下中農，就感到有點孤獨和寂寞了。找不到個能夠海闊天空地聊天的對象，只能正經八百談工作，哪能不感到悶的荒？而且在群眾工作中，我們從來都是以領導者、教育者的



身分出現的，任務也是宣傳黨的主義和政策，要求他們照我們說的做。而在農民的心目中，正好相對應，也把我們看成是有知識的公家人，並且是教他們管他們的領導。這就是說，革命知識分子（包括所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大中小知識分子），是向農民（首先是貧下中農）傳授理論和知識的教育者，農民則是受教育者，這一客觀的事實得到了雙方的承認。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的知識分子向貧下中農學習，不但違背馬克思對農民的評價和列寧的灌輸論，而且也與客觀事實和歷史潮流背道而馳。近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證明，知識分子的地位愈來愈重要，人數愈來愈多，也愈來愈成爲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農民則相反。那種被馬克思描寫爲生產落後、思想保守、留戀過去、缺乏自信、寄希望於清官好皇帝的農民，必然走向衰落和消亡。當然知識分子也不應高高在上，看不起農民，而應當虛心學習農民的長處。但是依發展的觀點和就整體來說，更多和更主要的還是農民向知識分子學習，走向現代化。因此，提出知識分子向貧下中農學習的號召，以及按這個精神採取的政策和措施，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啦，遷移大批城市居民下鄉務農啦等等，實質上都是倒退的、開歷史倒車的行爲，不但對這個群體和個人來說是很大的損失，而且直接影響和妨礙社會進步。

過去的長期教育，總是毛澤東說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有一個小資產階級王國，所以才和農民格格不入，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會覺得腳上有牛糞的農民最乾淨。經過長期在農村的體會（如果算上解放戰爭時的四年地方工作和解放後的十年下放再加上一年多「四清」，離開

延安後我在農村呆了十五年），這個認識還是逐漸改變了。而且我認爲，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不會也不應該改造成農民的。我就不相信毛澤東住的中南海會允許腳上帶牛糞的農民進去，也不相信他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各地住所和游泳池旁的紅地毯上能夠讓貧下中農走來走去。如果真正實事求是的話，說的和做的完全一致的話，就應該承認，知識分子代表文明和進步，農民表現了愚昧和落後。所以毛澤東也不得不強調，重要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

正是由於對以前理解的思想改造和向貧下中農學習失去了信心，再加上新的工作不適應和缺乏長期扎根農村、準備吃苦的決心，所以我還是在要求去地方工作以後又同意回到外交部。誰料想，回來沒做半天工作就被捲進文化大革命中去了。



第九章

被投進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

前面我們不是說過嗎，外交部一九六五年春把我下放到河北的北戴河、昌黎搞了兩期「四清」，並且交給了地方上去分配工作。但後來由於《世界知識》主編一時找不到適當人選，又從河北省委把我要了回來。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回到外交部報到，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司長符浩告訴我，不必去上班了，先回原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吧。過了不幾天，外交部黨委就把我作為「牛鬼蛇神」拋了出來，交由「群眾」批鬥和監督勞動，我也就從此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三月又被押送五七幹校，作為群眾專政對象，繼續接受批鬥和勞動改造，直到一九七八年自行離開幹校回北京。我被動參加「文革」，前後十二年整，還不算後來一年多在復查中的「討價還價」。所以全國文化大革命以十年計算，我卻是十二年。這十二年可以分為兩大段，除了在外交部參加三年「文革」外，還上了九年五七幹校。現在先談前二年。

### （一）對外交部「文革」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對中國人民持久和全面的大浩劫。外交部作為「文革」的一個重點和各派必爭之地，自然免不了要受到重創。我個人只是這場浩劫中的滄海一粟，而且一直處於挨批鬥和被看管的地位，不可能對外交部「文革」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但是自己的遭遇，離開大的背景又很難說清楚。好在這次文革和我參加過的延安整風以來歷次政治運動有個很大不同，就是有一定的透明度。不僅社會上包括部內的各種小報和印刷品滿天飛，高音



喇叭喊個不停，而且部領導和群眾團體的正式傳達也特別多。只要沒有被完全隔離起來，總會知道不少情況，加上事後的了解和研究，就不難對外交部「文革」有個基本認識。根據個人的親身體會和觀察思考，多年來對外交部「文革」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這裏只談兩個問題。

### 外交部「文革」的幾個特點

作為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外交部的「文革」自然和全國一樣。但由於工作性質、領導體制和人員素質等因素，文革在外交部還是表現出了以下幾個獨特的地方。

一是「文革」不但搞亂了外交部，頭幾年還嚴重地搞亂了對外關係，把原來就夠嚴重的「左」傾外交路線更發展到極致，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帶來極壞的國際影響，使中國一度處於非常孤立的地位。直到一九七〇年後，才在新的形勢下被迫將外交政策，主要是對美國和以它為首的陣營作了向右的調整，在外交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但在反蘇反修上還是愈來愈「左」。正統史學說的文革時期仍然「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顯然是不合乎事實的。

二是外交部「文革」有中央的直接源頭，始終得到毛澤東的密切關注、中央文革的積極插手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特別是周恩來的直接領導，決定了外交部「文革」的走向和變化。而周的態度卻是隨着毛澤東的態度變化在不斷搖擺。他既要維持原有體制和保護老幹部，又要效

忠毛澤東以保持晚節，因而時刻揣摩意圖，隨機應變，表現出緊跟的姿態。他長期管外交，在幹部中威信極高。但毛澤東不僅握有「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王牌，而且在外交部還有幾個衆所周知的「通天」人物，爲他了解情況，傳遞消息。中央文革也一直在窺測風向，總要找機會鑽進來同周恩來鬥。這些背景就使外交部的「文革」頭緒紛繁，詭譎多變，與衆不同。

三是整個說來外交部「文革」還比較文明，沒有發生武鬥和嚴重的打砸搶。這是由於：一則「文革」期間外交部在業務和運動兩方面都直接接受周恩來的領導，一時存在的造反派和領導上長期操縱的「無革派」（無產階級革命派）對他都很尊重；二則外交部幹部的素質較好，文化程度較高，紀律性也較強。社會上有關一些大案的傳說，例如火燒英國代辦處，其實並不是外交部造反派幹的。他們受命主管運動九個月，做了不少愚蠢和激進的事，特別是堅持打倒陳毅和頂撞周恩來總理等。但進行大規模、長時期的殘酷鬥爭和打擊迫害，反倒不是出現在他們掌權的時期，而是發生在部黨委結合無革派實行直接控制的時間裏。

四是外交部被整成全國抓「五一六反革命」的頭號重災區，全部參加運動的有四千名幹部，被抓的竟達一千七百人。（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下有關外交部文革的部分材料也引自該書，不再一一加注。）造反派得到的清算和處理也最殘酷，還有許多老幹部遭到嚴重迫害。因此「文革」中製造的一些冤假錯案，一直得不到解決和平反。領導層在「文革」中形成的山頭和派性，「文革」後還繼續起着重要作用。這些又使外

交部「文革」的時間要比一般單位長。

### 外交部「文革」經過二三個階段

根據我個人的經歷和觀察，外交部的「文革」可以分三個階段，但與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的分期並不相同。《決議》上也把「文革」分爲三段，但看不出明顯的分段標誌，表現了相當的隨意性。例如在它的第一段中，「文革」初期被毛澤東上綱成的所謂「資反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稱劉鄧路線）就完全沒有了，這就不合乎歷史事實。「資反路線」顯然也是一種極左作法，它一開始就自上而下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使大批幹部和群眾受到錯誤批鬥和無端迫害，這是抹煞不了的。所以我覺得，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期，不能爲了照顧領導搞成糊塗帳，而應該着重看運動的實際發展和廣大群眾的切身感受。從運動的實際發展來看，外交部「文革」可以分爲以下三個階段。

一、部黨委按過去政治運動的常規發動和領導「文革」時期，從一九六六年五月姬鵬飛代表部黨委作第一次動員到年底召開的「外交部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前後約有半年時間。

在這個時期，特別是一開始，廣大幹部群眾一般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只能按部黨委的佈置進行所謂揭發批判和學習文件。而部黨委對運動的領導，當時人們能感受到的，

主要還是以往搞政治運動的老一套：拋出批判對象；實行引蛇出洞；派出工作組。部黨委利用《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把一批部、司、處級幹部定為牛鬼蛇神，號召和組織大家揭發批判。拋出的人也被關押或看管起來，隨時接受批鬥。這些人中有部黨委成員、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孟用潛、副部長王炳南和陳家康等三十幾個人，我當然也在其內。與此同時，部黨委還不斷動員大家起來揭發，一再保證做到「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辮子），但實際上是引蛇出洞，佈置各級黨組織和積極分子注意釣魚，發現有「出圈」言論和大字報的，馬上立案審查，有的立即打成「反革命」，有的準備「秋後算帳」。再就是派出工作組進駐幾個部屬單位，如北京外國語學院（簡稱北外）、國際關係研究所等。不管中央內部門爭怎樣激烈和「文革」在社會上如何千變萬化，部黨委決不放鬆對運動的控制，只是隨着形勢的變化改換一下手法就是。這一切都是黨委書記陳毅的親自領導下，由常務副部長姬鵬飛具體主持其事的。而且我當時就認為，整個部署特別是重要事項，都一定會上報周恩來總理，並得到他的批准或默許。不然像關押王炳南、陳家康這些人，陳毅和部黨委哪敢擅自作主？

這一時期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我看就是八月份部黨委召開全部大會批鬥孟用潛。大會由副部長喬冠華主持，安排副部長韓念龍、部長助理宦鄉和已進駐研究所兩三個月的工作組人員相繼發言。會議事先作了周密準備，糊了十幾頂高帽子，下面有人領呼口號。除孟用潛外，還將



研究所其他領導人和業務骨幹十多個人拉來陪鬥。都戴着高帽子，手拄兩根哭喪棒（用白紙包的木棍），在台前跪成一排。而孟用潛的高帽子裏安裝有圖釘，用手一按就鮮血直流。他們在辦公樓樓道裏排着隊被遊鬥，經過人群時，人們可以隨便打他們和羞辱他們。孟用潛潛在遊鬥時走了一半路就已暈倒。這次批鬥大會是外交部「文革」中最殘酷最野蠻的一次。後來一些小單位開會時也許發生過打人等行爲，但全部大會出現這種現象只有部黨委操辦的這一次。

在這個時期，外交部也受到全國影響，自發地鬧了一陣紅衛兵運動，進行較爲文明的抄家和破四舊。不過由於他們的活動實際上是在部黨委領導之下，所以沒起多大作用，從成立到奉命解散，前後也只有四五個月。

二、造反派起來領導運動和監督業務、批判「資反路線」和揪鬥部領導的時期，前後歷時九個月。

外交部造反派的興起，不但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而且還出於周恩來、陳毅的直接推動。因爲他們相信外交部的幹部起來造反容易控制，如果遲遲不動，外面的學生衝進來可就難辦了。所以外交部造反派一成立「革命造反聯絡站」（以下簡稱聯絡站）就得到周恩來的支持。而周恩來的支持又使造反派迅速崛起和壯大。當時運動的主要內容也和全國一樣，就是批判所謂「資反路線」。大概毛澤東本來就要整一下陳毅，不久又發生了陳毅等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更引起毛澤東的惱怒。陳毅被停職檢查，聯絡站的口號也從「炮轟陳毅」改爲



「打倒陳毅」。外交部「文革」在這段時間基本上都是圍繞「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口號進行的。外交業務固然受到干擾，但造反派基本上還是執行了周恩來所定並得到毛澤東同意的「領導運動、監督業務」的原則，並沒有奪取外交業務大權。而且造反派總的說來也還是尊重和服從周恩來領導的。當時對外關係中的許多極左行爲，都是「文革」本身要反修防修、打倒帝修反、搞世界革命所帶來的，不是外交部造反派的創造。例如和印尼中斷關係，駐印尼使館的姚登山等人回國時中央領導除毛澤東和林彪外全體到機場歡迎、以及讓姚在五一節登上天安門城樓，這是外交部造反派能辦得到的嗎？只能是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安排。

三、外交部領導體制得到全面恢復和造反派及一批幹部遭整肅的時期。這個時期從一九六七年十月聯絡站徹底瓦解算起，直到文革後還延續了好久。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的重量級人物王力爲插手外交工作，接見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發表了煽動性的「八七講話」。得到講話的鼓舞，聯絡站也着實狂熱了一陣，出現了砸政治部、揪鬥陳毅、頂撞周恩來等一系列極左行爲。他們不懂得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運動都是完全由上面控制的，最高領袖要它向哪轉就向哪轉。「文革」當然不會例外。經過一年半的大折騰，不知是由於發動「文革」的初步目的已經達到，需要休整一下；還是發現再造反下去整個局勢會失控，因而需要恢復秩序，清算造反派；反正是在王力和造反派得意忘形的這個八月，

毛澤東決定來一個急剎車，把「文革」的局勢翻過來。他採取的措施包括：實行全面的軍事管制；辦五七幹校、大批下放幹部；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清理階級隊伍，搞群眾專政和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外交部第三階段的「文革」，就是按這個線路發展下來的。

又不知是毛澤東的意圖多變，沒有一定之規，還是善於揣摩意圖的周恩來也常有摸不准的時候，所以在對待外交部「文革」上就顯得變化莫測。例如毛澤東已決心從收拾「王（力）關（鋒）戚（本禹）」下手，對「文革」進行大調整時，周恩來還不敢對王力「八七講話」表態，而聽任造反派瞎折騰了一個多月。當他摸清意圖和把「王關戚」抓起來後，就正式宣布他支持造反聯絡站只到八月三十一號爲止。特別是他讓部黨委向全部傳達，說聯絡站核心組有人直接間接同「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有聯繫，這就一下把聯絡站搞垮了。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對於外交部一批部司處級幹部貼出支持陳毅的一張「九十一人大字報」，周恩來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這時正是全國反對右傾翻案風，批判爲「二月逆流」翻案，他在弄清楚毛澤東的態度前，不能不違心地反覆批評這張大字報，說成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代表一股「保守」甚至「反動勢力」，要求部黨委對此表態，並且動員群眾批九十一人和部黨委。這件事在外交部竟然鬧了好幾個月，逼得陳毅、部黨委和大字報簽名者紛紛檢討，耿飴、黃鎮等還被罰從事打掃廁所等體力勞動。後來毛澤東說，「我還是贊成九十一人的」，於是事情又完全倒過來，九十一人不再代表保守和反動勢力，反而代表正確方向了。其實批「九十一人大字報」只

是一個很小的插曲，並沒有影響毛澤東改變「文革」方向的進程，但它可算是證明「文革」是多麼荒唐的一個典型。不少人當時就心裏明白，周恩來是為應付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批判右傾翻案風而不得不違心地批「九十一人大字報」，才上網很高。陳毅、部黨委和大字報簽名者又是不得不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心照不宣地作假檢討。只有廣大幹部群眾被蒙在鼓裏，跟着認真地折騰了幾個月。

實際上，在造反聯絡站垮台後，外交部「文革」就一直是在以姬鵬飛為首的部黨委主流派的領導下進行的，軍代表進駐後也結合在內。取代聯絡站（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倒有好幾個，但統稱無產階級革命派（無革派）。他們有時也表現出在領導運動，按上面的意圖組織活動，像上面提到的主持開會批右傾翻案風、批「九十一人大字報」等；但總的方向是同部黨委一致的，完全接受周恩來的領導，成為鎮壓造反派、清理階級隊伍、抓「五一六」的主力 and 骨幹，在軍代表進駐後已被結合進了領導班子。外交部「文革」的頭兩年先後出現的這兩派群眾組織，分別稱為造反派和無革派。雖然存在的時間都不長，但是作為站隊正確還是錯誤的標誌卻至今還起着作用。而部司處各級幹部，凡是受過造反派衝擊和表現忠於部黨委的，都被視為站隊正確被保護過關，後來提升的幹部也出自這個圈內。另一方面，凡被懷疑有什麼問題的、或造反派提出過要結合的，以及被看成異己分子的，就按站錯隊處理，其中許多人遭到殘酷迫害和排擠。連造反派只是表示過要結合的副部長羅貴波、徐以新都被長期隔離審查。副部長陳家

康（因揭發陳毅講過毛澤東是「乾綱獨斷」，被周恩來說成跳梁小丑和壞人）、駐蘇聯大使潘自力（因表態支持「打倒陳毅」）被迫害致死。八大的中央委員、副部長劉曉被整得精神痴呆。副部長王炳南被弄得家破妻亡。其他受排擠和打擊的還有部長助理宦鄉、董越千等。至於中下級幹部挨整受迫害的就更多了。需要指出的是，外交部的組織和幹部，除造反派受權領導運動的九個月外，整個「文革」期間，一直為先是常務副部長、後是部長的姬鵬飛所掌握，並在外交部形成了一個長期佔統治地位、被稱作「姬派」的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運動和業務一直由他們操持，「文革」後還長期起着作用。

外交部領導（先後稱部黨委和黨組，中間一段稱核心小組）操持「文革」的這第三時期，歷時最久，如果算上「文革」結束後的復查階段，就超過十年。在這期間，外交部發生過許多事變，大運動中套了不少小運動，但總是在整造反派、清隊、抓「五一六」、排除異己和派性鬥爭這個框架內進行的。我了解到的一些情況，可以放在下面敘述個人的遭遇和經歷時來談，這裏就不多講了。



## （二）被投入「文革」

### 一回到外交部就成了牛鬼蛇神

我從河北省被調回外交部，還沒來得及到原定的工作單位《世界知識》出版社去報到，領導上就將我作為由群眾專政的牛鬼蛇神拋了出來，劃歸原單位辦公廳綜合組管。當時宣布，我不用上班，只從事體力勞動，在外交部大院裏拔草，接受批判，隨叫隨到。對這種遭遇，我雖然極為不滿，但也不完全感到意外。因為我回來時，文化大革命的風聲已經愈來愈緊，作為反右傾時的張聞天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知道在劫難逃，只能接受舊冤案上再加新冤案。有這點精神準備，心情反而安定了許多，在同文書處的唐國忠一起拔草時還可以閒聊幾句，開點玩笑，顯得有點滿不在乎的樣子。不大在乎，還出於我當時的阿Q精神，覺得自己還多少受到點優待。因為同時被部黨委拋出的三十多個人是分成好幾類的。一類如王炳南、陳家康等十多二十人，可能是屬於當權派或有什麼現行問題，被集中關押在地下室，吃飯時排隊進食堂，只能站着吃飯，不准坐。我被歸入的這一類，只是開始時搞點拔草之類的勞動，下班可以回家，和大家一樣，吃飯不用排隊，也可以坐。後來乾脆沒人管了，幾乎變成一個閒人。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我都保持着雙重身分。一方面是個牛鬼蛇神，不准亂說亂動，可以隨便被拉去批鬥。部裏的紅衛兵就有幾次把我和其他牛鬼蛇神集合起來，戴上高帽遊街，就是在外交部老部院子裏轉上幾圈兒，喊一陣被打倒的口號。連宿舍大院的一群中小學生也可把我揪出來批鬥一番，聽他們的訓話，回答他們的問題。總之，從被拋出來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是一個很馴服的牛鬼蛇神，沒有進行過任何反抗。但是另一方面，組織上仍在按老規矩辦事，沒有改變我的政治待遇。因此，除部裏組織的群眾性活動一般都可參加外，還可參加黨內十一級幹部可以參加的會議，包括到人民大會堂聽傳達和參加中央文革組織的一些大會，多次聽到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和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所以在外交部「文革」的頭兩個時期，我不但對外交部，而且對全國「文革」，還都是有些了解的。那時我經常到外面看大字報，閱讀和摘抄許多傳單和小報，單是「最高指示」和中央一些領導人的講話摘錄就抄了五六本。我密切注視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主要還是出於對中國向何處去的關心。這也確實是我這一輩子一直懷有的一點痴情。

### 抄家與破四舊

由於我是外交部早有名氣的「反黨分子」，這次又被定為牛鬼蛇神，所以紅衛兵運動一興起，辦公廳的紅衛兵就來抄我的家。大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一天，來了十多個戴紅袖章的

人，大部分記不清了，但其中有兩個卻印象特深，不會忘記。一個是毛澤東的表侄孫女、後來在「文革」中叱咤風雲的王海容。她當時是辦公廳綜合組的科員，和我在同一個單位。另一個是信使隊的李世濱，系忘年交李一氓的長子，和我同時在駐蘇使館工作過，當時任機要員。他們攜帶一批標語和小旗，先在院子裏喊了一陣「打倒何方！」一類的口號，然後在門上窗上貼了好些紅紅綠綠的標語，內容無非是：「打倒三反分子何方！」「何方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然後就是進門抄家，把我的書搬下書架，從中挑「反動」的東西。由於挑起來太麻煩，他們就把除馬列毛的書以外一律查封，貼上封條，不准動。只是有人指出一堆《紅樓夢》的書訓斥了幾句，說：「《紅樓夢》是毛主席批判過的（其實毛批的是《紅樓夢研究》），你還看！」對筆記之類材料，翻了翻，勒令限期交出。臨走前又呼了幾個口號，才集合起來走了。這種抄家，既沒打人也沒砸搶東西，比社會上傳說的抄家要文明得多了。由於紅衛兵是由「紅五類」組成的，首先是幹部子弟，所以和我年齡差不多的李世濱也成了紅衛兵來到我家，只是顯得有點尷尬，結結巴巴說了一句「何方，你是怎麼搞的」，就再沒話說了。後來李一氓被關押秦城，家被抄了個底朝天，他就又變成可教育好的子弟了。

我的家雖然被抄得文明，沒什麼可怕的，但社會上的抄家之風卻愈傳愈邪乎。而且我親眼看到許多抄家、破四舊的打砸搶和殘酷的批鬥場面。我原住的東城區無量大人胡同（梅蘭芳舊居），在一兩天內，各戶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就被一律砸掉了頭。住在隔壁的著名文化人唐弢，

多次被抄家和揪鬥，對面街上還經常貼出勒令的告示，如「勒令反動權威唐×不准吃大米白麵，只准吃玉米麵窩頭」等。後來他也和我常聊起在「文革」中的遭遇。

看到和聽到社會上其他機關學校抄家和破四舊的情況，還真有點嚇破了膽，心想自己也得採取些未雨綢繆的預防措施，免得被紅衛兵查出成爲話柄和當作罪證。於是就決定偷偷銷毀這樣一些自以爲帶有危險性的東西：一是包括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交響樂、歌劇、芭蕾舞的大批唱片，砸碎扔掉。二是一些西洋畫冊和光屁股的單張畫頁，用力撕成碎片變成垃圾。三是和一些「有問題」的人合影或他們的照片，包括作爲富農的父母親和闔家照片，特別是十多年跟張聞天在國內外的百餘幅照片。等到前些年要出《張聞天畫冊》時，發現不但張聞天夫婦和我們，而且其他和張聞天一起工作過或同他比較親近的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全把照片銷毀了，使一些事件如巡視駐外使館的活動就成了空白。四是一些「有問題」的人給我的書信和留下的字跡，如李一氓、胡喬木等，更不用說張聞天的大量手跡了。事後看來，這些東西並沒有人查抄或索要，自己的破壞完全是出於對形勢判斷錯誤，實在是庸人自擾，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再就是根據當時形勢，我估計勢必長期甚至永遠下放農村，多年來積存的大批中外文書籍就成了負擔，下鄉後哪有地方放呀？還不如早作處理，爭取主動。我先是向組織上提出交公，但辦公廳行政上和群眾組織都答覆不要，讓我自己處理。這樣一來，就只有當廢紙賣了。當時

所有學校關門，我上初中一年級的大兒子在家也沒事，我就讓他推着兒童車，裝上書到附近隆福寺舊書報收購站去賣。他約了個同學叫宮少霖，就每天幹起了這件事。那時處理舊書的人很多，收購站不但開價極低，而且規定精裝書必須撕掉封面才能過秤。孩子很守規矩，有時路上有人要挑着買幾本書，他們也堅決不幹。例如一次有人要買一本《詩詞格律學》，答應給一塊錢，但他們不賣，推到書店裏只賣了幾分錢。就這樣，經過一段時間，我家的存書就處理了一大半，只剩下馬恩列斯毛和魯迅等人的書，後來上幹校也確實是輕裝了。

### 參加了兩個月「文革」

「文革」一開始我就被定為牛鬼蛇神，勒令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專政，已經失去人身自由，所以無所謂參不參加。後來由於批資反路線，部黨委自身難保，顧不上再管我了，遂使我處於半自由狀態。特別是造反派起來後，得到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取得外交部運動的領導權，情況更有了進一步的變化。造反派認為，「文革」初期部黨委拋出三十幾個人來批鬥，實際上是爲了轉移視線、保護自己，是「資反路線」的典型表現，所以在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就把這些人給解散了，不再關押和看管。這時社會上正在批「二月逆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了「打倒陳姬喬」的口號，動員大家提供材料。於是各種揭發批判的大字報就鋪天蓋地而來了。他們還召開各種會議搜集材料。在搜集材料中，造反派自然不會放過我這個他們認爲的知情



人。因此，聯絡站核心組和一些戰鬥隊就紛紛來找我，動員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揭發陳姬喬」，「將功贖罪」。我本來就一直對等級制和特權制不滿，對陳姬喬也很有意見，所以遇到這個機會，一拍即合，當即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寫起了揭發材料，也算是「站出來」參加文化大革命了。

我給聯絡站寫的揭發材料和在兩三次知情人座談會上的發言，現在能記得的主要有兩項上網上的內容。一是說他們執行的一直都是「劉鄧路線」，不光是「文革」初期。二是說他們在外交部的工作同張聞天並沒有什麼區別。很明顯，他們既然執行的是「劉鄧路線」，和張聞天一樣，自然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不光是上網上網，還對每個人列舉了不少具體事例。如陳毅的鋪張浪費，在對外活動中講排場，擺闊氣；姬鵬飛的以權謀私，長期來一直想搬到東交民巷一個原外國使館住，張聞天主管外交部常務時給否定了，張被打倒後，他就很快搬了進去；喬冠華名位觀念極重，以前在不少場合表示，過去和胡喬木齊名，可是後來人家進步了他卻落後了，流露出對周總理的不滿，等等。還揭發他們經常接受別人送禮，一些大使回國總要給他們帶點洋貨。總之，在那兩個月裏我寫了不少內部揭發材料，雖然都是奉造反派之命，但也確實表現了自己的積極和主動，還幼稚地以為真是跟着毛主席鬧革命了。沒想到正是這些行爲，使我後來遭到許多年的批鬥和專政，落下了一個「支持造反派打倒陳毅」的名聲，一直影響到「文革」以後。



其實造反派也只是一時利用一下我，這我當時就清楚。他們仍然把我看成是張聞天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也沒錯，只不過屬於死老虎，而他們鬥爭的對象是當權的走資派。所以造反派主管運動的那九個月裏，我的身分並沒有變，只是行動比較自由了。而且這年六月，聽到毛澤東「對陳毅要一批二保」和周恩來反對「打倒陳毅」的傳達，我就意識到自己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姬喬犯了錯誤，趕快主動做檢討。這樣一來，又和造反派拉開了距離，也再沒人來找了。因此，從六月到九月那段批鬥陳姬喬最緊張的時期，我卻顯得有點自由自在，只是各處看看大字報和按規定參加一些大會。這樣，直到十月後的「批極左，抓壞人」運動，部黨委實際上取得了運動的領導權，我才又被隔離起來。

我爲什麼會站出來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姬喬呢？原因有兩個，一是思想認識，一是個人恩怨。主要還是當時形勢下的思想認識。我雖然通過大躍進、反右傾、特別是三年困難，個人崇拜的觀念已經大爲動搖，但是多年來的影響使我並沒有完全清醒。我對毛澤東還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和期待，對我們黨更是懷着深厚的感情和真誠的熱愛。「文革」的序幕是從文藝、歷史、教育這些方面拉開的，我沒有親身體會，感觸不深。「四清」時和「文革」初期，毛澤東一再提反對官僚主義和官僚特權，卻引起我思想上的共鳴。而且我對毛的個人崇拜觀念還很深，想的也很簡單，以爲毛在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三年困難後，已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現在要用大民主的辦法破除官僚們的特權，改變領導體制，推動社會進步。所以我首先響應號召，從自己做

起，竭力縮小同工農群眾生活上的差距，如退還保姆和孩子原住的一間房子，每月交超過工資一半的黨費（當時我的月工資為一百九十三元，交黨費一百元）等。而且「文革」初期還看到真的動了一些高幹的特權，如勒令姬鵬飛搬出原住外國使館。這類事也給我造成一定錯覺。雖然看不慣「文革」帶來的一片混亂，但是聯想到列寧讚揚的法國大革命，思想也就通了。說老實話，我在初期還是真心擁護文化大革命的，頭腦發熱，情緒高漲，在「不准革命」的限制下也還要「站出來」參加。

其次是因為我對陳姬喬本來就有意見，主要不滿是他們的官僚主義和享受特權等不正之風，但也夾雜着一些個人恩怨和報復情緒，就是抱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對我的殘酷鬥爭和嚴重處分。由於給我作的結論正如我在一九六二年的申訴中所說，「沒有一句話是有充分根據的」，所以我心中一直不服。我抱怨陳毅言而無信，很快就改變了自己在大會講話中許下的批判張聞天不搞株連的承諾。而姬鵬飛和喬冠華，和我相處很熟，對我應該說是非常了解的，爲什麼在處理我的時候竟然那麼心狠？姬鵬飛把自己對涉及周總理的關於接待外賓的規格過高的批評意見，完全推到張聞天和我的頭上，反而定爲張和我反總理的罪狀。喬冠華硬是堅持把我趕出外交部。現在，當造反派提出「打倒陳姬喬」的口號時，就又激起了我的埋怨，覺得一九五九年打倒我本來就冤枉，這次又把我當作牛鬼蛇神拋了出來，更是冤上加冤。難道領導人爲了自己過關就可以隨便把下級幹部整來整去，下面卻只能逆來順受，不得有絲毫的反抗？爲什

麼上面亂整下面不算錯誤，下面稍有反抗就是嚴重錯誤呢？這不是政治上的特權和明顯的不平等嗎？正是這些想法和情緒助長了我「站出來」揭發陳姬喬的勇氣，爲自己日後的倒楣埋下了禍根。

不管怎麼說，支持「打倒陳姬喬」的口號總是不對的，是我在「文革」中犯的一個大錯誤。這不但表現出我在政治上的簡單幼稚和心胸狹隘，更說明我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作了完全錯誤的理解，還在繼續做個人崇拜的俘虜，也低估了個人崇拜和一元化領導體制的根深蒂固。不過話又說回來，全黨和全國上下可有幾個人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呢？就是毛澤東自己恐怕也沒有預料到事情後來的發展。至於我所不滿的領導體制，更是多數老幹部要捨命維護的。這就是爲什麼許多人在「文革」中受到長期折磨，恢復自由後仍然要堅決擁護毛澤東和保持原有體制的原因，也是毛澤東後來實行軍管、把造反派打下去的原因。外交部的情況也一樣，部黨委的多數人和支持他們的司處級幹部，當然要求維護原來的體制和秩序，「文革」中一陣子又受到造反派的衝擊，所以同造反派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對於和造反派沾點邊的人也決不輕易放過。何況他們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都和張聞天劃清了界限，有些人還是當時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現在要老帳新帳一起算，我當然就在劫難逃了。

### （三）在被隔離的日子裏

#### 形勢發生根本變化

一九六七年十月，周恩來態度的變化，導致外交部造反派永遠退出歷史舞台，運動的領導權自然落在了無革派的手裏。但無革派和部黨委主流派基本上是一致的，後來也完全結合了。不過稍有不同，而這個不同就造成外交部「文革」的一些複雜曲折和撲朔迷離。因為無革派是有通天人物作背景的，他們往往見機早，看得準。例如無革派的主要組織「攀險峰」在成立宣言上有「打倒陳毅」的口號，但請示毛澤東後方針就很快改爲「對陳毅要一批二保」了。我一直有個沒有太大把握的想法，就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外交部的「文革」對毛澤東起了試點的作用。因爲這裏有幾位女將和他保持着經常聯繫，對於了解情況和作點先行一步的實驗都比較方便。同時外交部又直接由周恩來管，在他必須用周的情況下（由於「文革」把中國搞成爛攤子，要盡可能保持經濟和社會運轉，他還一時離不開周），有些事也需要讓周先知道並由周執行或推廣。因此，「文革」中許多事往往是外交部走在前面，比起其他單位和地區來得早。例如毛澤東要拋棄造反派，就是先從外交部做起的。在外交部的造反派被打翻在地七八個月後，毛澤東還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呢。而這次接見也預示着被毛澤東發動起來



的造反運動的結束，造反派正面臨着遭到鎮壓的命運。歷時兩三年，全國整了上千萬人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也是外交部首先開動和抓的比例最高的。

毛澤東拋棄紅衛兵和打擊造反派，絕對不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毛澤東後來最擔心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因為這是他認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關係到他的歷史地位。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則是既要用他做的另一件事即推倒「三座大山」維護他的歷史地位，又要實際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也是他決不允許的。因此他明知自己一手扶持起來的中央文革，並沒有什麼實力和群眾基礎，但他仍然要大力保護和支持，就是爲了用這股力量和周恩來相抗衡，壓制和防止否定「文革」的傾向。他不但不允許周恩來搞批極左，還要時不時地批右傾翻案風。這就使得周恩來不能不時「左」時右，顯得前後矛盾，沒有章法。例如才在外交部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批極左，抓壞人」運動，但很快又搞起了性質和對象完全相反的批「九十一人大字報」。而且在這期間，周恩來還一度提出要把造反派的頭頭、聯絡站核心組組長王中琪弄進醞釀中的外交部三結合領導班子裏。但後來形勢逆轉，王中琪反而很快成了「壞人」和「五一六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月聯絡站垮台後，外交部「文革」雖然也經過一些曲折和反覆，像批右傾翻案風、批「九十一人大字報」等，但總的發展一直沒有離開過鎮壓造反派、清理階級隊伍、抓「五一六」這個軌道。我由於支持過造反派，所以也就一直被打翻在地，接受批鬥和專政。

## 對我的批鬥

也是從一九六七年十月起，又開始了對我的專政和批鬥。執行這一任務的是辦公廳綜合組。這是無革派核心和直通毛澤東的王海容所在單位，群眾組織和行政單位是不分的。

在傳達了周恩來造成聯絡站垮台的談話後，就在外交部掀起了了一個「批極左，抓壞人」的運動。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聯絡站的頭頭。王中琪就被扭送公安部，因人家不收才只好派人接回來。另外幾個重要頭頭也很快被關押起來，逼他們自己承認是「五一六」和招供其他的「五一六」。與此同時，凡是被認為同造反派有關的人，也都被先後宣布專政，有的關押，有的被隔離。所謂關押，就是關在地下室或一間房子裏，日夜有人看管，不准離開，不能回家。所謂隔離，就是被安排在指定的辦公室裏按時上下班。上班時參加分派的勞動，寫思想彙報，學習文件，不得參加革命群眾的活動，還得隨叫隨到接受批判和審查，但是下班後可以回家，沒專人看管，一切規定自覺執行。不知是我的罪行比較輕，還是綜合組對我比較放心，給了我一個隔離的待遇，安排我同後來代替我任辦公廳副主任和黨委秘書的王凝共用一個辦公室。

對我的批鬥有大會和小會兩種。全部大會的批鬥，只有在一九六七年末的「批極左，抓壞人」運動中搞過一次。這也是我在十多年「文革」中唯一挨大會批鬥和「坐噴氣式」的一次。那次批鬥了幾個人，都是誰，已經記不起來了，反正是我被提溜到了台上，由綜合組機要秘書

陳貞芳作專題批判。批判內容主要是歷數過去如何追隨張聞天一起反黨反周總理，後來怎樣翻案，文化大革命中又跳了出來。爲了表示她的義憤，還在發言中幾次摠下我的頭，喝令我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批完後又大喝一聲「滾了下去！」於是我就低着頭從台上走了下來。另外在前些天的一般性大會批判發言中，已經有人點到我的名字，說我是外交部的一條毒蛇，只是沒有做詳細說明。這就是亞非司司長柯華那次有名的發言。說有名，是因爲發言從內容到態度都比較凶狠厲害，如說對查出來的各種壞人和自行跳出來的牛鬼蛇神，一定要從嚴處理，下決心關押一批、開除一批、判刑一批、掛起來一批……所以給大家的印象比較深。後來談起來有的記成「四大批」，有的說是「五大批」，還有說「八大批」的。除了大會點名批判外，這時也有給我貼的大字報。不過數量很少，記得的只有時任第二亞洲司司長姚廣貼的一張，標題是「把張聞天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何方揪出來示衆」，內容基本上是復述一九五九年批判我的論點。

所謂小會批鬥，就是綜合組把我叫到辦公室追查某個問題，或者是要定期訓（批鬥）一頓。問題都不大，但是陣勢嚴厲，態度凶狠，一定要擺出一種對敵鬥爭的架勢。例如一次是專門批我「冒充」綜合組組長。原來是清理階級隊伍時要填一種表格，裏面有一項「擔任任何種職務」，我填的是「原綜合組長」。因爲卸任綜合組長後我就下去「四清」，沒再擔任過其他職務，總不能寫成四清工作隊長吧？這不知是犯了什麼罪，硬是被大罵了一陣。陳貞芳指着田進

說，這才是我們的組長呢，你是什麼東西也冒充組長。這雖然使我哭笑不得，但申辯無用，也只好低頭認罪。

一次是批我隱瞞家庭出身。因為綜合組只有我這一個鬥爭對象，所以就對我吃了「偏飯」，花的時間不少。他們派王永華到我的家鄉去調查，除在那兒到處宣布我是壞人外，沒查出我在老家有什麼活動，只是查出我的家庭成分和我填的表不符。我參加革命後一直填的富農，但土改時被劃成地主（一則是我出走後家裏確實又添置了些地，二則土改時可能提高了成分）。現在綜合組硬是批我有意隱瞞，我說，對「地富反壞右」是同等看待的，把地主故意寫成富農有什麼意思呢？但有人還是要追問，你參加革命時只有十五六歲，怎麼就懂階級的劃分法呢？真是胡攪蠻纏，無法應對！

還有一次是追查我從銀行取存款的用途。「文革」前我在銀行裏有存款三四千元。「文革」中有一位我從東北帶出來參加革命的工農幹部叫門榮升，因孩子多家用比較緊。還有一位老朋友、劇作家謝力鳴患癌症住院，有些藥報銷不了。因此我就取了大半存款分別幫助了他們。誰想當時的銀行也喪失公德，立即報告了外交部。部領導和綜合組懷疑我是在準備逃跑的路費，就趕緊提審追查。我講了用途後，他們又找門榮升對證。那時門正以工人宣傳隊組長的身分進駐北工大，將帶着介紹信前去調查的王永華等人狠狠訓了一頓。他們也就不再懷疑了。

在我被隔離的一年半裏，雖然精神壓力一直很大，也時刻準備着接受批鬥。但是憑良心



講，對我批鬥的次數並不多，聲勢也不大。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根據我當時的觀察和分析，原因主要有這樣幾個。一是按照那時的情況，支持「打倒陳姬喬」的口號不能算做批鬥的理由。因爲「文革」頭兩年打倒的現象太普遍，各單位起來造反的群眾首先是打倒本單位的領導。我就親眼看到一些單位的領導人在同群眾一起喊着打倒自己的口號，包括姬鵬飛和喬冠華。而且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過「打倒陳毅」的口號可以喊，那姬喬當然就更不在話下了。毛的原話是：「群眾喊打倒朱德、陳雲、陳毅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喊就是了。」周的原話是：「不好籠統地認爲打倒陳毅這個口號是反動的，中央並沒有禁止這個口號。」「在部內可以喊打倒陳毅，在部外不能這樣搞，這是國際影響。」而我支持這個口號，還只是寫在內部材料裏，更不能成爲批鬥的理由了。二是我寫的材料，錯只錯在上綱上線，支持「打倒陳毅」，而揭發的事實卻並沒有什麼捏造和虛構。這些事實如官僚主義和特權等，也多是群眾知道的。如果用這些來批判我，那只能弄巧成拙，反而是揭露批判陳姬喬了。三是批判我缺乏群眾基礎，掀不起什麼高潮。外交部領導層的主流派，包括部黨委的姬喬等和追隨他們的一批司局長，對於支持打倒和揭發陳姬喬的人是非常痛恨的，但這些人在廣大群眾中卻並沒有什麼民憤。所以領導層主流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對這些人嚴加懲處，但終究沒有搞成大規模的群眾性批鬥。對我是這樣，對高級幹部也許更凶。例如潘自力，這位一九二三年參加革命、幾次擔任陝西省委書記、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最後任駐蘇聯大使的長征老幹部，在群眾中很有威信，

只因表態支持過「打倒陳毅」的口號，就受到長期折磨和迫害，最後死於山西一個缺吃少藥的偏僻山城霍縣。死後外交部核心組還派人去宣布；因為潘的問題還沒有做結論，所以骨灰不得進八寶山，家屬也得留在霍縣，不再是外交部的人了。但是在潘生前和死後都沒搞過大批判，也很少人知道他的下場。因為像他這樣在廣大幹部中有「好人」和「老實人」之稱的人，是很難搞起群眾性批判的。

### 隔離時期的生活

從宣布隔離之日起，規定我除隨時接受審查和批判、兩個禮拜寫一次思想彙報以及他們要的其他材料以外，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上班後打掃老部新樓大約有二十來個女廁所。男廁所歸同屋的王凝。花的時間都是一兩個鐘頭。其餘時間完全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允許看的書和搜集到的傳單小報。我們兩人一切自律，按時上下班，有事外出都會請假。我們的活動，始終沒有人看管和檢查，完全靠自覺。劉少奇在《論共產黨的修養》中要學習儒家的「慎獨」，這點我們都確實做到了。那時外交部各單位都已搬到東交民巷，綜合組也隨辦公廳搬去，而我卻被隔離在外交部街老部的紅樓裏，相互沒有電話聯繫。他們要對我提審、批鬥或要什麼材料，只好派人來通知我。老部偌大一個院子，除信使隊仍駐在我們打掃廁所的新樓和機要局原地未動外，以前的主要辦公所在地東樓和西樓都空下來了。原來顯得熱鬧繁華的大院也變得格外冷

清，既沒有車輛，也很少行人。有時在院子碰到押在西樓出來打掃大院的牛鬼蛇神，即使熟人也見面不說話，連頭都不點。像姚仲明這樣的老朋友，碰到時我問話他也不理，繼續掃他的地，和沒聽見一樣。其他不是牛鬼蛇神的人，不管認識不認識，相互見面也是一概不說話的。

那個時期，我除了回家後和家人還說幾句話外，上班時只有一個談話對象王凝。好在我們兩人過去的職務一樣，也沒什麼特別要保密的，所以可以經常談點往事。例如我被撤職後的部黨委情況，包括對我的議論和處理，就都是王凝那時告訴我的。老部留下的兩個單位又都是我們倆過去分工管過的，所以現在雖然人「鬼」有別，他們對我們也還比較客氣，從沒有人見面訓斥或叫做什麼事。我們打掃廁所可算盡責，只是有時懶得把用過的手紙送到垃圾站，而是倒在馬桶裏放水沖走，曾因堵塞下水道受到清潔工人的提醒，但沒批評過。假日可以上街，自由走來走去。那時外出主要是看大字報，收買各種文革印刷物，一般不去看朋友。有的人即使碰到，也搭不上話。例如一次在北京醫院看病時遇到李一氓夫人王儀，我問氓公情況如何？她只搖了一下頭就轉臉看別處了。還有一次在街上遇見延安老朋友何路，問她丈夫也是我的老同學付克在幹什麼？她也是搖頭不答。應當說這是我「文革」之前來往最多的兩家熟人。連他們都是這個樣子，別的熟人家哪還敢去？對我這個喜歡熱鬧愛說話的人，那些日子實在憋悶死了。

### 特殊身分

我的這種享受半自由人的待遇，還使一些人無法理解。一次在街上遇到「四清」時認識的昌黎地方幹部，他們是還在當權的造反派，來北京搞外調，在街上遇到我就大感驚訝，說要是在地方上的話早就關起來了，哪能讓你隨便上街，難道他們不怕你跑了？我的這種待遇，一方面表現在革命群眾的活動不能參加，如開會、遊行、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彙報，不能戴毛主席像章。另一方面也不禁止我混到人群裏去聽傳達和到處看大字報。按時上下班、節假日休息都和大家一樣。這種身分其實也不錯，應該知道的事也知道了，一些麻煩的純形式活動可以不參加。以遊行來說，當時規定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所以晚上半夜經常有一半句最高指示下來，宋以敏和兩個孩子必須迅速起牀趕回單位和學校去參加遊行。我因無此權利，也就繼續睡覺了。雖然一些會不能參加，但宋以敏回來說個大概也就知道了。另一方面，除長期打掃廁所外，其他處罰性的事情也給我和王凝免了。例如一些有各種問題的人，包括有歷史問題的，有現行問題的，或造反派中的激進分子，早晚都要被領到毛主席像前，排成隊低頭認罪，口中還得念念有詞。我每天早晨打掃衛生時都會看到這種現象，其中也有認識的人。像身為長征老幹部的陳志方大使夫人王靜，由於把偉大領袖毛澤東誤寫成了毛「擇」東，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也得參加這種低頭認罪的儀式。還有機要員出身的辦公廳政治處一個科員王萍，因為參加



反迫害大隊，造反派垮台後也被罰參加認罪。這類活動，我和王凝就沒參加。

這個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外交部旁邊一個大同中學設立的「十二·二六」戰鬥隊廣播站，幾乎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用高音喇叭廣播。內容除他們自己的活動外，主要還是各種文革新聞，包括及時傳達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員的接見、談話和有關活動。這些對我了解「文革」情況就幫了大忙，使我在隔離中消息還不太閉塞。

#### （四）對造反派的一些看法

##### 什麼是造反派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許可以歸納成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資反路線」反的以青年為主的群體。這裏說的當然是指外交部的造反派，但是看其他單位以至全國的造反派，實際上也都差不多。

外交部造反派的興起，也和其他機關學校一樣，由於部黨委開頭幾個月執行的所謂「資反路線」很不得人心，一些青年為響應毛澤東號召和受官方輿論影響，就自發串聯成立造反組織聯絡站，而且很快得到周恩來、陳毅和部黨委的承認。那時起來造反，既時髦，又有領導支持，這就使聯絡站立刻紅了起來，一時間全部幹部和勤雜人員有一大半參加。人一多，自然什

麼人都有，免不了混進來少數投機分子和極端分子，但絕大多數還是響應號召，自覺起來要跟着毛主席鬧革命的。特別是他們的頭頭和骨幹，主要是一九六四年前後進部參加工作的青年。他們一般出身好，多係「紅五類」，思想比較單純，本來就對官僚主義、特權、等級制不滿，又沒受過什麼挫折，有點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但他們也還是比較尊重領導，遵守紀律，顧大局講道理的。所以在造反派掌權的幾個月裏，外交部的運動表現得比較文明，除一些激進派戰鬥隊和少數極端分子自發的過火行爲外，整個說來，沒有出現過抄家和打砸搶現象，更沒有發生過武鬥。不過這種一哄而起的造反派組織，也和社會上的造反派一樣，一開始就分爲好多派，主要爲激進派和溫和派，最後走向分裂。

從上面的背景看，聯絡站雖然和周恩來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有分歧和頂撞，但整個說來它主要還是靠周恩來的支持才得以存在的。周恩來一不支持，就立即垮台。至於毛澤東的態度，大概體現在王海容的活動上。以王海容爲背景的組織「攀險峰」起先還附在聯絡站的名下，自稱「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攀險峰』野戰兵團」，但它有自己的獨立主張，並一直和聯絡站相抗衡，在批判王力「八七講話」後，更成爲取代聯絡站的主要力量。除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大背景外，中央文革也一直在積極向外交部插手，但在上述兩大力量面前沒有什麼太大作爲。無論當時還是事後，都沒有證據說明聯絡站和中央文革有什麼直接來往。如果要算上王力「八七講話」，那麼正是那次接見敲響了聯絡站的喪鐘。

我當然沒資格參加造反派組織，但可以參加他們組織的一些活動。和造反派的接觸，只有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在一九六七年四、五月找我去參加過三次所謂知情人座談會和幾次要我寫揭發材料。除此以外和在這之前之後就沒什麼來往了。在這些接觸中，我覺得他們還算有教養，比較客氣，並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對人橫眉冷眼訓來訓去的傢伙，總之當時的印象還不錯。

### 造反派的錯誤

既然發動文化大革命完全錯了，那麼號召青年人和廣大群眾起來造反就只能是胡鬧。因此，外交部造反派響應號召起來造反也是根本錯誤的。但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看，問題就要複雜得多，連周恩來在聯絡站垮台後不久還主張對它要一分为二，說它監督業務有功。事實上，在維持外交業務正常運轉上，聯絡站還真起了一點作用。例如當北外學生在外交部安營紮寨、查封部黨委時，就遭遇到聯絡站的勸阻。所以在它當權的那個時期也做過一些好事。只是整個來說，造反派不但無功可談，而且犯了很多嚴重錯誤。據我所能看到和想到的，可以談下面幾點。

首先是大方向錯了。聯絡站的宗旨和活動，不是促進而是妨礙中國外交工作的開展。當時世界形勢的一個重大特點是國際化迅猛發展，毛澤東卻使中國反其道而行，全面開展打倒帝修反的鬥爭，進一步把自己孤立起來。這種極左路線激發起來的造反派自然起不了什麼好作用，

只能是火上澆油，最後還使自己成了替罪羊。倒是以周恩來為代表反對造反的力量，在「文革」中期，適應形勢發展，及時扭轉方向，開闢了一個外交新局面。

二是頂撞周恩來和打倒陳毅。聯絡站在前期採取同周恩來、陳毅合作的態度，因此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後來提出打倒陳毅，就一直和周恩來發生頂撞，有些激進派還企圖「動一動總理」，要「火燒周恩來」。這已經不只是大方向錯了（由於「文革」是歷史的大倒退和人民的大災難，因此周恩來、陳毅等實質上反對「文革」的一些作法倒是符合歷史發展和對人民有利的），而且策略上和作法上也是步步錯，既搞亂了外交部，還使自己喪失存在條件。

三是打擊一大片，把幾乎所有當權派當成對立面，使多數司局級幹部，包括那些「文革」初期受到部黨委和工作組迫害的人，都受到衝擊。一旦形勢發生逆轉，他們自然會和部黨委聯合起來對付造反派。

四是烏合之衆，沒有統一紀律約束。對部分激進的戰鬥隊和少數極端分子的違法亂紀，核心組不但無法約束，甚至不知道。因此就發生一些戰鬥隊自行抓人批鬥、坐噴氣式以至打耳光的事。例如機要局幾個戰鬥隊翻牆入室把張聞天夫婦抓來進行殘酷鬥爭，核心組知道後還給予批評，但已經來不及制止。

五是狹隘的派性，把靠近或傾向陳毅和部黨委的人，特別是「文革」初期響應部黨委號召起來參加運動的積極分子和奉命搞「文革籌委會」的一批幹部群眾打成保守派、保皇黨，壓制



和排斥他們。

六是同外界特別是北外等學生造反組織串連，受他們極左思潮和過火行爲的影響，沒有幫助制止他們在外交上的一些違法亂紀活動。

七是在業務監督上有越權行爲，如周恩來批評的擅自批發一些電報（後來被誇大爲奪了外交權）。在領導運動中的過火行爲，例子就更多了。

談起外交部造反派的錯誤，一時也說不完說不全。何況我既不是造反派，又被隔離在牛棚裏，造反派的事，實在知道的不多，上面列舉的那些耳聞目睹的很難說都對。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也有許多壞事不是造反派幹的卻被安到造反派的頭上，而且愈說愈多，造反派成了「文革」中錯誤和罪行的大籬筐。

### 造反派成了大籬筐

把「文革」中的壞人壞事盡量往造反派的籬筐裏裝，把造反派妖魔化，這都早已成爲普遍現象。在外交部是這樣，在全國也是這樣。拿外交部來說，以聯絡站爲代表的造反派就措上了許多黑鍋，有些還被寫進了正式的歷史教科書，廣爲流傳。作爲局外人，我也可以舉出好多條。這裏只是簡單提一下，點到爲止，詳細情況談多了整理起來也費勁，何況我們在這裏並不是專門來討論這些問題的。

一、有意弄錯時間，把不是造反派掌權時期幹的事也堆在造反派頭上。外交部造反派興起於一九六六年底，第二年一月掌權，十月垮台，前後總共也就是九個月左右。但是還在「文革」後期，人們就把在這時以前和以後的許多壞事都算到造反派的帳上。例如「文革」初期部黨委主持批鬥孟用潛，拉來一些領導幹部陪鬥，這些人後來多數和部黨委結合起來共同對付造反派，還把挨批鬥受迫害的事也說成是造反派幹的。

二、不但張冠李戴，還上下胡聯。造反派掌權的時候根本不存在「四人幫」，但是在後來批判和處理造反派時往往要把他們和「四人幫」或中央文革搭上界，說他們的活動一開始就是受中央文革一些人的指使，因而犯下了滔天罪行，卻故意不提毛澤東特別是周恩來對造反派（聯絡站）的支持。

三、激進學生在對外關係中幹的一些違法亂紀的事和過火行爲，被一律安在外交部造反派頭上。例如著名的火燒英國代辦處，周恩來當時就已澄清，聯絡站頭頭和姚登山等人不但沒有參與，事先也不知道，完全是北京的激進派學生和工人幹的。還有周恩來親自出馬勸退的包圍蘇聯大使館事件（總指揮只是個十六歲的女學生）以及砸印尼和緬甸使館等，也都被說成是外交部造反派幹的。三十年來，一直有意隱諱引起對外關係緊張和發生比這裏提到的幾件還要更多和更嚴重的外交事件，根本原因都是當時推行的極左外交政策和要搞世界革命所引起的。這是一種爲尊者諱和推卸責任而拿造反派做替罪羊的常用手法。

四、還有些激進學生幹的事，如查封部黨委（被聯絡站勸離）、劫持陳毅（聯絡站反而參與掩護）、逼姬鵬飛、喬冠華上街賣報、在周恩來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胡攪蠻纏、惹得周心臟病爆發等，也都一律說成外交部造反派幹的。

五、公開宣稱造反派奪取外交部大權，時間還有幾種不同說法；半個月、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實際上半天都沒有。周恩來批評的也只是越權以業務監督小組名義向有關使館發電報。傳得最厲害的是被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時捧上天的駐印尼使館代辦姚登山，後來說他奪權當了「代理外交部長」還上了像《周恩來年譜》這樣的正式黨史書（只是用了個「革命領導幹部」的諷刺稱呼）。實際情況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澤東和尊重周恩來，當造反派的頭頭時也還是聽周恩來的話。不過他堅持只參加運動決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來先讓他參加黨委會議，後要他進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他都沒有去。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周恩來把他捧上了天（安門），又打翻在地，說他奪了外交大權，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台後，外交部召開萬人批鬥大會，批的頭號「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對周總理、要奪陳毅部長的權。批鬥後既未判刑，也無結論，就被送到秦城關押了九年。「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時，姚登山被放了出來，繼續當黨員（從未開除過），還恢復行政級別（十一級）。現在看來，這位老八路只是周恩來製造的一件冤案，但是許多書上至今還在流傳着被編造出來的「造反派外交部長」呢！

## 造反派的下場

外交部的造反派也和全國的造反派一樣，沒有好下場。這有點像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那次是許多知識分子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被打成右派。這次是一批大學生和中青年幹部響應號召起來造反，最後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過要談造反派的下場，還得事先做幾點說明。

一是關於造反派的界定。「文革」開始後，在毛澤東號召下起來造反的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而且一律自稱造反派。後來逐漸分化，大體形成傾向溫和與傾向激進的兩派。軍代表進駐後，溫和派（外交部叫無革派）被結合進領導班子（地方上是參加革委會），激進派就被整肅。當然也有少數單位激進派當了權，把溫和派或保守派當造反派整的。反正都是當權派整對立面。還有兩派都被整的，據說南京的許世友就在軍管後把兩派都給下放到農村，不准回城。但整個來說，沒有好下場的造反派指的還是當權派的對立面、被認為威脅到原有領導體制的激進派。這在外交部是分得很清楚的。

二是造反派和紅衛兵的關係。紅衛兵從中學興起，後來參加的已囊括各類學校和機關團體。他們響應毛澤東和林彪的號召，「殺向社會」，「破四舊」，對所謂「階級敵人」實行批鬥、體罰和抄家。開始大鬧的，有一批被稱為老紅衛兵，以高幹子女為骨幹，如北京的聯動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和西糾（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等，提倡「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大搞打、砸、搶，幹了很多壞事。後來隨着多數領導幹部被打倒，這些子弟們也被迫退出運動，許多人就去插隊或參軍了。這批紅衛兵活動時間主要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年底已經衰落。代之而起的，才是響應毛澤東批「資反路線」的號召、以大專學生和機關幹部為主體的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後在全國得到迅速發展。外交部的造反派也就是這個時候鬧起來的。所以造反派和紅衛兵有一定的銜接和交叉（大專院校新老學生造反派就一直叫紅衛兵），但終究是不盡相同的兩次運動和兩大群體。

三是造反派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造反派得到林彪、四人幫的支持和利用是不成問題的，但當毛澤東決定拋棄造反派時（外交部爲一九六七年十月，全國大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後），他們又積極參加了對造反派的鎮壓和以造反派爲主要對象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因此不能把林彪、「四人幫」和造反派混爲一談。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簡史》把造反派遭到拋棄和整肅後召開的九大竟然說成「造反派勝利的九大」，就實在令人不解。這樣說，又把毛澤東置於何地？不是成了造反派的頭子了嗎？

現在談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由於周恩來收回支持而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一哄而散。先是多數戰鬥隊聞訊宣布脫離，還把核心組的一批頭頭當成「五一六」分子來抓。同時一些造反派頭頭和骨幹也紛紛「起義」，進行反戈一擊。再加上原先對立面的群眾組織「攀險峰」等無革派

的圍攻，聯絡站一下就土崩瓦解了。從此，造反派的頭頭、骨幹和基本隊伍，以及和他們多少沾點邊的大小領導幹部，就成了清查和批鬥對象，在接下來的各次運動，如批極左抓壞人、清理階級隊伍、抓「五一六」期間，被戴上各種帽子，不但有七八年或更長時間受審查、靠邊站和挨批鬥，而且除一些被迫害致死的外，其餘的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調離外交部，並且在工作安排、調動和升遷上受了一輩子的影響。一些「起義」的也沒倖免。

像上面談到的，外交部的造反派頭頭和骨幹，除少數搞投機的極端分子外，絕大多數都是些出身好、有文化、較正派的青年黨員幹部。他們有的是解放前的地下黨員，更多的則是北外等大專院校學生中的尖子，被外交部篩選進來的培養對象。所以在他們當權的那九個月中，行事也比較文明，沒有發生過整死人和致殘的惡性事件。（外交部「文革」中整死人和致殘的事，都發生在軍代表進駐和部黨委改稱核心小組恢復對運動的領導後。）被整肅後近四十年來的表現，也證明對他們的這種估計並沒有錯。但是外交部對他們的處理卻是經過長期批鬥後設法分配外地，在辦完移交手續後還要在書面材料中和口頭上通知接收單位說本人有嚴重問題，不得重用，使許多人學非所用，用非所長，喪失機遇，抱憾終生。甚至幾年後接收單位要作職務變動和升遷，外交部也要出面干涉。造反派原來說要讓「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現在應驗到了他們自己身上。

不僅對造反派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而且對於同造反派稍微沾點邊的大小領導幹部也

不輕易放過。有些人我還比較熟悉，也了解他們的遭遇。除前面提到的潘自力、陳家康、劉曉等人外，還可多談點羅貴波、徐以新的情況。兩人都是長征老革命，羅貴波是遞補上去的八屆中央委員，徐以新是長期訛傳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半個。他們的挨整主要是由於一九六七年八月聯絡站提出讓他們參加「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並得到周恩來同意，還上報了毛澤東，後來因情況變化也就不了了之。另外，他們對批鬥陳姬喬的態度也不夠明確。羅貴波還在全部大會上公開點名揭發批判姬鵬飛，其中就提到我，說像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何方，他曾一再提出調離外交部，總是被姬鵬飛包庇和袒護下來。在造反派垮台後，他們受到停職審查，不但長期靠邊，還被一度當成了「五一六」的後台。直到一九七九年兩人才得到安排。羅貴波被排擠出外交部，調到山西當了省長。徐以新被停止黨籍四年多，下放幹校勞動，後來由於胡耀邦的干預，才被派去巴基斯坦當了大使。

在談到造反派的時候，總感到有不少問題值得反思。例如爲什麼我們黨總是不但不愛惜人才，還要一茬一茬地大量摧殘人才？紅衛兵和造反派都是我們自己號召和發動起來的，大多數是中青年知識分子，裏面有不少精英。但是過不多久，我們又親手把他們處理掉。讓一千多萬紅衛兵「上山下鄉」，國家不要了（除那批高幹子弟帶頭的老紅衛兵如「聯動」、「西糾」等外）。對數以百萬計的造反派，更是窮追不捨，打壓到底。這就把國家花錢培養出來的不止一代的大中學生白白浪費掉，使我們的科學文化一直落在世界的後面。還有，就是爲什麼大聲提

倡自我批評的黨總是害怕自我批評，不願意總結經驗教訓，對於才過去的歷史也要弄虛作假，或者把它變成禁區，不准自由討論，不准揭露真相，不准發表不同意見？這樣，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一筆糊塗帳，一切錯誤和罪行都可以歸之於林彪、「四人幫」和造反派；不但可以減輕和開脫毛澤東發動與領導「文革」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可以掩蓋自己舉手贊成進行文化大革命和成立文革小組、舉手同意選林彪為副統帥和開除劉少奇黨籍的表現，還可以報復批鬥過自己的造反派和排斥一些異己分子。胡耀邦倒是作過自我批評，並認為「文革」中的兩派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但有些人好像自認一貫正確，並且保護一派打擊一派。很明顯，這些問題都是應該進行認真反思的。而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造反派，就是一個需要重新研究、還它本來面目的問題。





第十章

九年幹校生涯

一九六九——一九七八年



斗以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  
为指导  
斗、私、批、修、反  
斗、私、批、修、反  
斗、私、批、修、反  
斗、私、批、修、反

北京  
1969.2

北京，下放幹校前全家合影，一九六九年二月

## （一）幹校探源

### 從辦幹校的決策談起

在談我個人的九年幹校生活之前，有必要先談一下幹校的緣起，也就是我對幹校的決策和它的思想根源的看法。因為從辦幹校可以看到建國後走過的二十年道路和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長期落後的原因。這也是用個人這麼小小的一滴水來反映大千世界的一種想法。問題很大，不一定能說清楚，這裏只是提出來討論討論。

在「文革」期間盛極一時，遍佈全國的五七幹校，這個重大的決策過程倒是非常簡單，只是毛澤東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個批示，就是《對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子文的批語》。裏面說，「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看來好像是毛澤東臨時想到、順手寫下來的，並不像經過深思熟慮和字斟句酌，因為手稿在「廣大幹部」前還多寫了兩個字「因有」，成了衍文，在發表時才被去掉。但是就這個簡單批語，發表出來已經驚天動地，在全國各地和所有機關團體，立即掀起了辦幹校熱。一下就出現了成千上萬個五七幹校。如同大躍進年代，毛澤東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國農村就在三幾個月內實現了公社化一樣。在



在證明了個人崇拜和一元化領導體制的神威。爲什麼叫「五·七」幹校呢？那又起源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信中提出，黨政軍民學一切機關單位和行業，都要在自已主要從事的職業外兼做其他行當的事。就是說要取消分工，減少交換，想在農村化和平均主義基礎上消滅三大差別。開頭主要還是幹部參加勞動和鬥私批修。黑龍江省安慶縣就是根據這封信的精神辦了一所柳河五七幹校。實際上辦的是農場，但被說成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爲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築走出了一條新路。經毛澤東肯定後迅速在全國推廣開來。

這段時間，毛澤東還有其他一些相關指示，有的登了報，有的只是口頭傳達，這些合在一起，就更加推動了辦幹校的熱潮。一個是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和精簡機構，甚至說冶金部可以辦成「冶金科」，要那麼多人幹什麼。對此，周恩來又是聞風而動，立即將總理辦公室人員減去一大半，同時指定外交部只留五百人，其餘兩千多人一律下放。再一個就是動員知識青年和城市人口到農村安家落戶。先提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來一個動員」。這一動員，地方上還擴大到了城鎮居民，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和鼓勵。在報道甘肅會寧縣一些城鎮居民要求下鄉並且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這一消息時，《人民日報》在毛澤東批准同意的「編者按」中提出，「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勞動的城鎮居民，熱烈響應毛主席的這個偉大號召，到農業生產的第一線去！」說「這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的正確途徑。」於是又掀起了一陣城市人口下鄉的熱潮。一些

地方也趁機把城市各種閒散人員、失業工人（甚至暫時停產的工廠職工）、打派仗的群眾組織成員強行遷往農村，吊銷了他們的城市戶口。

外交部的五七幹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辦起來的。那時不但外交部，無論什麼地區和部門，本身都無所謂決策不決策，只有一個如何迅速落實最高指示的問題。外交部不但有最高指示，而且有周恩來的督促。但是一下安排兩千多人下放終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得人馬未動，糧草先行。於是立即派人尋找校址，北迄黑龍江南到湖南，最後決定除保留山西離石的「六六學校」和北京郊區兩個勞動基地外，又在湖南茶陵、湖北沙洋和江西上高各辦一所五七幹校。經過同地方上的協商聯繫、自身籌建部分房舍和置辦應用物資，在最高指示下達後不到半年已經一切就緒，包括我在內的專政對象夾雜其間的第一批學員，於一九六九年三月就登程南下

### 農村化的必然步驟

從決策過程看，辦五七幹校好像有點偶然。其實不然。如果聯想到建國後中國所走的道路，就會豁然開朗，發現辦幹校確有它的必然性，連個人上幹校也是今生必須走的一段門檻甬道。不然的話，抗日戰爭也不過八年，怎麼幹校就上了九年？結合歷史，一下就想通了。

說來還真有點奇怪。人類文明的進程和國家現代化的實現，一個普世規律就是必須走城市

化的道路，首先表現在城市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兩者基本一致，但不完全相同）的急劇增加、鄉村和農業人口的絕對減少，最後走向城鄉差別的消失。例如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城市或非農業人口的比重早已超過百分之九十；而農業人口則在百分之十以下，英美等國只有百分之二、三。奇怪的是，我們國家建國後執行的政策和所走的道路卻正好相反，是要捨城市化走農村化的道路。實現社會主義要求的消滅城鄉差別，不是要落後的農村趕上先進的城市，而是要城市學習農村，為農村同化。從文明進化和現代化發展的觀點看，這只能看做是開歷史的倒車，引導社會倒退，使國家落後，人民遭難。事實也確實如此，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路還真是這樣走過來的。

建國後不久，中國黨和政府就實行世界上少有的戶口制，並且配合以農產品統購統銷、糧食和副食品定量供應（發行各種票證）等一整套制度和政策，把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能吃商品糧的人和不能吃商品糧的人截然分開。這就造成了城鄉二元結構，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成為實際上的二等公民。那些年的所謂「農轉非」（農業人口變成非農業人口，能吃上商品糧），可說是難於上青天。有些人為此花好多錢和通過很硬的關係走後門才能辦到。農村和農民不但要負擔國家建設的資金積累和供給全國人吃飯，還要接納城市不同時期因各種原因下放的人員，而且在制度變遷和生產實驗上也要起帶頭作用，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中國的許多事情好像都要先從農村做起，例如社會主義改造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大躍

進中的放衛星和大煉鋼鐵，從農村「四清」到向貧下中農學習等。其結果就是農民、農村和農業的遭殃。列寧主義說的絕對貧困化，那些年倒是在農民身上應驗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引起人們關注的所謂「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建國後已經開始出現，就是上述方針和政策造成的。當年的嚴重程度不知超過現在有多少倍。這從我們前面談過的三年困難時期和參加「四清」的情況中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種政策和它的後果，如戶口制、農民的二等國民身分等，現在仍然存在。這是國家欠農民的債，大約今後相當時期也是償還不清的。

捨城市化走農村化道路還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城鄉人口比重的不變，甚至農業人口還稍有增加的趨勢。近來我又翻閱了一下國家統計局關於人口統計的材料，發現我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始終保持着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比重，城市化進程一直處於原地踏步的境地。一九六九年城市人口比重反比一九五九年有所下降。在此期間不但嚴禁農村戶口進城，還一再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務農，單一九六二年就有兩千萬職工下鄉，使一九六三年農村人口比一九六〇年增加百分之三。直到改革開放後，城鄉人口對比才開始發生變化，但因戶口制的限制，城市還有大量臨時住戶和農民工。而且在農民繼續受到不公平待遇和政策上不夠重視農村與農業發展的情況下，還使城鄉差距和貧富懸殊得到迅速發展，三農問題也相對地更突出了。這裏引證這些枯燥材料就是要說明，由於建國後堅持走農村化的道路，所以做出城市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下



鄉上幹校，就沒有什麼費解的了。

農村化還要求城市居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農民化。建國後一直強調知識分子下鄉，從土改起已經小規模地在做。發展到「文革」，由於進而認為書讀得愈多愈蠢和知識愈多愈反動，所以就需要採取更加全面和嚴厲的措施。一是停辦大專院校（中學也一陣停課鬧革命），要辦也應分散到農村和實行半工半讀。毛澤東在「文革」開始時就批示：「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搬到工廠去沒地方容納，實際上就是一律下放農村。二是對以中學生為主的已有的中小知識分子，實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批到農村或生產建設兵團去安家落戶。三是為城市機關幹部和社會上的高中級知識分子辦五七幹校，一部分人輪訓，一部分定居。可見，辦幹校還是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實現知識分子農民化的一個重要措施。

## （二）淒涼上幹校

### 押解去江西

一九六九年三月外交部幹部第一批上幹校，和這年秋末的戰備疏散大批人馬上幹校不同，初次上幹校被看成一種光榮的事。形式上要辦個人申請、組織批准的一套手續。因此大家都爭相報名，搞得熱火朝天。可我卻感到悲憤和淒涼，原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對我打得更重



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幹校，參觀永新三灣，一九七一年十月

了，雖然還是群眾專政，沒進監獄。但是第一，去幹校的人，臨走前要集合去天安門向毛主席宣誓，表示決心扎根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進行勞動改造。我被通知不准參加這一活動，說是沒資格向毛主席宣誓。第二，在上火車前外交部還要舉行一個歡送儀式，我也不能參加，而是提前上車等大家，歡送場面也就知道了。不讓參加這兩項活動，對我來說當然沒有什麼損失，但它是要表示一種政治待遇，即對大家意味着上幹校光榮，我則屬於戴罪發配，不能分享這一榮譽。第三，更嚴重的是一上火車就受到嚴格監管，說是怕跳車自殺或逃跑。我在車上的座位安排在信使隊兩個壯漢之間，規定離開座位就得報告，上廁所也要有人跟隨，所以是名副其實的押解，只是沒戴手銬就是了。

離開北京上幹校，我得到通知比較倉促。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好準備的。和當年行軍一樣，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做到說走就走。當時的思想是白茫茫一片，今後會怎樣處理，只好聽任命運擺布和組織安排了。所以我沒有帶多少行李，除日常生活用品和簡單的衣被之類外，就是幾本書。家人相送到集合出發點，由於前途未卜，去向不明，不知如何發落，因此並沒有需要互相囑咐的，只是請他們立即回家，免得大隊人馬到時顯得尷尬。別看我當時心情上感到孤獨淒涼，成了精神上被集體驅逐出來的失群孤雁，但是整個說來並沒有完全陷入悲觀，人生哲學和原有信念也沒有發生動搖。我仍然堅持着，不管遇到什麼艱難困苦，經受什麼冤枉委屈，都一定做到：一，決不叛黨叛國；二，決不輕生自戕；三，活在世上，就要繼續學習，為社會為人



民做點力所能及的貢獻。當時我估計，是不可能再進北京或其他什麼大城市了，肯定會在農村過一輩子。即使這樣，起碼還可以教書掃盲，從事有助於提高農民文化的工作，例如當個小學教員或在地方小報上做個編輯什麼的。這樣一想也就鐵心了，對於面臨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也可以忍氣吞聲地接受。

上高幹校分散在郊區四個地方。我所屬的第三連指定進駐縣北十餘里磚場周圍。這個連有一百多人，完全由辦公廳各單位的幹部組成，幾乎全部都是青壯年。我雖然才四十七歲，但能算是全連除董越千外年紀最大的了。人員構成中除四個專政對象外，其餘都算革命群眾。其中站隊正確（無革派和支持部黨委）的人數不多，被任命為各級領導骨幹；大部分屬於站錯了隊的一般群眾。四個專政對象除我以外，還有釣魚台國賓館管委會主任李巨業，屬中年中層幹部，被定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他的「罪行」是，「文革」期間，一次中辦（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他有位中央首長要到釣魚台的幾號樓住幾天。他問是哪位首長，人家為了保密不告訴，於是他就答以沒空閒的樓。後來得知是毛澤東，但悔改已來不及了。因此被定為拒絕毛主席入住釣魚台的現行反革命問題，立即停止工作，進行批鬥。在批鬥中他已承認是走資派，但不接受死不悔改的附加詞，申辯他是能夠悔改的。這又產生了個態度問題，算是罪上加罪，因此作為專政對象押解來幹校監督勞動。另外兩個青年是機要局的譯電員，名字忘記了。其中一個是晚上睡覺時說了什麼夢話，好像是把毛主席說成了劉主席，被革命群眾聽見舉報，打成了



現行反革命。他表示不服，爲了表白，用刀剝掉了一個手指頭，不想反而成爲執迷不悟進行反撲，又是罪上加罪。還有一個青年，所犯何罪已記不清了。我們四個人分別編在各班，接受監督，沒人說話，四人相互間也不准說話，還要經常以班爲單位接受批鬥。總之，由於是以專政對象的身分押解進幹校，所以勞動、生活等各方面就和一般幹校學員有很大的不同。

## 專政下的幹校生活

### 先談勞動

幹校學員的基本任務是體力勞動。在這一點上，專政對象同大家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專政對象的勞動重，勞動時間長。

第三連進駐的是大躍進時修建、後來遺棄的磚廠，是德國式的轉爐燒磚。磚廠是圓形，建有十多個碼磚室，由於燒火不斷，所以從這頭碼磚坯，從那頭就可取燒好的磚。這樣輪回不已，日夜不停。磚廠由於長期沒用，也沒人管，已經破爛，必須修補。所以頭幾個月的勞動是打基礎，包括開闢道路、修補磚廠、收拾住房，就是周圍當年職工住過的草棚。我所在的這個班參加披荊斬棘、修橋鋪路。第一天就出師不利，砍樹時把手砍了個大口子。但是輕傷不下火線，稍作包紮（一個女同志捐獻出了她的手絹）又繼續勞動。這個班的班長叫譚秀民，是才從外交學院研究生班畢業調到檔案室的青年幹部，對我管制極嚴，一直把我當壯勞力用，什麼活



上高幹校磚廠豬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重就讓我幹什麼活。上下午勞動中間都有一次休息，午飯後還有一次可以東倒西歪睡一會兒的午休。每次休息過後都要先集合，由班長帶領念幾句毛主席語錄才能開工。罵我的語錄我也得跟着念出聲來。我是被剝奪了休息權的，在大家休息時我總要幹些修工具、磨鏟刀之類的事。修得好、磨得快，集合時班長就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如果沒有來得及修完或被認為修得不好，就要先批判幾句，然後念：「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幹這種活兒實在感到窩囊，吃力不討好。但是辦事認真的天性總是使我每次都要竭力爭取把工具修完修好。

幹重活，譚秀民總是要把我挑上，雖然他知道我的年紀大，身體不太好。例如到十公里外去擔水泥，兩袋一百斤，一定有我的份。磚廠開工後，我又被派去起磚，就是將燒好後還有點發燙的磚，一次搬四塊，堆滿獨輪車推到存放場地。起磚和碼磚都要用手，戴手套，很快磨爛；不戴手套，手指和手掌很快磨出血，晚上疼得睡不着覺。

豬圈養了十來頭豬，派了兩個人還是養不好，於是改派我一個人接替。從製作飼料、去很遠的廚房擔水（兩大桶泔水有一百多斤，這是過過秤的）、餵豬、起圈、直到配種、接生小豬等都是我一個人承擔。（據說下放湖南幹校的宦鄉、柯華、姚仲明，三個人養了兩頭豬，有些活兒還得派人幫助。）那時養豬有兩大困難。一是飼料，沒有糧食，又要餵肥，就得自己設法解決。我就是按照書報上的介紹，走當地叫「醱化飼料」的路。也就是把撈上來的水草（如水



浮蓮）剝碎，拌上部分磨過的稻穀糠和少許麩子，加一點原有的「醱化飼料」做酵頭，堆在一起發酵，溫度和時間掌握好，等到散發出一種香甜氣味就行了（否則豬不吃，全部作廢）。做一次，可以餵好幾天，豬也喜歡吃。二是豬瘟。那裏當時流行一種豬的哮喘病，治不好就死。我跟獸醫學到的辦法是最好注射抗生素特別是土黴素。由於公家沒這筆費用，我就自費托人買來土黴素，再加上常放豬外出吃草，終於扭轉了這個被動局面。在解決了這兩大難題後，就訓練豬聽指揮和上廁所。聽指揮，就是按我的口令離圈出去到放牧地吃草和聽命全部回圈。其實辦法很簡單，就是用豬最喜歡吃的空心菜（我們種了一大片作豬飼料，廚房有人也弄回去作菜吃）作誘餌，先從兩隻用作帶頭的豬訓練起，喊話後趕它們回來吃空心菜。用不了多長時間，豬們就聽話了。聽到我的喊聲，它們先是豎起耳朵辨別真假，聽準後就撒腿往回跑，爭吃空心菜。我的兩個兒子來探親，覺得好玩，也喊話叫豬回來，大概是口音的關係，怎麼喊，豬也不理。所謂上廁所，就是訓練豬不要拉屎撒尿在鋪着草的圈裏，而是到後面的空地上去。這樣就不用常換鋪的草，積肥也方便。總之，我養了大小豬二十多頭，不但大家可以經常吃上肉，而且豬圈也顯得乾淨利落，我還可以坐在豬圈旁的小屋裏看看書，比跟大隊人馬在一起，動輒得咎，要自由自在多了。直到現在，偶爾想起我的那些小豬們，還會怦然心動，甚至眼眶爲之濕潤。



## 次談監督

派一個人在遠離連隊駐地的豬圈養豬，實際上已很難監督了，我在那裏看什麼書都沒人管。但還是發生了個不好解決的問題，就是我的少花錢（我們的豬圈也是個因陋就簡的破草棚）、養好豬的事傳遍了全校，校部應大家要求決定開一次現場會。誰來向大家介紹經驗呢？成了難題，反正不能讓專政對象出面。後來院部和連上商定，到時由連長給大家講。我們的連長又是個過分剛愎、耻於向我這個「階級敵人」學習的人，根本不找我了解情況，自己就關起門來寫起了講稿。到了選定的日子，全校十多個連隊有二三十人來到了我的豬圈。我只能躲在後面人們注意不到的地方，聽連長講話。只記得他講的第一個問題是，要辦好豬場首先必須領導重視和選好人。在講了連上和支部如何重視以後，接着說，要挑選那種工作責任心強、做事認真、有鑽研精神、富於創造性的人來當飼養員，我們三連也是經過幾次淘汰才最後選定下來的。他沒有說名字，大家也遵守規矩沒有問，只有我認識的幾個熟人朝着我笑了笑。至於後來介紹的養豬經驗，多少沾點邊，但主要是些政治化了的空話，我很佩服他怎麼能講一個多鐘頭。然後是大家在豬圈轉了轉，參觀一番，現場會就算結束了。至於實際操作，由於我不能出面，無人示範，連長不敢也不會把大小豬放出去再叫回來。這場表演，大概也有向院部顯示連隊是怎樣對專政對象實行監督勞動的意思，因為我怎麼也想不通現場會的這種開法有什麼用。

其他的監督事項還有的是。例如我不能離開隊裏一步。其他人可以上街趕集，我不准。人

家一年可以探一次親，我不能。我也沒有資格參加黨內外一切會議，不能聽任何傳達報告。有什麼需要我知道的事，也是由小組長轉告。最使我不滿的是剝奪我的通信自由，我和家人的來往信件都得先由支部書記或指定的專人審查。好在我們雙方都知道這種情況，所以信的內容是完全可以公開的，沒有任何隱私和秘事可言。特別是兩個兒子，完全學會了官方通信格式，每次都是千篇一律的空話。我想知道的他們的學習、生活和心思，從來不寫一句。總是在稱呼之後，接着就寫：「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偉大的領袖（有時還把四個偉大全寫上）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中間只有幾句諸如「我們一切都好，請不要掛念」之類的話，就用一連串萬歲的口號結束了：「最後讓我們高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偉大領袖（有時也重複四個偉大）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有時還要來幾個打倒，例如「打倒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寫多少打倒就看他們的興趣了，有時一個也不寫，有時寫一堆。不知檢查官看了這樣的信有何想法。反正我看了自己兒子恭恭敬敬一筆一劃寫的那種毫無內容的信，心裏還是很熱乎的。對我採取的這種違憲非法檢查信件的行爲，大約持續了六七年之久。

在此期間，我的老父病故。大概家裏人也知道我的處境，只是來信通知了一聲，並沒有要

我回家奔喪。由於家庭成分不好，我向幹校連提都沒提，也沒有作任何表示。老母去世，我沒能奔喪，但還按張聞天意見寄了幾百塊錢回去。這次老父西行，大概連錢也沒寄一點。回想老父生平目不識丁，受苦一世。老年時不但得不到我的幫助和盡孝，還一再受兒子的連累，擔驚受怕。每想到這些，總覺得不是味道。難道我們黨真的要叫人六親不認？只能「親不親，階級分？」

### 再談批鬥

對專政對象的批鬥，那就可說是經常化了。按照規定，對於我，隨時隨地隨便什麼人隨便以什麼規模，都可以進行批判。所以在頭半年的批鬥還顯得頗為頻繁，只是規模不大，頂多以班為單位，有時也在小組進行。批鬥場合，開始時都在房間（草棚）中進行。當時班、組晚上開會比較多，內容主要是學習和總結白天的勞動和生活，還沒有安排過對我的專門批判。那時興互相取經、交流經驗，特別是汪東興在江西奉賢辦的中辦五七幹校，名氣很大，被奉為楷模。對我們上高幹校來說，又是近在咫尺，所以就很快派出一批人前去參觀學習。回來一傳達，果然名不虛傳，連五六十歲的女同志上工收工集合站隊，都是健步如飛，唱起歌來也是嘹亮雄壯。對我有直接影響的是，他們經常開地頭批判會，就是在勞動休息時在田間對專政對象進行有組織有準備的批判。這可一下活學活用立竿見影了。我們連有四個專政對象，就在所屬的四個班分別開批判會。頭一兩天先指派幾個人作準備，然後在勞動休息時舉行。雖然一班人

散坐在地頭田間，但形式頗爲正規，不但發言先後有序，而且還要表現出憤怒狀。有時也安排喊幾句口號，無非是「何方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至於批判內容，其他三個人我不清楚，對我主要批的依然是追隨張聞天反黨的事。前面講過，「文革」中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姬喬的口號是批不起來的。要批判一九五九年的事情，許多人又不了解，所以要事先準備，還特意搬來保管張聞天專案材料的政治部一位叫薛純的女同志。在她發言後，黨小組長就以嘲笑的口吻說，別以爲我們不知道你跟張聞天幹的勾當。這種田頭批判會也沒能持久，開了兩三次就開不下去了。因爲大家感到厭煩，情緒不高。

再一種批判形式就是上面說的以班組爲單位晚上開的生活會。雖然專門安排批判我的會很少，但是一些人爲了表現積極或者轉移視線，還是要設法批上我。例如原辦公廳文書處長陳強，很會隨機應變看人行事。一次生活會上不知什麼事有幾個人對他的白天言行提起了意見。不料他發言時先念了一句語錄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然後就把矛頭轉移到了我的身上，說是發現了什麼階級鬥爭新動向。由於對他的意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我則是敵我矛盾，孰輕孰重，孰先孰後，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他的這一招還真靈，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第一線。一些要尋找機會顯示立場堅定的也會趕緊跟上去。例如同班的原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董越千（他因在打倒陳姬喬問題上取騎牆態度，被部黨委和姬鵬飛懷疑爲「五一六」的後台，率先下放幹校，本人也很



感不安，總想設法緩解懷疑，取得信任），立即響應並舉例說，「這次下放後，何方仍然稱呼我董主任，他明知我已經是五七戰士了，還用舊稱呼，顯然是故意的，有什麼用意他自己明白。」這次令人哭笑不得的會，又都是熟人發言，所以留下的印象特別深。

其實，真正令我感到不快的倒不是組織起來的批判，而是極少數積極分子和急於表白自己的吹毛求疵和故作姿態。例如剛談到的陳強，就是見人兩副面孔，對那時當了個副班長原來是他下級的打字員劉蘭雲，就有點諂媚，開口一個蘭雲閉口一個蘭雲。對有問題的人，他會表現出極大的階級仇恨。例如他有一次患了重感冒，隔離在一個房間裏。我考慮到過去是老同事，現在又是同班，就特意去看他，表示慰問。不料被他大罵一通，要我「滾了出去」。我從此就再沒跟他多說一句閒話。後來我得到復查平反，在北京再遇到時，你看他那個熱乎勁，簡直叫人無法應對。還有我們的班長譚秀民，他一直對我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視着我的言行。幹校開始那一陣，上工下工是要一路歌聲不斷的。一次唱到《抗大校歌》，他竟能在大隊合唱中聽出我小聲哼錯了歌詞，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唱成「團結、緊張、活潑、嚴肅」，問我是什麼意思。我說，我唱的是當年在抗大學的，後來什麼時候改了我不知道。幸好這次還沒上綱上線，批評了兩句，叫以後注意，也就算了。應該說，我在「文革」中被定為牛鬼蛇神，特別是上了幹校，一直謹言慎行，整天提心吊膽，就這樣還經常挨批，感到日子實在難過。對一些人在運動中輕生自盡，我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但我已下定決心不走那條路。

## 「群眾」新解

所謂群眾專政，其實定案和執行的，只是部黨委少數人和支持他們的少數司局長以及下面的積極分子骨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群眾反而是同情我的。九年的幹校生活使我對這點感受極深。即使在管制最嚴、批鬥不斷的情況下，我也知道多數人對我是同情的，並不相信領導上強加給我的那些罪名。有些膽子大點、又沒站錯隊的人甚至敢於公開當眾說明。例如當我們副連長的邵乃讀，輪到他安排工作時，就對我毫無歧視，完全信任，而且多次公然對人說，「何方有什麼問題，還不是受了張聞天的牽連。」支部和班上組織的批鬥會，被事先指定發言的人，有不少也要偷偷給我打招呼：「老何，對不起，明天我也要發言了。」私下對我安慰，說點寬心話的就更多。支部對我的評論，甚至部黨委和政治部有關我的指示，也都有人及時透露給我。所以我不但不感到孤立，而且並不十分閉塞。例如林彪出逃，先是黨內傳達，要求絕對保密，泄露出去開除黨籍。但有位林兆潤同志硬是要冒着這麼大的風險來告訴我。他背地裏找到我，不敢說出聲，只在地上不斷地畫林字。可誰能因此想到林彪出逃？我還以為他自己有什麼事。問他，他只是搖頭，繼續畫林字。最後發現我實在冥頑不靈，太不開竅，才不得不悄聲說：「林彪跑了。」

在對我實行群眾專政的那幾年，我倒是親身體會到群眾對我的同情和關切，實在令人感動。事實證明，群眾專政的那個「群眾」是冒名，後面這個「群眾」才是客觀存在。這就不免

令人想套用一下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在絞刑架上最後說的那句話：群眾，群眾，一切不法行為竟假汝之名以行！我們長期以來也把一些名詞給用濫了。除「群眾」以外，還有個「人民」。無論什麼事物前面都要冠上人民二字，諸如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鐵路、人民法院、人民幣等等。一時又興起了掛社會主義之名，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社會主義農村等等。用這些名詞，說是爲了標明它的特點，實際上卻是往往用來掩蓋它的不足。用群眾專政這個詞，就是爲了使當權者或領導上可以假群眾之名，對挨整的真正的群眾，隨心所欲、無法無天、違法亂紀、任意胡來；還可以掩蓋專制的實質，推卸領導的責任。外交部的群眾專政，絕不是出自外交部廣大幹部群眾的意願，更不是群眾自覺執行。恰恰相反，這種剪除異己、迫害幹部、製造冤假錯案的專政，完全是領導上自上而下一手操持，依靠忠於他們的積極分子並強迫群眾來執行的。

### （三）抓「五一六」

#### 一般情況

抓五一六，是人們當時用的簡稱，全名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涉及個人就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管怎麼叫，抓「五一六」都是文革中歷經兩三年，席

捲全中國，涉及幾千萬人，集中力量幹的一件大事，最後竟不了了之。因為實際上就根本不存在什麼「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當然也就沒有什麼「五一六」分子了。抓「五一六」運動，完全是一場憑空製造的對敵鬥爭，比延安搶救運動還要荒唐。所以此後的官方史書，既不說有，也不說無，好點的是語焉不詳地提幾句，差點的是根本不提。連《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的正式文件，都隻字未提，好像沒發生過這件事，用意可能是要為上下領導開脫責任。而且在抓「五一六」的運動中，外交部又是重點和樣板，透明度又很高，大小事經常有傳達。我雖被認為沒有資格參加「五一六」，也無權抓「五一六」，但各種傳達和抓的場面，我還是和大家一樣，也要參加的。所以我對抓「五一六」的運動還是了解一些。而且對這一官方史學盡量回避的問題，我倒是認為有必要就我所知作點簡單介紹。

「五一六」的要害是反周恩來總理。一九六七年發現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貼出「打倒周恩來，砸爛舊政府」的傳單，一時引起混亂。五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上書毛澤東，反映社會上和外交部有一股攻擊總理的空氣。毛澤東批示說，「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後來毛澤東又在批改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寫了「五一六」是反動組織，廣大群眾正在追查的話。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的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但這兩年除公安部門抓了一些極左派學生外，大部分地方還沒形成群眾運動。抓「五一六」成為全國性大規模群眾運動，應該看作是在得到毛澤東、林彪的號召和批准下，由周恩來親自發動



和親自領導進行的。所以外交部也可以吃上「偏飯」，得風氣之先，傳達頻繁，了解較多。官方史書把抓「五一六」說成是「四人幫」、中央文革一伙幹的，這既不合乎我們當時了解的情況，而且說「四人幫」抓極左，也於理不通。

大概是經過一個時間的觀察了解、排隊摸底和看準時機（除上面談過的指示外，毛澤東後來還多次談到「五一六」問題。特別是一九七〇年同越南黎筍、朝鮮金日成和美國斯諾的談話，說「五一六」是反革命秘密組織，煽動性很大，喊打倒周恩來，火燒英國代辦處……）而且在這之前毛已決定犧牲造反派），一九六九年周恩來就全面鋪開了抓「五一六」運動。他指示外交部要以抓「五一六」為運動中心。當陳伯達流露抓「五一六」出現擴大化傾向時，他批評說，運動才開始怎麼能講擴大化，這會對群眾運動潑冷水。在他起草的《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還特別提出，抓「五一六」主要看罪行、查證據，不要專門追組織、查表格。所以他在同外交部領導談話時說，「姚登山參加五一六，難道還要填表嗎？」不久姚就在工人體育場近萬人大會上遭批鬥，定為外交部頭名「五一六」，關進秦城監獄。雖然中央文件和周恩來這樣說，但下面還是一時轉不過彎來，總是要追組織。而且兩派互相抓，打派仗。原領導和溫和派群眾組織當權的單位，就抓造反派的頭頭、骨幹以及同他們沾邊的各級領導幹部——這是絕大多數。由造反派參加的三結合班子，就只抓溫和派骨幹和相關領導——這是少數。

一九七〇年三月，周恩來又主持起草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經毛澤東批閱「照辦」後頒布。這個文件雖然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但又指出反革命組織很多，強調鬥爭的複雜性，而且把解放軍的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共同列為「五一六」的後台和操縱者。因此實際上助長了擴大化。這個通知發出後就立即在全國掀起一個運動高潮，一直持續了兩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出逃後，才開始降溫，但抓「五一六」的事還拖了好幾年，沒有結束。在那兩年的高潮期間，從機關到學校，從城市到農村，到處可以看到標語大字報，動員並不存在的「五一六」分子坦白，而且還用各種辦法，從引誘欺騙到刑訊逼供。結果在這兩三年內，全國就清查出了有的說一千萬左右，有的說兩三千萬的「五一六」份子。在運動中迫害致死致殘的起碼成千上萬。而且滑稽的是，誰倒了誰就被定為「五一六」的後台。什麼王、關、戚，楊、余、傅，蕭華，以至清查「五一六」的專案組長陳伯達，都被稱為「五一六」後台。林彪跑了，他又變成「五一六」主要幕後操縱者。「文革」後，「五一六」的總後台才最後確定為林彪、「四人幫」。此後就不用再變了。

在抓「五一六」的緊張日子裏，周恩來不但起草文件、指揮全局，而且還身先士卒，親自動員。他找原外交部造反聯絡站的一些頭頭和骨幹，勸說他們坦白交代，起帶頭模範作用。新聞司科員成綬三和黃安國，後來就響應號召，「立功贖罪」，承認他們是外交部「五一六」的

組織部長，不但自己承認，還招供了一百多人。根據部黨委宣布的寬大政策，對坦白交代者實行「三不」：不定為五一六分子，不按敵我矛盾論處，材料不入本人檔案。他們兩人由於坦白有功，所以不但沒戴帽子，成綬三的官職後來還連升三級，最後做到外交部的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

周恩來不光是做這些二十多歲青年幹部的工作，也做老幹部的工作。例如「文革」後出任駐土耳其大使的林兆南，當時就盛傳他的「七進七出」（言其多就是了）。先是周總理動員他坦白交代，此人因為是歸國華僑，比較單純，見到總理百忙之中還苦口婆心勸他，於是就承認了。回來後覺得不對，又推翻了。已升任部長的姬鵬飛當然不甘心，又找他談話。他覺得盛情難卻，又承認了。回去一想，又推翻了。如此者再，落了個「七進七出」之名。他本人還牢騷滿腹。後來政治部主任符浩視察幹校，還在大會上批評了他。我就在場。

一九七二年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初步定案，經周恩來批准，正式戴帽子的二十人，除名列榜首的姚登山外，還有司局級幹部三名。此外有百餘人或列為敵我矛盾，或受各種不同處分。最滑稽的是，各供出幾十以至上百人的三名「組織部長」（除成、黃外，還有個洪嘉），都從寬處理，更沒戴帽子。而堅持實事求是，拒不承認參加過「五一六」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繪畫編輯朱根華，因「態度惡劣」被正式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這些人在一九七五年都個別得到通知，不加聲張地被取消了帽子，但工作安排受影響可是一輩子的事。例如這位因不承

認是「五一六」被戴上帽子的朱根華，後來就被迫離開《世界知識》，到《人民日報》畫漫畫去了。

搞了這麼長時間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最後竟不了了之，在黨的文件和不少正式歷史書上連提都不提一下。從中央到各級組織，從發動者到執行者，沒有一個出來承擔責任，更沒有一個進行檢討和懺悔。被當作「五一六」抓的上千萬人和受牽連的，沒有得到一個說法，只能冤沉海底。被整死的幾十萬人也不會瞑目。至於身殘者、喪志者、家庭離散者、長期受影響者，也只能歸之為命該如此了。

上海作家沙葉新寫過一篇「檢討文化」，裏面提到周恩來總理的不斷檢討。這也是我在多年跟周總理工作中親耳所聞。但是在改行學習黨史，特別是清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後，我才發現，以前聽到的檢討，都是涉及毛澤東的，如三次路線錯誤、反冒進等，顯然都是在應付毛澤東。與毛無關、確屬個人所犯錯誤，我就沒有聽說過一次周恩來的檢討。即以抓「五一六」而論，我就不信長期做地下工作的周總理會認為外交部有那麼多「五一六」，竟會輕信和他長期共事過的一批幹部如劉曉、潘自力、陳家康等，會成為「五一六」後台。而且在他去世前，就已逐漸明確並不存在「五一六」這個東西，也開始了些善後工作。但卻始終沒聽說他在這個問題上表過態，講過一句實事求是的話。這就不免令人感到遺憾，也會多少影響到後來對這個問題的順利清理。例如長期在他身邊工作、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吳慶彤，直到文革後在一九七八



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還要就五一六問題作專題發言，肯定有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只是上面的指揮者和操縱者換成了林彪、康生、陳伯達、「四人幫」，還舉了抓出「五一六」分子姚登山爲證。親自負責抓「五一六」的姬鵬飛部長開始連擴大化都不承認。正是由於各級各部門抓「五一六」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的百般阻撓，才使這場堂吉呵德大戰風車的清查「五一六」運動的復查結案，直到「文革」後還拖了好幾年。有的人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才私下了結，分配工作，算是最後一風吹了。

### 抓「五一六」在幹校

全國都在抓「五一六」，幹校更不例外，成了抓「五一六」戰鬥最激烈的地方。而且由於幹校沒有什麼業務工作，更可以集中全力抓「五一六」，何況外交部還是重點，「五一六」多集中在幹校。所以我們江西幹校從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差不多有兩年多，可以說是基本上停工抓「五一六」。抓的方法無奇不有，先說是組織已掌握有名單，號召自動坦白。此法無效，就點名硬逼。大會轟，個別談，軟硬兼施，威脅利誘，車輪戰，逼供信，一切發明創造都用上了。對我這個經過延安搶救運動的人來說，幾乎沒有什麼新鮮的名堂，甚至比搶救還文明一些，因爲我沒有看到打人抓人的現象。除了這點以外，一切都和搶救一樣，但洋相和笑話要比搶救時多。例如形勢變化之快，就是搶救望塵莫及的。今天的專案組或積極分子，明天、甚

至轉瞬間就可能變成被抓對象。有的人已被迫承認，正在追關係時，他看見窗外走過來一個專案組人員，只把嘴朝窗外一努，此人就頓時被勒令停職交代，變成被抓對象了。湖北幹校一個學員，硬要逼他交代組織，供出同伙。他答應晚上考慮一下，明天照實講來。專案組讓他睡了一覺，第二天抱着很大希望聽他交代。不料他招供的是姬鵬飛、喬冠華等人。結果可想而知，整得更厲害了。後來精神有些失常，我回北京住招待所時還看見過他。

抓「五一六」一開始，聽了傳達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號召，特別是周總理的詳細說明和佈置，我還真以為有一小撮人搞反對周總理的秘密陰謀集團，也不顧專政對象的身分寫過一張勸他們坦白交代的大字報。後來一看實際的抓法，才發現是延安搶救的再版，就根本不再相信，只是看熱鬧了。前面說過，「文革」一開始，姬鵬飛等人就已把我打成了敵我矛盾，誰也不相信「五一六」會發展我。而且作為專政對象，也沒人給我分配抓「五一六」的任務，因此我就顯得有點瀟灑了，除了餵豬外，業餘時間完全可以自由支配，主要是看書。但有時也會調查到我頭上。例如姬鵬飛和部黨委懷疑羅貴波、徐以新、陳家康等可能和「五一六」有聯繫，甚至是他們的後台和操縱者。也許是爲了治他們的罪而尋找材料，於是也派人找到我的頭上，調查我和他們特別是和羅的關係。例如問：「文革」中你和羅都談過些什麼？我說：一九五九年以後，我和羅沒說過一句話。問：是否通過別的形式聯繫過？比方讓別人傳話，或寫個條子什麼的？答：根本沒必要和羅聯繫，既未麻煩第三者，也沒寫過一個字。另外還問了張聞天和羅貴的

波等人的關係，我都沒給他們有內容的答覆。連碰了幾次軟釘子後也就再沒有來糾纏了。

由於逼供信，幹校的大部分人變成了「五一六」或者嫌犯，沒問題的乾淨黨員在我們連裏已經所剩無幾。我所在的班連個黨小組長也找不到了，於是只好請一個外單位跟着丈夫來幹校的非黨員代行黨小組長的職責，如召開小組會，傳達什麼事，或過組織生活。這位女同志還比較謙虛、態度和藹，給我的印象不錯。後來隨夫去美工作，我進行中美學術交流時，還在紐約遇到過兩次。

在集中抓「五一六」的兩三年中，也不是每天都在抓，而是緊張地抓一陣，休整一段時間。大約是專案組在外調、核實材料、回北京請示彙報，其餘的人恢復勞動，主要是燒磚、蓋房和種菜。等到部黨組新的指示來了或者取到了什麼經，於是就又會緊張一陣。由於周恩來對抓「五一六」始終不鬆口，不認為錯，外交部長姬鵬飛等又對當年造反派的衝擊耿耿於懷，一定要把他們肅清，所以外交部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既搞得「徹底」，延續的時間也長。直到一九七五年，群眾性的活動才基本停止，但運動還是結束不了，一大堆遺留問題還沒有去着手解決。真是「任重道遠」！全國折騰了好幾年，外交部更是花了加倍的人力物力，結果一個「五一六」分子也沒抓到。這就是我們黨和它的領袖們以及大批久經考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在「文革」中幹出的又一件荒唐事，無怪乎正式黨史只能打馬虎眼，不好意思提了。有關清查並不存在的「五一六」的工作，我們黨的有些領導人，例如周恩來，辛辛苦苦搞了好幾年，不知

作過多少批示，開過多少次會，找過多少人談話，但是最後在他們的傳記、年譜以及其他不知有多少紀念和回憶的書籍、文章中，多是根本不提。對有的人，無法避免時就一筆帶過，或者只講幾句正面的話，使得花去的那麼多時間和精力都打水漂了。這就是我們號稱講求實事求是的黨史編纂學！

#### （四）幹校的後五年

我的九年幹校生活，大體可以分爲兩大段。第一階段就是上面所談的三年多的情況。下面再簡單談一下第二階段，即後來五年多的情況。

#### 開除黨籍

無論就全國來說還是對我自己來說，一九七二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先是打了個馬虎眼，不但未加宣布，還裝着讓他活了一陣，如國慶文件還有他的名字。但過了一陣，就不能不公之於衆了。副統帥和法定接班人的出走可不是一件小事，不但對毛澤東是個沉重打擊，導致精神走向崩潰，而且實際上等於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破產。所以到了一九七二年就已形勢大變：雖然上面爭權鬥爭還在繼續，但各地的局勢已基本穩定下來，以軍代表和老幹部爲主的省市級革委會都已正式掌權。抓「五一六」的群眾運動基本上停止，



各單位所整的人進入了受處理階段；一大批在押的走資派和黑線上的人物得到解放，有些人還安排了工作，仍然在押的人生活待遇也得到極大改善。全國的專政和恐怖氣氛稍趨和緩。五七幹校的管制大為放鬆，並在醞釀合併或取消，外交部的湖北和湖南兩個幹校先後合併到江西幹校。

對我來說，一九七二年有三大變化。第一，最嚴重的是被正式開除黨籍；第二，已很少勞動，可以集中時間讀書和研究點問題；第三，有一定自由，可以探親旅遊，再後來宋以敏也從湖南搬來江西。

提起開除黨籍，這不僅使我感到憤怒，但也並沒有出乎預料。因為從「文革」開始，我就被陳姬喬打為敵我矛盾，不能過組織生活了，只是每月交一百元的黨費，他們還照收不誤。緊接着又實行群眾專政，剝奪人身自由，已經被當作罪犯看管，還談什麼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在違背黨章和踐踏國法——憲法、民法和刑法的條件下實施的。但這樣拖了六七年，再拖下去總不是辦法。部黨組在眼看林彪走後一切有恢復正常的可能時，就趕快把他們有權處理的一批人先加以處理，來一個木已成舟。根據馬繼森所寫《外交部文革紀實》，處理的結果是，戴「五一六」帽子二十名，劃敵我矛盾三十一人，給予各種處分的八十人，定為犯嚴重錯誤的一百七十人，認為站錯隊、犯一般性錯誤的一千四百零八人。我大概就在劃不成敵我矛盾（因為實在找不到劃敵我的理由）但給處分的人之列。至於開除黨籍的手續，只是形式而已。這是我

早就心知肚明的。因為我們黨從延安整風後就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對黨員的處理多是執行上級指示，很少聽說有出自黨員群眾意見的。「文革」中當然就更輕率了。先是黨組討論時意見就不盡一致。有人主張保留黨籍，說是老同志了，還是為黨做過一些工作的。但黨組書記姬鵬飛斷言，此人我了解，不宜留在黨內。喬冠華等人一附和，也就定案了。隨即通知江西幹校執行。幹校不知出於何種考慮（也許怕生意外），頭兩天就給我打了招呼，讓做精神準備。同時也通告了全體黨員（免得臨時出事）。有些同志也偷偷向我通氣、報告消息，或表示歉意（說：「老何，實在對不起，人家叫一定要舉手。」）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江西幹校三連黨支部開會，全體一致通過開除何方黨籍（決議係事先擬好，會一開就念的）。我敢斷言，如果讓黨員自願行使投票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黨員是不會贊成開除我黨籍的。所以開除我的只是姬鵬飛等少數領導人，決不是檔案上所寫的二連黨支部。這裏還有個插曲，告訴我和通知大家時，處分中有從行政十一級降為十三級這一條，但到支部大會通過時宣布成從十一級降為十四級。據說，這是頭一天晚上的長途電話通知。因為當時十三級是條杠，杠以上可以享受副食看病等一些優待。部黨委一些人一想，不能讓何方繼續享受這些優待，所以多降一級。可見仇恨之深。通過後要我表態。我承認錯誤，但對開除黨籍有保留，要求留在黨內。

我的表態是真誠的，我對黨確實懷有深厚感情。雖然我在延安被打成特務，一九五九年被定為反黨，「文革」開始又變成牛鬼蛇神，蒙受不白之冤佔了我參加革命後時間的一半。我也

對黨內的許多作風不滿，如缺乏民主、輿論一律、個人崇拜、等級森嚴、特權制度、領導說了算、黨員只是螺絲釘等，但還是把黨看成母親，可以為黨犧牲一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我有個老朋友是原來的僑辦副主任，給我談到愛國華僑對祖國的感情，說他們受再大的委屈，也是矢志不移。他講了個故事，說有一家狗主人，把狗打暈打算宰了吃，不想沒打準，狗逃了出去。可是過了幾天，這狗又一瘸一瘸地跑了回來。他說，有些挨過整的愛國華僑就和這條狗一樣。可我對黨的感情，還要超過這條狗，就是再打也不出去。所以從開除之日起，我就不斷地向中監委、部黨組、姬鵬飛、喬冠華、王海容等寫申訴信，要求留在黨內。這些信都是石沉大海，這是我原先預料到的，寫出去不過是立此存照，表示決心。如果不恢復我的黨籍，我就會一直寫下去，直到生命的終結。我不想感動「上帝」，只是要據理力爭。

開除黨籍，無疑對我是個沉重打擊，精神情緒自然都受影響。連我十幾歲的大兒子聽到這個消息都大哭了一場。但我是個樂天派，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仍然顯得滿不在乎，嘻嘻哈哈，開玩笑、出洋相，一如往昔。和大家的關係也很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對我並無歧視。支部還要我給大家作時事報告，也還當眾表揚過。一次我的小兒子來探親，有十多個同志騎自行車去車站迎接，連小孩都感到了我的群眾關係不錯。開除後，我的黨費遭拒收（當組織委員的積極分子說，「別想用你那點臭錢就能買到黨票！」），我就用來幫助一些家庭困難的同志。但當時不能明給，否則會被定為以小恩小惠收買革命群眾的罪行。總而言之，開除黨籍

並沒有把我整垮，我的學習、勞動和生活很快就恢復了常態。

### 後期的幹校生活

林彪出逃對幹校是個福音。有些單位的幹校竟自動散伙，大家乾脆回北京不再來了。外交部管得嚴，紀律性強，一切還是照章辦事。而且部領導還有個趁機甩包袱的計劃，就是把那些部裏有權處理的司局級以下的造反派頭目和骨幹、站錯了隊和各級領導不喜歡的、特別是當作「五一六」抓錯了的人，利用幹校撤離的機會，設法交給地方分配。湖南幹校就設法留下了一百多人。人事司司長楊克明，還到別的省去「推銷」幹部。他利用幹部的的外語等特長，把他們交給許多大學。單是大連外語學院就送去近百名。此外還有四川大學、河南大學等。「推銷」的辦法以湖南為例，先是向省委組織部做正面介紹，說這些人懂外文呀，有什麼特長呀，工作能力強呀，只是外交部要進行精簡，不得不把一部分人送給外省。省委一聽，也覺得他們正好需要這方面的人才，於是就慨然接收下來。等一切手續辦妥後，楊克明再帶着書面鑒定，同時也口頭通知省委，說這些人工作能力雖強，但政治上有問題，「文革」中是姚登山線上的人，犯過嚴重路線錯誤，特別是反對周總理，因此安排上要注意，今後也得控制使用云云。地方上一聽，發現上當，但這時已經退不回去，就只好啞巴吃黃連了。對此，湖南省委組織部一位副部長曾當着外交部幹部的面罵過，說外交部這種做法太不像話了。後來由於各地不再要人（或



因本地「文革」中離職的幹部都安排不過來，或因對外交部送出的幹部不大放心，中央又決定各單位幹部「自行消化」。外交部領導對他們不喜歡的幹部，特別是造反派，再推銷不出去了，自己又不想用，於是就只好養起來，辦法是繼續花錢辦幹校。直到一九七八年，還有七百多幹部沒安排，其中當然也有我。但另一方面，由於中美關係的鬆動和中國進了聯合國，中國的建交國在一九七〇年後的三年多時間就增加將近一倍，達到九十個，正需要大量熟悉外交業務和懂外文的幹部，因此，下放幹部中的無革派和領導上認為問題不大的幹部，都已紛紛調回部安排了工作，站對隊的這派人有一大批還得到了提升，此外又從地方上調進了二三百人。但對那七百多幹部卻就是不用，儘管文革前多年和文革後更長的時間，都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對黨忠心耿耿和富有才華的優秀幹部。但是一些人出於派性，還是決心要把他們壓下去，久久不讓翻身。

幹校中原有的骨幹和積極分子以及被認為還可使用的人，被陸續調走了。留下的都是基本上不被信任的人，連幹校的各級領導也是矮子裏拔將軍，找問題相對小一些的人充任。這樣一來，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就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分，已經沒有那些橫眉豎眼、裝腔作勢、動輒訓人、唱高調、念語錄的人了。大家相處還顯得真有點平等，無論是戴「五一六」帽子的，受各種處分的，除個別黨員還要顯示點優越性以外，相互之間已沒有什麼歧視，也再不開那種批判會。整人的現象已經很少，只是「五一六」分子的勞動重一點，時間長一些。管理雖然寬

鬆，但是秩序還是很好的。當時已經沒有多少勞動任務，只剩下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就是種菜做飯之類。每人每天平均勞動不到兩小時，各司其職，都很自覺。因為多數人走了，遺留的一切都歸少數人享用，所以物質生活相當不錯。而且還可以自由上街下館子，或者自己做飯改善生活。那時幾乎每人都開小灶，除大鍋飯外，自己還經常搞點小吃。而上高街上的雞、魚、蛋、油以至鱉，不但多而且便宜，其他菜蔬就更不用說了。我在「文革」後進行對外學術交流時，同一些日本學者聊天，談到這種情況，他們竟然很羨慕這種生活，說：不做工作，工資還照發，實在太好了。

但那時幹校的同事卻並不這麼想，相反地，都是心事重重，為前途擔憂。最怕的就是部領導的甩包袱政策，不知會被楊克明們「推銷」到什麼地方去。因為大家已經看到分配到湖南一些同志的處境。他們帶着外交部的黑材料，不被地方重用，人生地不熟，生活（住房吃飯）比較苦，很不習慣。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副班長劉蘭雲，原來在外交部辦公廳文印處算是個副科級幹部，管一幫子打字員，表現挺好。後來被分配到湖南株洲洗煤廠當收發，任務只是每天分送一次報紙，又吃不慣大鍋飯的辣椒，總是吃不飽。一次我回北京探親，路過株洲去看她。她沒說幾句話就已泣不成聲，抓住我的兩隻手不放鬆。其實還有比這更悲慘的，例如分配到少數民族地區的山溝裏，自己打柴做飯，那種孤苦伶仃的處境就不用說了。留在江西幹校的人，聽到這些就犯愁。有些同志常說，哪怕回到北京叫掃大街也幹。由於情緒不好，許多人又

終日無所事事，所以經常在一起發牢騷罵娘。這又是一種惡性循環，愈是發牢騷，情緒也愈壞。另外時興的就是打撲克和做木工。這兩件事情都會上癮。以做木工來說，有些人近乎入迷。買各種木材，製作各種用具，還真像一回事。我也被捲進去了一陣。

其實，被開除黨籍後，我並沒有心灰意冷，起碼生活習慣沒有多大改變，特別是愛惜時間和注意學習。我由於只上了六七年學，沒有文化，所以參加革命後就非常重視自學，設法提高文化。但是以前的勞動和工作，再加上各種運動，又都一直很緊張，只能盡量擠時間學習。這樣就使我從小養成了一種愛惜時間和喜歡看書的習慣，差不多堅持了一輩子。以前生產勞動、行軍打仗都要利用一切機會學習，何況現在上幹校，學習條件要好多了。特別是林彪走後，管理很鬆，隨便什麼書都可以看，時間也有的是。於是我就在心中訂了一個學習計劃，白天整塊時間通讀《馬恩全集》。因為過去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書，馬恩著作除《資本論》、《反杜林論》和一些通行的單行本外，還有好多沒讀過，所以這次下決心再通讀一遍。我對形勢的估計是，部領導要把我這個包袱甩到地方上去並不容易，但又絕對不會儘早給我安排工作，只能是個長期拖的局面。所以我就只好作長期打算，既不和任何人談回北京的事，也不向上面提這類意見。不過我自己還是認為，拖到最後仍然是以回北京的可能為大，做的傢具也基本上是準備回北京用的。除正規時間讀馬恩外，作為調節，其餘零碎時間用於再通讀《魯迅全集》和一批古今中外名作名著上，勞動間隙則讀些提高文化、增加知識的書。反正

是把時間排得滿滿的。例如我當時的勞動任務是做飯時負責在下面燒火。上面喊要大火，我就通開火加煤。等到進入燜飯階段，我又把火一壓，看起書來，三五天就可看一本。那時大批人馬走後，留下的書倒是不少，可以憑我挑選。所以在幹校的後五年多，我還真是讀了不少書。我也多次奉勸周圍一些同志，特別是同我關係好的，建議他們利用機會多讀點書。可是聽得進去的人不多，都說讀書沒有用，將來還不知道叫幹什麼呢。我說，管他有用沒用，讀書總沒什麼壞處，總比在一起扯亂談，發牢騷強吧！但是仍然沒作用。因為當時人們想的全是前途、出路一類的事，流言傳說也特別多，哪有心思靜下來讀書？

什麼書都讀，學和用脫節，也多少有點不習慣。加之我這個人有個老毛病，就是喜歡動腦子。當時讀書看報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為什麼落後，革命勝利二十多年，多數時間反而生活更苦。於是舊病復發，技癢又犯，想起研究問題來了，並且確定研究戰後日本經濟。因為日本的面積和人口都和中國不成比例，經濟規模（總量）比我們少一半，戰爭破壞也比我們更嚴重，為什麼這時（一九七〇年代）竟然大大超過我們，變成世界經濟強國？那時不敢談中國，但談日本總可以吧。幹校也有一定的條件，圖書館可以借到不少參考書，報紙上沒什麼名堂，但當時的《參考消息》信息量還超過現在。我幾乎純粹從經濟角度研究問題，如吉田路線和資本積累、對外開放和國際接軌、狠抓教育和培養人才（日本戰後比中國苦，但留學生沒有學成不回國的），等等。這種研究先是暗地進行，寫出成果後覺得也沒什麼保密的必要，乾脆



複寫了幾份，送給當時的校長徐淨武等人看，他們不但沒批評，反而大為讚賞。這就壯了我的膽，分別寄給北京的一些領導和朋友看，例如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宦鄉等人。我的研究確實膚淺，不成樣子，但是終究給人留下了一點印象，這大概與我後來被安排當了近十年的日本研究所所長有關。雖然至今我也不敢承認自己是日本問題專家。

### 後期幹校生活另一面

我不能只吹自己怎麼學習，其實後期幹校生活還真是有點豐富多采。這裏就試舉幾例。

一是改善生活。因為後期幹校的任務就是養活自己，既有外交部的供應，又有大家的獻計獻策和努力勞動，所以食堂的生活就已經不錯了，但人們還要再上一層樓，自己開個小灶。特別是女同志，做出各種各樣好吃的，自家享用，也送別人。我是只收不送，人們倒還理解。但我有時也搞點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只是嫌麻煩、怕費事，所以很簡單，最拿手的是蔥油麵。我嫌路遠，懶得上街。多是隔幾天，於清晨時分，拿個小馬紮在路旁一坐，遇到賣雞蛋或茶油（江西的野生茶油真好）的婦女，我就各來它一斤，而且不講價錢。我一直認為，農民辛辛苦苦勞動了好多天，能多要幾個錢，何必同他們斤斤計較。有時也買一條魚，回來清蒸着吃。買過一次雞，太麻煩，再不幹了。因為後頭幾年，宋以敏已經被借調回北京教英文去了。幹校只剩下我一個人，住了一大間房子，一切自己做主。白天除讀書寫字和食堂燒火外，也還搞點散

步之類的運動。春天，我會到野外採回大批金銀花，掛在牆上，清香無比。秋天，又從山上採來梔子花或丹桂，弄得滿屋散香。如果不算精神壓力和思想負擔，這也算得神仙般的生活了。

二是學做木工。先是做木工用具，而且愈做愈精，單是刨子我就做了七八個，什麼長刨、短刨、花樣刨，一應俱全。用的都是檀木、櫟木等上好材料，比起街上賣的要好看多了。其他如鋸子、鑿子、斧子、鑽子等，都屬上乘。這套工具，捨不得處理，一直保存到現在。二十年前一次，兩個木工想用兩個書櫃換我這套工具，我硬是難以割捨。現在普及了電鋸、電刨等，這套工具實際上沒用了。現在只能把它們放在客廳的玻璃櫃裏留作紀念了。

做工具不是目的，是為製造傢具。江西盛產樟木，用它做箱櫃桌椅，不但殺蟲散香，而且花紋特好看。我加工和製造的樟木傢具就有樟木箱、辦公桌、五斗櫃、椅子、茶几、躺椅等多種。都是刨光後連上五次漆，最後簡直亮到可以照見人影。這些傢具後來全部運回北京，不是沒處放，就是派不上用場，慢慢地也就逐步分別處理了。五個樟木箱和桌椅等先後都送了人，只留下一個五斗櫃和兩個躺椅捨不得處理，仍然沒處放。現在剩下的就只有一個茶几、兩個圓凳、兩個馬紮，倒還頗有用處。

三是旅遊探親。本來，林彪走後，專政對象就可以自由探親了。那時宋以敏和孩子住湖南幹校，我住江西。我也被准許到湖南去探親。開始探親控制很嚴，來回兩個禮拜。我到湖南茶陵那次，正是夏天，還參加過他們的採茶勞動。那時江西的白糖隨便買，湖南根本買不到，我

去時就給孩子帶了好幾斤糖。回來時也幫別人帶一些江西稀罕的東西，如三七、夏布、涼席、白酒等。不想夜宿新餘縣時遇到災星高照。屋內同住的幾個幹部摸樣的客人，互相閒聊，談得倒也投機。但沒想到這幾位竟是樑上君子。第二天起來，我的行李衣帽等被席捲而去，只剩下身上穿的一件針織三角褲又和替人帶的涼席白酒。我只得趁早晨街上人稀，跑到公安局報案。本想借幾個錢買件衣服，可人家只是登記在案，借錢沒門。不得已只好硬着頭皮坐上公共汽車回上高（幸好車票在枕頭下面成了漏網之魚）。回到幹校，恰巧大家都去工地了，我可以從容地取出衣服穿上。後來給宋以敏寫信提到此事，還套了兩句昆明大觀樓長聯上的話，說是「只落得兩瓶水酒，一枕涼席」。給丁谷（後任對外文委外聯司司長）帶的東西丟了，我提出要賠。他說，「拉倒吧，還賠什麼！」

後來，湖南幹校合併到江西，我和宋以敏會合了。但兩個孩子卻去了北京。大兒子何黎由湖南茶陵兩年制的初中畢業，由於是專政對象的兒子，按規定不得升高中，只可就業。但又不准進國營企業和大集體所有制的工廠，最後被分配到以家庭婦女為主體的街道工廠，擔任倉庫保管員，從十六歲一直幹到二十三歲考上大學。小兒子何寧回到北京上初中。兩個人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集體宿舍，一切自理。宋以敏還可回北京探親看兒子，我卻不准。直到一九七六年，外交部才在繼續維護違反憲法的制度和規定下，給了我一線寬鬆，就是可以回北京探親了。其實這時幹校也實在沒事，管理也不像以前那麼嚴了。所以我就想結合探親再到外地走走，乾脆

請了一個月的假。宋以敏是一九七五年借調到北京教英文的。借調的是外單位，但得經過外交部同意。外交部幹部司先是不答應，宋以敏就苦苦哀告，說兩個兒子在北京需要照顧。後來幹部司奉命提出幾個條件，大意是不能因此長期呆在北京，何方更不能藉故回北京等。宋以敏答應條件後總算是被借調回來了。所以這次探親已經是進京了。但我沒有急於進京，只是想利用目前這點得之不易的自由和沒有工作的機會，出去走走。雖然不是要看名川大山和行萬里路，但是到一些地方看看，總可以增長知識見見世面。決心一下，請假獲准，就領着放暑假的小兒子何寧一同上路了。那時出門可不像現在，交通吃住都成問題，每去一個地方，買票就不容易。而且飯館和旅館都少得出奇，吃頓飯和找個地方住真是難於上青天。所以我們這次出遊是摸着石頭過河，能買到車票和有住處的地方才去。第一站是黃山，離得近，車票好買。先坐火車到蕪湖，再花一整天時間坐公共汽車到黃山腳下。這一路倒值得說幾句，因為一些偶然機會成就了我們以後的行程。

公共汽車坐了好幾十人，擠得滿滿的。主要都是上海和南京兩個地方的人，職業為大專學校教員和一些南京航空學院的學員。他們三部分人好像是有組織地相約而來，互相認識，相談甚歡。上海的教師談了一路《紅樓夢》，討論氣氛熱烈。但是談到第九十一回《佈疑陣寶玉妄談禪》卻卡了殼，都說不出寶黛二人對話的含義。我本來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也算得半個「紅樓迷」，所以忍不住就插起話來，邊背原詞邊作解釋。例如寶玉回答黛玉問話時說，「任憑弱



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就是說不管有多少女孩子來追求，我只和你一個人好。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好不成怎麼辦？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不是好不成，就怕心不堅。意思是他很堅定，不會隨波逐流。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我死了你咋辦？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東風舞鷓鴣。」我的愛情已經固定，不會動搖，你死了我就去當和尚，不再想家了。此外也還談了別的一些問題。我的這些毛遂自薦的解釋，對不對，到現在也不敢肯定，但是當時卻很解決問題，一下擺脫了孤獨狀態，和大家混熟了。不但路上得到他們的照應，而且他們還各顯神通，介紹了自己在我們要去的地方的親屬、朋友或同學，寫好介紹信，托親朋幫我們解決吃住買票等問題。所以後來就基本上一路順風了。我們在爬了黃山後，還去了南京、無錫、蘇州、揚州、鎮江、咸陽、西安等地。

最令人難忘的是，在咸陽正趕上唐山大地震，我們住在南京航校一位同學的家裏。他的父母都是幹部，對我們非常熱情，把他們全家兩個月的肉票拿出來買肉給我們包餃子吃，晚上拿出他們家新的綢緞被褥鋪在大街上讓我們睡（地震期間都不敢在家住），真使人過意不去。而且遺憾的是，丟失了他們的地址姓名，後來一直想聯繫都沒聯繫上，實在覺得對人家不起。這又使我產生了更多的聯想。你看，我們下放江西幹校七八年，實際上和群眾並沒有什麼接觸，也談不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倒是這次出遊，接觸到國家的一些現實和許多老百姓。文化大革命把群眾折騰得夠嗆，除了那些搞個人崇拜和整人的積極分子成爲大小既得利益者外，群眾

和一般幹部的生活真是每況愈下，但是我們看到的一般幹部和老百姓，還是那樣淳樸、那樣熱情、那樣任勞任怨、那樣埋頭苦幹。中國的廣大幹部和群眾該是多麼好呀！如果文革後我們黨和國家掌權的那些領導人（少數沒有私心但權力有限的人除外）不是急於恢復舊的官僚體制和個人的權力與地位，而是在實行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實行政治改革，那我們國家恐怕到一九八〇年就已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而且還會是十分穩定和順利的，因為有非常好的群眾基礎和國際環境。

就是這樣，經車上的朋友介紹，一站接一站地走了不少地方，花了一兩個月時間。當時也無所謂超假，因為上面不知出於什麼考慮，躲地震那些天不准一般人隨便進北京。外地就不賣給我們去北京的火車票。不得已，只好在老家西安閒住了一個禮拜，直到允許買去北京的車票，這才乘車來到北京，和家人團聚。

### 北京見聞

回到北京還是躲地震。當時外交部招待所讓我們三家人住在一個約四十平方米的大房間裏，各家之間用塑料布隔開。住在當中的是朱烈（後任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一家四口人，進出還得從塑料布底下鑽過去。好在當時躲地震，部分大人和孩子都住到防震棚去了。留下幾個大人住在一個房間，大呼嚕、說夢話，互相干擾，也很難睡穩。白天吃飯倒是自家從食堂打

來，還頗方便。

這種亂哄哄的生活過了不久，就碰上了毛澤東主席去世。招待所在東交民巷，離天安門廣場很近，白天晚上都常去看看。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感到群眾反應不強烈。肅穆和悲哀的氣氛還不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時的北京街頭，比起爲周恩來送葬和後來悼念的情景就差得更遠了。不久又發生四人幫被抓。這顯然只是一件沒有也用不着大動干戈的事，幾乎和甕中捉鱉一樣容易。因爲他們並沒有什麼實力和群眾基礎，當年能夠風雲一時，主要還是有毛澤東的扶持和庇護。毛澤東一過世，他們也就變成隨時可抓的落湯雞了。後來人們把他們吹得神乎其神，似乎能量很大，那只不過是爲毛製造替罪羊罷了。但他們的被抓，卻在幹部和群眾中引起巨大反響，敲鑼打鼓、遊行示威，情緒非常熱烈。這前後相隔不久的兩件事，加在一起說明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破產和毛澤東自己已經失去人心。如果那時黨中央能利用機會對毛澤東的錯誤進行一場群眾性的清算，對建國以來所犯極左錯誤路線加以總結，那一定能比較容易和順利地解決個人崇拜和專制體制問題。可惜當時以及後來的領導人，爲了維護原有道統和法統，取得執政的合法性，反而竭力恢復「文革」前的舊體制和設法復活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於是就繼續造神造假，壓制民主、實行輿論一律。

我這次探親能在北京目睹親聞這些重大事變，也算是個人的幸運。但我終究只是個外交部的離職幹部，全面情況不可能知道得太多。能夠聽到正式傳達和道聽途說比較多的還是外交部

的情況。這倒值得說一說。

在恢復舊秩序上，外交部是走在前面的。經過清理階級隊伍和抓「五一六」以後，外交部就已經把所有造反派和跟他們沾點邊的各級領導幹部打翻在地了。關押的關押，挨整的挨整，靠邊的靠邊，其中外交部不想要又推不出去的大部分（七八百人的編制）還是繼續留在幹校。至於部內和駐外使館的領導和其他崗位，也俱已在「站隊正確」的一派人中瓜分完畢。按照毛澤東事物不斷分裂的規律，原來曾經團結一致的三大派：姬鵬飛主導的主流派、人馬不多的喬冠華派、王海容通天的小姐派，也先後走向分裂。要講實力，姬派最大。老幹部一般都屬於這派，有的自覺，大部分是不自覺的。但是由於姬鵬飛只長於團結（拉攏）幹部和抓實權，對辦外交卻是幹了二十多年還是外行得厲害，從副部長當到部長，就是不能出國訪問和帶團參加國際會議，特別是每年的聯合國大會。一九七三年好不容易有個率團出訪英法等國的機會，帶着時任禮賓司長的王海容。不知王海容回來是怎麼向毛澤東彙報的，反正很快就傳出了毛對姬鵬飛的批評：「西天拜佛，如喪考妣，疲於奔命，所獲不多。」不論所傳是否真實，隨後外交部開起了批判姬鵬飛的大會，過了些時間姬就被調離外交部長崗位，卻都是事實。姬鵬飛被擠走後，喬冠華接任外交部長，王海容升為副部長。主要矛盾又轉化到喬王兩派之間。這從喬夫人章含之近年所寫書文中還可聽到繞梁的餘音。喬冠華大約又是出於地位觀念，不知怎麼搞的竟和「四人幫」拉上了關係，還充當了毛澤東組織的批周公的打手。隨着「四人幫」的倒台，喬



冠華自然也就倒台了。我還參加過在體育場開的批喬大會，批判內容記不清了，但對那場面卻印象特深。會議主持人和群眾都在球場看台上。台下偌大的一個球場，中心設一長凳，空蕩蕩地只坐了他們夫婦二人，真有點滑稽。

喬派倒後，外交部上層幹部又追究起了批周總理的事。這雖是毛澤東親自安排，但代傳聖旨和上跑下跳的可是王唐兩位小姐，人們自然會追到她們身上。但她們曾經是中國塔頂上的人物，不但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而且不少領導人同她們有關係，受過惠，所以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一發話，也就把她們保出了外交部。三派頭目雖走，但人馬尚在，特別是姬鵬飛的主流派，還直接操縱着外交部的人事大權和一些內部事務。代替喬冠華任部長的黃華，就是在立根未穩之時，被姬派幾員幹將借事起哄，弄得在外交部呆不下去了。後來姬鵬飛仍然插手外交部多年。所以長期以來外交部的傳統就是姬派傳統，對過去外交部許多問題的看法也是他們的觀點。例如至今不承擔一九五九年批判張聞天的責任，也從不提及這方面的錯誤，反而把自己犯的一些錯誤和罪責推到張聞天頭上；一直不承認文化大革命初期執行過一段錯誤整人的路線，不承認對造反派和許多大小幹部的迫害；更不承認抓「五一六」的違法亂紀和草菅人命，等等，還始終以正確自居。對這些，我個人有親身體會，所見甚多。看來，這筆帳是永遠也算不清了。

## 再回幹校

「四人幫」被抓後，大事甫定，外交部又要整頓它的文革秩序了。其中一條就是把從幹校回到北京的各色人等動員回幹校去。幹部司又積極到各地把這七八百人推銷出去和從外面招募一批幹部進來。這時首先是傳達上級指示，上面提到的那位國務院秘書長吳慶彤首先發下話來，說：什麼叫五七幹校？五七幹校就是無期幹校；作為幹部輪訓的基地，幹校要長期辦下去，永遠辦下去。駐外交部的軍代表也講得挺乾脆：就是剩下一個五七戰士，幹校也要辦下去。動員回幹校可是一件艱巨的任務，得軟硬兼施，恩威並重。因為許多回北京探親、看病或因其他事請假回來的人，在當時的形勢下是決定不再回幹校了，何況繼續辦幹校的中央和國務院機關已沒有幾個，只是外交部自命特殊一點就是。

動員我的是以前共過事、關係還算好的政治部主任林中。此公也是奉命而來，但也要說得口若懸河、天花亂墜。什麼幹校環境優美呀，空氣新鮮呀，可以很好讀點書，養養身體呀等等。我說，你別給我來這一套，空氣再新鮮你老兄也不會去呼吸，還是願意在北京呼吸這種污濁空氣。我並不怕回幹校。因為我主要關心的是個人黨籍問題。在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我倒還真願回幹校。林中一聽願意走，就算目的達到了，真是喜出望外，對我也慰勉有加。其實我並不想賴在北京。既然解決黨籍問題暫時無望，還不如回到幹校去，少看一點人家

的臉色。何況幹校還存放着我們全家的東西，即使將來回北京也得去收拾一下。決心下定，就又告別家人，乘車南下了。

這時的幹校，真可謂景物依舊，人事全非。原來的四個點，蓋了上百所房子，都移交給了地方，連同開闢的果園、菜地和農具。剩下的七八百人只回去了一二百，全部集中住校部。全校留下的傢具、豬雞等由這少數人享用。大家的政治情況都差不多。臨時指定的一些負責人，只是幹活多，威風少。幹點重活如殺豬，還得一再央求高手。大家相處平等，遇事協商，同時也通情達理，該幹的事並不推諉，簡直成了馬克思說的自由人聯合體。但是外交部還是另眼相看，所以大家晚上一起乘涼，還是發牢騷罵娘，這時已沒什麼人彙報、打小報告，而且人們也都不怕這些了。

這次返校，正是金風送爽、丹桂飄香的季節。我還是老辦法，從院子大桂樹上採來一批花枝插在屋子裏，自我陶醉，自我欣賞。從當時聽到的各種小道消息和傳說，我對個人的處境和前途已經做出自認為是有七八成把握的估計。第一，五七幹校已徹底以失敗告終，根本辦不下去了。吳慶彤和外交部領導雖然還可乘餘威讓幹校苟延殘喘一陣，但肯定已無力回天，再堅持下去也會自行散伙。第二，外交部派人向地方推銷這幾百「非我族類」的幹部（後來證明，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很好的同志），已經到處碰壁。據一位被結合進領導班子的工人同志透露，外交部曾和江西省委交涉，想把上高幹校幾百人連人帶馬加校舍，全部移交本省處理，江西省委

沒幹。第三，像我這樣的人，外交部只能收回自行消化。原因是我的情況比較特殊，資格老、錯誤大、處分重，地方上不敢要。即使敢要，也必得先找我談，而只要一談，就肯定崩。第四，從全國的形勢看，不會讓「文革」造成的這個爛攤子長期持續下去，必然會進行一番復查、甄別和整頓。因為倒在「文革」中的大小幹部有的是，外交部也不只整了我一個人。第五，不單幹部問題，就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等，也都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決不會一直按毛澤東設計指揮的往死胡同的盡頭鑽。我個人雖已年近花甲，但總還能再為黨（我估計黨籍一定會恢復）為國做些事情，把挨整耽誤的二十年補回來。蘇東坡說，「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我就不能有點小小的雄心壯志？這樣想好以後，也就再次安下心來認真學習了。而且後來留校的年輕人已不再給我分配什麼勞動任務，留給我的只有享受，使我又過了一陣世外桃源生活。

### 自行結業

但是，梁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而且從當時形勢判斷，幹校已根本維持不下去了。北京其他單位的幹校早已明令撤銷或自行散伙。外交部江西幹校，也是多數人留在北京，政治部動員無效，只好睜隻眼閉隻眼了。我們留在幹校的這一百多人，早已無所事事，心回北京。我想，再在幹校長期呆下去也不是辦法，還不如回到北京爭取解決恢復黨籍和分配工作的問題。



於是就自行決定，除讀書學習外，盡量利用時間悄沒聲地收拾行李。對這個工作，會做木工的我簡直是得心應手。由於大躍進以來，我已吃盡了國家短缺經濟的苦頭，對市場供應沒有多少信心了，所以幾乎是一切都要包裝運回。現在想來好像有點好笑，但那時還真都有用。例如我在當地砍下曬乾的一捆竹竿（支蚊帳、曬衣服）、好幾十個絲瓜瓢（洗碗用）、一批好的小塊木料（樟木、杉木、紫檀）和竹筒、剩下的各類鐵釘和油漆等，更不用說做好的大批樟木傢具（箱、櫃、桌、椅等）和自製木工用具了。所有這些，都用稻草包裝捆好，做到不怕鐵路上的野蠻裝卸。只等時間一到，將正在使用的被褥衣服和鍋碗瓢盆收拾好，就可立即走人。

一年容易又春風。一九七八年春天又輪到我探親了。從一九六九年下放起，到這時是整整九年，但外交部還無意宣布畢業，真的想辦成無期幹校。只不過形勢比人強。我已宣布自行畢業。這次去北京探親是不打算再回幹校了，而且已經作好對付外交部強大壓力的精神準備。事實證明，我對外交部的了解還真透徹。果然不出所料，回到北京向外交部政治部報到，算是看得起我，林中主任親自接見。經過簡單寒暄後，就又動員我探親後重回幹校。這回可是對不起，讓他碰了個硬釘子。我說，當年中央規定，幹校是幹部輪訓基地，我已經住滿整九年，你們這些一天也沒下去過的幹部總應該執行中央決定輪訓一次吧！林中說，倒不是讓你們長期住幹校，而是因為現在上面決定要對你們的問題進行復查，所以不如先回幹校等着，等有了結論再回來。我說，這次回來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與其回幹校，千里迢迢，多有不便，還不如在

北京可以隨叫隨到。雖然話不投機，但林中也沒把話說死，這就使我留在北京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

我們一家四口，住在外交部招待所一個十三平方米的房間裏。他們三人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都有事幹，只有我一個人等候復查。手頭沒事，除讀書看報和恢復對國際問題的了解外，就是不斷催政治部請他們指定人找我談話。當然也免不了瞻前顧後，想想國家和個人的將來，想想「文革」和幹校這一場噩夢。「文革」不說了，幹校連上九年，我估計在全國都是不太多的。雖然外交部還不讓畢業，但我卻已形成一些想法，順便談一下，就算我結業論文的一個初步提綱吧！內容豐富的九年幹校生活，如果有時間和可以查檔案材料，那是可以寫好幾本書的，而且辦幹校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那些一直坐在城裏搞革命和被革命的人很難想像出來的。但是我既無權查檔，上天也沒給我留夠充裕時間。個人經歷的、了解的、記得的都只能簡單談談，更不敢妄想龐大的計劃了。所以對九年幹校的回顧，只留下了乾巴巴幾條筋。

一、事實證明，用辦五七幹校的辦法，實現城市農村化，用來消滅城鄉差別，是倒轉歷史車輪的超級幻想，是注定了要必然走向徹底失敗的。它不但在中國產生惡劣影響，而且還可能殃及國外。據說柬埔寨紅色高棉後來實行全國迅速農村化，導致全國死人四分之一、達一百七十萬，就有學習我國經驗的成分。事實上，紅色高棉的消滅城鄉差別、消滅商品貨幣等極端冒

險主義措施，曾得到當時中國領導人和輿論界的高度讚揚，中國政府並給予政治上和物資上的大力支持和援助，這都是確鑿的歷史事實，至今還使我們在國際審判紅色高棉問題上顯得有些被動。至於其他國家的毛派政黨和毛派游擊隊是否受到影響，沒有研究，就不敢隨便說了。

二、五七幹校並沒有實行知識分子向貧下中農學習，也沒有改善吃公糧的同農民的關係。由於五七幹校是關門辦學，本來就和群眾沒有多少接觸，所以談不上什麼互相學習。實際上，幹校同當地群眾還發生不少摩擦，如爭奪一些田地、山林等生產要素和資料，引起當地某些物價上漲（例如幹校去後，上高集市的雞、魚、油、蛋等價格就提高約一倍，引起群眾不滿），這些都和群眾利益直接發生衝突。其實還多虧了關門辦校。就是這樣，當地農民對幹校人員還是看不慣、不搭理的。上高老鄉就說幹校人員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手錶」（當時手錶還沒普及到農村），表示了他們的不滿。所以辦幹校，總的來看，對幹群關係和政府同群眾的關係都是不利的。

三、造成人力的大浪費和大破壞，是對中國人才的又一次摧殘。幹校集中了大批政治、經濟、社會管理人才，特別是科技文教界的大部精華，造成了時間、創作、教學、技藝的無法彌補的浪費和荒廢，給中華民族造成的損失之大，是無法用數量和時間來計算的。

四、道德和風氣的破壞。知識分子參加點體力勞動，體驗一下艱苦生活，對於一些人也許是有好處的。例如詩人臧克家就寫了大量的詩歌頌幹校生活，雖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認為是

討好和作秀，但感到有收穫的人總還是有的。不過整個看來，幹校裏的思想政治生活還是起的壞作用大。例如在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抓五一六的運動中，就盛行互相告密，反目爲仇，說假話受賞，說真話受罰，拍馬溜須者升，正道直行者降，做好事的檢討交代，做錯事的一貫正確，鬧得是非顛倒，真假莫辨。在這種做法和風氣下，自然會造成許多嚴重後果，如夫妻離異，朋友成仇，不少人悲觀失望，不思上進，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精神失常……幹校的這一切，領導上自然不會總結，更不會加以批判，許多惡習反而被作爲傳統保持了下來。

五、造成財力物力的巨大損失和浪費。文革期間，中國經濟在走向崩潰的邊緣。全國建幹校，大概也是幫着向邊緣推了一把。以外交部來說，先後建立了七八所幹校，總的原則是，建校時不從國際形勢考慮，準備有六分之五的人長期上幹校，於是就到處鋪攤子。可是沒多久就開始收縮，一個一個地白扔，最後全部放棄。這還被說成是計劃經濟呢！單從這一滴水就可反映出計劃經濟是最浪費的經濟。不過浪費的只是納稅人的血汗，所以出主意的大小當官的是不會當作一回事，更不會進行總結和檢討的。

要逐條計算也還可以再列幾條。不過單是上面這些就已可看出，提倡辦五七幹校是多麼荒唐的思想，結果又是多麼慘重的失敗，事後又是多麼快地使人們遺忘。當官的更是誰也不會回頭去想一想。閒雜人等，則又誰想誰犯禁。最後就變成民族的集體失憶，大家都忘了。這就是中國社會發展多年來所存在的一條重要規律在幹校問題上的反映。



至於我個人，九年幹校可說一無所得。人們會說，你總還讀了一些書吧！我卻不以爲然。如果不是在政治迫害和思想壓力下，換一個真正的學習環境，我相信會讀得更多讀得更好。例如《資本論》我是在幹校仔細讀第二遍的，但是無論理解還是記憶，都不如十七歲時那次初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思想常開小差。至於學了木工、養豬、種菜等，我相信，是誰也不會當作工作成績計算的。

第十一章

艱難平反路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

## （一）等候復查

### 外交部沒有「平反」之說

文化大革命中製造了那麼多冤假錯案，「文革」結束和揪出「四人幫」以後，對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應該是天經地義，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也都是這樣叫的。但外交部卻顯得特殊，把涉及到上千人的這一龐大的甄別平反工作給取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名稱，叫做復查。爲什麼呢？因爲直到「文革」後的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外交部在給中組部的報告中還一口咬定，「外交部沒有發現冤、錯案，不存在昭雪平反問題。」他們的說法是，「文革」中外交部所做的事情，從開始拋出一批牛鬼蛇神，到後來揪出走資派、叛徒、特務、歷史和現行反革命、抓到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以及把兩千多人的造反聯絡站打成被反革命頭頭控制的組織，而這些人就一直被算作站錯了隊，等等。所有這一切，當時都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有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哪能錯呢？既然沒錯，還談什麼平反？應該說，這一基本認識成了外交部主流派的長期傳統。即使迫於形勢不得不改變作法，但是這一基本觀點並沒有改變。這就是外交部的甄別平反工作始終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拖的時間特別長，還要盡量留點尾巴的原因；也是對「文革」結束前的外交部幹部一直要分站隊正確還是錯誤，在幹部使用上長期存在派性的原因。

正是由於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使我多參加了兩三年「文革」，住了九年五七幹校，走了一段艱難的平反路，並長期受到負面影響。

外交部主流派雖然堅持他們的基本觀點，但形勢卻迫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作法。這就是一方面，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已逐漸走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一九七七年五月已批判了「兩個凡是」，部黨組所恃有毛主席指示和由周總理領導的理由就失去了依據。而且隨着對「文革」的不斷揭露和清算，外交部幹了那麼多迫害幹部和群眾的事，也再無法繼續隱瞞和繼續堅持下去了。比如說抓「五一六」吧，全國從上到下都已經說沒有「五一六」這個東西，你外交部總不能說你們沒有我們有吧？還不是得偷偷摸摸地給摘掉帽子或減輕以至取消處分，要在結論中留尾巴也只好找別的藉口和在今後使用上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就是後院起火，外交部的廣大幹部群衆自發起來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結束外交部對一大批幹部的十年迫害，並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運動」。一些被安置到外地外單位的幹部也紛紛回北京要求外交部糾正對他們的錯誤處理。例如後來當了大使、外辦主任和外交學院院長的劉山同志調到湖南後，發現竟被暗中取消了黨籍，經過直接找到外交部交涉，才把黨的關係轉了過去。雖然這些最後都被設法壓下去了，但它們的影響卻不可低估，還是直接推動了部領導開始稍為認真地對待「文革」中製造的一些冤假錯案。但他們仍然要堅持原來的基本觀點，不用撥亂反正和甄別平反，而用了個新的名字叫「復查」。時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朱霖（黃鎮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也承認，外



交部領導在「文革」後對幹部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極不重視，一九七八年政治部成立了一個復查辦公室，只有一間房子和兩名剛調來的幹部。後來由於上面所講的形勢所迫，復查辦公室才加強了力量，工作人員增加到二百多人，算是開始了外交部對「文革」中受迫害的幹部的撥亂反正工作。

### 等待復查

我拒絕外交部領導的動員再回幹校，就是爲了爭取平反，解決恢復黨籍和分配工作問題。部領導確實也不得不準備對我進行復查，但是同我的想法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們的想法和作法，基本上是傳統的暗箱作業，沒有什麼新的變化。具體說來，就是復查工作不和本人見面（所以才動員我回幹校去等着，免得住在北京給他們找麻煩，也就是講理），由他們安排幾個人查閱檔案，並按領導規定的框子找出適合於這個框子的材料，寫出復查結論。一般的都要比原結論減輕，例如原來是「五一六」分子，現在給你摘掉帽子，算成犯了嚴重錯誤；原來定爲敵我矛盾，現在改爲人民內部矛盾；原來開除了黨籍，現在恢復黨籍，只給予留黨察看處分，等等。而且絕不承認原來處理錯了，而是說成黨的寬大。所以照例要寫上根據黨一貫執行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精神和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指示。往往還要加上鑒於本人已有悔過表現和希望留在黨內一類的話，所以決定從寬處理。還有一種情況是，有的人不同意結論措

辭甚至處分，專案組或復查組也可在不大變動領導意圖的條件下，作一定的鬆動、緩和甚至改變。多年來這已變成一種八股，而且在多數場合還是有效的。它使受處分的人感到寬大，以至於產生感激之情，頂多也只是在簽字時作點更正事實或表示心跡的說明，附在結論後面。這樣就算結案了。作這類復查工作應該說並不困難，一般幹部都可以勝任。

但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個人的想法和作法卻有了很大變化，就是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弄清是非，不再受人愚弄，吃那老一套了。我曾跟人開玩笑說，經過文化大革命，我的一個重要收穫就是多少學會運用「鬥爭哲學」，不合理就鬥，決不再逆來順受，不想再受一些人的擺弄和欺侮。一句話，豁出去了。這也是形勢逼出來的。

應該說，參加革命以後，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我已心甘情願做黨的馴服工具，服從命令聽指揮，而且做到了積極、認真、拼命幹。但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無端挨整。延安整風中硬被打成特務，最後上面不認錯，反而說是由於本人思想意識有毛病。一九五九年受牽連，被毫無根據地定為反黨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撤職降級留黨察看。更可笑的是，硬被安上了個「老運動員」的諱號，連我自己也鬧不清是從什麼時候算起的。對這一定性和處分，陳毅當時還讓韓念龍找我徐達深談話，說成是黨的寬大，否則無論按哪一條都可開除黨籍。好容易從飢餓線上掙扎過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又被莫名其妙地交付群眾專政。怎麼這革命老是往自己頭上革？但我仍然抱定了逆來順受的態度，接受一些人的欺侮和凌辱。不想一九七二年姬鵬飛、喬冠華

等人竟利用手中權力下令開除我的黨籍。這我也沒有灰心絕望，還是適應黨內老一套的作法，在表示不同意處分決定的同時，承認錯誤和提出留在黨內的要求。另外我也指出處分決定有許多提法不合理，舉例不實，除寫下書面保留意見外，還向當時的支部書記陳尙廉和專案組的何桂英口頭談過。只是出於對部黨組威力的畏懼，意見提得很緩和。此後我就不斷苦苦哀告，提出申訴，要求保留黨籍，將我的問題提交中央重新審理。這些書信和申訴，有寫給部核心小組的，有寫給黨組報中央的，有寫給國務院政工組或中組部的，最後一封申訴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寫給部長黃華和副部長韓念龍、王海容、劉新權的。所有這些信都是石沉大海，所以從此以後再不向上面寫信了。既然老一套作法根本沒用，我就不能不採取新的做法，這就是，進行面對面的說理鬥爭。這也是爲什麼我在一九七八年春堅決留在北京不再回幹校的原因。

但是事不由己。外交部領導還是堅決採取老一套暗箱作業的作法，由專案組（對外稱復查辦公室）背着本人在那裏查檔案改結論。這就使我留在北京完全是白等了。

### 臨時工作

由於急於解決問題，我就採取了雙管齊下的作法。一方面不斷打電話給政治部主任林中，請他或派人找我談話，解決黨籍和工作問題。另一方面也想摸一下新任外交部長黃華的態度，因爲我們過去比較熟悉。我先找他的夫人，我們在延安一起學俄文的同學何理良，談了我的申

訴，請她轉告黃華，必要時我也要找黃華本人談。她很快就告訴我，她已轉告黃華，黃只說了一句：「何方是外交部有名的筆杆，讓他到國際問題研究所去。」後來又從別的老同學（付克）那裏傳出，聽何理良說何方有反總理的問題。根據以上情況，我就決定不再找黃華。我看出黃華沒有對外交部文革中的問題進行撥亂反正的認識和氣魄，還是姬規黃隨，信任和依靠原來的班子以及老一套的做法。於是我就剩下了一條路，三天兩頭地打電話催林中。

林中和政治部倒是沒有再動員我回幹校，但又一直藉口工作忙，說「等我有空了去看你」，就是拒不接見，也不指定別人找我談。我雖然在招待所有十三平米的小屋可以獨成一統，但不解決黨籍問題又沒有工作，總覺得有些悶。就這樣閒等了兩個月左右，林中還是採取拖延戰術。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對林中下了「最後通牒」。我說，「如果你們總是藉口忙，拖延不決，那就表示外交部不打算解決我的問題了。那我以後就不再找外交部了，而去直接找中組部。」林中聽後說，等他們商量一下，然後約我談。下午就來電話，請我到政治部去一談。我的「鬥爭哲學」算是初步告捷了。去後，林中態度倒是挺友好，先寒暄了一陣。我請他有話直說。他表示，我的問題正在復查，總得要點時間。現在《世界知識》正在籌備復刊，由鄭森禹和張映梧分任正副社長，還在招兵買馬。我在這方面是輕車熟路，是否先到他們那裏幫助工作，等復查完了再談今後的安排。我聽後一想，終究胳膊扭不過大腿，黨內形成的這一套解決幹部問題的暗箱作業，我只能遵守，無力改變，因此先去《世界知識》打工也行，一則



總算有了工作，二則可以恢復一下業務。所以當場就答應了。由政治部幹部司通知世界知識出版社後，我就前去報到。

當時《世界知識》借用外交學院的一批房間辦公。組織設置和分工情況，我當時就沒多打聽，現在更說不清了。反正鄭森禹分配給我的工作，是半個月寫篇文章，題目臨時商定。這個單位雖然人不多，但一切還是循規蹈矩，例如辦公室就是嚴格按等級分配。我由於什麼也不是，所以就按最低待遇，四個人擠在一個小辦公室。而且我算臨時工，任務簡單，也不用參加很多會和同別人發生橫向關係，有點獨來獨往，倒顯得清閒。例如一上班就耳聞正副社長鬧摩擦，其中的是非曲直我連聽都懶得聽。雙方向我求援，我也以不了解情況推開了事。我只做份內的事，半個月寫一篇文章。現在只記得，試刊第一期給我出的題目是世界裁軍問題，第二期寫了篇評論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問題。應該說雖然業務荒廢多年，但完成這點任務還是頗感輕鬆的。其他時間就是跟蹤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大量閱讀有關國際問題的材料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甚至還自學起了英文。

當時組織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對外交部也不抱太大希望，所以心情很難安定下來。但竟然還興起了一點野心，打算用加倍的努力，彌補過去白白失去近二十年的損失。其中一項就是學起英文，利用一切空閒時間背單詞，口袋裏經常裝一批生字卡，坐公共汽車也不斷掏出來看。還暗自訂了計劃，每天學什麼文法，背多少單詞，晚上或第二天進行檢查和補課。因為根據當

時的形勢估計，允許我繼續研究國際問題可以說是很有把握的了。事實證明，原先學的俄文用處不大，英文卻是研究國際問題應當具備的條件。上了九年幹校，沒利用時間學英文，是估計以後不可能再和國際問題沾邊了，準備在農村基層呆一輩子，哪用得上什麼英文。但終究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學起外文來非常吃力，不但記單詞不容易，而且英文的文法和發音也要比俄文複雜得多。學了兩三個月，都一直在進行着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乾脆放棄了。我考慮了個人的條件，也探討了許多人包括馬恩列斯毛學外文的情況。得出的結論是：第一，學習語言可能有一種特殊的天賦。有的人學得快，有的人學得慢，有的人可以很快精通不少語言，有的人拼命學也學不會一種。例如斯大林就無法和恩格斯比。毛澤東學了多年英文，大概只是爲了點綴和調節，實際根本沒用，也根本學不會。張聞天就說，徐老（特立）學了大半輩子法文總是學不成。我自己連普通話都沒學會，還學什麼英文呢？第二，權衡利弊，學英文已經來不及，也不合算了。與其花很多時間去學英文，還不如拿這些時間用來研究問題和開拓知識。兩相比較，學英文吃虧，決心一下，就和英文告別了。

這裏稍帶說一下兩年後又學起了日文的問題。由於調到社會科學院後，原來安排我做蘇聯東歐研究所長的計劃落了空，臨時讓我籌辦日本研究所。這時，宦鄉從美國到日本，到處宣布我是日本研究所所長。《人民日報》一次報道還以日本問題專家相稱，讓一些熟人笑掉了大牙。但是既然被扶上了老虎背，也只好豁出去了，於是野心又起，想到要學點日文。這倒不是

完全忘掉學英文的教訓，而是出於太不懂日文。我們當年在延安學俄文的時候，中國還沒稍爲像樣的俄漢字典，只能靠日本人編的《露和字典》。看日（和）文對俄（露）文的解釋，一大堆漢字，連猜帶蒙，可以知道個大概。一本《露和字典》我已揣來揣去保存了六十多年。自以爲只要大體弄清漢字外的那幾個字母，看書看報不就解決了？所以我就請老師，找課本，學了起來。結果，學了兩三個月，失敗得更慘，發現日文比俄文英文更是難學得多。又是基於以上兩點考慮，宣布拉倒，只能自慚形穢，當了八九年的文盲所長。

## （二）復查的交鋒

### 第一次交鋒

在《世界知識》打工不到半年，專案組以中共外交部政治部的名義，閉門造車，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給我寫出了復查結論。外交部黨組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批准。十月二十日政治部負責復查工作的三位主要領導同志朱霖（政治部副主任兼復查辦公室主任）、楊清華（政治部副主任）、許寒冰（幹部司副司長，姬鵬飛夫人）約談，拿出決議稿讓我看，如果同意，就簽字，有意見也可以提出來附在後面。態度還算溫和。

我一看結論是新帳老帳一起算的，總的精神還是以前的老框子。題目雖是《關於何方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的復查決定》，但內容卻提到我對延安審幹（搶救）不滿（原文是「何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審幹時，曾因受過組織審查而對黨不滿」），說一九五九年「因犯嚴重錯誤而受到處分」，一九六二年甄別時又「乘機翻案」，由於「翻案企圖未能得逞，因而耿耿於懷，對組織更加不滿」，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跳出來，「採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支持『外聯』頭頭打倒陳毅、姬鵬飛等同志，妄圖混水摸魚，借機翻案，造成了極爲惡劣的影響」。因此一九七二年給予開除黨籍等處分。經復查，何「所犯錯誤屬實，情節嚴重」。但考慮到「他受處分後，對所犯錯誤有一定的認識，本人又多次要求給予留在黨內改正錯誤的機會。根據黨的『十一大』精神和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決定對何方同志的錯誤從輕處理，將開除黨籍的處分改爲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留黨察看的時間，自本復查結論之日算起；將行政處分改爲由十一級降爲十三級（已扣發的工資不再補發）」。

我也是有備而來，看完結論後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我說，按照「結論」所說，我在「文革」中的錯誤主要是支持聯絡站（外聯）所提打倒陳姬喬的口號，和應聯絡站要求寫了所謂揭發陳姬喬等同志的材料，時間在一兩個月以內。我承認支持打倒陳姬喬的口號是錯誤的。但是第一，陳姬喬爲什麼可以完全錯誤地兩次打倒我，而且後果極爲嚴重，使我受了二十年的迫害，幾乎送命。陳姬喬不但沒有受處分，而且可以不負責任，至今還被認爲是正確的。我支持打倒陳姬喬，對他們毫髮無損，不起半點作用，怎麼就變成了嚴重罪行？我們不是經常說，在



憲法面前，公民人人平等；在黨章面前，黨員人人平等。對這個問題連毛主席也沒有否認過。爲什麼外交部的黨組織就這麼不講道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第二，如果由於一時支持打倒陳姬喬的口號犯了錯誤，就受這麼嚴重的處分，那麼長期高喊打倒劉鄧陶的口號，又當何論？這兩個打倒究竟哪個更嚴重？我就親自看到陳姬喬和包括你們在內的外交部各級領導不但喊打倒劉鄧陶的口號，而且一直用它教育幹部，進行外交工作，影響恐怕要比只在內部表態支持打倒陳姬喬嚴重千萬倍。對這些人又應給什麼處分？第三，聯絡站得到毛主席、周總理和部黨委的支持，並授權它領導運動。我同它的關係是一個專政對象和正式組織的關係。它要我開會和寫材料，我只能服從。爲什麼周總理和部黨委支持聯絡站就是應當的，不算錯誤，一到我這裏就算犯了天條？第四，想不到外交部黨組織怎麼這麼落後和保守。現在已經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央已在醞釀爲劉少奇（鄧小平早已出來工作）、彭德懷平反，你們還堅持打倒劉鄧陶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的立場，難道就不怕犯錯誤？

朱霖她們聽了倒沒生氣，只是提出要我將意見寫出來由他們轉交黨組。我說，我知道這是你們結案的一種辦法，把本人意見附在後面，決定就算生效了。因此我不會寫一個字，只是請求你們把我的意見報告黨組。如果黨組堅持原有決定，那我就要求將我的問題提交中組部審理。

由於她們也不打算說服我，對我的問題又不十分清楚，所以雙方沒有辯論就結束了第一次

談話。

後來聽劉英說，也是她們三人於同一時間（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去找劉英，要劉對一九五九年的復查結論簽字。劉一看結論上還留了一條「態度不好」的尾巴，就當即打了回去，表示根本不同意。接着，劉將這件事報告了當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胡表態說，「態度不好就是立場穩，做得對嘛！」過不久，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劉英當選中紀委委員。第二天又是這三位，登門拜訪，轉告劉英，黨組決定她的問題完全平反，一風吹了。

### 變與不變

這裏說的變，是指「文革」結束後，中央的領導和政策以及整個中國形勢不斷發生的大變化；所謂不變，是指外交部「文革」後看待幹部的一項原則並成爲長期傳統。

在主流派控制下的外交部黨組織，從一九六七年冬打翻造反派，取得穩固的領導權後，就一直以「文革」頭兩年特別是一九六七年所謂的站隊正確與否（標準就是支持還是反對陳姬喬）來看待和處理幹部問題。「文革」結束後，不管上下和外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外交部的這條原則是一直堅持下來了。所以這不但是在一九七八年外交部在幹部復查中推行的政策和做法，而且幾十年來都一直按照這一原則看待那段歷史和處理參加過文革的幹部。因此，外交部「文革」中的造反派（頭頭、骨幹、積極分子）和同造反派沾點邊的人，就大小楣倒了一輩

子，更不用說許多被迫害致死和致殘的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說清楚爲什麼直到一九七八年底，外交部政治部和部黨組還對我做出那樣的決定和處理，並且在繼續討價還價。

當時是個什麼形勢呢？這就要簡單交代幾句。粉碎「四人幫」以後，無論是國內形勢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在接連發生帶有根本性的變化。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開了十一大，鄧小平復出。十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胡耀邦組織的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十二月中，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長，並且立即着手平反冤假錯案。一九七八年一月開始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十一月中組部正式提出爲薄一波、楊獻珍等所謂的「六十一人案」平反，裏面已經講到批准此案的張聞天是代表黨中央的總書記。十二月就召開了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很快，章蘊已在《紅旗》上發表文章指出，既然文化大革命完全錯誤，因此「文革」中的兩派就沒有哪派正確哪派錯誤的問題，應該平等看待，以實際行動定是非。胡耀邦也提出不能用派性看待和處理「文革」中的兩派問題，還直接批評了外交部那種一派壓一派的做法，要他們不能讓原來的專案組搞復查，對當權的這一派中整人整得厲害、有嚴重錯誤的人，也要處理幾個。然而外交部黨組織對這一切似乎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除涉及到的具體問題不能不有所表示外，他們原來堅持的原則和觀點不但沒有改變，甚至沒有動搖，不到不得已，是不會後退一步的。這從對許多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劉英的復查結論中都可看得出來。

外交部黨組織不但不重視中央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而且部內幹部群衆的呼聲也聽不大進

去。因為還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外交部的一些領導幹部和廣大黨員群眾，就曾自發地開會「批判外交部十年來執行的錯誤幹部路線」。由於事前請示報告過領導，所以不但有外交部政治部正副主任參加，而且第一天就由中組部領導同志張志傑派人出席。原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十一屆三中全會當選為中紀委委員）第一個發言，嚴厲批判外交部違背黨的幹部路線。據原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的夫人李涵珍為文說，第二天中組部副部長曾志曾到會。這天發言的是徐以新、李涵珍、柳雨峰（曾任大使）等。大會開了三天，其間曾發生過外交部歷史上著名的曾湧泉搶話筒事件。會議開到第四天竟不了了之。當時就傳說，這時姬鵬飛雖已離開外交部，但他為首的主流派仍然處於統治地位，而會議的矛頭又是直接針對他們的。因此姬就搬請一直保護他的中央領導同志李先念干預，把這個會議和批十年錯誤幹部路線的活動給壓下去了。從這裏也可看出，外交部黨組織為什麼會對中央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和處理「文革」中兩派問題的意見，採取那種不大在乎態度的原因。

### 「討價還價」

在既要堅持原有觀點，又不能不適應形勢變化的條件下，外交部黨組織對我採取了討價還價、逐步後退的辦法。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一月六日，又由朱霖、楊清華、許寒冰三位兩次找我談話。詳細經過和具體內容現在記不清楚了，但印象是結論修改得一次比一次寬，



而且態度始終是友好的，用的是商量的口氣。例如對錯誤的嚴重性就在不斷降低，太勉強的提法也可去掉。第一次復查結論中說我有嚴重泄密行爲，說在給聯絡站寫的材料中，從我「非法保存」的十七本工作筆記中摘抄了大量「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並爲聯絡站所擴散。我的辯護是，第一，我沒有那麼多筆記本，即使保存的那些筆記本也根據有關規定和過去教訓，除必須記的工作安排和向下傳達的事項外，不再記其他內部資料。加之我受處分後的工作處境，根本接觸不到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因此談不上什麼嚴重泄密。說我有十七本工作筆記，純屬誇大，可能是連我在「四清」中寫的材料本也糊裏糊塗給算進去了。說是「非法保存」，更是不講道理的誣陷。第二，聯絡站是中央和周總理承認和支持的領導運動的合法組織，我奉命寫不涉及機密的材料，而且注明爲內部材料，即周總理和部黨委提倡的所謂小字報，因此談不上泄密。何況中央和總理授權他們監督業務，插手當時的高度外交機密。與之相比，我寫的材料對他們根本無秘密可言。這條罪狀，在後來第二還是第三次復查決定的修改稿中，好像就給去掉了。

隨着錯誤性質的下調，處分也一再減輕。好像第二次是把留黨察看的時間換成了過去式，行政降級也有減少。第三次的稿子又把留黨察看改成了嚴重警告，行政上不降級了。對這兩次修改，我都作了說明和反駁，也決不接受他們的決定。三位女同志還是使用以前的策略，提出讓我寫出書面意見。當然又遭到我的婉言拒絕。我還最後提出，部黨組批准對我的復查決定和

這兩次修改，說明外交部黨組織，也就是黨組和政治部，在掌握黨的原則和處理幹部問題上也太不鄭重、太不嚴肅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三變對一個幹部的處分，難道黨組真的竟為我的問題開了三次會？這當然是不會有人相信的。

第四次談話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決定草案提出，本人雖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但基於黨的寬大政策，決定取消一九七二年開除黨籍和行政連降三級的處分。這就是說，一切恢復到「文革」前對我的處分，即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降職。對這個草案我仍然表示不能接受。因為第一，我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姬喬，如果要作為錯誤處理的話，那全國應作為錯誤處理的當以千萬計。想想看，從打倒彭羅陸楊起，全國有多少人參加了這些「打倒」行爲。單是我參加的幾次大會上直接聽到周恩來總理要打倒的就有：彭羅陸楊、劉鄧陶、賀龍、譚震林、楊余傅等，即使王關戚、林彪、陳伯達不算，也有十多個。而且還給戴上了一些難堪的帽子，如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大軍閥賀龍，大叛徒譚震林等。這裏面打倒錯的不少，那又當如何處理？算不算犯了嚴重錯誤？相比之下，我那點子「打倒」實在算不了什麼，而且沒有起任何作用。因為他們的「打倒」，還真打倒了一大陣，我的「打倒」，當時就沒動得了陳姬喬的毫髮。第二，我不但不能接受給我安的「文革」中的錯誤性質和處分，而且還強烈要求對一九五九年給我的批判和處分迅速進行甄別平反。我說，現在問題已經非常明顯，希望外交部黨組織不要老是落在形勢後面，處於被動。

### 《審改決定》

又過了一個多月，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朱霖等三位同志又找我談話。表示，根據新的精神，「文革」中的問題就不算了，有關檔案材料一律銷毀。關於一九五九年的處分也決定取消，並且重新做一個審改決定，如果同意，就請簽字，我的問題就算從此結束了。我拿過黨組文件一看，題為《關於何方同志問題的審改決定》。除前面簡歷和以前的處理情況外，結論寫道：

「經復查，我們認為，何方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積極參加了張聞天在外交部的反黨宗派活動』，並給予黨紀和行政處分是不對的，應予糾正平反。一九六二年八月，雖對何方同志進行了甄別，但仍給予何方同志以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上降職的處分，也是不當的。現決定撤銷中共外交部委員會一九六二年八月《關於何方同志的甄別結論》，取消給予何方同志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上降職的處分。」

「有關何方同志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的材料（包括一九六二年的甄別結論），一律從其個人檔案中撤出。」

中國共產黨外交部黨組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看了這個簡單決定，覺得對一九五九年的問題能寫出這樣由黨組織承擔責任的復查結論就相當不錯了，要是過去，例如延安搶救的甄別結論，還會把責任推給本人，並留點尾巴。這次能做到這點，當然不是外交部黨組織認識的進步，而是由於不得不適應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形勢和中央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再提，也是根據中央精神，特別是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的指示和干預。雖然我對外交部的處理並不完全放心，但也認為自己的問題只能這樣結束了。因此於三月二十日簽字「同意」後，交還了政治部。

我的不完全放心有兩點。一是，外交部是否會根據中央統一規定全部銷毀「文革」中有關我的材料，會不會留幾件作為以後必要時用的把柄？例如中央規定應歸還「文革」中查抄的本人的物品和資料，外交部政治部竟以「找不到了」為由，至今沒有交回我一件。而這些東西是按組織系統收繳的，並不是紅衛兵隨便抄走的，怎麼會丟個精光？二是外交部對我的那種處理顯然是迫於形勢，而不是出於思想認識的轉變。否則，在那兩三個月的時間裏怎麼可能會發生那樣大踏步後退的變化？外交部由於堅持「文革」中是否站錯隊的派性觀點，所以即使給你取消了處分，也還會控制使用，或像湖南那樣給用人單位打招呼說此人有問題。我就看到不少有為的青年，只因參加了幾個月造反派的活動，一直被控制使用到退休，不得提職，不得出國等。其中許多人（包括姚登山）就是一開始在外交部政治部那種表示「寬大」的結論上簽了字，或者附上了保留意見和說明的。而這個結論也就放在本人檔案袋中長期保存和跟着本人走



一輩子。

根據我對外交部的估計和看法（事後不但在我，而且在許多人的身上，都證明了這種估計和看法並沒有錯），在問題得到平反後，我就已下決心離開外交部，另找個單位工作。

### （三）幾點思考

#### 歷經三次甄別

在我參加革命後的短短四十年中（一九三八至一九七八年），已親身經歷過三次甄別。而且每次都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都是在大運動中挨整，又是在大運動中甄別的。至於甄別結果，有的得到平反，有的只是減輕處理。第一次是在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特務。當時延安的脫產幹部約三萬人，據各種正式黨史書籍和一些領導人如胡喬木講，打成特務的約佔一半。經過兩年多的甄別，據說一個特務也沒查出，包括許多帶有特務嫌疑尾巴掛起來的以至被當作特務槍斃了的，最後也都查明並不是特務。這次給我作的甄別結論，不是說黨組織搞錯了，而是說由於本人思想意識有些毛病，所以受到審查，結果沒有發現有政治問題。對這一推卸責任和極不實事求是的結論，我拒絕了簽字。

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運動中，我被打成外交部張聞天反黨集團的主

要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作了留黨察看、行政撤職降級和下放農村勞動改造的處理。這次運動的聲勢浩大。據一九六二年中組部的統計，全國的批判重點和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為三百六十五萬人，而當時全國的黨員也還只有二千六百萬。三年困難使得大躍進的牛皮破了產，全國餓死三四千萬人，得浮腫病和女人閉經成爲普遍現象。連毛澤東也不得不默認「三面紅旗」的失敗，被迫對下面的讓步和後退睜隻眼閉隻眼，一時准許對反右傾運動中被整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是不僅毛澤東，而且參與製造廬山冤案和主持反右傾運動的中央領導集體，也都是不願公開認錯和作點自我批評的。所以這次甄別，縣級以下是基本上上風吹了，到了省市特別是中央機關，進行起來就難得多。因爲上行下效，各單位主持反右傾的領導和參加運動的積極分子，也都不願認錯，對甄別能拖就拖，能不平反就不平反。所謂戴帽容易摘帽難。對我的甄別，由於外交部黨組織的一拖再拖，直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作結論。而這時正是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對「三風」（包括「翻案風」）的時候。在這種氣氛下，外交部對我的處理既沒有作實質性的改變，反而將我實事求是的申訴算成了翻案。於是文革一開始，又把我打成牛鬼蛇神交群眾批鬥。

「文革」後的甄別平反，開始時更不順利。在經過十二年的專政和監管後，外交部對我的復查還進行了幾個月的討價還價，而且一開始要價就那麼高！我了解的外交部情況和看到對周圍許多人的復查，大體都是這個樣子。這說明黨組織處理自己的同志是多麼的心狠，更談不上

「以人爲本」。由於是他們主持批判和處理錯的，自己又不願承擔責任，所以以前的每次甄別，都不願給整錯者平反，或設法留個尾巴。何況現在主持平反（外交部叫做復查）的，正是受過造反派批鬥的這一派的領導人和堅決支持他們的那批幹部。如果處理公正，沒有派性，胡耀邦也不會干預，外交部也不會改換專案組的人。但是他們的計劃沒能順利和完全實現，是因爲這次碰上了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空前大潮流，主持其事的又是一貫大公無私、這次又立定「下油鍋」決心的胡耀邦。所以我經歷的這第三次甄別，雖然走了一段「艱難平反路」，但總還算從「復查」走到了平反。如果沒有這個大氣候，那對我的處理頂多是朱霖、許寒冰她們第一次拿出的那個「復查結論」，更大的可能是連「復查」也都不會「多此一舉」了。

經過三次挨整和三次甄別，特別是這最後一次「復查」，使我考慮了很多問題，涉及到黨的性質和章程。我在黨內生活只差兩年就整七十年了，經過和看到的政治運動實在不少。每次運動都有大批人挨整，現在看來絕大部分都是整錯了的。完全整錯的運動有抗戰時期的搶救運動、建國後的抓胡風分子、反右派、反右傾和「文革」中的抓「五一六」（抓了上千萬），這幾次大概一個整對的也沒有。其他如解放初期的鎮反、緊接着的三反五反，一九五五年後的肅反，恐怕大部分人也是被整錯了的，經不起全面的甄別和復查。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這筆糊塗帳了。但是非還是應該分清，而且是能夠分清的。例如「文革」初期那半年左右的所謂「劉鄧路線」，就是由中央和省部級黨組織公開點名批評和逮捕了一大批高級幹部和知名人士如周

揚、李達、田漢等（外交部也有孟用潛、王炳南、陳家康），派出工作組鎮壓迫害機關學校的大小知識分子。後來，劉鄧和執行這一「路線」的一些當權派也被打倒了，受到各種迫害。於是在作有關「文革」的決議時，這段歷史就不算了。難道這稱得上實事求是嗎？你不提「劉鄧路線」，可以；但你總不能抹殺那一段緊跟毛澤東、推波助瀾的歷史吧？從道理上講，應該是各有各的帳，誰的錯由誰負責。不能用「宜粗不宜細」的辦法把是非攪混，似乎「文革」初期那半年被整的成千上萬的人，也可以籠而統之地歸罪於林彪、「四人幫」。這講得通嗎？

對於我們黨這種先整一大堆人，然後搞甄別平反（還不算有好多沒有得到平反），而且整人容易平反難，我在以前就有些想法，經過文革後的這次「復查」，更感到問題嚴重，所以也想在這裏簡單談一下對幾個相關問題的看法。

### 整錯了人要不要負責

過去的作法是，整錯了人不但不會受到批評處分，而且還會受到表揚和重用，這就是保護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的政策。要搞政治運動，沒有積極分子不行，正像在農村搞土改需要勇敢分子一樣。每次運動，在發出號召和進行動員後，一個首要工作就是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由他們首先響應號召，衝鋒陷陣，才能把群眾帶動起來。其中有些確實是出於認識問題，但也有不少是基於個人利害得失的考慮，其中更難免故意表現「左」和明知不對還要作假的。例如



在延安搶救中，有位同學自己先坦白了，然後又來搶救我。由於運動中表現「積極」，後來提拔當了區隊長。及至兩年後甄別完了，他不但對我，還對別人吹他的先見之明說，我本來就不信何方那麼個小鬼參加革命會是特務！又如在「文革」中許多抓「五一六」的積極分子本來也不信被抓的是「五一六」分子，只是爲了表白自己、虛應故事就是了。但是，在運動中組織上又要相信和依靠積極分子，而且還要適時加以表揚和鼓勵。於是一些積極分子也就愈來愈「積極」，出現逼供誘供和各種嚴重違法行爲，直到逼死人命。但是等到甄別階段，黨仍要堅持保護積極分子的政策，把他們的過火行爲和違法亂紀解釋爲出於革命義憤。運動過後，論功行賞，積極分子不但不會因各種侵犯人權的極左錯誤而受到批評處分，有些人還會得到提升重用。被整錯的人，除一小部分檢討「好」和表現「好」的外，一般都會留點尾巴，影響到此後的使用，因爲你挨過整，總要懷疑你會對黨有怨氣。過去領導上對保護積極分子政策的解釋是，如果批評他們和處分他們，下次運動誰還敢當積極分子？這一保護積極分子政策可能是從農民運動以至游民階層中繼承下來的（你看梁山就不會處分劫法場時亂殺人的李逵）。長期執行的結果是：第一，使政治運動中積極分子在黨內的比重愈來愈強，地位愈來愈重要，成爲各級黨組織的領導骨幹；第二，使政治運動中總是犯極左錯誤，逼供信得到不斷重複和發展，製造出大量冤假錯案；第三，造成弄虛作假特別是說假話的風氣。過去那些大批判運動，如批王實味、批胡風、批右派等，都是一些積極分子帶頭，然後大家一哄而上。其實人們思想不可能

轉變得那麼快。

因此，按理不但不應該無條件地保護積極分子，而且在批判和處理人的問題上應該實行一定的透明度和「問責制」。也就是對人的處理不能總是暗箱作業，應該向群眾公開，向社會公開。凡是政治批判，事後證明錯了的，批人者也應該檢討和認錯。不能一些人（積極分子）老是批評者，而且一貫正確，批錯了也不負責；另一些人老是挨批，即使被批錯也得不到個說法。外交部一九五九年批鬥張聞天的人，至今沒有一個人認錯，而且在後來的運動中，他們仍然是積極分子，一貫正確，一直吃得開。所以張聞天的平反在外交部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好像是平反和不平反一個樣。這是很不合理的。過去由於整錯了人不負責，所以不但整人不慎重，而且還夾雜派性和挾嫌報復。因此，爲了防止亂整人整錯人，制止利用手中權力進行打擊報復、排除異己和競爭對手，不光是要平反冤假錯案，而且必須查清責任，找出冤假錯案的製造者，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該繩之以法的也不應例外。起碼在甄別平反中要說清原委，不能由於爲尊者諱連名字都不能提。否則，即使爲蒙冤者挨整者平了反，但不提冤案製造者和整人者，那所有冤案不都變成了無頭命案？這起碼是很不公平的。只找到受害者，不去找害人者，這個案子也不能算了結，甚至是對害人者的包庇。所以不但應當清算整人運動的發動者和主要執行者，而且在運動中整人的人也必須負應負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專門整人的運動，防止亂整人和乘機報復的現象。

### 黨內講不講平等

黨內常說的，「黨章面前黨員人人平等」，不但做不到，可能也沒能做到。大的方面我們不去談它，就說甄別平反吧。在我們黨內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時，好像有個分工，分爲整人者和被整者。一些人是專門批評別人的，一些人是一直受批評的，一搞起政治運動就被拋了出來。每次運動完了，照例是整錯一大批，於是就要由整人者給被整者進行甄別平反。想想看，這能公平嗎？

再就是處理問題有不同標準，不但分上下，而且分親疏。例如我們上面說的，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打倒我兩次，事後證明他們打倒錯了，可對他們連責任都不追究，更談不上給予處分了。我只是跟着搖旗吶喊，絲毫作用不起地打倒了一次陳姬喬，就算犯了必須開除黨籍和行政降級的處分。至於跟着中央領導和中央文革，打倒劉鄧陶、彭羅陸楊等的人，幾乎囊括了所有高級幹部和全國人民，這個帳又該怎麼算呢？又比如，最近我看了胡喬木在「文革」末期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全文，真可謂淋漓盡致，但沒有聽說有什麼處分。我對陳姬喬受命寫了一些所謂揭發材料，就罪不可赦。這也說明在黨章面前只有尊卑之分，沒有平等可言。再如「文革」後過了好久由黨中央發動，陳雲再三強調不要手軟，搞了五六年的《清查三種人》運動（所謂三種人是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

子」)，對於「文革」初期在北京搞打砸搶很著名卻因為有許多高幹子弟參加的「聯動」和「西糾」成員，就網開一面，還說指望這些人接班呢。陳雲就說，他們起碼不會挖祖墳。事實也確實是，那些人還真接了班，當了大官或大款。而受到「清查」的，主要卻是「文革」期間響應號召起來反對所謂「劉鄧路線」和衝擊各級領導的造反派。主持清查的正是那些打擊造反派和「文革」中長期排除異己、迫害幹部群眾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這在外交部表現得特別明顯：違法亂紀、逼死好多人命的主流派，一貫正確；既沒有打砸搶，也沒人命案子，但提出打倒陳姬喬的造反派，卻永世不得翻身。

還有個話語權問題，也就是發言權和辯護權。這在黨內，特別是在政治運動中更被弄到了蠻不講理的程度。本來在平時，已經往往是領導人講話，下級聽話；領導人批評，下級檢討。駁領導人的回，一般是沒有什麼好下場的。根據我的體會，這種不民主、不平等的體制，大約從延安整風後就逐漸加強，經過後來的各種政治運動，更進一步完全鞏固下來了。在運動中，不但挨整對象被剝奪了申辯權，稍作解釋，必會被指責為態度不好或要拉某領導下水。而且其他一些人也只能牆倒眾人推，不准為挨整者作點辯解或說句公道話，不然輕則自己也變成批判對象，重則被打成挨整者的同伙，什麼分子或某某反黨集團成員。這樣就必然在黨內建立起嚴格的等級制、宗法制和專制主義。



## 平反是否表示黨的寬大

過去經常的說法和人們的理解，都是：對你進行平反，這是黨對你的寬大。一些長期受苦受難的挨整者，一旦得到平反，如同撥開雲霧見到青天，頓生感激之情，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認為，這是顛倒了是非，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因為當年整錯了你，那是黨組織，具體講，就是有關領導人和積極分子的錯誤。他們現在給你平反（往往還是出於不得已，為形勢所迫），是改正自己的錯誤，是完全應該的，並不是出於寬大，更不是施恩。由於他們的錯誤，使你受到委屈，應該是他們向你道歉和檢討（胡耀邦就是這樣做的），而不是你向他們致謝。過去那種把黨說得很神秘，不但正確，而且萬能，黨員對黨只能服從，連個人的一切都是黨給的。這也屬於封建傳統，是顛倒了黨員和黨的關係。殊不知黨是由黨員組成的，沒有黨員哪來的黨？黨的一切都來之於黨員的貢獻（在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的情況下，非黨員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也得作貢獻）。至於貢獻的大小，則取決於個人的能力、機遇和入黨時間。一次社科院有個新當權的領導，批評一位愛提意見、要求民主的老幹部，說他吃着黨的飯還對黨不滿，簡直是忘本。這位老幹部後來對人說，沒有我們這些老傢伙奮鬥犧牲，他哪能當成什麼領導？他吃的飯倒有我們大家的貢獻在內。這固然屬於賭氣話，但也不失為對那種故意把黨神秘化、便於以黨壓人的一種回答。

對整錯了的人進行平反，不但不是寬大，實際上還缺少應有的補償。這不僅是個金錢（工資等）和其他物質待遇問題，而且主要是精神和時間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一個錯劃右派的年輕人，等二十多年得到平反，他的青春年華還是白白荒廢了。更不用說那些家庭分離、精神失常、自尋短見、以及遭遇其他不幸的人們了。光是平反，這些能得到補償嗎？應該認識到，得不到相應補償的平反，終究是不會公正的，是黨組織對整錯者欠的帳。不說大的方面，例如對迫害致瘋的路翎一家應當怎樣補償？這裏只談點近年常聽到的一件小事。據說中央領導爲了照顧老幹部制定了一項政策，規定「文革」後的司局級幹部，凡「文革」前爲正局級的（或是老紅軍），都可享受醫療上的某種優待。這對「文革」後才得到平反的人就太不公平了。難道得到平反的那幾百萬正局級以下的幹部，都是水平低、能力差，不會有人在二十多年中得到提升？大量事實證明，裏面倒是埋沒了許多有才華的人。因此，制定這種以「文革」前的任職設檔的政策本身就帶有歧視性，決策者站在哪一方面也是很明顯的。

於是一些當年的和現在的積極分子以及「左」派人士就出來說話了，責備那些得到平反還有意見或計較過去所受迫害的人。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叫「飽漢不知餓漢飢」，他們顯然屬於既得利益者群。最常見的還有一種現象，就是曾被錯定爲右派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平反後如果議論一下時政，或對促進民主和法治、對政治改革提出意見，發表議論，於是就有積極分子和「左」派人士站出來罵他們是個人主義，說他們是因爲挨過整或沒得到升官所以對黨不

滿。總之，挨過整、平了反的，仍然還受到一些有形的或無形的歧視。在一些領導人、積極分子或「左」派人士眼裏，似乎平反了的右派（和其他分子）還是右派，和他們不能平等。甚至於認為，他們整錯人還是對的，被整錯的人終究是錯的。

### 為什麼要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

常看到一些領導人在講話中談到自己或別人（只能是領導絕不會是群眾）時，往往會談到毛澤東在世時不能不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毛自己竟多次講，連他也是這樣）。而且把這說成是顧全大局，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現在看來這種說法 and 做法並不妥當。這不但是在為說假話和辦錯事開脫（躲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容易混淆是非，攪亂歷史，助長弄虛作假的不正之風。

首先，怎樣判定是違心話和違心事？這就只能靠個人的主觀想像了。例如鄧小平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講得次數最多的是說周恩來在「文革」中為了支撐大局不能不說些違心話，做些違心事。應該承認，周恩來確實在「文革」中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和做過一些違心的事。但是如果我們問，哪些是違心的，哪些不是違心的？恐怕鄧小平也說不清楚。你說周恩來打倒劉少奇是違心的不是？又根據什麼？以我當年參加大會的近距離觀察，好像不是。他領導和主持抓「五一六」，肯定不是違心的，而是真心實意要打擊報復，報復那些反對過他、不聽話的造反派。提

王海容爲第十屆中央委員候選人，也難說是違心的。又如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他在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是違心的，但又說他上山時就帶了反「左」和反右的兩份發言稿。如果他自己不做辯解，誰又能猜出哪份是違心的？按照這種有關違心的說法，大家都可以推卸責任，歷史也可以不要史實，只根據猜想隨便去寫了。

當然，說違心的話和做違心的事確實有。不但有，還很多。這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例如許多人的被迫檢討或奉命去批判別人就是這樣，因此也不容易得到人家的相信。張聞天檢討了半輩子，毛澤東就是不相信。在政治運動中搞牆倒衆人推的「批判」，恐怕真心實意的不多。但是逼人家這樣做就對嗎？被迫作假檢討、搞假批判、說假話、做糊弄人的事，難道值得提倡嗎？我自己就有這方面不光彩的歷史。承認是特務，是純粹的假話，倒還很快推翻了。但是承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參加批判張聞天，文革中又承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當然都不是真心實意，卻又堅持了好些年。這就不能完全推給客觀，而是個人應該感到羞愧的。

所以也應該指出，不管壓力怎麼大（更不用說那些壓力並不大，只是爲了保護自己），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都是既不實事求是，也不光明正大，和黨對黨員的要求與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完全背道而馳的。不但一般黨員，領導同志更不應例外。否則怎麼能使人信服呢？還不是說的和做的兩碼事。這也是個黨風問題。例如，一直提倡並教導大家「不惟書，不惟上，只惟實」的陳雲，作爲西路軍事件的經手人，四十多年不敢講真話，直到毛澤東逝世五六年以後才



揭露真相，這是「惟上」呢還是「惟實」？至於他自己說的一九五七年頂不住反「反冒進」，那就更是心明肚亮的「只惟上」了。如果認爲可以說違心話做違心事，那許多人的錯誤都可以得到開脫了。大躍進中講放畝產百萬斤紅薯的衛星的違心話，「文革」中做整死人的「違心事」，似乎都可以原諒了。這樣，黨的理論和宣傳、領導人的講話，還怎麼能取信於人？

還有，對違心之說是否也分等級，即領導上可以，下邊不行？例如，前面說過，爲什麼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支持打倒劉少奇，就算做了違心事，可以連檢討都不作，而潘自力在造反派壓力下只表態支持打倒陳毅就要置諸死地？陳家康只揭發了陳毅說毛澤東乾綱獨斷，就被周恩來說成「跳梁小丑」、「壞人」，最後冤死於五七幹校？更不用說像我這一類蘿蔔頭幹部了。單就算不算違心這點來說，也是分明存在着雙重標準的。

末了，持「違心說」，最嚴重的是它可以教人不堅持原則。那共產黨員還有什麼信念？還談什麼爲真理犧牲，爲主義獻身？這可是根本問題了。所以，對鄧小平、陳雲提的這套包庇領導和爲自己開脫的「理論」也是應該清算的。

接受復查引發的思考還有一些。例如我們的黨管一切，以黨代政，以黨代法，可能已經達到最高度。你看，黨對黨員和非黨員的處分，除了行使黨的權力（按理也無權處理非黨員）以外，還擁有行政、司法等權力。不但直接管到行政處分，細到減你的工資從什麼時候算起以及補不補發等，而且也管審訊、抓人、坐牢以及執行刑罰。例如大名鼎鼎的姚登山沒有經過任何

司法程序，既未判刑，又無結論，卻糊裏糊塗在秦城關押了九年多，而黨籍卻一直不曾中斷，放出來後仍然是黨員，而且還要補交黨費。爲了不扯得太遠，有些感想就不談了。但是上面談到的這幾點，也都是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涉及到黨的成分和性質問題，黨員和黨的關係問題，黨章的規定和執行問題等等，確實是我長期以來的想法。這些問題不但駁不到，恐怕領導上連允許討論也是不敢和做不到的。



第十章

恢復工作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



## （一）離開外交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外交部黨組給我做出了平反決定，我也簽字同意，這就意味着我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緊接着就是今後的出路和工作安排問題。對此，外交部領導倒沒有漏出什麼風聲，是我搶先提出了調離外交部的要求。而在這以前，早一步離開外交部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當副院長的宦鄉，就已經一再動員我去社科院工作。這也正合我的心意。因為我想，經過外交部對我的二十年折騰，自己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再做不了幾天外交工作，還不如去不大受年齡限制的專門研究機關。而且更重要的是，外交部仍然由「文革」中的以姬鵬飛為首的主流派所把持，他們不會給我安排什麼合適的工作，還會長期加以歧視。這也正是「文革」前李一氓勸我離開外交部的原因。宦鄉也是因此才去了社科院的。決心一下，就立即向政治部提出。找我談話的又是政治部主任林中。他不提對我的工作安排，只是強調外交部非常需要像我這樣所謂熟悉業務的筆杆子。態度誠懇，竭力挽留。但是我的態度比他還要堅決，兩個人當然談不到一起。最後他勸我再好好考慮一下，還說部領導是決不會放我走的，要我打消這個念頭。我卻是在告別前請他向部領導反映我決心離開外交部的要求。

還真是不出我的所料，這種歧視很快就表現出來了。過了不久，外交部總務司發公函給我臨時工作的單位世界知識出版社，說是爲了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給何方分配地址在勁松的兩間

宿舍（大約三十多平米，而我在一九五九年前的住房面積是一百多平米），叫我前去辦手續、看房子和領鑰匙。我接到通知後有點不大高興，就寫了一個書面答覆由出版社組織轉去。意思是，他們分的兩間房既談不上落實政策，我也就不去看房子和辦手續了，還是一家四口一起借住在招待所的十三平米的房子裏，那兩間房子請分配給其他急需房子的同志吧。此後外交部再沒提解決住房的事，我們也就在招待所那間小房中又住了兩年。

由於工作不定，所以我就一再催，但每次的答覆都一樣，就是不放人。「文革」後期外交工作確實開展很快，建交國家成倍增加，外交幹部不但數量少，業務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時間。林中就多次強調，許多新調來的幹部，寫的報告不但文字不通，還有不少錯別字。但是就在這時，招待所還住了二三百所謂「文革」中站錯隊的幹部得不到安排，正在聯繫調給別的單位。政治部也在為這些人分配不出去發愁呢。一方面喊缺乏幹部，一方面大批熟悉業務的幹部又無法處理，這一矛盾現象說明外交部派性的嚴重。主流派就是不按胡耀邦、章蘊代表中組部和中紀委所表達的意見（「文革」中不存在哪派正確和哪派錯誤的問題）辦事。根據這一情況，我也考慮到外交部要堅決留下我，除了確實認為我還有點用處外，是不是還有留下來便於控制，出去有點不放心的成分。

由於個人一再談都沒有用，我就只好找人幫忙了。當時鄧力群任社科院副院長，我們以前在遼東省委一起工作過，又都是張聞天的老部下，所以我就求助於他。他也很認真，直接去找

黃華。不料碰了一鼻子灰。黃華說，別想來我們這挖牆腳。後來我又找當時國家機關黨委書記宋一平幫忙。他很同情，親自去外交部交涉，正好遇到部黨組開會，他一提出來立即遭到全體反對，又碰了釘子。鄧力群把這些情況轉告我以後，接着說，我給你出個餒主意，他們不放手，你就別再給他們去上班。我一想這個辦法倒不錯，隨後也就真地照辦了。這時正好遇到中央要給張聞天平反開追悼會，胡喬木、鄧力群提出要我參與起草悼詞、寫紀念文章、整理張聞天的遺稿等有關工作。我也就趁機完全脫離出版社，專門從事追悼會的籌備工作了。

在這期間，我仍不斷找外交部政治部，要求放我去社科院。但得到的回答總是好言相勸，堅決挽留。我看再沒辦法，只好攤牌。我請林中轉報部領導，我決心離開外交部，不可能有任何動搖了。我說外交部整了我二十年，把我一生中正是年富力強，能為黨為國多做點貢獻的大好時光給白白浪費掉了。二十年中有一大半時間是在接受大張旗鼓的批判鬥爭和勞動懲罰，已經搞得很臭了。現在只是暗箱作業，悄沒聲地丟了處分，恢復了二十多年前的行政待遇，當事人既不承擔責任，也不在原有的批鬥範圍內平反昭雪，使我的名譽得不到恢復，在群眾特別是積極分子面前仍然有點抬不起頭來，還是感到有點灰溜溜，不能心情舒暢地工作。因此，我正式向組織表明，如果一定要把我扣住不放，我不但不會再來上班（何況現在並未分配工作，也無班可上），而且也決不再進外交部的大門，即使通知開會，我也會請病假。但是外交部仍然不鬆口，我也就按鄧力群出的點子辦。這樣又僵持了三四個月，據說最後還是分工管幹部的

新來副部長張海峰向黨組提出，既然何某人堅決要求走，勉強留也不是個辦法。這樣說服了黨組，算是給我放開了一條活路。一九七九年八月張聞天追悼會後，我就辦理手續，從外交部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 （二）為張聞天平反

#### 先向劉英作檢討

我曾一再說，我這一生中犯過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特務，一個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這就一直成了我思想和精神上的兩大包袱。一九七八年春天，我從幹校回到北京探親，打聽到張聞天夫人劉英已回到北京住下，並且還和鄧力群談到我，說我在一九五九年外事會議上的發言，曾使她和聞天大吃一驚。這更加重了我的負罪感，所以我沒有敢貿然去看她，而是先寫了一封信試探。在信中，我做了一個簡單但真誠的檢討，並且問到能否去看她，以便當面向她謝罪。很快，劉英就回了信，歡迎我去看她，還說不要做什麼檢討。收到信後，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見面，我先作檢討，說對不起她和聞天同志，一九五九年外事會議上的揭發，既表明自己嚴重的個人崇拜思想，也包含有只顧個人過關的私心雜念，辜負了他們兩位十多年的教導。由於二十年不見，又感到羞愧和對張



聞天的懷念，我這個很少失聲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劉英卻不同意我做檢討，反倒認為他們連累了我，跟着他們吃了苦，還影響了前途。

從此我同劉英恢復了來往，而且經常見面。特別是我改行學習黨史以後，她不但完全支持，而且允許我帶着錄音機多次訪問。她也做到了無所不談，給了我極大幫助。因為從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以後，作為長征中接替鄧小平的中央隊秘書長（其實等於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秘書）和紅軍到陝北後的總書記夫人，她就成了從遵義會議到延安這段時間有關黨中央情況的一位唯一的直接見證人了。而且她的記憶力又特別好，活到九十七歲仍然頭腦清楚、談吐流暢，所以一些人稱她為中共黨史的活字典。我能在她最後的二十年中百餘次的接觸和暢談，實在感到幸運，值得我終生懷念和感激。

還應一提的是，從此我就以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參加了對張聞天的研究和宣傳，這方面又得到了劉英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給我以極大鼓舞。她本人從中紀委退下來後，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這一事業。所以後來成立的張聞天文集編輯組，就是一直在她的關懷和指導下進行工作的。編輯組不但可以隨時向她請教，而且還以她的名義為紀念張聞天向許多領導同志和社會著名人士約稿。張聞天的稿費她分文不取，完全用來補助張聞天的宣傳工作。對二十多年來研究和宣傳張聞天上取得的所有成就，劉英是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我也很感謝她對我的信任，指定我在張聞天問題上負責政治上的把關，甚至她自己的一些對外表態也要找我商量。我們在工作上合

作得很好，平時來往上也相處得十分愉快。

### 參加起草悼詞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在小組發言中提出為彭德懷平反的問題。雖然他沒提張聞天，但彭張是一個案子，理應一同處理。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已為彭德懷舉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會。本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劉英就向新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提出，希望將張聞天的骨灰從無錫移回北京安放在八寶山公墓，並得到胡耀邦的應允。但由於當時擔任中央副主席兼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阻撓，竟又拖了半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五月才將骨灰運回。那天胡耀邦參加了在八寶山舉行的骨灰安放儀式。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他的記憶力很強，竟能認出五十年前在延安總政工作過的李則望，還可叫出名字來，說「李則望，聽說你當了大使了。」這時中央已決定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原準備七月下旬舉行，但是當時在杭州休養的陳雲要求參加，希望等他回到北京後再開，並提出追悼會讓他主持或致悼詞都行。這樣就使追悼會推遲到八月二十五日，由陳雲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這就標誌着中央對張聞天的平反昭雪。在這期間，我還為劉英寫了一篇悼念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悼念活動和追悼會的準備工作，特別是參加了一點悼詞的起草工作。

那是一九七九年五月，曾彥修、徐達深和我接到通知，要為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在張聞天追

悼會上宣讀的悼詞。這件工作對我們三個人來說都感到棘手。我們不但很難掌握對張聞天的評價，而且連他的歷史都不了解。因為他這個人有個特點，就是從來不對我們這些人談他的過去，更不用說作過什麼貢獻了。例如我在他身邊工作了十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更不知道他主持了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和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寫悼詞簡直無從下手。我們除了拜訪劉英以及其他能見到的老同志外，還得經過批准去中組部查閱檔案，而中組部讓我們看的檔案又極其簡單，因為主要材料都還保存在大三線的山洞裏。所以我們起草的悼詞就顯得很一般，一些重要的評語和史實，如說張聞天「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起草了會議的決議，並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說「他是我黨歷史上在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等，都是送審後由胡喬木修改時加上去的，並得到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的審閱通過。加上去的這些話確實分量很重，是我們不知道也不敢寫的。但是胡喬木的修改稿又反映出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堅持個人崇拜精神和必然會引起的自相矛盾。這也是官方黨史對遵義會議的敘述漏洞百出和不少地方弄虛作假的根本原因。要知道，在遵義會議那個時期，總書記是黨內最高的職務，所以才要把博古拉下馬。如果真像《悼詞》上所說，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那為什麼不選毛當總書記呢？說張的報告和起草決議

「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不但缺乏事實根據，邏輯上也講不通。又比如說西安事變後，中國黨實現「從國內戰爭轉入抗日戰爭這一歷史性的偉大戰略轉變」，不是其他中央領導成員協助總書記，反而是總書記「協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完成的，這就把事情弄反了，連黨的組織原則都不顧了，怎麼能說得過去呢？我由於對這些事思想不通，所以先後寫過好幾篇文章提出來討論，後來都收進《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一書中，這裏就不多談了。

追悼會的舉行就意味着對張聞天正式平反。從此也開始了全國性的張聞天研究。

### 編輯張聞天文集

要研究和宣傳張聞天，向他學習，首先要做到挖掘和編輯出版張聞天的文稿。爲此，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曾彥修以他和社長陳茂儀的名義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向中央寫了個請示報告，還建議成立編輯領導小組，由鄧力群（組長）、馬洪（副組長）、何方、徐達深、曾彥修、譚吐、王慶淑組成（一年後劉英又提出增加孫尙清）。十一月八日胡耀邦批示：「可先行編輯，完成後發排時再找些同志看看最後定。」在這之前，胡喬木、鄧力群、朱穆之等相關領導也已批示同意。中央批准後，領導小組就開了個會，由鄧力群拍板，決定先出《張聞天選集》。但領導小組成員都是兼職，又多爲單位負責人，自然不能承擔具體編輯業務，找別的單





劉英到日本研究所商討張聞天研究工作小組開展工作的問題，  
一九八五年五月



北京南沙溝劉英同志家，《張聞天選集》領導小組成員及工作人員。前排左起：何方、馬洪、羅立韻（鄧力群夫人）、劉英、鄧力群、曾彥修，後排右起：鄭曉燕、施松寒、張培森、孫尚清、蕭揚、程中原、李定國，張青葉，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位，人家又不幹。最後商量，只好自己組建一個從事具體編輯的工作小組，可是人員（還得有相當水平）、經費、辦公室等問題又怎樣解決呢？這就頗費周折了。當時鄧力群倒是有求必應，劉英也是一塊硬牌子。而領導小組真正幹活的主要是曾彥修和我。雖然不太明確，但我們有個大體分工，就是他利用人民出版社的陣地，多管點編輯業務和提供辦公室和後勤服務，我主要搞點聯繫跑腿的事情，再加上劉英、鄧力群指定的所謂政治上把關。不管怎麼說，從這時起，我對張聞天的研究和宣傳還是投入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不過許多事都很瑣碎，無須去談，這裏只想介紹幾點值得一提的事。

### 成立編輯工作小組

由於我們要成立的工作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無單位，也沒編制，只能用借調方式找來一些志願者。一九八〇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劉英家遇到主動來建議編張聞天文稿的著名史學家胡華，並經他介紹借調到在人大和北大教黨史的張培森。這就為工作組的成立奠定了基礎。張培森也一幹就是二三十年，成為全國著名的張聞天研究專家。他來後許多事就直接由他抓了。例如南下江蘇借調後來分工執筆寫《張聞天傳》的程中原，就是派他去完成的。按理說，在外交部直屬單位編《世界知識》的當年張聞天的政治秘書蕭揚，借調來參加這個工作是最合適不過了，但外交部就是不放。先後用鄧力群和劉英的名義去交涉都碰了壁，直到請王震給黃華部長寫了親筆信，才借調出來。接着就成立了以蕭揚為首的工作小組，還吸收了在經濟

學院教黨史的施松寒和退休教員張青葉等，前後算來有十來個人。一九八五年《張聞天選集》編出後，蕭揚被外交部要回，就一直由張培森擔任組長，工作內容轉為編輯年譜、文集以及組織紀念活動等。頭四年多，利用曾彥修的關係，小組借用人民出版社的房子辦公，曾彥修離休後又轉移到日本所。一九八六年，隨着張培森結束借調，行政關係轉到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整個小組也就跟着搬了過去。別看這個小組長時間沒找到掛靠單位、除張培森外沒有固定人員，也沒有自己的辦公地點，但是在研究和宣傳張聞天上還是發揮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歷史性的作用。在中央為張聞天平反後，進一步使黨史上長期被埋沒和抹殺的一代總書記重見天日，而且影響愈來愈大，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功於這個小組的工作。

### 維護張聞天的歷史地位

編輯小組的整個工作，也可說都是爲了恢復和維護張聞天的歷史地位，但這裏談的是另外的問題，就是對於把張聞天的總書記擅自改成負總責的抗辯。

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張聞天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宣讀悼詞中才說過的「遵義會議上他被選爲黨中央總書記」，可是到了一九八三年就被陳雲和緊跟他的胡喬木、鄧力群硬給把總書記改成了負總責，也不知道經過什麼手續。原來一九八二年，陳雲認定他寫的一份手稿是關於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無論從內容、形式、旁證，還是當時情況看，都完全不像傳達提綱，對此已有不少文章證僞），但文獻研究室和黨史研究室（主任都是胡喬木）





北京，和（長征）電視劇洛甫（左二）、毛澤東（右四，唐國強飾）、彭德懷（左一）等演員談中共黨史，一九九九年

就以這個孤證和陳雲自己對幾個問題的回答，把我們小組起草的《張聞天生平簡介》中根據《悼詞》寫的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總書記改爲會後在常委分工中負總責。對此我們自然不服，就以小組名義於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寫了個請示報告，由我和蕭揚分送鄧力群和馬洪。馬洪七月十三日審批同意並請力群考慮「是否報中央審批」。可是鄧力群只是在改總書記爲負總責旁邊批「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辦」。總的批示是：「何方同志：請照此修改後送胡繩、李琦同志定稿。」這就是說，既不必送中央審批，也沒有考慮的餘地了。對這種做法，不但我們幾個人不服，連知根知底、更加權威的劉英也感到氣憤，因此於七月十九日率領我和蕭揚去找鄧力群談總書記問題。可老鄧仍然沒講什麼道理，只是介紹了陳雲最近回憶的內容，仍主張按陳雲的意見辦，還強調要尊重陳雲同志。本來就十分尊重陳雲的劉英也就沒話說了，大概又來了個一九五九年對她所作嚴重右傾結論的態度：「組織服從，思想不通。」從此，張聞天才恢復了的總書記地位又被用「負總責」的名義給壓了下去，而且立即通行全國，不得違反。一九八五年李銳在紀念張聞天的文章中用了個總書記，胡喬木就把張培森和施松寒找去，痛哭流涕大批了一陣，說什麼「中央文件上都說得很清楚嘛，沒有什麼總書記嘛！這不是混淆視聽嗎？」。其實以胡喬木爲代表的官方黨史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是心虛的。他們儘管硬着頭皮堅持使用負總責，也盡可能地禁止人們用總書記，但是講不出能說服人的道理來，也不敢開展爭鳴和辯論，還表現出邊守邊退的架勢。看來這個陣地是不容易守住了。因爲他們除了那個當事人中只有陳雲自

已承認且矛盾百出的所謂《傳達提綱》外，找不到任何人證物證和其他可靠根據。有些領導人提到這個問題的回憶錄或傳記多是後來組織人寫的。例如《楊尚昆回憶錄》就是楊死後三年由文獻研究室編寫出版的，和本人生前對這個問題發表的談話根本不同。

附帶再談一個與陳雲有關的問題。在我們編輯《張聞天選集》的同時，文獻研究室也在組織編輯《陳雲文選》，其中收了一篇《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即有名的「陳高洛電報」。據我們了解，這個電報是張聞天起草的，而且他書寫的原檔還在。同時張聞天當時是北滿分局的負責人之一，又有他的署名。因此當我們了解到《陳雲文選》收了這篇文章，當即向有關方面提了意見。但是不論陳雲本人還是文獻研究室仍然堅持收了進去，只是不得不加個注：「這是陳雲同志主持起草的，以他和高崗、張聞天的名義給中共中央東北局並轉中央的電報。」以為這種做法實在欠妥。如果照此辦理，各級黨委和各單位的一切文件都可算做第一把手的創作。毛澤東也不應反對把《遵義會議決議》收入毛選。因為照官方黨史的「定論」，遵義會議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舉行的，會議確立了毛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決議是根據毛的意見起草的，等等。根據這些一直作為定論的虛假前提，《遵義會議決議》收入《毛選》不是比「陳高洛電報」收入《陳雲文選》更加合理合法得多嗎？

有關這類問題和這方面的情況，就到此打住，不再多談了。總而言之，從一九七九年，我就投入研究和宣傳張聞天的工作中去了，直到現在。中央批准的領導小組，由於多數同志都



是高級負責人，所以我就做的具體事情多一些。爲此，張培森還請示鄧力群同意，封了我個「常務組員」，等我知道，已經印到《張聞天年譜》的扉頁上了。不管常務不常務，這個工作我還會繼續下去，直到喪失工作能力。

### （三）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

#### 小組簡介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把國內工作的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爲綱」改爲「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戰略轉變，標誌着在國內經濟建設中執行了三十年的極左路線被拋棄了。但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和推行的外交政策，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國內建設和外交戰略轉變的不同步，說明人們思想的發展變化還是有個過程。這也就是鄧小平說的，實行改革開放是摸着石頭過河。正是由於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仍然認爲蘇修是發動戰爭的禍首和對我國的主要威脅，因此就要着重研究蘇修，做到知己知彼。三中全會後，根據鄧小平的提議，決定成立一個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研究蘇聯是怎樣變修的，最終成果是寫出一本《社會帝國主義論》（書名未定）。這個小組的組長是胡喬木，副組長宦鄉，由社科院（如林利、陳德昭等）、外交部（如原蘇聯東歐司代司長李匯川）、中聯部（如蘇聯東歐研究所陸南泉等）、新華社（如



後來任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慎之）、《人民日報》（如後來任該報總編輯的譚文瑞）等單位抽調二三十個研究骨幹組成。經李先念批准，小組吃、住、辦公都在釣魚台國賓館十一號樓（「文革」時為江青所住，右邊十二號為毛澤東，左邊十號為康生）。因為「文革」後，釣魚台基本上處於關閉狀態，除個別單位借用幾棟樓外，絕大多數樓都閒置着。服務人員也沒有了，小組進駐十一樓時，還是剛從香山飯店借來了十多個服務員。由於這個小組成立時外交部還不放我走，所以開頭一陣我還沒能參加，情況也不大清楚。只聽說，組長胡喬木在小組成立時來和家見了一次面並講了話，此後再沒來過。平時主持工作的是宦鄉。但他也是個忙人，不可能常來，日常的工作安排和行政管理就委托李匯川代勞。但宦鄉又嫌匯川有點「無為而治」，使小組的工作和生活都顯得有點散漫（這是宦本人多次對我說的），所以他希望我早點來社科院報到，以便去釣魚台幫他跑跑腿。

### 加入小組

彭德懷和張聞天的高規格追悼會一開，就等於宣布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的徹底破產。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和由此起家的人起碼表面上不能再神氣了。外交部的主流派也不能完全認為是我欠他們的帳，多少也覺得有點對不起我的地方，這就導致了最後對我放行。當時姬鵬飛已改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常務副部長李一氓。作為忘年交，

一氓一上任就想把我拉到中央對外聯絡部去。一次他正式向我提出，中聯部要成立一個研究室，想讓我去當主任，說明是正局級，意思是還比二十年前的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提了半級。這件事他已徵得姬鵬飛的同意，姬也表示歡迎，而且對我的評價不低。我說，姬在文革中那樣整我，特別是堅持開除我的黨籍，我還沒有輕易忘懷的修養和肚量，再到他的領導下去工作，實在感到不便，我可以做任何工作，也不願再到他的麾下了。氓公說，姬在中聯部實際上並不怎麼管事，也不是經常都來上班，我去後不會和他發生工作關係。我說，但他終究是兼任的正部長，平時不見面，開會時總會碰到，那還是會有點尷尬。氓公了解我的個性，也諒解我的處境，所以沒再勉強。我也就「義無反顧」地離開外交部去社科院報到了。

社科院是新設單位，而主其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又雄心不小，想創辦一個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部門比較齊全的大研究機構，成爲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學府。而用作基礎的原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卻只有很少幾個研究所，且偏重於人文科學方面，社會科學方面我知道的只有一個經濟研究所，國際問題更是一片空白，只是在經濟所中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室。因此，要實現胡鄧設想的宏偉計劃就必須建立許多研究所，其他條件都比較好辦，關鍵是缺少幹部。這也是對我興趣大的原因。據鄧力群對我講，在還沒有交涉到外交部放我的情況下，他們已在談論我的工作安排了。于光遠希望我去計劃成立的馬列主義研究所當所長。黎澍則想讓我去代替他辦《歷史研究》，使他得以脫身。鄧力群說，他們考慮，官鄉費了好大勁才

把我要來，還是跟宦鄉去研究國際問題，籌辦最感迫切的蘇聯東歐研究所吧。國際問題寫作小組正好是研究蘇聯東歐問題的，所以跟宦鄉商量後就直接搬到了釣魚台。

這裏還可談個小插曲。由於我是中途擠進來的，所以來到十一號樓就面臨「殖民地」（住房）已經瓜分完畢」的局面。樓上有主副兩個大套間臥室，主臥室留給喬木，雖然他始終未看過一眼，但卻沒人敢佔用。副臥室歸宦鄉使用，他也很少來住，只是套間裏擺了許多報刊和內部資料。樓上樓下的兩側房間俱已住滿（除借住的錢俊瑞外，大多兩人一間）。唯獨剩下後面的一個小套間（像魯迅說的「老虎尾巴」）空着沒人住，因為是過去江青的用房。這個女人也真有點怪，放着樓上的主副臥室不用，偏要住到樓下最後面的這個小套間，而且還將所有的窗戶用木板釘死，房間裏面弄得黑乎乎一片，白天也得開燈。她爲什麼要這樣做，不得而知，反正我去後就住到了裏面。由於我們是借住，無權也沒想找人拆掉窗戶上的木板，所以房裏的裝修和陳設就一切仍舊了。

不過住了兩個月，總覺得那裏既憋悶，又有點和大家隔絕，於是產生了一個「僭越」的念頭，想借住到樓上那個留而不用的主臥套間去。我先摸了摸群眾的意見，大伙都贊成。然後去向宦鄉提出，說那間大屋喬木同志連看都沒看過，一直空着，還得每天打掃，是否先讓我借住進去看房子，喬木一說要來，我立即騰出。宦鄉屬於「平民領導」，聽後二話沒說，完全同意。於是我就搬進主臥，享受了一陣高級待遇。爲什麼說是「僭越」，因爲據我所知和所見，

中國這種專為某人新建和設置的別墅、住房，以至專機、專車和其他用具，成年空閒着還得經常維修的，就有的是。我就知道毛主席在全國各地有二三十個別墅他從來沒去過，別人也不敢隨便住，常年累月在那閒着，管理和服務人員還不能少（據說改革開放後多數已實行對外開放營業）。又如外交部在通州設置的名為培訓中心實為別墅的大院落內，其中二號院，平時就關閉閒置着，只有部長去才開門啓用。至於一個人用公款建築幾處住房又平時不用的情況就多了。

我到小組工作不久，李匯川就被外交部調回去擔任中蘇談判的代表團副團長了（團長是王幼平）。因此，原來的工作接交顧慮（我憑什麼取代他來協助宦鄉），也就自行打消了。而且根據我去後對工作和人員情況的了解，我也只能「蕭規曹隨」，繼續執行「無為而治」的方針。因為我首先感到這個工作是在鑽死胡同，搞不出什麼名堂來。如果說蘇聯變修了，我們也許比它更修；如果說蘇聯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我們的特權肯定比它更多。其實，根據我在蘇聯的觀察和在中國的感受，這些問題是不用怎麼「研究」，就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的。其次，小組成員多是有關單位的尖子和精英，哪容得我去指手畫腳。所以我的工作只是看看大家的研究成果、印出的簡報、文章和資料。我自己既沒有分擔什麼專題，也沒寫出一篇文章。而且很快就轉移工作重點，協助宦鄉籌備出國學術交流了。



### 參加對外學術交流

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我們國家一直執行的是閉關鎖國政策，當然談不上對外學術交流。上世紀五十年代張聞天曾經考慮到這個問題，並且試驗了一下。但那只是和蘇聯的交流，而且還沒來得及開展，他自己就先被打倒了。此後，對外的門關得愈來愈緊。「文革」結束後，逐漸增加了一些出國訪問團，但是多限於參觀和考察。對外學術交流的開展，起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宦鄉在這方面起了開山的作用。真正稱得上是學術交流，首先是同美國和日本進行的。雖然第一個敲開美國大門的學者代表團，大概應該算以宦鄉為團長、團員有錢鍾書等著名學者的那次。他們的水平高、影響大，但主要是參觀訪問，還算不上真正的學術交流。

可以完全稱得上學術交流，而且是中美之間第一次的，我看就是我們參加的這次中美學術討論會。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討論會開了一個星期，加上會後到各地參觀訪問共一個月）。中方以社科院代表團為名，團長宦鄉，團員除我以外還有劉克明、李慎之、程明群、徐葵、薛謀洪等共十人。美方由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變化研究所所長比亞勒牽頭，參加的都是著名學者如斯卡拉皮諾、奧克森伯格、鮑大可、索南費爾特、扎戈利亞等，以及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院官員共三十九人。討論的主題是蘇聯問題。會前交換了學者論文，會上發言也作了錄音整理。由於這是第一次對外學術交流，所以社科院領導和宦鄉非常重視。出國前進行

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準備，先後開了十多次會，每篇論文都經過討論，還聽取了有關單位的情況介紹。回國後由我和徐葵整理編輯了一本《蘇聯問題討論》，由社科出版社於一九八〇年六月出版，在內部發行。

一年後又去美國參加了一次學術交流。這次是社科院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聯合舉辦的亞太形勢與中美關係學術討論會。時間是一九八一年一月，連討論帶參觀訪問也是整整一個月。事前的脫產準備也是近兩個月。這次的團長仍是宦鄉，但他開完會就離團回國，團裏的事由我代理。代表團成員除我和李慎之外，還有裴默農、蔣元椿、張靜怡等十多人。美方除布魯金斯學會主席麥克勞伊和少數幾個新人外，其餘多是參加上次會的老熟人。

把這兩次會連在一起談，是爲了便於說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在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上的主流思想和正在從閉關鎖國中走出來的一些情況。

當時的對外學術交流強調同中央完全保持一致的原則，出國前的脫產準備和培訓，主要內容就是在可能遇到的一切問題上統一口徑，免得對外說錯話。當時中央領導特別是鄧小平對國際形勢總的估計，仍然是兩霸相爭必有一戰，世界大戰只能推遲，不可避免，而戰爭的主要威脅是蘇修的擴張，力量對比也是蘇攻美守。因此我們主張加強以聯美反蘇爲中心的「一條線」戰略，反對對蘇聯的綏靖主義。例如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韓叙給我們第二次赴美代表團介紹情況時就說，上個月的威廉斯堡會上普遍責備美國領導不力，日本武裝不夠。而在這之



一九七九年在哈佛



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在同日本客人談話時，也曾提出日本軍費開支應達到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日本政府規定不得超過百分之一）。第一次代表團分給我的論文題目就是《論蘇聯的南下政策》，說蘇聯繼承帝俄的南下政策，決心要在印度洋取得一個出海口，在印度支那擁有一個海軍基地，所以必然要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其實，我們對國際形勢的估計本來就有些「左」，這時又沒有跟上國際形勢和力量對比的變化，所以我們的觀點和政策就不容易得到國際輿論的理解。例如蘇聯入侵阿富汗深陷泥潭後，在同美國爭奪中已現出強弩之末的態勢，早已變攻為守，一九八〇年代初就提出緩和和政策，而國際形勢也確實呈現出走向緩和的趨勢。但我們不承認這一趨勢，仍強調蘇攻美守，提倡「一條線」應加強抗蘇軍備，反對採取緩和措施（即所謂綏靖）；要求「一大片」（指第三世界）應嚴防蘇聯勢力入侵和不可執行親蘇政策。這就使我們的看法和方針脫離實際，顯得有點孤立。例如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對我國本來一直有兩大疑慮，即華僑政策和同當地共產黨的關係。這時又增加了一個支持和幫助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問題，不但遇到幾乎全世界的反對，而且柬埔寨內部其他反越派別如西哈努克、賓努、宋雙等也極為不滿。這個問題還成了我們外交上長期背在肩上的一個包袱。因為事實證明，波爾布特是個殺人魔王，紅色高棉統治時期柬埔寨人被消滅了五分之一左右，而支持他的大概只有我們中國。

對外學術交流的一個最大好處就是使我們有機會直接體會一下世界輿論和國際氣候，檢查



和印證我們自己的看法。例如索南費爾特就一再表白他主張緩和美蘇關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主張，並不是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為放任蘇聯擴張、力主綏靖的「索南費爾特主義」。事後看來，對索氏的批評顯然不妥。正是由於參加了幾次對外學術交流，才促使我改變觀點，能夠跟着宦鄉、李一氓分別提出改變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和調整對外政策的建議。他們的建議，最後也得到了中央的採納。

對於出國和搞點外事活動，我倒並不生疏，當年也曾跑過不少國家，見過一些世面。但是「文革」後可就有點不同了。從自己方面說，作為不久前的專政對象竟有機會出國，是根本沒有想到的，而且看成偶然機會，所以只作臨時打算。按當時的規定，每次出國只發一套西裝的製裝費，回來後願意自己留用，可以五十塊錢買下，否則將衣服交公。而我的處理辦法，竟然是回國後脫掉衣服交公。倒不是捨不得那五十塊錢，主要是整怕了，不敢想還有機會出國。像上面說的，結果過了不到一年再次去美國參加學術交流，我也就又一次領取製裝費作了一套西裝外加一件夾大衣。說來實在好笑，這回仍然不作長期打算，回國後又交公了。沒想到過了不到半年又要去日本進行交流，自然又得製裝。而且那時所去的國家都處於中國熱的階段，每次都是對方招待一個月，東西南北跑一大圈。這頭三次，我都是一套西裝貫徹始終。現在想來仍然感到有點寒碇。

對國際問題研究界來說，此後的對外學術交流已變成了家常便飯。想不起來還有什麼特別

好談的。

### 參與上書中央

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向上反映情況、提供看法和建議，本來就是經常的業務，我自己也可以說幹了半輩子，所以沒有什麼稀奇的。但是一九八〇年前後參與李一氓和宦鄉的上書，卻有特別的意義，很值得說一說。

先談宦鄉的建議。通過學術交流和自己研究，促使宦鄉對我們現行的外交政策產生疑問，認為已經到了必須進行較大調整的時候了。經過多次醞釀，宦鄉提出以他個人的名義寫一個關於調整外交政策的建議，上書中央。這是一九八〇年春夏間的事。商定後，就請原總參二部的張靜怡執筆，他也很快寫出來了。宦鄉和我們幾個人一看，覺得不太成熟，於是命我加以改寫，最後寫成一篇《關於建議同美國拉開距離和調整對蘇關係的報告》。這個標題是我就記憶所及，沒有底稿可查。只記得我原寫的是「改善」對蘇關係。宦鄉覺得用這個詞彎子轉的太大，人們反而接受不了，最後改用一個中性說法「調整」，反正內容是一樣的。我們的意見是，國際形勢在趨向緩和，蘇聯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蘇美對峙仍舊，都有點想借用我，希望改善對華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適當拉開一點同美國的距離，改變一下對蘇聯的僵硬態度，使雙方競相有求於我，我國力量雖小，但卻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

作用，使國際上的戰略大三角關係向更加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這篇報告經宦鄉修改後就直接上報了中央，據說得到了中央的重視。後來宦鄉又組織寫了一篇大力開展對外經濟關係的報告（大家討論後由戴倫彰執筆），胡耀邦和趙紫陽看後還分別作過大段批語。胡耀邦說，這是理論聯繫實際調研的典範。趙紫陽批給外貿部及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研究討論。

與此同時，也就是一九八〇年前後，李一氓在中聯部組織專門班子研究有關當時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中六個重大問題，寫成《討論稿》報送中央。由於他同我的關係和了解我在這方面多少懂得一點，所以也拉我參加，當然不是參加那個專門班子，因為我不是中聯部的人，而是單獨找我同他議論和改稿。在這些《討論稿》中，有幾個影響到我們國家戰略決策的重大問題，可以挑出來簡單談一下。

一個是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工作的重點已轉移到經濟建設，但對國際形勢的估量卻還是老看法。鄧小平對外談話就常說，戰爭只能推遲不可避免，我們希望推遲二十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就可以使我們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上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李一氓主持寫的報告則提出，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戰爭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打不起來。據李一氓轉告，政治局專門討論了中聯部上報的《討論稿》，並請他列席。在談到和戰問題時，大家還一時轉不過彎來。鄧小平就說，你這個李一氓呵，帝國主義還存在，戰爭怎麼能避免？但是這個問題終究引起了領導上的重視和思考。到一九八二

年，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一九八五年鄧小平更進一步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並且公開承認，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有「兩個重要的轉變」。其中第一個就是「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逼近的看法」。

李一氓提出的另一個《討論稿》，是不同意所謂「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認為立論沒根據，不成其為「理論」。而且要害是聯美反蘇，不但導致在國際共運中完全孤立，而且脫離了多數發展中國家，因此建議不要再提這個「理論」。後來他向我轉達，中央當時就接受了這個意見，決定此後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正式講話，不再提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但不正式向下傳達，學術界仍可爭鳴。這一建議也非常重要，為後來改變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和以蘇劃線的作法，進行了思想準備。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胡喬木在準備十二大期間對李慎之說，他主持撰寫、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那篇題為《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的文章，是胡說八道的原因。這是李慎之當時就給我和宦鄉、李匯川、譚文瑞等人談過的，後來他還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了。

李一氓主持撰寫的《討論稿》中，還有一份是分析當時國際共運形勢並建議恢復同各國共產黨關係的，認為幾乎把全世界共產黨打成「修正主義」，不但是以蘇劃線的結果，也是「唯我獨革」的「左」傾表現，傷害了別人，也孤立了自己。記得提到的另外兩個問題，一個是恢



復同南共的關係，另一個是改變對第二國際和各國工黨、社會黨的看法，並考慮也和它們建立黨際關係。至於還有什麼別的建議，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

宦鄉和李一氓的上述建議，對於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在觀察國際形勢和調整對外政策上進行撥亂反正起了重大作用。他們的遠見卓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寫作小組的解體

國際問題寫作小組成立以來，確實還是作了大量的工作的，出了好多期簡報和不少資料，上報中央和分送有關單位，對推動當時最重視的蘇聯問題研究和修正對蘇聯的看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整個說來，小組的工作是無果而終，沒有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務，沒有寫出一本蘇聯是怎樣變修的書來。爲什麼會是這樣呢？因爲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小組多數同志實際上已改變了對蘇聯的看法，對蘇聯變修、成爲社會帝國主義，多持否定態度。這樣的思想狀態，怎麼可能寫出上面要求的那種書來呢？

小組的許多同志，我也在內，對蘇聯的看法原來就同中央不盡相同，只是不敢說就是了（對外還要保持高度一致）。現在又經過專門研究，觀點就更明確，理由也更充足了。就以我的思想來說吧。首先我覺得，過去毛澤東等領導人對蘇聯東歐並不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也硬要以毛澤東的個人感情代政策。不然的話，爲什麼相連一起、社會情況和政策完全一樣的羅馬尼

亞和保加利亞，後者就變修了，前者卻沒變修。更荒唐的是羅馬尼亞不但沒有變修，還屬於第三世界，變修的保加利亞則被歸於第二世界。由此也可看出所謂「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確如胡喬木所說，真是「胡說八道」。這只能是在國際共運中完全以我劃線；凡對我們好，同意和支持我們的觀點，就是朋友，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否則就變修了，就成了我們的敵人。蘇聯就是這樣變修的，而且變得非常快，三五年就變過去了。這可能嗎？這算什麼理論？所以「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最後不能不修正原來的看法，又承認蘇聯沒變修，相互間也恢復同志的稱謂了。

其次，我們以前說蘇聯變修，一個主要根據就是認定它出現了一個剝削和欺壓廣大群眾的特權階層，而使用的材料卻都是來自蘇聯的公開報刊。先不說這種引證是不是斷章取義和以偏概全，問題還在於這些都是人家自己揭露出來的。實際上中國不但有同樣的特權階層，而且比蘇聯嚴重（毛澤東在外地的別墅就比斯大林多得多，生活也奢侈得多），報刊上更不准揭露和炒作（也就是議論）。怎麼能說完全照搬蘇聯模式（所謂「一邊倒」）的中國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放到蘇聯自己身上反而是變修了？這不是明顯的雙重標準嗎？這就是爲什麼在中蘇十年論戰中，國際共運中很少有人相信我們這套反修理論，資本主義世界更是看熱鬧了。

再說，蘇聯脫離群眾、欺壓人民的高度集權體制和得不到制約監督的特權，都是斯大林時

代就已經產生的，成爲斯大林模式的一個特點，而我們又是要堅決維護斯大林這把「刀子」的。如果再深入揭露蘇聯的特權，就勢必要批判到斯大林頭上，使反修變成了反斯大林，結果陷入自相矛盾的泥坑中不能自拔。

參加那一陣寫作小組的工作，還使我更直接地體會到，我們的許多論斷不是出於調查研究的結果，而是先有論斷，然後再去找材料編理由來加以證明。我們經常說的結論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後、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惟意志論、「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等等，不但大多限於口頭，實踐起來還往往相反。許多問題都是偉大領袖先提出一個結論，下面（特別是秀才們和寫作班子）就趕快查書查報找論據寫文章，以證明這個結論的正確。所謂蘇聯變修問題，可算得是個典型。我們當時在學習反修的《九評》時，就深有所感。偉大領袖以感情代政策，發誓要把揭批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赫魯曉夫打倒，這就必然牽連到赫氏統治下的蘇聯以及同蘇聯站在一起的黨和國家，說它們統通都變修了。緊跟偉大領袖的筆杆子們也就照例不去做切實的調查研究，而是輿論一律地寫起了反修文章。所以我們這個專爲研究蘇聯而設的寫作小組並沒有得到重視，開始成立似乎帶有一時心血來潮的味道，過後就又不管了，使小組實際上一直處於無領導狀態。常寫反修文章的胡喬木組長也竟然基本上不管，表現出對調查研究興趣不大，好像寫文章只要領會上面的意圖就行了。我從調來起，就感到小組處於可有可無的狀態中。有些人也都經常回去忙本單位的工作去了。小組存在的前景已很不妙，這是大家當時都預

感到的。

大約過了半年又發生一件事，就是經中央辦公廳和外交部批准，釣魚台國賓館要從一九八〇年某月（記不清了）起開始對外開放營業，變成一個獨立核算單位。這樣一來，寫作小組佔用的十一號樓，就要按規定每天交房錢四千元，還得從批准開放的那天起計算。我和宦鄉商量，以前固然可以賴帳，以後恐怕很難再住了，必須另想出路。但這個寫作小組，中央領導雖沒過問但也沒說取消，我們當然無權自行宣布解散。因此，宦鄉只能去找組長胡喬木，向他報告。第一，小平同志指示寫的那本書，由於難度太大，恐怕無法完成任務。因為一則我們的建設是搬運蘇聯的模式，蘇聯存在的問題我們也都有。如果揭發批判蘇聯，很容易使人聯繫到中國自己，效果反而不好。二是批判蘇聯現在的問題勢必會追溯到斯大林，這又與我們維護斯大林的方針不符。看來這個問題只得請喬木同志便中向小平、先念等同志反映一下。第二，現在借用的釣魚台十一號樓，人家也不讓白住了。小組的工作既然已經暫停，從各單位借調來的人員是否先各自回原單位，將來萬一需要時再集中也來得及。第三，小組既然還不能明確宣布取消，那就留社科院自己的幾個人像何方、李慎之，保留着小組的架子，也還可以幹點別的工作。至於他們的辦公地點，可否請中央文獻研究室（喬木兼任該室主任）撥兩間空房子借用着。當然宦鄉和喬木是怎樣具體談的，我無從得知，只是後來聽宦鄉轉達，基本上也就這樣定下來了。



當時擔任國賓館管委會主任的是原外交部總務司副司長翟蔭堂，我們比較熟悉。他要來討房租，我們就開玩笑說，你是《打漁殺家》上來討魚稅銀子的，要錢沒有，要腦袋倒有一個，我們住釣魚台是李先念批的，要錢請去找李先念。就這樣連賴帶磨又住了兩個月，最後商定了個搬走時間，大約是一九八一年四月前後，以前的房租也就免了。這個結果向大家宣布後，各人就分頭收拾行李，來了個捲簾大散，連借調的服務員也送回了香山飯店。只剩下我和李慎之搬往前毛家灣的林家（林彪）大院安身，結果一住又是將近兩年。

#### （四）籌建國際片

文獻研究室借給我們的辦公用房是和林家大院連在一起的西頭一個小院，據說是高崗初來北京時住過的。房間屬於中國老式的「一明兩暗」，中間一個大會客室用作辦公，左右各有一個帶洗澡間的臥室，前面還有兩小間耳房。院子裏有一棵大梧桐樹，還真有點「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的味道，顯得十分幽靜。宦鄉看後說他不會常來，由我和李慎之分住。吃飯可以在文獻室食堂入伙，只是水平比釣魚台差多了。由於我們是胡喬木介紹來的客人，又同室領導李琦等是熟人，所以文獻研究室在看文件和生活方面都非常照顧。我們雖然離開了釣魚台的優越待遇，在這裏卻又過起了世外桃源式的「神仙」般生活。每天早上去附近的北海公園散散步，白天願幹什麼幹什麼，晚上時不時地約李慎之夫人張貽到護國寺的人民劇院看看京

戲，只是李慎之沒興趣，從來不去。我和李慎之都感到，這是我們今生今世以前沒有、今後也不會再有的一段清閒瀟灑經歷。

宦鄉來社科院後就抱着很大的雄心壯志，要建立一批國際問題和國別研究所，並得到胡喬木和鄧力群的支持。要我來就是讓我籌辦蘇聯東歐研究所，因為我會點俄文，又在莫斯科工作過。要李慎之來，是讓他籌建美國研究所。

正在這時，也就是在我們進駐毛家灣不久，竟得知中聯部部長姬鵬飛想要把該部文革前建立的三個研究所蘇聯東歐所、拉丁美洲所、西亞非洲所，「連人帶馬」成建制地移交給社科院，包括現有科研和行政人員三百五十人，經中央批准的編制名額五百人，以及科研設施、圖書資料等。這正合乎宦鄉的心願，在徵得胡喬木、鄧力群的同意後，就委托我代表社科院和中聯部談判交接事宜。（中聯部以辦公廳主任張學同為代表。）爲了摸底，我先找中聯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了解情況。他說，這主要是因爲姬鵬飛對研究工作沒興趣，而且嫌管起來麻煩，所以中聯部除堅持保留三個所的房屋地皮所有權外，其餘一切都不要了。我問爲什麼一定要保留地皮的產權呢。他說中聯部想在那裏蓋幹部宿舍。除地皮問題，其他問題都比較好解決，所以談判進展順利。從一九八〇年九月談起，到十二月雙方就已簽訂了移交合同，由社科院副院長宦鄉和中聯部副部長劉新權簽字。中聯部寫給中央的報告，書記處也已批准同意。我的談判任務就算結束了。

談判拖了兩三個月的主要原因是房屋地皮的產權問題。其實那是一筆糊塗帳，連中聯部也沒什麼根據。這三個所的駐地是張自忠路（原鐵獅子胡同）三號東院，房產原屬人民大學，後歸馬列研究院，李富春又批給中聯部，卻至今未辦手續，所以產權還沒定。但在談判過程中，中聯部堅持必須寫明：社科院在建國門內的大樓建成後，三個所應立即搬進大樓，將原佔用房退還中聯部。對這點，宦鄉的腦子就是轉不過來。因為他原來設想要把那裏搞成個國際片，在中聯部搬出四十間借用辦公室作宿舍的用房後，還可再安插兩個研究所進去。所以他不願在協議中寫上那項社科院大樓蓋好後立即交還三個所用房的條文。我就勸他說，咱們就不會來一個劉備借荊州嗎？到時不搬，他還能把人趕到街上去？而且鐵獅子胡同三號是著名的段祺瑞執政府所在地，還曾是清朝重要的官署和抗戰時期侵華日軍岡村寧次的華北駐屯軍司令部，那裏的房舍院落都是規定保護的古蹟，怎麼會讓中聯部拆掉蓋宿舍？宦鄉這才放心地簽了字。事實上，至今二十多年，中聯部也從未提起，社科院又在那裏成立了日本、美國、亞太三個研究所。宦鄉設國際片的計劃很快就實現了。

所謂國際片，其實就是宦鄉分工主管的八個國際和國別研究所的聯絡站。這八個所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蘇聯東歐（現改爲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歐（現爲歐洲）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亞太研究所。片設有會議室和機要室，申請和交涉到有關單位送來內部文件和資料，按密別等級供各所領導和主要研究人

員閱覽。原規定每兩周開一次所長參加的片會，由宦鄉向大家吹風（傳達中央精神和通報有關情況、內部消息）、就國際問題務虛，確定重要科研項目和相互協助問題。由於宦鄉不常來，所以決定由我協助他主持日常工作。開始一陣，開會、看文件等還比較正常，但後來就逐漸鬆弛了。等宦鄉一九八五年離開後，這片會就再沒開過。一九八八年我不再擔任日本研究所所長，國際片也就不再存在了。





第十三章

日本研究所

一九八〇——一九八八年

## （一）受命籌建

### 偶然上馬

我這一生遇到不少出乎意料的事，這籌辦和主持日本所也算是其中小小的一樁。我既沒有研究過日本，又不懂日本話，竟當了八年多的日本研究所所長，還被一些人叫成日本問題專家，也被日本人列為所謂知日派，現在想來連自己都覺得有點可笑。事實上這也確實出於偶然。

社科院原來要我籌建蘇聯東歐研究所，由於從中聯部成建制地接收了這樣一個完整的所，原來的設想自然也就告吹了。但是宦鄉仍然要把我留在他主管的國際片。因為我們比較熟悉，他還不止一次地同我談過，希望我能做他的助手，不只是遇事張羅、跑跑腿、起草點文稿，特別是在理論上為他把關，他說自己馬列讀得不多。我也覺得對他有知遇的感情，也還合得來，就決定跟着他跑腿吧。但具體幹什麼，卻沒有商談過。不料一九八〇年一月去美國同布魯金斯學會進行學術交流，他在介紹中國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情況時，竟然冒出還要成立兩個國別研究所，並當場介紹我是日本研究所的所長，美國研究所的所長為李慎之。這不但當時使我頗感吃驚，後來得知社科院領導事先也沒有研究過。鄧力群有一次就向我談到，宦鄉的這種做法不

大合乎組織原則，對於成立美國所和日本所，以及他提出的人選，後來黨組討論時也都完全同意，只是應該在黨組批准並向中組部備案後再向外宣布才好。同年我們以中國社科院代表團名義訪問日本時，宦鄉又多次向日方介紹我是日本研究所所長。當時日本也處於「中國熱」時期，所以接待我們的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學會會長有澤廣巳（日學士院院長、學界領袖，一九八五年和英國李約瑟一同被中國社科院聘為名譽博士）聽後非常高興，表示今後要給予大力支持，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除捐贈圖書資料和某些科研設備外，還有一項就是由該會邀請我今後每年率日本所代表團訪問日本一次。後來，國內《人民日報》等報紙還刊登了新華社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新聞，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近成立了日本研究所，所長為日本問題專家何方。而這一稱呼當時就使外交部一些熟人笑掉大牙。我當然更不敢當，但也只好鴨子上架，硬着頭皮籌辦起了日本研究所來。因為當時還沒有其他更合適的崗位，社科院黨組和宦鄉本人也不會讓我成爲一個不擔任點兒行政職務只做國際問題研究的人員。另一方面，我只是答應籌建，心想班子搭得差不多了就可以交差。而在這個籌建過程中，既可以找到日本所長的適當人選，也可以給自己找一個合適的工作崗位。誰知結果竟然兩頭落空，一直幹了八年多，最後還是在領導上一再挽留的情況下堅決離開的。



## 與美國所共進退

日本所和美國所是同時開始籌辦的，好像一對孿生弟兄。我又和籌建美國所的李慎之特熟，他也非常信任我，說他缺乏行政工作經驗，兩個所統一按我的意見辦，約定「同患難，共進退」。我也就毫不客氣地一起抓了，有日本所的東西，就一定有美國所的。例如兩個所都是白手起家，既沒人也沒辦公室，我和李慎之還借住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所裏不少新人都是來這裏報到的。兩個所只有公家給配備的兩部汽車，我們倆又不用，整天就停在院子裏，司機也可以不上班。那時的當務之急是解決辦公地點問題，院部既然擠不出幾間房子來，就讓我們先租房。先是臨時租了花園村老虎廟的全總幹校（後來的國際工運學院、今勞動關係學院）醫務室的二樓。辦公室秘書、會計、打字員等行政人員陸續找來，研究人員也通過各種關係在逐漸擴充。還成立了臨時黨支部。研究所架子很快就搭起來了，先後設立了政治、經濟、外交、綜合等四個研究組和行政辦公室、圖書室，指定了組長和臨時負責人。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兩所聯合開會，我受院領導委托並代表兩所領導在成立大會上講話。主要內容是：第一，宣布美國所和日本所正式成立，但爲了好記，決定以五月一日爲成立紀念日。短期內兩個所在財務後勤工作上實行全面合作，統一調配。除此以外，一律各自爲政，獨立行事，互不干擾，爭取盡快走上正規，不能老打亂仗。第二，具體講了組織制度和紀

律。第三，關於方向和任務，要在貫徹院裏的總體規劃下，着重抓三個問題：一是出產品和出人才。這是科研機關的共同任務，問題就在於質量和水平。二是把為當前政策服務和長遠學科建設結合起來，既要注意動向、跟蹤時局，起到一定的參謀和助手作用；又要具有長遠和全局眼光，重視研究的理論性和系統性，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美國和日本學科；三是照顧國際和國別問題研究的特點，如政策性強，變動性大，涉及面廣，服務直接，內外有別等。第四，關於思想、學習和作風，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和執行國家對外政策，強調了刻苦學習的重要和建立好的學風，如獨立思考、甘於寂寞等。

後全總幹校醫務室要拆除，我們只好另尋辦公地。當時賓館、飯店雖然不多，但客人更少，很多房子都在空着。於是我們就在西苑飯店八號樓各找了五間客房作臨時辦公室。住賓館，生活很好，但終究貴了點，所以兩個月後又租住到太平路裝甲兵招待所。日本所和美國所各居一層，條件大大改善。日本所正式成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三個研究室，任命了室主任。在此期間，還接受了大批日本方面的贈書，以至「書多」為患，沒處放。住了一陣，大家嫌那裏太遠，上班、開會都不方便，而且住旅館、招待所總不是長久之計，所以由院部交涉，勸說中聯部來的三個所各撥出一批空房，日本所和美國所就又落腳到了張自忠路三號東院。

## 組建科研隊伍

籌建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招兵買馬——建立科研隊伍。這方面美國所相對容易一些，日本所則比較困難。因為據我所知，當時全國還沒有一個美國研究所，而正式掛牌的日本研究所已有六個。懂英文和對美國有所了解的人在北京也比較容易找，而研究日本問題的人卻多在外地。例如那六個日本所就分別設在長春、瀋陽、天津、保定，北京一個也沒有。從外地調人的最大障礙，還是一九五八年我們自己設置的戶口制這種世界上少有的限制遷徙自由的措施。因此我們的隊伍建設只能就地取材，在北京機關和學校物色研究人員。而且往往是；條件好些我們要的，人家堅決不放；人家放的，我們又覺得不合適。這樣找來找去，第一個找來的是中聯部一位文革前北大學日語的畢業生劉映春，但她來上班三四個月還沒有找到第二個人，可見找人之難。後來經過將近兩年的努力，才找來了四個畢業於偽滿建國大學的老幹部和二十多名學日文或世界經濟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日本所的科研隊伍才算初步建立起來，科研機構的架子也算搭起來了。

建設科研隊伍，光是有人還不行，更重要的還是使找來的人變成科研人才，而這個任務更艱巨。我們找來的人，不但沒有幾個研究過日本問題，而且基本上都沒有做過研究工作，只有三兩個人在研究機關待過一個短時期。因此我們當時決定，在所成立後的幾年內主要是組織學

習、進行人員培訓，不急於辦刊物、出成果。學習沒有老師，完全靠自己，至多是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我雖然從事過國際問題研究，但對日本問題卻是門外漢，只能跟大家一起學習。在開頭一個時期，給我規定的任務是，定期（一到兩周一次）給日本所和美國所的全體人員作一次國際問題報告，除了幫助大家開始熟悉業務外，也爲了強調國別研究必須和整個國際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此外也還給大家講一些資料積累和研究方法等問題。美國所創辦時的老人董樂山、張靜怡等，多年後還常和我笑談當時的情景。

### 注重學風建設

對日本所，我當時着重抓學風建設，希圖建立一種好的風氣和傳統。我們相約，在做學問和做人上，應當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古今中外的學向家，大多是道德高尚、品學兼優的人。同時，要做學問，就必須刻苦學習，不僅要專，而且要博，抓緊一切時間充實自己、積累知識。作研究工作還得不計名利、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無論是做人、還是學習和工作，特別是科研工作，我以爲都應該以馬克思爲榜樣，因此規定《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爲日本所新來人員的必讀書。我們還提倡發揚獨立思考和創新精神，提出沒有新意的文章不寫，沒有獨立見解的言論不發表，堅決反對那種缺乏個人研究只是東拼西湊趕時髦的所謂科研成果。我們也特別強調反對各種形式的剽竊。例如有的人從外國報刊上看到一篇什麼文章，加以改頭換面，就以自



己的名義發表出來。還有些人利用權勢和名位搞變相剽竊的，就是那種下級寫文章或編書，領導不論看不看，都要署名。一些人在社科院當了幾年官，不但「自然」變成專家，還列名於許多編著，特別是「主編」了大量類書或叢書。鑒於長時期存在的，帶頭刮學術界不正之風的正是大小單位領導人和所謂學科帶頭人，日本所一開始就規定，所和室的負責人，在科研上有幫助大家的責任，對於看過甚至修改過的稿子也不得享有署名權和分取稿費。

根據個人的一貫秉性，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一定做到。我這個人各方面的毛病確實不少，缺點很多，但有兩個特點可說是保持了一輩子。一個是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在研究工作上還算勤奮和嚴謹；一個是在地位高低和物質待遇上從不伸手。這也是爲什麼過去對我進行過多次和長時間的批判，但從來都沒有提到工作態度、生活作風和群眾關係方面有什麼問題。這多次籌辦日本所，也是一開始就給自己約法三章。例如院裏規定，研究員每年寫出的科研成果不得少於五萬字，我總要超額完成。審閱和修改其他同志的稿子，絕對不署自己的名字和分取稿酬或編輯費。在生活上和大家一起，不搞特殊化，連規定上下班用車接送的待遇我也自動放棄，寧可步行一個鐘頭去上班。對外活動中接受的禮品一律交公。自己不攀領導、不走後門，但別人也甯想走我的後門。所裏有同志提着禮品來看我，我寧可不留情面也要他將禮品帶回。爲了實踐「公事公辦」，我在所裏規定，凡有事找我談話，一律在上班時間到辦公室談，來我家裏恕不接待。我的諸如此類一套，確實上下都得罪了一些人，也被有些人視爲怪。不過我是

不管這些的，依然我行我素。心想，已經年屆花甲，能夠恢復工作，按照自己的良知再做幾年工作，就已經不錯了，比已經犧牲的同伴要強得多，還有何求呢？

### 精簡行政事務

日本所的工作也是挺麻煩的，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身兼所長和黨組書記，科研業務和行政工作一把抓。頭三四年沒有副所長，辦公室主任還是一年多後才從吉林社科院借調來的。但我嚴格按規矩辦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發揮各人所長，所以工作並不顯得忙亂，我還可以集中大部分時間搞研究工作。別看不讓下面同志到家裏來談工作這個小小的規定，卻可使我解脫不少麻煩，可以利用晚上和假日讀書看報。否則這個要求分房子、那個要求評職稱，就會弄得你不得安寧，陷於被動。行政事務性的工作，我就放手讓幾個年輕同志如做秘書的林昶、管人事的史華等去幹，自己頂多作點監督檢查。例如一次和本田財團聯合舉辦（他們出錢，我們辦事）經費數千萬日元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只在幾個青年幹部中作了詳細安排和分工，就具體由他們去辦，結果搞得還真不錯，連八十多歲的本田本人都很感滿意（我們給他們夫婦和隨行人員在釣魚台國賓館租了一棟樓，還包了一架專機送去杭州參觀，全程陪同的只是機要通訊員趙亞新）。後來所裏主辦的一些國內學術討論會，一般籌備工作，經所務會議討論後，交由這些青年同志去辦，也就可以了。新建的日本所，一切都是從無到有，經過了一段艱

苦創業的時期。當時搬家三四次，許多體力活都是不分工種，男女老少一齊上陣，幹得特別歡快。辦公室只要少數行政人員，幾乎都是多面手，一人兼數職，還較好地完成任務，因而得到院部的獎勵。這種大家動手的艱苦創業，一開始就為日本所確立了優良的工作作風，這是應當歸功於當時的全體同志的。

但是這種一把抓的辦法，對我來說，終究在行政事務上花的時間多了些。所以我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找一個合適的辦公室主任。一個偶然的機會竟使這個願望得以實現。這就是一九八二年，我在長春召開的一次全國日本研究者代表會議上，遇到了吉林省社科院的辦公室主任吳玉琪。因為他是黃永勝秘書班子裏一個小行政秘書，林彪一出事，他被調離北京下放到長春，但家屬還在北京，他當然願意回來。吉林社科院院長佟冬，曾在延安參加過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簡編》的寫作班子，我在遼東省委工作時他在省委組織部任組織科長，所以我們是熟人。提到吳玉琪，他也很同情。當時對進京人口控制很嚴，除高級幹部外，屬於工作需要的，科研幹部只有職稱為副教授和副研究員以上的才可提出申請，一般行政幹部根本沒門。後來我只好和佟冬商量用借調的辦法，讓吳玉琪來日本所代辦公室主任。幾年後才把他正式調進北京。

經過兩年多的籌建，日本所雖然在出成果、出人才上還有一定差距，但作為一個研究機構，它已經初具規模，有了六十多名成員和三個研究室，在除圖書資料外的科研設備和辦公設備上，還在社科院各所中名列前茅，不但已經同國外特別是日本開展了不少方面的學術交流，

而且在國內日本研究這門學科上起到了一定的帶頭作用。

### 在任命所長上的小波折

宦鄉在國內外介紹我和李慎之分別爲日本所和美國所的所長，社科院黨組也批准我們兩人開始籌建工作。那時胡喬木、鄧力群還主持工作，他們一九八二年五月才離開社科院。但我們卻並沒有及時得到所長的正式任命，而在這中間還出現過一些麻煩。

比較而言，李慎之的問題不大。只是經過近兩年的相處，宦鄉對他研究國際問題的水平評價偏低。一九七九年那次訪問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宦鄉介紹李慎之是美國所所長，但內心的底盤卻是自己兼任所長，讓李當副所長。當他以這個打算徵求我的意見時，我表示斷然不可。我對他說，作爲一個美國所所長，像李慎之這種人才還是很難找到的。他雖然沒有做過研究工作，但長期做新聞工作，對國際問題還比較熟悉。而且他學問根基扎實，知識面廣，有活動能力。如果讓他當副所長，會影響他的積極性，甚至留不住人。宦鄉後來雖然改變了主意，但並沒有改變對李慎之的估計。所以組織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報告起草班子時，胡喬木指名要李慎之參加，宦鄉卻竟然推薦我，說在研究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上我比李慎之強。但胡喬木說他習慣於同熟悉的人共事（指他任新華社社長時李在新華社工作），還是堅持要李。李慎之也對我說，他也向胡喬木推薦我，說我曾參與過八大的準備工作，可胡就是不聽。這都是宦鄉、李慎



之事後講的，我當時並不知情。

宦鄉後來還對我談到，在正式任命我和李慎之爲所長時，李慎之順利通過，我卻遇到一點麻煩。按當時規定，所長（算正司級）的任命要通過中組部，中組部在審查中有一條是徵求原單位的意見。李慎之的原單位新華社沒意見。而我的原單位外交部黨組織卻提出不同意，理由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對我的批判、定性和處分固然不對，但已經在一九七九年進行了平反，職務和級別也得到恢復。那時是副司級，現在任命爲正司級，就屬於提升。而我在「文革」中還發生過支持反派打倒陳姬喬的問題，因此再提就不大合適了。另外，這時上層也有人說我的壞話。據我在東北工作的老領導楊春茂（現爲北京市正部級離休幹部）告訴我，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同時是書記處書記的領導人在上層散布我在「文革」中支持打倒陳毅的言論。一個高級領導人對下面一個小幹部的議論，當然會對上層某些人產生一定影響。但是鄧力群和宦鄉還是比較了解我。特別是宦鄉，完全清楚外交部的派性（他自己就是被姬派排擠出來的，他後來多次說過，開會時碰到姬鵬飛也不搭理）和我在外交部「文革」中挨整的情況，所以還是堅持對我的任命。這樣，在新華社發表我的任職消息後還經過半年多的交涉，我和李慎之的任命才一同宣布。宦鄉說，本來李慎之的任命早已解決，但爲了照顧影響，還是壓了半年。由於這些情況都是宦鄉事後才告訴我的，我和大家當時都不知道，因此一點也沒有影響到兩個所以至國際片的籌建工作。

## (二) 學科建設

### 有沒有一個日本學科

在籌辦日本所的過程中，當然首先要考慮學科建設問題，但一開始就遇到了有沒有個日本學這門學科的爭論。不但不少中國學者不承認有個日本學，而且一些日本學者也都加以否認。繼有澤廣已任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會長、被稱爲中國通的安藤彥太郎，就不承認有個日本學。他說，不能有個國就有個學，例如國際公認有個印度學，但沒聽說過有個巴基斯坦學、孟加拉學。這一爭論倒不只是個名詞之爭，更重要的是直接影響到工作，包括有關科研機構和學科的地位、定性、範圍、方向，以及科研人員評職稱、科研經費的預算開支等。但是對這個問題，卻是長期以來就不很清楚。例如社會科學院成立多年，經費還沒能在國家預算中立項，而被列入「其他」項內。在國務院的學術評審、學位評定中，也長期沒有國際關係學科的地位，改革開放後好些年都被歸入政治和法學範圍內。我雖然對這些問題毫無研究，但我的初步看法是，我們在這方面迄今還受教條主義的束縛。例如當年的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和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設立，就都是根據毛澤東對知識學問的分類：「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

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由於這種分類法沒有人文科學，所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李鐵映當社科院院長時就曾幾次在會上提出，爲了和國際接軌，是否應放棄哲學社會科學的老提法，換成人文社會科學的提法，也好和外國的人文科學進行交流。後來大概是不了了之。

我認爲，日本研究不但應當視爲一門學科，而且還是內容極爲豐富的綜合學科。它涵蓋的一些分支學科如日本文學、日本歷史、發展模式、對外關係等等，都是極具特色的。我們既然以它爲研究對象，就必須當一門學科對待。極而言之，即使以前沒有（實際上不是）這門學科，我們也要把它建設起來。因爲客觀形勢在不斷發展，人類知識及其分類也在不斷發展，而且發展速度比過去要快得多。例如當年外國（像俄羅斯）的漢學（即中國學），在一定程度上只相當於古漢語和中國古代史，而現在風靡世界的中國問題研究，內容就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現任全俄羅斯漢學會會長的季塔連科，就首先是中國問題專家，出任遠東研究所所長已超過二十年。而且中國對日本的研究，還是世界上最悠久的，特別是對日本的歷史和文化，兩千年前就有了研究。日本研究自己的古代歷史還要從中國取經呢！事實上，日本學科的一些分支，還在解放前就已是中國研究的單獨學科，如日本歷史、日本文學等。現在怎麼能反而倒退到沒有了？這個觀念一明確，我們就下決心不僅自身要爲這門學科建設而努力，還要利用地處北京屬於中央機關這個優勢，推動全國日本學科的建設。

### 學科建設和機構設置

日本學科包含的內容實在太多，我們一個新成立的、科研人員不多的研究所，不可能全面鋪開。而且有些分支如上面提到的日本歷史、日本文學、以及日本外交、中日關係史等，國內已有不少單位在研究，我們也不必都去插手。但是作為中央機構的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在一定意義上負有學科上牽頭的使命，當然不能只做些拾遺補缺的事。重要問題即使同國內各單位重複，我們也要着重研究。因此，我們在學科建設和機構設置上就確定了一個十二字方針，即突出重點、量力而行、照顧分工。

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日關係在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後也進入一個新階段。日本出現了持續多年的中國熱。中國也掀起了一陣經濟上學日本的高潮。因為第一，日本戰後執行吉田茂的和平發展路線，經濟創造了奇蹟。日本戰爭破壞厲害、國土狹窄、缺乏資源，戰後頭十年比中國還要困難。一九五五年才恢復到戰前水平，經濟總量也只有中國的一半，可是二十五年後，就已變成中國的四倍，文化科技水平更把中國遠遠甩在後面。第二，無論地理、歷史，還是文化條件，中國學日本都容易一些，也就是我們當時說的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所以研究日本經濟一時成風，而且由此及彼，人們都想多了解點日本情況，一些領導人也紛紛訪問日本以便就地取經。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日本所的成立自然會寄予很



大的希望，以至提出超過我們主觀能力的要求。不久以後，就經常有國務院一些部門以至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交來任務和索取材料。爲總書記、總理和其他某些領導人訪日作準備也會找到我們。

面對客觀的要求和壓力，我們只有加緊招兵買馬、建立機構，開展科研。當時找科研人員的困難是現在無法想像的。找不到現成的研究工作者，就只得找一些研究生、大學生和改行轉業人員。爲了適應形勢的需要，在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上，把研究日本經濟放在了首位，我自己也跟着大家一起重點學習研究經濟。邊學邊練、邊出產品，日本經濟研究的成果也比較多。其中有一位搞技術的工程師馮昭奎，來日本所改行研究經濟，在本人的刻苦用功、勤奮鑽研下，很快就進入角色，寫出了很多文章。他的一篇《資源小國的壓力與活力》曾被中央作爲「縣團級文件」批發全國，一些內部刊物還競相轉載。一九八四年，經濟室編寫的《日本的新技術革命》專刊，作爲內部資料向全國徵訂，不但訂數突破五千份，而且很多文章還被中央和地方報刊轉載。總之，一開始就確定以研究日本經濟爲重點，加強經濟室的建設，不但適應了當時形勢，也出了較多的成果和人才。

與經濟室同時建立的是日本政治研究室。日本政治，包括日本內政、外交、中日關係等，國內其他有關單位也在研究，但是根據上述理由，我們也不能沒有。政治室雖然不是全所重點，但是對它也並沒有忽視。當時安排的室主任是位老同志何倩。他帶領全室不多的幾個人，

很快就編寫出一本《日本政治概況》。在我的印象中，這是日本所出的第一本書，等於在書籍出版方面爲我們創了第一塊牌子。

在學科建設中，我了解到，中國對日本的研究方方面面都有，但就是沒有日本文化這一門。而作爲一個綜合研究日本的研究所，我決意要在中國的日本研究中填補這個空白。所以在設立經濟室和政治室後，我就着手籌建日本社會文化研究室。由於中國沒有研究日本文化的，所以這門學科的專業科研人員一個也找不到。於是我就動員一些研究日本文學和研究日本語言的人，擴大研究範圍或調整研究重點，參與創建中國的日本文化研究這門學科。例如國內研究的日本文學，特別是川端康成，頗有名氣的葉渭渠，就應我的請求，開拓了研究範圍，寫出了頗有分量的《日本文化史》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其專著、譯著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是國內少見的。研究日本語言的高增傑，也改行研究日本文化，擔任社會文化室主任十餘年。中國的日本研究中第一次有日本文化研究機構、有專業人員和科研成果，應該說是從我們這裏開始的。這也算對日本研究學科建設的一點貢獻吧！

### 在學科建設中練兵

學科建設當然不能只是說空話，我們一開始就是同開展科研和人才培養結合進行的。日本所是個新研究機構，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百業待舉。但我認爲開辦頭幾年的主要任務還是練

兵，求得在學習和工作中培養出一支科研隊伍來。但這種練兵，除經常組織一些學習外，基本上還得靠在研究實踐中提高。因此我給經濟和政治兩個室佈置的任務是，除平時隨着形勢的發展寫點帶有時間性的零散文章外，都要着手搜集資料，準備撰寫一本稍有分量的著作，參加到計劃中全國日本研究界分工合作編寫的《戰後日本叢書》系列中來。政治室由何倩主持，組織撰寫一本《戰後日本政治》。經濟室由室主任王宗林主持，寫一本《戰後日本經濟》。由於確定經濟是重點，我也參加這後一部書的研究，同大家一起練兵。因為無論是對於日本問題還是日本經濟，我都是一名新兵，需要從頭學起。

我着重抓日本經濟的研究，首先是出於對國家需要的認識，其次也與個人偏好經濟的研究興趣有關。所以《戰後日本經濟》我是從頭到尾參與了的，除翻閱大量有關資料等準備工作外，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單是我主持召開有所外人參加的研討會就有十餘次，全國的日本研究界也討論過三次。先由王宗林執筆，他寫了不到一半就因病去世。我審閱後感到這部稿子很不成熟，只得請外地專門研究日本經濟的三個大學的日本所所長，即遼寧大學金明善、長春東北師大宋紹英、河北大學孫執中，三人另行分工撰寫，由金明善主持和統稿，我組織討論和最後審改定稿。一九八八年交航空工業出版社出版時更名爲《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史》，但在署名問題上卻發生了一點爭執。直到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金明善還來信說，「本來，這本書應有您的署名，由於您一再堅持不要署名，不僅封面上沒有您的名字，連前言提及的名字，也

被您親自拿掉了，對此我很過意不去。」其實，我倒是跟他們三位學了一些日本經濟的入門知識，記住了許多數目字，直到現在有些問題給我的印象還很深。一是日本政府能夠及時抓住戰後的時代特徵定下和平發展的長久國策。二是他們能夠適應形勢變化制定產業政策和進行宏觀調控，像戰敗初期經濟瀕臨破產的時候，吉田茂首相果斷採納原日共勞農派、著名學者有澤廣巳的「傾斜生產方式」（即重點生產理論）的建議，以及後來適時提出的「貿易立國」戰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等。三是戰後民主改革不但使生產力大解放和積極推動了經濟發展，還使日本跨過一個歷史階段成爲現代文明國家。四是日本非常重視教育，在戰後經濟極爲困難和多數國民吃不飽飯的條件下，還進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一九四七年的教育法把義務教育延長到九年（戰前一九〇七年定爲六年，一九四一年改爲八年但未實現）。派出國的留學生，學成不歸的極少甚至沒有。對這幾個問題特別感興趣，也許是由於無形中在同中國作着比較。

### （三）全國規劃和學術交流

#### 出任日本學科全國規劃組長

日本所成立後的一年多，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宣部、國家教委、社科院聯合召開了一個全國社會科學規劃會議。會上規定，每門學科都設一個規劃小組，進行全國的分工、合作、交流



和協調。在國際問題這個大規劃組（宦鄉負責）下，還設一些分支的規劃組，我就出任了研究日本問題的規劃組長。至於如何規劃、如何協調，會上會下都沒有什麼明確規定，實際上也沒有人管。但我還是充分利用了這個規劃小組和組長的身分，多次召開會議，討論分工合作，進行學術交流，還可了解全國研究日本的情況，並向他們取經和學習。在我的任內，召開全國日本研究工作會議和學術研討會，約有七八次之多。這樣一來，我就和全國的日本研究機構、重要學者或研究人員做到相互認識、建立聯繫，進行一些分工合作。大家對我也還比較尊重，能聽取我的一些意見和安排。這是因為，我雖然對日本問題沒有專門研究，又不懂日語，但卻具備一些優越條件。一是我們所地處北京，為中央機關和人文社會科學最高學府的下屬單位。二是因此信息量大、消息靈通，容易了解對日本的政策和需要研究的問題，可以給大家通氣吹風。三是可以在研究工作和對外交流上為大家服點務。例如外地許多老日本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所長，搞了幾十年，快退休了，還沒有去過日本。我就交涉日方邀請和接待並率領他們訪日一個月，大家都感到非常滿意。其他如幫助他們和日本有關單位建立聯繫等。四是我對國際問題和研究工作還比較熟悉，也沾點「老延安」、「老幹部」的光。在我任所長的八年裏，我和社科院日本所，同其他日本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關係都搞得很好，沒有發生過什麼衝突。我本人同大家也不存在所謂文人相輕的問題，還盡量對兄弟單位作點照顧。例如一九八五年，我們要創辦自己的刊物，按社科院期刊系列，應該取名《日本研究》。可遼大日本所的金明善來信

說，他們已經以同樣刊名向省裏備了案，希望我們把刊名讓給他們。我就立即採納，從新向上寫報告，把《日本研究》改爲《日本問題》（後來又改爲《日本學刊》）。

### 國內的合作與協調

當時以規劃小組和我們所的名義召開的全國性會議大體有兩種。一是工作會議，由各單位領導如所長、室主任參加，互相通報情況和研究分工協調等問題。二是學術研討會，內容自不必說。

一九八二年第一次工作會議上，除交流情況外，作了兩項決定，一是，決定全國日本研究界合作撰寫一套《戰後日本叢書》，包括經濟、政治、教育、財政、外貿、產業政策、宏觀調控、基礎設施、壟斷資本、經濟社會統計。選題以經濟爲主，既適應國家建設需要，也由於具備主觀力量。成立以我爲主任的編委會，實行跨地區和跨所的合作。每本書，編委會都要討論寫作大綱、最後審定出版。各種學術討論會，既在北京召開，更多地還是在外地舉行。

第二項決定是組成中國日本研究工作者代表團訪問日本。由於我國過去長期執行閉關鎖國政策，所以外國問題研究也是閉門造車，不但出國考察屬於奢望和幻想，連訂閱外國報刊和購置外文書籍都受到嚴格限制，聽「敵台」廣播更屬犯法。所以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在宦鄉的帶頭下，開展對外學術交流還是不大容易的。例如一九八〇年我在籌辦日本所期間說了一句研究

日本問題必須到日本去考察的話，竟然在一些研究國際問題的人中間引起震驚，說我講話也太大了。一九八三年我率領中國日本研究者代表團訪問日本，就成了日本研究界一件大事。爲了照顧外地同行，全團十個人，外地就去了七人。通過一個月對日本從南到北的考察，大家豐富了感性知識，開闊了眼界，當然也出了一些洋相。例如一次在東京新大谷飯店，住在我隔壁的一位老兄在室內燒信紙。飯店保安人員從儀器中發現就立即來察看。他從門上的「貓兒眼」一看，把保安當成了警察，竟拒不開門。保安越發着急，堅持敲門要進。我出來一看，請他開門。但我不會說日語，他卻會。只見他和保安爭執不下，我就問是怎麼回事。原來是他否認燒紙（顯然在說謊），只承認吸煙，而保安堅持，儀器能分清抽煙的煙和燒紙的煙，如果抽煙他們就不會來打擾了，燒紙的煙屬於火警，所以要來看一下。後來保安看到我在干預，也沒發現火警，就鞠個躬走人了。而這位老兄還硬說他只抽煙，沒燒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在進行全國協調合作中，我還提出籌建中華日本學會，保持日本研究界的長期協調合作。顯然由於規劃組長任期內的活動，一些全國同行甚至許多日本人，當時都把我們研究所看成了日本研究的中心，把我誤認爲學科帶頭人。但我還是多少有點自知之明，不但經常口頭上一再聲明自己是日本研究的外行，而且絕不擔任日本學會的會長。在卸任日本所長後，日本研究界的活動我也參加得很少。因爲這學術上的事，是不能打腫臉充胖子的。

## 對外學術交流

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從事國際問題研究，自然要參加對外學術交流。我在兩個研究機構工作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參加對外學術交流實在不少，當然大部分還是在國內舉行的。而且多數是其他單位主辦邀我去參加，如果可以不交論文，也就不算什麼負擔了。出國參加交流，大多不用交論文，對方接待的時間頭幾年很長，總在一個月左右，後來愈來愈短，甚至是開完會走人，倒也利索。

對於出國，我開始時還頗有興趣，後來的興趣也逐漸淡漠，有些能推掉的就推掉了。因為出國不但總要費點時間，打擾你的研究工作；而且去得最多的又是日本和美國，我卻不懂日語和英語，所以感到非常警扭。開會時同聲傳譯不夠準確，會下交流靠翻譯也很不方便。例如參加了一次高級討論會威廉斯堡會議，與會的全是國際上著名的學者和前政府高級官員，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日本前外相大來佐武郎、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蘇聯總統顧問阿爾巴托夫等二十餘人，都講英語，乾脆就不設同聲傳譯，我帶的翻譯也幫不上忙，開了兩天會，對我來說簡直是活受洋罪。其實，交流能談得深，還是個別的私下交談。例如我和日本的有澤廣巳和佐伯喜一，能夠談得真切和廣泛，以致成爲要好的朋友，就是因爲我分別陪他們在中國參觀遊覽了一個多禮拜，每天從早到晚都能海闊天空地交談（有翻譯）。參加國際會議，如果碰到懂漢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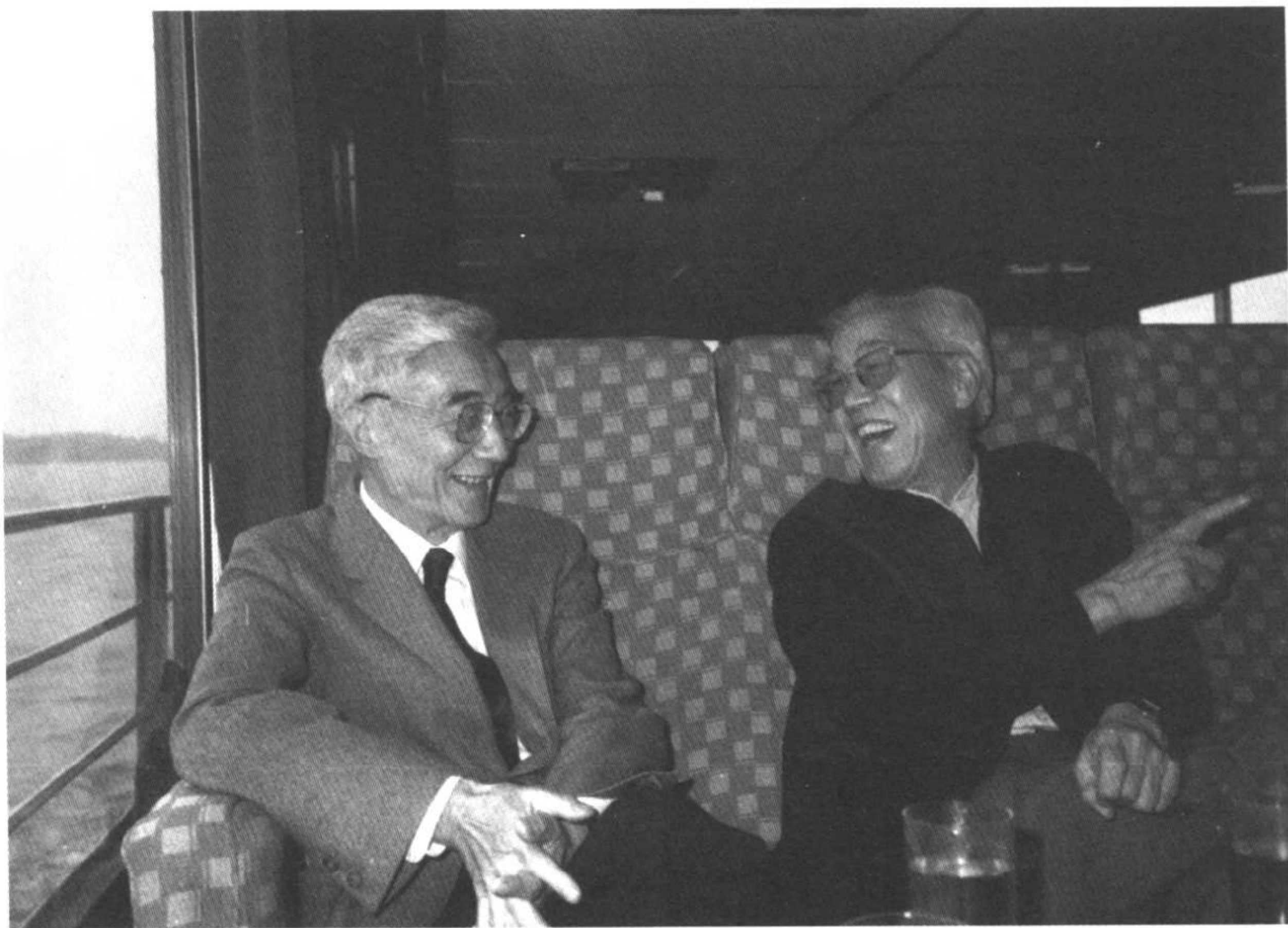
的學者，會外也可以談得很好，如和美國哈佛大學的傅高義。但是外國學者漢語好的實在不多。有一次在日本參加國際研討會，我只帶了日文翻譯。會議休息時，老朋友美國學者斯卡拉皮諾要和我討論一個問題，找不到一個英譯中的翻譯，只好請日本學者先作英譯日，再由另一個人作日譯中。這種間接翻譯，不但費時間，還影響情緒。那次談的問題由於爭論很激烈，所以雙方都搶着發言，往往是還沒等翻譯完就要批駁。最後弄得互相的意見也搞不清了，大家哈哈大笑完事。

進行對外學術交流，我們一直強調同中央保持一致和內外有別。頭幾年，出發前還要練兵和統一口徑。由於那時外交政策保留有嚴重的「左」的傳統，如認為戰爭不可避免和堅持反對帝、修、反，所以進行交流的人員往往給人以「鷹派」的印象。記得每次代表團出國前，去向院黨組書記梅益請示時，他總要交代兩句話：注意政策，少說多聽。再加上「左」比右好的潛規則，使一些人對外特意要表現立場堅定和堅持原則，導致學術交流中長期流行一種「左」的思潮和狹隘民族主義情緒，返回來又影響到國內輿論和科研本身。但整個說來，對外交流的正面作用還是主要的，我把它歸納為：有助於我們了解世界、宣傳自己、取長補短、促進發展、交換觀點、增進友誼。它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下，必須進一步加強和開展。

就對外學術交流的內容來說，我參加的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有關日本的問題，二是一般

國際問題。在日本研究所所長任內，談日本問題可能稍微多一些，所以訪問日本就有十多次。但是即使在那八年，參加其他國際交流也很頻繁，如果前後加在一起，討論一般國際問題的次數還要更多些。總起來看，在我從事研究工作的十多二十年間，無論是在我的時間上還是精力上，學術交流都佔有很大的比重。單是在國內參加的全國性和國際學術研討會，每年就有十多二十次，絕大部分都是別的機關和團體舉辦的。因為我受聘或被推舉為顧問、理事以至副會長的學術團體或機關前後就有二十多個，能記得的有：日本學會、台灣研究會、國際戰略學會、國際經濟關係學會、世界經濟學會、外交學會、聯合國協會、國際交流協會、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國際友好聯絡會、中蘇（俄）友協、中日友協、國際貿易學會、太平洋學會、戰略與管理研究會等。這些機關和團體，除每年有一次年會外，平時還有多少不等的學術活動，有的如外交學會、中蘇友協等還會組織團隊出國交流。此外也參加過一些國際性論壇，如由中、蘇、日、韓、美、加、澳這幾國組成的東北亞論壇，就每年輪流主辦一次研討會，我也參加了五次；還有定期舉行的中美知名人士會議，中日民間人士會議等等。

其實說老實話，改革開放以來，我到底參加了多少次學術交流、出了多少次國，自己也實在記不清楚了。由於過去日記和筆記被查抄的教訓再加上個人的懶散，特別是從來沒想過以後有機會回過頭來記述那些平凡經歷，所以並沒有留下多少文字記錄，更不用說日記了，現在就只能靠回憶說個大概。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有記錄可查，那麼多的研討會和學術活動，也沒



在無錫參加東北亞論壇國際討論會期間和章文晉續「廢話協會」舊緣，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六日



有必要一個一個地去談它。

## 對台工作

改革開放後的對台工作，一個重要渠道是通過學術交流。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以學術交流的形式參加了一些對台工作，主要辦了這樣幾件事。

一、一是參加一九八三年我方主辦在香山召開的「台灣之將來」討論會。曾邀請海外在台灣有影響的學者田弘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當過民進黨的「外交部長」）、林宗光（美國德雷克大學教授）、范良信（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授）、蕭欣義（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翁松燃（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等九人與會。這是大陸和台灣學者第一次聚會，為此後海峽兩岸通過學術交流進行接觸和來往開闢了道路。由於這次海外與會學者多數主張台獨，所以會上沒有多少共同語言，不可能達成共識，只是各說各的，進行些交鋒和爭論，算是「不打不相識」。我向會議提交的論文是《國際形勢與台灣之將來》，會上發言主要是批駁各種台獨言論，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當場回答蕭欣義、林宗光等所提在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共中央多次宣言和毛澤東多次談話都主張台灣獨立，抗日戰爭勝利後怎麼就變了？我的解釋是，中共以前主張台灣獨立是指從日本佔領下獨立出來，正像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其中就有我們陝西省）一樣，是表示脫離清朝而獨立，並不是要脫離中國變成獨立國家。當年中共



說的台灣獨立就是指脫離日本統治，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

二、二是三次去美國同台在美學者和台半官方人士接觸。這裏只談還記得的兩次，還有一次印象已經模糊，大概也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事。記得第一次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紐約州羅徹斯特由美國亞、非、拉三個學會聯合主辦的研討會。雙方事先商定兩岸人士利用這次機會商談幾個問題。我方以社科院學者名義去了三個人，李慎之、陳樂民和我。對方全是官方和親官方的人士，一部分來自台灣如魏萼（文宣系統，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吳安家（情治系統，台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等，一部分為在美的著名學者如所謂「四大金剛」中的丘宏達（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曾當過台灣國統會委員，代表蔣經國、李煥等正統派）、高英茂（美國布朗大學教授，後來出任民進黨外交部次長）、熊玠（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和自稱為丘宏達馬前卒的楊力宇（美國西東大學教授，一九八三年曾得到鄧小平接見）等六人。這次訪美，除我在亞洲學會一個分會上宣讀一篇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文外，整個活動都是和台方人士會談。這次活動的主要收穫是基本上摸清了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底牌：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和一國兩席（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就是要求大陸放棄使用武力和給台灣國際空間。回國後，十一月五日由趙復三、李慎之和我去向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楊尙昆和台辦主任楊思德彙報。楊尙昆聽完彙報說，要繼續保持這一渠道，現在的形式還是有用處的。還說，可以請丘宏達來，見見小平同志。

一九八六年三月，我和院副秘書長李壽祺，作為社科院學者代表參加美國亞洲學會在芝加哥舉辦的「台灣未來十年」討論會，由我作主題發言，但是主要工作還是會外活動和去紐約等地會見台方人士。這次會議在僑界和華裔中反響很大，全美的十數種華人報刊作了連篇累牘的報道評論，但實際收穫並不大。如果說去年那次接觸的對象主要是台官方和半官方人士，這次與會的卻以台獨分子和大陸出走的民運人士為多。我們的方針是，主要接觸對象為同台當局有關的人，台獨分子如果要求見面談話也可答應，只是不和民運分子來往。會外見到的一些台獨人士，有的像彭明敏、許信良後來還當過民進黨的主席，但當時毫無共同語言，談到半夜也談不攏。加之對台獨估計不足，以為成不了什麼氣候，所以沒有做較多的了解。

這次去參加會的還有以林麗蘊為首的台聯的幾個人。行前我們還做過分工，但一到現場就只能各顧各了。當時這些台灣人，包括已來中國多趟負責全程接待我們的楊力宇，其實對中國還是很不了解。他們在會下只同我和李壽祺打交道。有兩次會談，我建議請林麗蘊參加，他們不同意，只認定社科院是通天的。我說，林麗蘊是中共中央委員，本來就在天上，同上面聯繫比我們直接得多。但他們就是不相信，真叫人沒辦法。

三、三是陪同國民黨資深立法委員、後任台灣中國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的胡秋原來訪。胡在抗戰前就是中國著名的文化人，後跟國民黨去台。他的這次回大陸訪問，屬於破冰之旅。因為直到這時，國民黨仍禁止兩岸人員來往，特別是公職人員和國共兩黨黨員。所以胡秋原訪問

公開報道後，國民黨就作出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但是我方卻給予優厚的禮遇，在北京，由國家主席李先念、政協主席鄧穎超、統戰部長閻明復分別設宴招待，到外地，也由省市負責人接見和宴請。我被安排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全程陪同他們夫婦參觀訪問。胡先生當時雖已年逾八十，但思想敏銳，也很健談。在西安參觀完張學良公館後，主人突然提出請他題字留念。他即不假思索地在一張大宣紙上寫了「八年抗戰從此起，仍有英雄作楚囚」兩行大字。我們一路也相談甚歡。他一聽到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就和我商量如何向全世界發表聲明加以批判，而且對回台後受國民黨的刁難做好了一切精神準備。他不但沒有因此對回大陸產生絲毫悔意，而且通過一個月的參觀訪問，還進一步激發了他的祖國情思，回台後更致力於祖國統一事業，頭幾年還和我保持一定的聯繫，寄些統一促進會的報刊資料。

要做對台工作，當然需要做些對台灣的研究和了解。所以在那些年月，我也被吸收進台灣研究會，經常參加一些學術研討會和接待台灣和海外華人的工作。時任古籍整理小組組長的李一氓，還真以為我對台灣有所研究，中華書局要影印《台灣府志三種》，他就一定要我寫篇序。不過，自從做點對台工作後，我也確實更關心台灣形勢的變化和統一事業的進展。給我留下的印象，或者說愈來愈強烈的感覺，是台灣在經濟發展和民主改革方面，都走到了大陸的前面。每當看到大陸居民投奔特別是偷渡台灣，心中總感到不是滋味。所以我想，兩岸統一的關鍵其實還在大陸。只有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了，特別是民主政治實現了，才會贏得台灣的民

心，也才能水到渠成地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這個日子，我恐怕是看不到了。

#### （四）我的研究工作

##### 研究生生活

先談點作研究工作時的日常生活。在日本所和當年在外交部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都能嚴格遵守作息時間。早晨六點起牀，七點準時出發，背上裏面裝有飯盒等東西的書包，以急行軍速度步行一個小時，八時前到辦公室。爲什麼要帶飯盒呢？因爲大食堂的飯菜不是太鹹就是太油，不大可口，所以早晚飯在家吃，午飯也是頭天家裏準備好，在冰箱存放一夜，第二天帶到辦公室中午加熱後用。我在上班時，基本上是搞研究，讀和寫的時間大約各佔一半，開會和雜務被我壓縮到最低限度。每周平均開所務會一次，處理所內較大事項，實現集體領導；開全所會一次，作有關傳達、學習或佈置工作。一般事務由有關部門按職責分工自行處理。例如按院部當時有關條例規定，所辦公室主任有權處理十萬元以下的採購事務，所以辦公室主任吳玉琪自己做主花七八萬元買了一輛三輪小汽車，我事後在院子裏看到才知道，而那時全所預算也不過七十多萬元。

所謂搞研究，就是根據原來規劃的課題收集、閱讀材料和構思、撰寫文章。但在日常的廣



泛閱讀中往往會發現新問題，產生新看法，這就要修改原計劃，增加新題目，再根據情況分配給其他合適的人去研究或作為自己搜集材料準備寫作的課題。在研究工作中我是單幹慣了，從來沒有同別人一起合寫過和共同署名的文章或書籍。幫助別人出主意、找材料，最後修改，那也只能算是別人的創作。我研究的課題，都是一切自己動手，從搜集材料到逐字寫作抄清，一般不麻煩別人。但在醞釀階段和成文後會廣泛徵求意見，再根據這些意見考慮進行修改甚至重寫。而且在過去參加起草或自己寫稿中，還養成一個習慣，就是每篇文章都要抄寫好幾遍，頭幾頁最多時可能抄寫十多遍，因為那時候拿出去的稿子是要領導或編輯、打字人員看的，所以不願意拿出改得亂七八糟的稿子讓人家看不懂。總是要抄得清清楚楚。實際上每抄一遍，也總會改得更好一些。我多年來寫的稿子和發表的文章，不但完全是自己寫的，也完全是自己抄清的。我還從來沒有過請別人代我起草稿件的事。

我在日本所八年，研究的問題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自然是日本問題；第二是一般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第三是一些涉及理論的問題。下面就分別作點簡單介紹。

### 關於日本研究

我研究日本問題是新手，信心不足，所以寫的內部報告和公開文章雖不算少，但卻從來沒想過要著書立說，寫什麼專著。有些論文，對問題的分析 and 預測也不準確，特別是經濟問題。

例如對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日本經濟發展的預測就估計錯了。我曾在討論日本經濟的文章中認為，日本經濟的適應能力強，能夠比較容易地克服日元升值帶來的困難和當時遭遇的結構危機，到九十年代就會進入低速增長，甚至會走在西方國家的前列。可是後來十多年的情況卻正好相反，日本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另外，我對日美矛盾也一直估計偏高，認為會逐漸激化。結果不但沒有激化，日本反而向美國靠得更緊了些。

不過我對日本問題也有幾點與眾不同的看法，至今仍在堅持。例如我認為日本不可能再復活那種對內實行法西斯和對外進行武裝侵略的軍國主義。因為一則國內的民主化不容許它走回頭路；二則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它也不可能再帶頭挑起世界大戰。日本就是要做具有核威懾和戰略攻擊力的軍事大國，大約相當時期內也很難辦到。因此不能把防止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作為宣傳口號和制定政策的依據。在揭露日本的擴軍動向時，也不宜作過分渲染。那樣做，只能傷害兩國關係和激發雙方的民族主義情緒。

無論是內部報告還是公開發表，我都比較偏重中日關係的研究，這方面的文章也寫得有些。直到一九九七年，我還公開發表過一篇《對中日關係的一些看法和意見》的文章，被某些人認為是開啓對日關係新思維的先導。我的看法是；第一，搞好中日關係對我國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它是關係到我國和平發展、穩定周邊和進行地區合作的一個大問題。第二，要以平常心態看待日本，把它看作國際家庭中平等的一員，不可總是以戰敗國相待，總是低人一等，別

國可以做的事它卻不能做。第三，要逐漸淡化影響中日關係的歷史問題，更不可把歷史問題定為兩國關係的基礎，而應當是鄧小平說的「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如果以歷史問題為基礎，那我們幾乎同所有鄰國和主要西方國家都無法搞好關係。例如俄國佔了我們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連列寧、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認；同其他鄰國如朝、越、印度等也都有無法達成共識的歷史問題；而當年一再侵略中國的列強又有哪個承認侵略呢？難道和所有這些國家都要算歷史帳？第四，日本統治集團和國民的主流意識，對日本侵華的認識已經以村山富市政府的聲明畫上了句號，即一般承認侵略和表示道歉，既不大可能進一步深刻，也不會根本倒退。在這種情況下，過多地談論和強調歷史問題，不但不會得到預期效果，而且還會引起日本國民的反感，形成惡性循環，傷害民族感情，影響兩國關係。而且在對侵略的認罪態度上，也不能拿德國和日本比。德國有民族負罪感，直到現在，為戰爭辯護和為納粹翻案仍然屬於犯法。日本就完全不同。這除了戰後形勢的變化和美國對日本的包庇扶植，使日本的戰爭罪沒有得到徹底清算等因素外，還有個重要原因是戰後德國政權發生了根本變化，取得統治地位的是受納粹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而日本卻基本上是原有的統治集團。他們不但沒有真心認罪，還控制輿論，向國民灌輸他們的歷史觀。這就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上一再說的，「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東京，應日本學士院院長有澤廣已（前排左三）邀請訪日，一九八八年



在我任日本所所長期間，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中日關係最好的時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曾是兩國朝野喊得最響的口號。在雙方都執行以友好爲主的政策下，歷史恩怨和領土海域爭端等，也都降到次要地位或被暫時擱置起來。當時日本對中國在經濟技術方面也確實有很大的支持和幫助。我們日本所也跟着沾光，除在圖書、科研設備上得到日方一些資助外，一九八二年九月日本鈴木善幸首相訪華，還想仿效大平正芳首相捐贈中日友好醫院的作法，也贈送一件可以長期留名的紀念品，考慮結果決定幫我們建一個現代化的日本研究所，包括樓房、設備、圖書資料和人員進修等。因此在鈴木來前，日本駐華文化參贊就多次找我商量，探詢可行性和需要投入的金額。我只能以個人名義表示歡迎，並趕快寫報告請示。不料院黨組書記梅益先不同意，過幾天他又傳達了姬鵬飛（當時任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國務委員兼秘書長）和陳楚（時任外事小組秘書長和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批示，說科研單位不可接受外國資助，「以免滲入政治影響」。這就使我無法回復日本文化參贊，藉故推掉了幾次約見。此外，國內還有幾個單位在爭這筆援助。結果誰也沒撈到，日方決定在東京建一個日中友好會館。不想過了兩年，梅益又專門找我和美國所長李慎之談話，要我們設法向美、日兩國活動，爭取他們資助我們修建研究所，還可幫院裏修一些辦公用房，以便啓動北京市留給社科院東邊那塊房基地。我和李慎之當場就表示不能受命，此後也只好不再提了。

我當時對中日關係的研究偏於樂觀。根據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對兩國戰略利益的考量和相

互關係的觀察（當時雙方政府都在致力於發展關係，民間更是熱情很高），認為只要兩國政局和政策不發生大的變化，二十一世紀的中日關係有可能像德、法在歐洲那樣成爲亞洲地區合作的軸心。雖然也感到日本與德國不同，中日爭奪東亞主導權的問題也比較大，但總希望能像德、法那樣求得解決。沒想到進入九十年代，中日關係發生逆轉，竟然一直走了下坡路。在我方看來，這是一方面由於日本的歷史、地理和民族秉性，不願看到在它身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而且經濟停滯、政治右傾，所以對外才加強聯美防華。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是日本朝野認爲，中國在「八九風波」後就大力推行民族主義政策，從大規模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起，就提倡愛國主義教育，改變了對日友好政策，突出了歷史問題。不管雙方怎麼說，九十年代後中日關係已經大傷元氣，一個嚴重後果是激起兩國國民的對立情緒，多數國民的態度從友好變爲猜疑以至敵視。這種局面確實是我長期研究中日關係所沒料到的，也是今後相當時期都難以扭轉的。所以我已經不再樂觀了，而且又一次體會到，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能在觀察國際形勢與處理國際事務上具有戰略眼光、不受情緒左右，只考慮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實在太難得了。

### 關於國際問題研究

不過我在擔任日本所長期間，研究的重點始終是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無論是寫出的內部



向李一氓遺體告別，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和公開材料，還是參加的學術活動，都以這方面居多。先後受到表揚和獎勵的也只是這方面的科研成果。例如其中的一篇就是一九八三年我以發言提綱形式寫的《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幾點看法》（內部報告），因為抄送了一份給李一氓，他就用毛筆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說「你那個提綱，我要中聯部印了幾十份，內部散發……」然後借題發揮，對國際形勢和對研究國際問題的方法發表了一大通意見。也許院領導是在得知這一情況後才專爲此文作了一次通報表揚。

國際問題研究涉及面比較寬，問題複雜，爭論也多，談起來既費時間和篇幅，也不容易說清楚，所以我主張這部分從略，不多談了。另外，日本所期間，我在張聞天文稿的研究和編輯上也花過一些力量，由於上面已簡略談過，這裏也就完全不提了。

### 幾個理論問題

由於過去做過點理論工作，後來也一直對理論問題有興趣，所以我比較注意國際問題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但是應該聲明，對於源自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我確曾學了一陣，但收效甚微，距藩籬尚遠，更不用說堂奧了。這裏要談的是另外的理論問題，下面只舉兩個例子。

### 關於和平與發展時代

一九八六年，我根據鄧小平頭一年關於當今世界存在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的談話，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提出我們早已處於和平與發展時代的論斷。大意是：





在國防大學將軍班作報告，左一為國防大學科研部部長程明群，一九九一年

一、對時代問題的認識屬於最高層次的戰略判斷，是據以制定對內對外政策的基礎。

二、二戰後不久，世界就從戰爭與革命時代向和平與發展時代轉變，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這個轉變即告完成。至今還有人說，七十年代後才發生了新舊時代交替，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這時世界經濟已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進入「滯脹」（經濟發展相對停滯加上一定的通貨膨脹）時期，而世界和平也是早就存在，實在找不出交替的標誌。

三、我們建國後社會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耽誤了三十年，原因之一就是對時代判斷的錯誤，明明是和平與發展時代，我們卻硬要說還是戰爭與革命時代。因此，眼看着人家的經濟技術在飛速發展，我們卻大搞階級鬥爭、反修防修、支援世界革命、積極準備打仗。這樣和時代潮流對着幹，怎麼能不落後呢？

四、產生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本來，《帝國主義論》的基本論斷當時就有些不夠準確，二戰後更是多數已經過時，但我們還是抱着不放，哪能不犯錯誤？

根據以上發言內容，我又在一些學術會議上和中央黨校、軍事科學院等單位作了幾次報告。國防大學當時的校長和政委張震、李德生還親自寫信邀請我去給他們學校講時代問題。後來我又應北京國際關係史學會會長周紀榮之約，把報告整理成文，由他們在內部發表，同時也寫了些通俗的公開文章。這樣一來，就引起國內學術界的熱烈討論，開始以反對意見居多，後

來同意的文章才多了起來。到一九八八年我離開日本所時，認同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意見在學術界已漸居優勢。但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情況又發生逆轉，輿論界不但批評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提法，而且從上到下相當普遍地批評說，以前對和平與發展問題講得太多了。

就在這時，陳雲發表了《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談話，說「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我看，沒有過時。」「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原來傳達的內容還要多些，整理發表在《陳雲文選》第三卷上只剩下不到一頁。）

一九九〇年二月，我收到一個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名義（該室被趙紫陽解散後這時好像還沒恢復）發來的開會通知，要我三月五日去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出席一個由鄧力群主持的座談會，討論關於帝國主義和時代問題，並附有一份不到三千字的《討論提綱》。我一看，來者不善，肯定是要挨批了。可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已經不再是逆來順受、只知按上面的要求作檢討，而是要盡量實話實說，真地講點實事求是了。於是就以給主持人寫信的形式寫了一篇答辯，堅決捍衛自己的觀點，批判《討論提綱》關於世界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的提法。開會時果然沒出預料，在傳達完陳雲的談話後，會議主席鄧力群就要我首先發言。我一看與會者多是北京思想理論界的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如何東昌、吳冷西、熊復，以及徐達深、浦山、王懷寧等，就說我是來聽取批評的，還是讓別的同志先講吧。鄧力群說，那就



先讀一下你的信吧。我只能同意，算是做了個書面發言。隨後開始討論。發言者主要是擁護陳雲對帝國主義看得準、提得及時，對時代問題倒講的不多，更沒人點我的名，同以前的那種批判會大不相同。會議開了半天宣布休會。第二次會於三月十六日舉行，我因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沒能參加。不久又接到三月二十八日開會的通知，同時附來一份《論我們所處的時代》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是浦山、王懷寧根據頭兩次討論和領導意見，將原來的提綱擴展而成的。因第二次會我沒有參加，鄧力群特意通知我，對這篇文章寫出書面意見。我遵照他的指示寫了一個文字材料，進行了不客氣的反批評。第三次會仍然是各說各的，而且內容主要是談當時的國際形勢，很少涉及時代問題，既無指名批評，也無激烈爭論。會議開得沒什麼生氣，但還是決定繼續進行。第四次會大約是四月上旬，我因有外事活動又沒能參加，只好向與會的徐達深了解情況。據他說，會開到後來吳冷西作了一個發言，認為和平與發展問題是鄧小平提出的，他雖然沒和時代連起來，但一公開批判就很難分清了，這就會造成誤會，所以還是以不批判為好。這個意見，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後，鄧力群也就宣布，這個會不再開了。浦山、王懷寧問他們寫的文章怎麼辦？鄧力群說，隨便你們怎麼去處理吧。關於時代問題的這次高規格討論，就這樣不了了之，那篇文章也沒見到發表。只是這一時期的報刊輿論，在「六四」後猛批帝國主義的高潮中有些也曾涉及到時代問題，或許由於存在着像吳冷西說的投鼠忌器問題，當時對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提法批評不多。其實經過幾年的討論，支持這一提法的人已愈來愈多。所以



在這之後的一九九七年，在北京召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的總結中就已指出，「多數學者認為，應該承認現代的時代是和平與發展時代」。（見《理論前沿》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這次批判，我算是有驚無險地渡過了，後來還悟到自己無形中被捲進了實際存在但被百般掩蓋的路線鬥爭中。這就是鄧小平多次向海外人士說的，黨中央也存在分歧。什麼分歧呢？很明顯，就是主張改革開放和不怎麼贊成（不是完全不贊成，而是更想回到「八大」前的「烏籠經濟」）的兩種意見分歧。這就是為什麼上海浦東晚開放了近十年；為什麼有人把經濟特區看成以前的洋人租界，死也不去看一眼；為什麼有人要組織調查僱工剝削，等等。把這些事聯繫起來一想，還真有點恍然大悟，這次討論竟然也是涉及路線鬥爭的冰山一角！而且既然被納入路線鬥爭，自然不會只顯現一回，以後遇到什麼大一點的風吹草動，一定還會再來。

果然，一九九九年爆發了科索沃戰爭，特別是美國人轟炸了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於是對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批判又掀起了一次高潮，而且來勢比上一次還要猛一些。這裏只舉幾個印象深刻又查了原文的例子。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二〇〇〇年六、七月，就連續兩期載文批判和平與發展時代。六月二十日刊登李崇富的文章批評說，「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都過時了，昔日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亦即以革命和戰爭作時代主題……必須代之以他們所理解的，實際上是由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所主導的所謂『和平與發展』。因此他們主張，要『告別革命』；當今中國在改革中，需要『全盤西

化』，融入西方社會，在經濟上無條件地向西方開放，與國際『接軌』，以順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趨勢。」總之是說理不多，帽子不少。七月四日《院報》又發表了兩篇批判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文章。其實，這些文章還只是在時代問題上進行批判，說明還不敢太放開。自稱「作為這個世紀戰鬥的人」，就不太客氣了，直接批評到和平與發展。這就是作家魏巍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號《中流》上寫的文章中說，「列寧說，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其實並沒過時。」「列寧概括的帝國主義五個特徵，一個也沒有變，變的只是列寧指出的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寄生性和腐朽性成倍地嚴重化了。」「戰爭的危險顯然不是減少而是大大地增加了。」「所謂和平與發展，只不過是好心人的主觀願望罷了，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可惜歷史並沒有按照這些鏗鏘有力的論斷發展，而且今後也不會。這方面的道理，我在《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一書中已談得很多，這裏就不再重複敘述了。

從提出和平與發展時代到現在已經整整二十年了，人們的認識也在逐漸趨於一致。正像一位不認識的同志古燕幾年前說的，「雖然至今還有人反對，但對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提法，無論是在黨和政府的文件（按，包括胡錦濤最近在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還是在學術界，已經佔據了主流地位。」另外，關於「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說法，可能有當時提出的客觀需要，但很難說是理論層面上的問題，而且也是說不通的。就拿和平問題來說吧，是不是做到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三無世界」才算解

決了？因為作爲一個時代特徵或世界主題，它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客觀存在，談不上怎樣才算解決。例如爲和平與發展所代替的戰爭與革命，你能說哪個解決了哪個還沒有解決嗎？所以利用這句話來反對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提法，是站不住腳的。

### 關於鄧小平理論

既然時代問題的爭論是在對待改革開放上兩條路線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把鄧小平理論同和平與發展時代聯繫和結合起來研究，就有點順理成章，對於說明這兩個問題都有好處，也很必要。於是我就在《論和平與發展時代》的研究基礎上，選定了一個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的研究課題。既有前面的基礎，這個問題的處理自然比較容易些，很快就寫出了一篇約五萬字的文章。但是，寫作容易發表難，很長時間找不到出路。文章分爲兩部分，頭一部分的小標題爲《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是講和平與發展時代問題，雖然也不盡符合官方規定的輿論導向，但還沒有明顯犯忌的地方，所以容易爲一些刊物接受。第二部分是關於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談我那時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脈絡的看法，雖然在表述上盡量照顧到主流提法，但還是犯忌太多，曾分別向幾個刊物投稿，包括我任顧問的《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都表示不便採用。經過多方探問和對原稿棱角的打磨，最後還是採取了分兩步走的辦法。第一部分由編譯局主辦的《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公開發表。第二部分則托人民大學教授方生交由《中國市場經濟論壇·文稿》內部發表。一次李慎之說，他主持的《太平洋學報》不

怎麼出名，希望發表點受到廣泛批評的文章，幫他們出出名，於是又把這兩個部分放在一起公開發表了一次。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學者文集，我就把這篇東西收進《何方集》中，但還是被編輯人員看出了一些問題，經一再解釋（說都已公開發表）才沒被抽出。

這篇文章有什麼礙事之處呢？這裏只簡單介紹幾個論點。一是提出要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分開，「馬列主義」的提法是不科學的。列寧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且兩者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着根本不同。二是指出不能把斯大林模式同列寧主義截然分開。斯大林模式固然是斯大林的創造，但在很多問題上都可以從列寧主義中找到苗頭。三是給毛澤東思想下了個定義，說它「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因此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要變打仗為建設，它也就不適用了。這正是建國後中國老走彎路、喪失了三十年寶貴時機的根本原因，毛澤東思想不能不為鄧小平理論所代替了。四是說「鄧小平理論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

以上這些問題的闡述，主觀上是竭力要限定在體制內的框架中，盡量適應主流輿論導向，結果還是遇到一些麻煩。如果要完全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去寫，那就可能會失之千里了。可見在沒有言論自由的條件下搞學術研究、探討理論問題，竟是多麼地難呀！例如在此文發表後才



看到《胡喬木談中共黨史》，裏面有一句話說，「我們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解釋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這種話我就不敢說。我還只能按老框子把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都給套一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其實他們同馬克思主義只有一點皮毛的關係，並無深層次的聯繫，連馬克思主義的流派都算不上。至於在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前面加一個社會主義的形容詞，也是為適應主流輿論的需要，實際上我並不清楚社會主義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區別，更分不清兩種改革開放了。倒是鄧小平有時講得比較坦率。他說，「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我看誰也不敢說現在就搞清楚了。但是憲法和黨章又都規定必須堅持。所以那時也就糊裏糊塗地寫到文章中去了。現在看來，過去的研究工作多是在思想禁錮或不完全解放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有些問題必須重新考慮。

### （五）幾則紀事

在日本所工作了將近十年，眼見耳聞和做過的事也實在不少，大多數屬於家常便飯，用古人的話說就是不足掛齒。但有幾件事情我以為值得一提，下面就簡單談一下。

#### 一次免職事件

真沒想到，被稱為清水衙門的學術單位，研究所長這麼個小芝麻官，不但下面有些人在積

極活動地要當，而且有些上級領導也要爭着拿到手以便安排自己的熟人。我這個日本所長就先後經歷過兩次這類事情。一次是一九八二年換屆時，院黨組書記梅益在全院大會上宣布「日本所暫時由何方同志行政上負責」，意為可以隨時換人，經查問後才說出任命我為所長的決定。三年後又出現了一次院長馬洪要將我這個所長免掉的事。這裏就只談這一件。

我和馬洪原來並不認識，只是後來中央批准成立張聞天文集編輯領導小組把我們弄到了一起，不過他掛名副組長，我只是個組員。到社科院後，可能是我的一些作法引起了他的不滿。一是大概他覺得我主管的日本所作爲他和社科院對日交流的窗口不太得力，使用起來不順手。這是我從幾次陪他會見日本客人的態度和社科院同日本的學術交流中體會到的。二是沒有接受他介紹來的一個學生。起因是時任中紀委常務副書記的王鶴壽給他寫了封信，說自己有個女孩子親戚，吉林大學日語系畢業，想來日本所工作，請馬洪幫忙。馬洪在原信旁批了個「請何方同志處理」給我送來。我認爲這種作法不合規矩，所以壓下沒辦。過了一陣，馬洪來電話問，王鶴壽的信看到沒有。我說看到了。他問怎麼處理的。我說不好處理。他說，日本所是個新所，編制還沒滿，安排個人不是很容易嗎？我說，不容易，因爲院裏規定，由外地調來的人必須是副研究員或副教授以上，這個女孩只是大學生，顯然不合規定，如果要調來，是否請馬洪同志作一個單獨批示。他大概一聽不對勁，說了聲那就由你看着辦吧，掛了電話。後來我也一直沒辦。

一九八三年，趙紫陽拉馬洪去兼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因此他就跟同為副秘書長的陳楚變成了熟人。陳楚以前當駐日本大使時手下有個參贊叫陳抗，偽滿建國大學畢業，日文很好，這時已出任駐馬來西亞大使。不知什麼原因，一九八五年任期才一半，外交部就要把他調回，回來後可能就不會有新的任命了。因此他先向陳楚活動，想來日本所當所長，要陳楚求馬洪。馬洪不但答應下來，而且立即着手辦理。對此我事先也聽到點消息，不過心中並沒有在乎，因為對日本所長我是並不留戀的。但是宦鄉的一次談話使我改變了主意。他從馬來西亞開會回來約我談話，說鑒於我們兩個人的關係，有件事不能不告訴我。在馬來西亞聽陳抗說，他要回來當日本所所長，但同何方很熟，有點不好意思。（我估計是想請宦鄉向我作解釋。）我說，我正想不當這個所長呢，下台正好。宦鄉說，下台也要光榮下台，不能遭人暗算。我一想也對，經過考慮後，就起而抗爭了。

我先請常務副院長趙復三幫我問清情況。他很快告訴我，問過人事局，得知調陳抗來院任日本所長的調令已發到外交部了，調令是由馬洪個人以院長名義簽署的，沒有經過黨組討論。這一來，我就立即找秘書長吳介民，歷數馬洪當院長以來推行的宗派幹部政策、排斥異己、製造對他的個人崇拜、活動當全國社會科學界領袖，以及其他不良作風和不正当作法。同時我還要求梅益召開院黨組擴大會，聽取我對馬洪和對院部工作的意見。由於馬洪這幾年的表現不得人心，所以除孫尚清外，院黨組沒有什麼人同情他。趙復三不久前就曾寫信給胡喬木，告了馬

洪、孫尙清的狀。梅益和馬洪的矛盾也不可開交，不但對我的意見有共鳴，還邀請我去他家聊天。只是由於我有個怪脾氣，一般不去領導人的家裏串門，所以始終沒去過他家。據幾位黨組成員事後轉告，經我這麼一鬧，梅益就在黨組會上提出了調陳抗的問題。馬洪承認沒經過黨組研究，是他個人簽的調令。討論中除孫尙清外，其他人都不支持。趙復三還堅持，陳抗已年過六十，調來違背規定。末了梅益表示，這個問題按道理是應該由黨組先研究，現在大家既然都不知道，是不是先放一放，不急著調。馬洪一看他完全孤立，只好答應撤回調令。

### 一次拂袖退席事件

大約是一九八六年，有一天院副秘書長兼紀委書記楊克召開全院各所、局黨組書記聯席會議，通報胡石英（胡喬木的兒子）案件。由於我對這個案子比較了解，所以聽着楊克通報中紀委隱瞞、包庇和作假的情況介紹，感到怒不可遏，幾次要站起來批駁和揭發，都被坐在旁邊的趙復三等人所勸阻，但又實在聽不下去，只有夾起皮包怒氣沖沖離開會場，演了一齣「拂袖退場」的戲。許多與會者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按說，胡石英案與我並無直接關係，放在我的自述中好像有點勉強。但我還是忍不住要說。至於我爲什麼對這個案子會比較了解呢？說來話長，這裏就盡量長話短說。

胡石英出事前，編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該院的常務副院長兼黨委書記孫耕夫，住在我們



樓下，也是延安抗大同學，和我很熟。有一天，他談到胡喬木的兒子犯事了，成了中央正在抓的一個大案要案。他在研究生院負責協助中紀委查辦這個案子，因為日夜要查，回家都得帶上有關檔案。談到案情，他說簡直可以寫一部小說，寫出來一定十分生動。他多次給我講述這個案情，還讓我翻閱了部分檔案。去年又看到原工人出版社社長胡甫臣的夫人尹慧珉寫的文章《記甫臣的三件事》，一件就是處理胡石英的問題。這使我對胡石英來研究生院前的事也了解到一點。現在就把我記得和知道的情況作點簡要敘述，並且負責所談情況的真實。

尹文中說，胡石英是出了名的「酒色財氣之徒」和「衙內」，辦了兩個頗有名氣的刊物《人才》和《醜小鴨》，先掛靠在科委，因為關係搞不好，才看中工人出版社。來後擔任了個室主任，但他不服從領導，「還要入黨、升官、評先進」。沒幾個月，矛盾就已尖銳化，胡石英決定走人，另找個好地方。「更富戲劇性的是胡喬木親自插手」，在短短幾個月裏竟多次派秘書找胡甫臣談他兒子的事。由於胡石英不聽勸阻，違背黨組決定，私自跑到外地籌備成立全國自學者協會，胡甫臣寫信告訴了胡喬木秘書。為處理胡石英調離事，由習仲勛召集有倪志福、劉實、胡甫臣等人參加的會。習仲勛把他帶的一摞材料在會上讓胡甫臣看了一下，其中有胡甫臣寫給胡喬木秘書的信和胡喬木就此給習仲勛的信。喬木在信中控訴胡甫臣對胡石英太不公平，「連個副總編輯也不給」。喬木的護犢之情，實在令人吃驚。後來他憑着自己的關係，先要把胡石英一班人馬掛靠到人民日報出版社，沒有談成後，才找到了他的老部下梅益，轉來

社科院。原安排到社科出版社，但該社堅決不接受，一個重要理由是社科出版社不能出《醜小鴨》這樣的刊物。沒辦法，梅益只好交給喬木另一老部下、任研究生院院長的溫濟澤。胡石英的班子從此就在研究生院安家落戶了。爲了適應上面的要求，溫濟澤在胡到研究生院半個月後就把他發展成了黨員。還在習仲勛任中央安排組長時，胡喬木曾對習說，他就這一個兒子，請習加以安排。據說原曾打算讓他去山西當副省長，經過了解，山西領導表示歡迎，說咱省正缺通天的人，要批點什麼實在不容易。但這個小胡當時還不是黨員，馬上安排有困難，而工人出版社又沒給解決，所以才來到和胡喬木關係更深的社科院研究生院。

胡石英不但有雄心壯志，而且能量極大。他帶來的班子在研究生院處於特殊的獨立王國地位，幹起事來還很順利。在辦兩份有名刊物的同時，短期內又辦了兩件大事。一個是成立了中華全國自學者協會，根據地設在山西。這個協會在山西有公司和大批存款，而且是分散存放，有個縣就存了幾十萬。另一件大事是創建律師函授學校，在《人民日報》上登了招生廣告和簡章，以著名學者張友漁爲顧問，時任社科院法學所所長爲校長。規定報名費五十元，學習一年半載畢業後即有資格申請當律師。具體規定記不清了。據孫耕夫講，匯款報名的有好幾十萬人，甚至還有住在香港的外國人。後來胡石英變成大案要案，問題也就出在這兩件大事上，首先是律師函授學校。

原因是司法部看到《人民日報》上的簡章後，就立即向中央反映，說這種搞法要破壞中國

的司法制度，弄得律師滿天飛。有關反應先還是在上層踢了一陣皮球，無奈司法部門對告狀竟鏗而不捨，習仲勛只得召集有關單位研究和組織調查，結果又引出自學者協會的問題。事有湊巧，不久碰上中央要查處一批大案要案，於是胡石英就栽進去了。導致東窗事發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報名學律師的人員只收到一份簡單講義後就再無消息，大家發現上當受騙，就紛紛寫信告狀，要求退款甚至謾罵。開始時還有人折看，後來發現是千篇一律也就不再打開了。據孫耕夫說，這種告狀信裝有七麻袋。正在這時，原班人馬又起了內訌，胡石英和他的支部書記鬧得勢同水火，互相召開大會宣布將對方撤職和開除黨籍。開頭一陣，胡石英還裝腔作勢，開會時總要先講一句：「院紀委書記楊克同志要我向大家問好」。被定為大案要案後，他被抓起來了，才再做不成什麼秀。這時其他有關的人也忙於寫材料推卸責任。例如溫濟澤就說，是梅益給他打電話轉達習仲勛的交代，要趕快解決胡石英的組織問題。梅益立即寫材料反駁說，溫濟澤是胡說八道，根本沒那回事。張友漁和法學所長，也聲明他們原本不知道胡石英的騙局。

問題的嚴重還在於此事直接驚動到胡喬木。中紀委決定逮捕胡石英時，要搜查一下他的住處，於是就派中紀委副書記韓天石和國家機關黨委書記宋一平去請喬木夫婦到養蜂夾道看節目。據說當天從胡石英牀底下查出一大批人民幣和幾麻袋報名學律師的告狀信。而韓宋二人也利用節目中間休息時，向喬木夫婦解釋說，外面對石英有些反映，有關部門想看一下石英的住處，查不出什麼東西也就好落案了。使宋一平長期不得其解的是，喬木反而笑笑說沒關係，總

是會團結起來的。但是過了一陣後，喬木卻大發脾氣，說是把他騙出來抄了他的家。後來傳說，胡喬木認爲，他兒子犯事是胡耀邦有意整他。

這樣一個嚴重案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內鬧得天翻地覆，不但沒人管，還得到兩級保護，直等到中紀委定爲大案要案，才不得不「配合」查證處理。但是楊克在傳達中卻誇口說，院裏對這個案子如何重視，案發後又如何積極配合中紀委進行偵破，還經中央批准，作出了嚴肅處理。最後的落案是查出胡石英貪污八百三十元，和其他問題一併合議處理，給予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處分，判刑一年零三個月（從拘捕之日算起，現在即將釋放）。想想看，這樣的案情通報和最後處理能不叫人氣破肚皮？所以我在拂袖退席後，怒氣仍然未消，多年來都一直想把這件事寫出來，但是沒有機會。由於有意見總是想說出來，所以就盡量根據個人了解和記得的情況，放在這裏講一下。我想，胡石英的案卷檔案應該都還在，要查證是不會有困難的。

### 和鄧力群一席談

對於地位在我之上的領導人，我是一般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更極少去人家家裏。但是一九八八年春節後，我卻有意去拜訪了一次鄧力群。這不只是因爲我們是熟人，拜個晚年，主要還是他在頭年十一月的十三大上兩次落選，我覺得應該看一看。

老鄧倒也確實是個痛快人，一見面就說，兩次落選，丟了面子。我就問緣故。他說主要是



胡耀邦的一班子人起哄。我說，中央委員會選舉後他應該退出顧問委員會的選舉，不但一般委員，就是常委當不當也沒什麼了不得。他同意我的意見，並且說他就是這樣做的。頭天晚上開會通過候選人名單，第二天就要選舉。他曾三次提出不做候選人，但是都被楊尙昆、習仲勛他們擋回。最後趙紫陽說就這樣定下來了，不要再提啦。你看有什麼辦法！我說應該寫個書面意見，即使不能像余秋里那樣主動，起碼也可以立此存照。他說，哪有時間寫，實在是來不及了。

看來老鄧意見最大的還是選前的安排。所以他一再說，選舉嘛，那是代表們的意思，沒什麼可說的，問題在於選舉前就連降了三級。聽了這句話，我是丈二和尚，問是怎麼一回事。他說，開頭醞釀是定為政治局常委，後來變成政治局委員，等拿出最後名單時，已經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這顯然是對鄧小平有意見。因為陳雲提出鄧力群進常委，鄧小平等人不同意。鄧小平提萬里進常委，陳雲、彭真等人又不同意。最後鄧小平拍板，兩個人都不進常委了，就讓萬里去當個人大委員長吧。但這鄧力群在候選名單上變成候補委員的來由就搞不清楚了。李銳多次說是他寫的狀況鄧力群的信起了作用，不知真實情況究竟如何。

談話中我還問，十三大已開過兩個多月，不知有沒有中央領導同志來看望他，下一步給他安排什麼工作。他說，沒什麼人來，也沒安排什麼工作。只有薄老（薄一波）來了一趟，說他們不安排，我們給你安排，但沒說安排做什麼。問他自己的打算。他說，這次落選對他的精神

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影響，以後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多了，正好多看點書，寫點東西。只是由於青光眼，現在已變成了獨眼龍。當然，還談了些別的。例如他曾主動談到，一次鄧小平把他叫去好一頓批，說你和胡喬木不要在我和陳雲同志之間夾楔子，我和陳雲同志有不同意見這是公開的，我在和外國人談話中多次說我們中央內部也有分歧，就是指的這個，只是沒有點名就是了。鄧力群說，他就趕快向小平作解釋，表示絕對沒有挑撥鄧陳關係的意思，並列舉了近年來所寫文章和所作報告，引證鄧的話一共多少次，引證陳的話只有多少次（他都有具體數字，我的印象是引證陳的話不到鄧的三分之一）。另外，他還把鄧小平和周總理作了對比，表現了對鄧小平的讚揚。他說，在毛主席去世後，如果周總理還健在，那自然是周總理接班了。但總理在政策上舊的框框比較多，不像小平那麼堅決。比方要是總理在的話，是不會把江青給抓起來的。對這些我自然沒有什麼好說的。總之，這次長談給我的印象是，他的精神還好，正像他自己說的，作為共產黨員，是絕對不會倒下來的。他仍然健談，記憶力仍然驚人的好。

在這以後，我們雖然還見過幾次面，如紀念張聞天的活動和慶祝劉英生日時的聚會，但再沒有過個別接觸，關係也逐漸疏遠了。以前，他的著作出版後都要送我。例如《鄧力群文集》，在他親自擬定的一百名贈送名單中就有我。（不過我翻閱他的《延安整風以後》，對他把在東北為張聞天起草的兩篇已收入《張聞天選集》的文稿收在自己文集裏的作法，覺得實在不像話。如果大家都按他的辦法，一些領導人的文集就可能被起草班子給瓜分得所剩無幾。）

還有，他以又耳的名字出版的石刻集也送我一本。但是後來由於一個不懂事的小朋友跟他說了我的壞話，情況就起了大變化。更大的原因，可能還是他了解到我同他的思想距離太大，所以不但不再贈書，連關係也中斷了。

### （六）離開日本所

一九八八年，我終於離開日本研究所，轉到原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後改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中心或中心）工作。從我同宦鄉和這個中心的關係看，這倒有一定的必然性。還在一九八一年，宦鄉就開始醞釀成立國研中心，並讓我起草了籌建計劃。原來設想只是個論壇性組織，過段時間在一起議論一下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中較重要的問題，寫出看法和建議提交中央參考。成員除研究機關的一些負責人外，還吸收了幾個業務部門如外交部、中聯部的副部長錢其琛、錢李仁等參加。這種論壇性的會只開了一兩次就因各人的工作忙而繼續不下去了。一九八二年三月，宦鄉商得趙紫陽同意，在國務院下成立了國研中心，由他任總幹事。開始他沒有讓我參加，只是同我保持一些研究工作和學術交流方面的聯繫。如一九八六年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召集的一次會議上，大家決定合作編寫一本《當代世界政治經濟基本問題》，就由宦鄉和我分任正副主編，還邀請厲以寧、李琮、郭震遠、徐葵、俞邃、宋以敏等人參與寫作。不期審稿工作開始不久，宦鄉就得了肝癌，不但這主編工作落到了我一個人身

上，而且一九八八年初在他去上海動手術後，還要我照顧一下國研中心的工作。大約到年中，他就正式要求國務院調我去中心，我也實際上代他管起中心的事了。

但是這些情況都還沒有報告社科院，而社科院只知道我不想再當所長，所以只是考慮設法挽留。按當時社科院的規定，所長任期為三年。一九八五年胡繩代替馬洪任院長後，對所長作了重新任命，到一九八八年七月正好期滿換屆，而這時胡繩又恰巧骨折住院。怎樣能如期安排好換屆所長，自然成了院裏一件大事。記不清是六月還是七月的一天，趙復三和李慎之兩位副院長約好到我家來。我知道他們來是動員我留任的，所以見面後就開玩笑套了一句《紅燈記》上鳩山的台詞，說今天相會，只叙友情，不談正事。但趙復三還是鄭重其事地說，胡繩把他們兩人叫到醫院裏去，要他們無論如何說服和挽留我，哪怕再幹半年，讓院裏物色到代替的人，因為現在是實在找不出合適的人來。他們一再表示，胡繩是如何懇切，如何着急。於是我只好向他們談了不能不去國研中心的實際情況。趙復三聽後當即表示，既然如此，就不必勉強老何了，因為國研中心的工作重要得多，宦老更不能不照顧，日本所的問題，我們另想辦法。這樣一來，我就開始辦理去中心的手續，同時也還得兼管日本所的工作，直到趙復三他們找到正式的人選後，我才不再管日本所的事了。

離開日本所時照例要作一個告別講演。我講的很簡單，談到日本所成立後取得的成就和在國內外享有的地位，並着重講了自己的工作沒做好，主要表現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上。另外



還提出約法三章：不帶走一針一線，也不再從日本所要什麼東西和享受什麼方便；對所裏工作不再干預，不指手劃腳；所裏要求幫忙的事和需要利用我在日本的舊關係，一定盡力而為。這些承諾，多年來一直嚴格遵守。只是到一九九三年，應日本所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要求，對於院裏決定將日本所合並到亞太所一事，曾以政協委員的身分，通過政協渠道，請李瑞環、胡繩向中央反映過一次意見，同時抄送除胡繩外的社科院領導。因為王忍之和滕藤來社科院掌權後，也仿照大專院校合並的模式，要求社科院推行合併政策，要將日本所合併到亞太所，美國所和拉美所合併為美洲所，西歐所和原蘇東所合併等。這只是國際片的情況，其他片也有不少所的合併計劃。這些合併不僅會引起黨政領導和學科管理上的混亂，造成很多矛盾，而且對外影響也不好。一些日本人聽到消息後，就猜測說，這表示中國對中日關係不重視了或對日態度強硬了。我的意見送上去自然是石沉大海，王忍之、滕藤反而派專人來日本所（當時沒所長）加速合併事宜。結果日本所也確實被順利地合併了。其他一些所，如美國所等，由於進行堅決抵制，最後沒合併成。過了幾年，李鐵映出任社科院長，日本所這時已被併五六年，在科研和物資上都受到不小損失，幹部們意見很大。於是我又應他們請求，以一面之交的關係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寫信給李，反映日本所幹部要求脫離亞太所恢復原建制的共同願望。結果又是照例石沉大海。從此我就不再管這件事了。但是這種人爲的「拉郎配」，終究很難長久。等到問題愈來愈多，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在王忍之和滕藤離開領導崗位後，院黨組才不得不於二〇

○一年又將日本所重新獨立出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這也是貫徹人治和外行領導內行在科研領域的一點表現，所以多說了幾句。



第十四章

國研中心

一九八八——一九九五年



## （一）崗位變了

### 兩頭兼顧

由於日本所長的繼任人一時找不到，所以我還不能完全脫身去國研中心上班，只能兩邊兼顧着。其實在這之前我老早已在物色日本所的接班人，總想盡快找一位內行來代替自己，但是幾次都失敗了。後來只好立足於本所培養。還在一九八五年，我們就把一位副處長逐步提拔為副所長，並在所裏解決了他的職稱（晉升為研究員）和組織問題（發展為黨員）。在我看來，由他接任所長還是比較合適的，而且也順理成章。可我出於習慣性地遵守組織紀律，始終沒向他通過氣。不知他是出於誤會還是受人調唆，一時間出乎意外地急於發難，聯絡一些人四處活動和向法院裏告狀。結果惹惱了院領導，不但不同意他繼續留在日本所，而且堅持要把他調出社科院，最後去了經濟研究中心馬洪那裏。這樣一來，日本所就只好由院裏給臨時另找人了。在找到之前，我也總不能立即甩手不管。

至於國研中心那邊，也必須立即走馬上任。趙紫陽當總理的時候，對國研中心還頗為重視。鑒於宦鄉一則年事已高（時年八十），二則國內外的社會和學術交流活動還特別忙，一九八七年十月特任命原胡耀邦秘書、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鄭必堅為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

總幹事，輔助宦鄉抓科研業務。行政黨務本來就一直由另一副總幹事高鏗主持。但不知什麼原因，一九八八年七月前後，鄭必堅才工作半年多就又離開，不久被調去社科院當了副院長，而宦鄉這時又恰巧確診為肝癌，必須住院做手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被安排立即去國研中心代替鄭的工作。雖然並無正式任命（國務院總理李鵬任命我為國研中心副總幹事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卻已坐在了原鄭的辦公室裏。但日本所還得經常去上班，直到社科院領導為日本所配齊班子，我才完全離開日本所，作了上面已經談過的移交和承諾。其實對我來說，從日本所到國研中心，只是變換了工作崗位，工作內容基本上還是連貫的，仍然是在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這個圈子裏打轉轉。

### 送走宦鄉

國研中心的創始人和總幹事宦鄉，是國內外公認的當時中國第一名國際問題專家。他創辦國研中心的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在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方面為黨中央和國務院起點參謀作用。二是想要帶動全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和開展對外學術交流。他的雄心壯志確實不小，在帶頭打開對外學術交流的大門之後，很快就萌生了一個念頭，要辦一份有如美國《外交》季刊（現已改為雙月刊）那樣的《中國外交》，以好幾種文字出版，在國內外發行。為方便起見，他計劃把出版發行放在深圳，並且已和當時深圳的負責人李灝談好，一切物質條件和經費都由深圳

負責。他心目中的主編早就看准了許乃炯，後來許代表中國去世界銀行當了執行董事，他沒辦法了又找到我的頭上。但是我從開始醞釀就抱消極態度，認為他的想法太不現實，一直在潑冷水。因為關鍵的問題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有關外交的問題禁忌更多，不允許自由討論，更不准有與官方不同的聲音。如果刊物內容完全與官方口徑一致，只講官話，沒有什麼不同看法，那就和《紅旗》雜誌或《世界知識》差不多了，又何必另起爐灶呢？就這樣，拖了兩年我也沒答應。宦鄉原來也並不想讓我出任中心副總幹事，現在沒辦法了，鄭必堅一走，只好讓我去充數，辦刊物的事也就放下不談了。正當他雄心勃勃地進一步開展內部研究和對外交流事業時，卻檢查出已經患了初期肝癌，不得不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參加香港一個學術討論會後到上海住院動手術（因為據說上海長海醫院吳孟超大夫的肝癌手術是當時全國第一刀）。手術倒很成功，所以他在休養恢復期間仍顯得精神旺盛，雄心未減，只是準備退居二線，提出以後國研中心的事主要由我來管，他打算除了抓大事外，要安靜下來集中精力寫一本平生的第一部專著。有時他也和我討論當前的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我們兩人都感到對外政策有點落後於形勢的發展，總是「慢半拍」，顯得被動。例如經濟國際化在迅速發展，我們卻為國內一些工業部門的短視所妨礙，不急於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創始國席位；經濟發展和市場化要求儘早同國際接軌，我們卻異想天開地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冷戰走向結束的形勢下，我們仍抱着一些舊的觀念不放，因意識形態的原因不能和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提出所謂「三大障

礙」，而首要一條竟是柬埔寨問題（要蘇聯逼越南從柬撤軍），要大力支持像紅色高棉之類的極權主義政權，等等。根據這些共同想法，他要我以他的名義給中央寫一份形勢分析和政策建議，此外還要代他起草一篇《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基本問題》一書的《前言》。這樣，我就只得一再奔波於京滬之間，忙乎了一陣。正當宦鄉樂觀地籌劃一切的時候，厄運到來，他的病情出現突然變化，倒不是癌症的發作，而是術後輸血的感染，發生了急性黃疸性肝炎，進入冬季，就已經不能起牀了。我代寫的《前言》，他只能躺着看一遍，一字未改地只寫了「感謝」二字。到一九八九年二月我去看他時，他已說不清話了。我多次問他還有什麼交代，他只是再三重複關於設立宦鄉基金的問題（因為他於一九八〇年受聘摩洛哥皇家科學院聯繫院士，積累的酬金已有十多萬美元，他原想用這筆錢建立一個獎勵國際問題研究的基金。他去世後，由於社科院黨委不同意，這最後的一個遺願也就落空了）。至於國研中心的工作，他竟沒有作任何的囑托和交代，就於二月二十八日告別了人世。我們利用他和時任海軍政委李耀文的關係，弄到一架運輸機把他的遺體運回北京火化。

我和宦鄉相識相處近四十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對於他的病故，我當然感到十分悲痛，但更重要的還是國研中心失去了主心骨。新的總幹事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來，而且說老實話，再要找到像宦鄉那樣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身兼新聞家、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和社會活動家的人來當總幹事，是根本沒有可能了。所以曾經和我一起充當宦鄉哼哈二將的李慎之說，國



研中心實際就要宦鄉一個人，宦鄉在中心在，宦鄉亡中心也就亡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宦鄉的助手來到中心，又沒有總幹事，就只好把驢當馬騎了。

### 工作概況

我從一九八八年七月宦鄉生病後開始，到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國務院人字七十六號文件免去副總幹事職務為止，在國研中心整整工作了七年。這七年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頭兩年新任總幹事未到任，我只好以無名之身在那裏拳打腳踢；後五年主要分工管調研，但工作量並未減輕，前後做的事情也幾乎完全一樣，只是後來不再管全局、不再召開會議、不再拍板定案就是了。這裏先講一個大概情況，下面再就幾個自以為還值得一談的問題分別作點交代。

這七年的工作，是名副其實地在搞調研，而且主要是自己研究，對大家的研究管得不多，無非是定題目、改文章，提點意見。在這期間，我曾給定居國外的鄰居回過一次信，用順口溜來描述我一天到晚的工作和活動，就是：「看不完的材料，開不完的會，寫不完的文章，受不完罪。」確實也是，搞這種研究工作或文字工作，一直都處於緊張狀態，單是這看材料就真是沒完沒了，書籍、報刊、公開的和內部的材料，每天一大摞，不看也得看，耽誤了還得補看。至於寫點有新意的文章，就更不像一些詩人和作家有了靈感激情能夠一瀉千里那樣輕鬆愉快了。我在這七年期間寫的內部報告和公開文章，長有幾萬字，短只幾百字，加起來也不過百

篇左右。參加與學術有關的活動，如出席研討會、外出做報告等，在國內平均每年大約有十多次，出國總共十五次，年均兩次。此外的一些社會活動就另談了。

這期間還有以下的幾件瑣事，也附帶在此做點交代。一九九〇年我被評為在社會科學上有特殊貢獻者，從一九九一年起領取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這算是社科界的第二批（在這之前評的第一批有錢鍾書、呂叔湘、劉大年等）。一九九〇年，我還被推選為中蘇友協（後改為中俄友協）副會長（會長伍修權），直到二〇〇〇年卸任，後來還掛了個名譽顧問之銜。一九九三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對我對和平與發展的研究，授予我名譽博士學位，曾於翌年年初與徐葵結伴，應邀領取證書，參加了幾天活動。這期間，還被國內幾所大學如北京大學（一九八四年聘為國際政治系教授，這次聘為國研所教授）、南開大學等聘為兼職教授，不過多係掛名，沒幹多少實際工作。

離開國研中心後編制又轉到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因為是全國政協委員，所以換屆前還不能離休，直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才批准離休，第二年一月辦了手續。在這三年多時間裏，並沒有參加日本所的工作，而是做了一陣國際問題的自由撰稿人。同時由於在國際問題研究界還多少有點所謂名氣，所以約稿、請作報告、參加學術活動仍不間斷，除了不必每天上班外，和以前好像有點差不多。就這樣又瞎忙乎了三年多，到一九九九年才下決心改行，專心學習黨史。但這時已經是七十七歲的人了。所以李慎之等一些熟人都批評我改行太晚。我自己又何嘗



一九九三年，領取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證書。右一為該所所長季塔連科

不後悔呢？

## （二）科研工作

### 蕭規曹隨

我接手主持國研中心工作後，一切都按宦鄉生前的老規矩，沒有什麼大的改變。當時雖然也曾分室分組（世界經濟、國際政治等），但基本上按各人所長和志願分工，例如一個懂德文的青年研究人員童天齊就一直只研究西德問題，我們也順其自然，不加勉強。幾個研究員也是在整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中自行選題。全體研究人員平均每個禮拜開一次會，討論形勢或政策中的某一個問題。有時對寫出的成果也進行集體評論，但一般由我審閱處理。當時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為戰，數量雖有個大體要求，但並不嚴格，所以出的成果也就多少不一。有人個把月寫篇文章，也有人一年只寫那麼一兩篇，還被「槍斃」了。有些文章沒有達到內部打印水平，就鼓勵他們修改後向外投稿，供報刊發表，因為這都屬於培養和練兵過程。總之，我對大家的研究寫作工作比較放手一些，在學術思想上也主張寬鬆和寬容，不管得太死。頭兩年是這樣，新總幹事（原駐聯合國大使李鹿野）上任後基本上還是這樣。因為他雖然也提出過一些新的主意，如更多發揮集體力量，多用中心名義寫內部材料，少由個人署名發表公開文章等。



但由於他本人基本上不寫文章，又不和別人共同研究，大家又按老辦法幹慣了，所以他在科研管理上也只得蕭規曹隨了。

當時中心出的產品分三種。層次最高的叫做「簡報」，代表中心看法，所談問題較大，機密性較強，因此印數較少，只發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參閱。例如宦鄉病中和我商討的那些意見，後來由我寫成一篇萬把字的文章，就是以國研中心第×號「簡報」發出的。根據李一氓的提議，當時管外事的吳學謙副總理，還專門就這篇簡報找我談了一次話，可惜沒談出什麼名堂。第二種叫「研究報告」，屬於一般性的分析和建議，由於機密性不強，發的範圍也較廣，一般署作者姓名，還特意注明不代表中心看法。這一形式的產品數量最多。第三種是「情況反映」，主要是參加對外學術交流或出國考察，了解到值得向上反映的情況。這類材料也不多，因為出國參加活動的多是中心的領導人員，而他們回國後又很少寫什麼材料。第四種是我自己創辦的一種「政策建議」的短小報告，單刀直入，每期只提一個建議，完全由我一個人操作，既不同中心其他同志商量，也不給他們看，寫好後就直接送外辦轉呈中央領導了。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防止泄密。

## 個人的研究

我在國研中心七年主要是搞研究，所以寫的內部報告和公開文章也確實不少，有些還是利

用開會或出國の間隙寫成的。我寫的這些東西，也常有被轉載或翻印的。公開的，有些報刊轉載或摘登；內部的，有關單位或系統翻印或摘發。當時並沒有要通知本人的規矩，所以轉載和翻印的情況我一般都不知道。例如一九九一年在訪問韓國途中寫了一篇《蘇聯八月事變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的影響》，我能看到的翻印件就有五六種，有人從外地回來還說他看到有十來種。至於這一時期我研究和寫作的內容，也是非常龐雜的，主要是緊跟國際形勢，抓住某個問題，經過研究，提供點看法。就形式來說，寫得最多的是內部的簡報或研究報告，這也是我們本來所承擔的任務。公開在報刊上發表則算是個人的事，與任務基本無關，文責自負，領導上可以不管。

### 課題舉例

既然我這一時期的工作主要是科研，那麼談自己的經歷就不能不敘述一下個人這方面的情況。不從事這類工作的人也許會感到有點枯燥，所以就舉幾個在我看來還值得一提的問題，作點簡單介紹，其他就不多談了。

舉例一，《關於調整對外政策的建議》。這是一九八八年七月我給中心寫的第一篇《簡報》，一共提了十六條建議，記得主要的意思有：緊緊掌握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把外交工作的重點迅速轉移到經濟上來，對外交態不妨低一點，以免樹大招風；把發展對美關係放到最重要地位，對外開放主要也是對美開放；改善對蘇關係，早日實現正常化；對越南關係應適當放

鬆，早日恢復正常；改變對紅色高棉的態度，及時放下包袱，擺脫在柬埔寨問題上的孤立處境；積極參加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不能由於擔心日本主導而持消極態度；發展同南朝鮮的經濟關係；適當壓縮對外經援，特別應減少援建樓堂館所；等等。

舉例二，堅持對國際形勢的根本判斷。這是我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為此寫過不少內部報告和公開文章，主要強調兩點。第一，由於我們認定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題、時代特徵，那麼就應長期堅持這一根本判斷、絕不能遇到一點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改變政策；第二，更重要的是按照這一根本判斷進行戰略決策和工作部署。例如既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不會發生大戰，那麼在國防建設上就應作長期打算，避免陷入同大國或某一特定對象的軍備競賽中去。不應只是短期着眼，把軍費主要用於近期的裝備和軍購，而應着眼於長遠，加大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因為隨着科技的飛速發展，軍備更新極快，如果把錢過多地花在購進很快會淘汰的（先進的人家不賣）武器裝備上，那就只能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走，始終處於被動。事實上，我們國家在教育 and 科技上的投入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也還是世界上比較落後的。但另一方面，各級衙門樓堂和高幹住所的更新大約又處於世界最先進之列。例如美國那麼富有，國防部的五角大樓百年不變；可我們從建國初期的三座門到現在的八一大廈，不知已更新了多少次。

舉例三，關於全球化和地區化的問題。這也是我在上世紀最後二十年中一直關注和着重研

究的一個問題。我曾論述過全球化的許多方面，如全球化與一體化，全球化與區域化，全球化與民族化，全球化與信息化，全球化與均衡化，全球化與兩極分化，全球化與和平發展等等。除了學術探討外，主要還是着眼於政策建議，強調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必須積極參加和主動適應；不能把全球化只局限於經濟，正像經濟發展必須適應市場化一樣，要促進文明和維護穩定還必須適應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

舉例四，所謂「蘇東波」。既然說是緊跟形勢，所以蘇聯東歐的變化就成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研究的又一個重點。當時港台傳媒用蘇東坡的諧音戲稱這一重大變化，大陸也有人仿效，一九九〇年四月我率中蘇友協代表團訪問蘇聯，回來就在政協小組上斷言「蘇聯氣數已盡」，曾受到一些同事的批評和質疑。一九九一年三月再次訪蘇時，就已親眼看到蘇聯崩潰的開始。社會秩序極度混亂，我們作為蘇聯科學院的客人有時竟然一天吃不到飯，只得晚飯時混到一個學校師生隊伍中排隊領取一大勺菜飯。後來談到蘇聯解體的原因，我無論是在中央黨校作報告還是寫文章，都不同意那種主要歸咎於領導人（說是由於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人的背叛）的英雄史觀、思想掛帥的唯心論，和歸之於和平演變的外因論，而認為根本原因是；經濟沒有搞上去，政治上專制恐怖、完全脫離群眾，對外被軍備競賽拖垮。現在看來，還是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歸納的比較好，即由於黨及其領袖對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實行三個絕對壟斷。

舉例五，關於南北差距。在研究發展中國家（所謂南方）問題時，我發現長時期以來（從



上世紀八十年代直到最近）不但我國輿論主流，而且幾乎所有國家領導人，特別是主管外交事務的領導人，都一直聲言南北差距在不斷擴大。對這一完全違背事實的論斷，除內部調研報告，我還先後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世界知識》上撰文辨析，但是沒起作用，直到現在還看到這種「權威」言論。他們即使不注意其他南方國家如東盟、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的發展，總不應忘記最大的南方國家中國自身的發展吧？實在叫人想不通。

舉例六，我已經離開國研中心的一九九七年，又應約為《環球時報》寫了一篇《我們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嗎？》（系內部調研報告《對中日關係的一些看法和意見》的改寫稿），這是前面已經講過的。問題在於，這些意見不但沒有起作用，個人還受到內部追查，報紙受到宣傳部門的「提醒」。特別嚴重的是，中日關係更加速走下坡路了。

上面只是舉幾個例子，實際上寫的東西和提的意見會比這多幾十倍。至於起到什麼作用，就很難說了。要說這些意見頗受重視，那恐怕是吹牛。要說一點影響都沒有，倒也不見得。因為這總是構成輿論的一個小分子，這個人不看還有那個人看，講得多了，知道的人也會多一些。例如我們談過的那個和平與發展時代問題，由於講的時間長，參加討論的人多，結果弄得中央領導也知道了。聽說有人問到鄧小平，鄧說，先不忙，看一看再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央外事領導小組開會，我代替宦鄉參加，會上就曾提出和平與發展時代問題。我記得與會的秦基偉（北京軍區司令員）、朱良（中聯部部長）等好幾個人都表示贊同，還沒聽到反對

的意見。但組長李鵬總理、副組長吳學謙副總理和錢其琛外長沒有表態，會議也就接着談其他問題了。大概是由於鄧說「不忙」，後來又缺乏拍板定性的權威，所以在時代問題上一直限於主題和特徵的提法，只差明確定性為時代了。

從總體上看，回顧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提看法和意見，絕大多數還是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自己內心裏也還是踏實的，算是時間沒白過。不過這只是自我評估，實際上還有不少問題存在着爭論。

### 政策建議

這項工作由於是單人操作，所以國研中心人員大多不知道。宦鄉去世後，我開始主動寫了兩條建議，受到時任外辦主任劉述卿的肯定，他還提出所謂「短平快」的意見，具體為：每期不超過一千字，只印八份，分送常委和外交部領導，因為寫得太長了領導人沒時間看。我寫的政策建議都有些什麼具體內容，已記不清了。只記得開頭兩期是對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善後提的意見。一次是鑒於匈牙利事變中明曾蒂大主教逃到美國使館，住了差不多有二十年，當美蘇關係趨於緩和時，匈牙利政府還是允許他出國了。因此我建議對「六四」時逃到美國使館的方勵之夫婦加以放行。因為長期不准離境，不但影響中美關係，也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警戒防範還徒增麻煩。另一次是建議立即取消北京的局部戒嚴。因為北京那次長時間戒嚴，不僅沒有必要，還招致國際輿論批評，有損中國的聲譽，因此建議立即解除。後來這兩件事確實也

都這麼辦了。但據有關方面透露，中央本來已做出決定，我的意見只是碰巧而已，並不是真的看到我的建議才採取措施的。

此外還記得提過一次加強對近中東工作的建議。由於那裏的石油資源和戰略地位，一直是大國重視和爭奪的地區，我國卻插不上手。過去那種用台灣海峽打炮支援黎巴嫩的辦法已經不能再用；搞經援軍援，我們又不能和發達國家比，但總是無所作為也說不過去。所以我建議可從加強外交活動着手，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分，派專人到中東搞穿梭訪問，利用矛盾，擴大影響。詳細內容已記不清了。

政策建議這項工作，在中心的新領導來後就停止了。起因是這樣的：鑒於韓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別是對我國在引資和通商上都有很大的潛力，同時也看到蘇聯和東歐各國在紛紛和韓國建交，而北朝鮮的反應也只是無可奈何，因此我認為中國應該及早和韓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就此和領導商量時，不想他卻一瓢冷水潑下來，認為這個意見不可提。理由是，如果外交部已經有這種設想，自然無須提了；如果外交部不同意，那麼這類問題由我們提也不合適。我聽後一想，這樣說來，不但提政策建議是多此一舉，連國際問題的調研也都屬於可有可無了。這時又適逢外辦也改換了領導。從此，政策建議在我這裏就一筆勾銷，國研中心也沒有這項業務了。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最後幾年我的內部研究報告也在逐漸減少，公開文章倒是寫得多了起來。這算是我在科研上的一點小變化，成為離開國研中心的一段過渡。

## 科研活動

### 江澤民召開座談會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五日，江澤民總書記召開座談會聽取國際問題研究界對形勢和外交問題的看法和意見，事前要求外辦提供與會者名單。新任外辦主任劉述卿原來是外交部副部長，對這方面情況不是很熟悉，所以要我先提個名單供他們參考。於是我就按自己平時了解寫了個包括二三十人的名單，而且主要都是北京的，外地記得只提了兩位和江澤民同時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陳啓懋、江蘇省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程極明。參加會的領導人，我只看見楊尙昆。還有什麼人，沒看清也記不住。感到詫異的是外事領導小組組長李鵬卻沒參加。注意這個細節，是由於當時對於不是循例由現任總理代替下台的總書記，而是用了外地調來並非常委的政治局委員，人們有些傳言和議論。

由於外辦上送的名單把我放在了第一名，所以會議一開始江澤民就點名要我發言。記得我的發言比較平和，講了三個問題。一是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二是對開展外交工作的建議。這兩方面的看法和建議也就是上面談過的那些，沒有什麼特別新的內容。三是關於國際研究方面的意見，主要是要求開放禁區，允許發表不同意見，如果研究工作只是摸領導的意圖，看眼色，順着來，那樣的研究可以不要。如果科研成果和發表文章都只能限於闡釋中央政策，只能用一



個聲音說話，那不都完全變成宣傳了？哪裏還談得上研究？同時在全球化加速發展、許多方面都要同國際接軌的情況下，我們對國際消息和外國言論卻限得愈來愈嚴，只報喜不報憂，只傳播外國人說的好話（有些還加以誇大和渲染）而隱瞞他們的批評，這不但妨礙廣大幹部群眾了解情況、面向世界，而且還助長民族驕傲情緒，也會使領導上受到感染，影響對外關係上韜光養晦的原則。我的中心意見是主張言論自由和信息公開，只是講得含蓄一些。同樣的問題，有的人就講得比較尖銳。而且大家意見最多最大的也就是這個問題。江澤民只是聽和埋頭記，中間沒有講話，也很少插話，最後表了個態，說有不同意見，內部可以自由發表，對外還得同中央保持一致。

關於國際問題的座談會大概開了兩三次，直到沒人再提意見為止。此外還召開了其他不同界別的一些座談會。例如理論界開座談會時，著名經濟學家蔣一葦在癌症已經擴散到病入膏肓的情況下，還特意從醫院出來參加了一陣會，發了一次言。中心意思是希望對學者知識分子寬厚一些，對輿論管理寬鬆一些。他特別提出，應該允許「六四」期間出走的學者知識分子回國，並舉了原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說他是我們培養的有一定理論水平的學者，出走後也沒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這樣的人不應堅拒於國門之外。蔣一葦的行爲和發言都非常感人，被當時學界傳爲佳話。此後不久他就病故，他的意見只是被領導記錄在案而已，並沒起任何作用。細想起來，這些座談會的目的，似乎不在於聽取意見，而在於表示要聽取意見，也了解一

下都有些什麼意見，就是人們說的摸底或者調查研究。因為此後的國際問題研究並沒有得到放鬆，輿論控制與資訊管理反而愈來愈緊了。朱厚澤當中宣部長時所提被稱爲「三寬主義」的寬鬆、寬容、寬厚，仍然被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遭到進一步批判。

### 創辦年終討論會

國研中心有個特點，就是業務上的自主權比較大，沒有多少婆婆管。有關的上級機關只有兩個。一個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只管後勤供應和全年預算，平時活動一概不管。一個是國務院外辦。我到中心後，時任外辦主任的劉山交代得很清楚，說外辦和中心不是行政和業務領導關係，他們只是受外事領導小組的委托和中心聯繫，主要做兩件事，一是隨時向中心吹點風（傳達中央有關形勢和外交方面的精神，一般只傳到副總幹事，有時也擴大到司局級的常務幹事），二是起承上啓下的作用，不管日常業務。所以主持中心的工作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首創權，除上述的「政策建議」之類業務外，全國的年終國際問題研討會也完全是我們自主辦起來的，既不必向任何機關請示，也用不着哪個機關批准。這是我跟張聞天工作時學到的。那些年在外交部，每年十二月都要開幾次會，總結當年的形勢和工作，做出對來年的估計和規劃，然後由我寫成正式文件，經張聞天批送周總理和中央審定。在中心我可以做主的情況下，也就這樣活學活用了，同主管行政的高鏢副總幹事商量後再召開常務幹事會，決定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舉辦。此後每年一次，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着（中心撤銷後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接辦）。我

個人也不間斷地參加，到二〇〇六年爲止已參加了十八次。

再說，中心本來就有一個聯繫全國國際問題研究的任務，既設在國務院下，宦鄉又曾是這方面的領軍人物，所以從一開始就受到國際問題研究界的重視。能夠被邀請與會被看成是一種規格，基本上是凡請必到，還有些地位較高的領導人自己主動要求參加。爲了保證討論的高規格高質量，也受會場容量和接待能力的限制，頭幾年邀請外單位的人基本限於二三十人，大部分還是來自北京有關單位，外地請的不多。每次會期兩到三天，自由發言，提倡爭鳴，最後也不作結論。對大家的發言，除寫一總的報告向上反映外，還挑選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或建議，分別寫一些「簡報」。所以這個年終討論會，不但進行了學術交流，也向上反映了國際問題研究界的意見。開頭那幾年，每次會後《人民日報》都要發長篇報道，講述會上所談一年來國際形勢的特點和對今後的展望。應該說，創辦這個年終座談會還是起了些作用的，後來雖然不少單位仿效，但舉辦全國性的似乎還不多。

此外還有一個與全國聯繫的問題，就是宦鄉開創的走出去的辦法。一些地區，例如東北瀋陽、華東上海、華中武漢等，有時開地區性或一個城市的國際問題討論會，也請國研中心派人「指導」和作報告。宦鄉在世的七八年多是他自己去。他去世後一個時期，由我或高鏢去。例如一九九〇年我外出參加會議和作報告，記得的就有五次。到了東北地區要開的那次學術討論會，原定由高鏢去（以前幾次都是宦鄉參加），新領導來後沒讓去。同停辦《政策建議》一

樣，中心同外地以前的那種業務聯繫從此也就中斷了。在這以後，我參加外地的活動和其他單位邀我隨團出國交流，都是以個人身分進行的。

### 「懷柔會議」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鄧小平提出在國際問題上「還是要有所作為」，當時所指，就是「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第二年五月，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在懷柔召開學術研討會，有國務委員兼外長錢其琛出席，主要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因為據說鄧小平的意思是要在當年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這麼一個建議。討論的情況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在發言中是反對這個意見的，認為在聯大提這樣的建議不適當。首先是時機不對。因為關於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並不是什麼新問題，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就發動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運動，不但在第三世界的一些組織如不結盟運動中大聲疾呼，也在聯合國不斷講，還掀起了南南合作的高潮，促成了持續多年的南北對話。這一對話，最後以一九八一年十月在墨西哥舉行的沒有取得重大成果的坎昆會議（由中國、巴西等十四個發展中國家和美、英、法、日等八個發達國家高層包括美國總統里根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參加的南北對話會議，會上多數國家同意進行全球談判，也因美國持消極態度沒能實現）而告終。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已逐漸進入低潮。在這種情況下，再舊事重提，恐怕連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有多少響應的。第二，國際經濟秩序實際上像股份公司，誰的錢多，誰的發言權就大。



國際經濟秩序，或者說是它的遊戲規則的制定和操控，也是哪國的錢多實力雄厚，哪國發揮的作用就大。有關國際經濟的幾個重要組織，主要是關貿總協定（後改組為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也都是按這個規矩行事的。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年美國擁有百分之十上下的投票權就可操縱提案的表決。我國原來的投票權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所以說話的影響有限（二〇〇六年九月才提升到百分之三點七二，發言權又提高了點）。可見，國際經濟秩序並不決定於國家數量的多少（發展中國家多，往往說了不算；發達國家少，卻說了算），更不決定於意識形態。我們過去政治掛帥慣了，總以為只要主張對就一定行得通，所以喜歡在國際事務中提新口號，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就屬於這一類。第三，對我們這個長期閉關自守的國家來說，在全球化飛速發展的時代，首要的問題是盡快參與現行的全球化，同現存的國際經濟遊戲規則接軌，而不是急於另搞一套。這種總想用自己的觀點改造世界的想法，還是以前的「左」傾思想殘餘，不但行不通，而且妨礙改革開放。

上述意見是我在那個時期的一個重要想法，在一些會議上的報告和發言，在發表的好幾篇文章中，都曾談到過。所以在懷柔會議上講一通帶有很大的必然性。因為我對我國遲遲不參加關貿總協定一直意見很大，一有機會自然會表而出之。

錢其琛在會上講了些什麼，我沒記，現在也回想不起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當年的聯合國會議上沒有像鄧小平設想的那樣提出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提案和建議。

### （三）關於「六四」事件

#### 經歷「六四」

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叫「八九」政治風波），我已到國研中心工作快一年了。由於中心的辦公室在西安門大街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大院內，我的住地又在東三環外，所以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東西長安街。六四前的一陣子還可經過天安門，看到人山人海的群眾遊行集會。後來天安門前不通行了，我只好繞道沙灘、北海這條線，但也經常遇到學生的遊行隊伍。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學生們的精神、秩序和紀律。我幾次看到從西郊走過來的清華、北大等學校的隊伍，到中南海附近的街上，已經走了十多里路了，但他們始終精神飽滿，隊形整齊，秩序井然。我看到幾次，還跟着在旁邊走過兩小段，感到實在有點佩服。還有幾天，不知北京市當局是故意要用搞亂交通來栽贓，還是爲了集中警力搞什麼特別活動，竟撤掉了一些繁華街道上的交通警。又不知是哪幾個學校的學生組織起來代守崗位，指揮交通，保證了車流暢通，沒出事故。雖然那時候北京的車輛還不多，但由學生自發做到這點，也真不容易。在那些天裏，不但學生們表現得頗有紀律，而且我看到的市民群眾也都很守秩序，學生遊行隊伍經過，大家只是佇立街道兩旁觀看。還有不少機關幹部和老百姓給靜坐的學生送食品飲料。令人感到

奇怪的還有，平時經常發生的那種街坊鄰居吵架現象不見了，據說連小偷也不再出來作案。總之我所看到的市場秩序並沒有亂，我仍然照常上班、看材料、寫文章。機關秩序只有一個變化，就是大家經常一起議論時政，互道見聞和談點小道消息。所以根據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把那次得到廣大市民支持的學生運動，一開始定性為動亂，後來更升級為反革命暴亂，都是不符合事實的。

五月十五日，我和老伴宋以敏按事先約定去西安為解放軍政治學院作時事報告，講完後順便回臨潼老家探親。這次西安之行，看到的情景和北京差不多，學生遊行示威的場面甚至還要熱烈一些。學生們所提要求和標語口號，同北京沒什麼兩樣，只是看到很多揭批趙紫陽兒子的大字報，說他倒賣西安所產黃河牌彩電，因此街上看到不少在北京沒見過的「還我黃河！」標語。從這一點也多少可以看出，說趙紫陽是「六四」學生運動的「黑後台」就不大像。而且事後聽說，他的兒子並沒有倒賣彩電。我們在西安前後逗留了十來天又回到北京。這時北京反「官倒」、要民主的聲浪已經更高了。我也有幾天沒有上班，而是去李一氓家向他了解當時的形勢。很明顯，他是同情學生運動的，認為中國需要進行幅度大一點的民主改革，在經濟轉型期間，應該嚴格限制特權，對權錢交易和以權謀私加強監督和制裁。由於我不習慣串門，所以除李一氓外，那些天沒有再去別的人家。當時社科院從胡繩、錢鍾書、李慎之等到許多研究所長，曾聯名支持學生運動，竟然也沒人找我簽名。如果有人來找，按我的思想，肯定是會簽名

的。主要是沒什麼機會，也使我沒能參加其他活動。本單位的同志上街遊行，沒人通知我，事後清查時我才知道。直到發生天安門事件的那天夜裏，我被密集的槍聲驚醒，還以為是老百姓辦紅白喜事放鞭炮呢，根本沒有當回事。後來接到中日友好醫院一位當醫生的親屬的電話，談到軍隊開槍和他們接收傷員的情況，這才知道出了事。起牀後去街上看，只見大批軍隊從西往東開，兩旁站着不少居民在高聲叫罵。爲了看個究竟，我和家裏的人又穿過東三環路向城裏走，這時已經看到路旁的屍體。再進到建國門外，更看到坦克碾壞路面，兩旁樓房多有彈痕，外國使館人員居住的外交公寓更是彈痕累累。據說是部隊半夜開過東西長安街，可以任意向兩旁開槍，也許對洋人有點氣，所以開槍較多。幸虧洋人沒站在陽台上，否則一定造成傷亡事故。這一天的所見所聞，對這次動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感到實在不可理解，認爲毫無道理。

### 反思「六四」

「六四」過後，緊接着就是清查運動。由於我在那兩個月沒參加過任何有關的活動，所以清查不到我的頭上來。至於單位的清查，我以不了解情況爲由，根本沒管，完全聽任高鏢負責處理，並同意他的作法，最後得出國研中心沒發生什麼問題的結論。但在一些發言中，我還是談了幾點看法。一是認爲處理這次事件，動用坦克、裝甲車和開槍掃射顯然是不必要的。對群眾即使要鎮壓，水龍頭、警棍已經足夠了。何況最後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的不過三兩千人，用不



了多少卡車，就可以把他們像掄小雞一樣掄上車拉走。更不應該沿途開槍、造成不少無辜傷亡。二是認爲採取這些措施的原因大概是出於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把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看成有軍隊背景的政變。如果說是由於聽信了誇張不實的彙報，那也說明決策太倉促了，爲什麼不把情況弄清楚再下決心呢？三是認爲自稱代表群眾利益的共產黨，解決群眾性的問題應該用疏導的辦法，而不應該用鎮壓的辦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如果解決「六四」事件，採取勸導的方式，答應廣大群眾真正合理的要求（如承諾取締和查處「官倒」，而不是爲保護「官倒」和群眾對立），那次群眾運動會比較容易地平息下去，不致發展成爲對抗。以上這些意思的意見，我在幾個不同場合的會上都講過，還沒有聽到過反駁。當然我的意見也只是說說而已，聽到的人不多，也明知不會起什麼作用。但在需要發言的場合還是要講一下，起碼是爲了遵守「文革」後給自己定的原則，即：要講真話，實在不能講真話也盡量不說假話。

其實「六四」事件一開始，我在思想上就是和群眾站在一起的。沒有參加群眾活動，只是因爲沒有機會。運動進入高潮時我去了西安，回到北京後不久就聽見了槍聲。我對這次事件當時就有些看法，後來只有加深認識，但沒有根本改變。這些看法主要可歸納爲以下幾點。

#### 一次和「四五」性質相同的群眾運動

「四五」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爆發的悼念周恩來、反對毛澤東支持的「四人幫」的群眾抗議運動。「六四」則是悼念胡耀邦、反對「官倒」和要求民主的群眾運動。兩者性質基本相

同。「四五」被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定性爲「反革命政治事件」，遭到鎮壓，十一屆三中全會又給平了反。「六四」被鄧小平定性爲「反革命暴亂」，動用軍隊鎮壓下去，至今尙未得到平反。

#### 一次採用非法手段的宮廷政變

鎮壓「六四」是少數幾個人背着人民群眾、國家機構和黨組織的密謀。問題一發生就是撇開集體由個人定性，並且強制國家權力機構（如人大及其常委）和黨的領導機關（如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處於癱瘓狀態，人大委員長和黨的總書記不但無權召開會議，而且失去人身自由。這次事件性質的專權獨斷，超過了「四五」（定性還是先由政治局提出後經毛澤東批准）和赫魯曉夫一九五七年的宮廷政變（召開中央全會做出決定）。

#### 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一次轉折

「六四」影響深遠，成爲許多方面出現轉折的標誌。十二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停頓，此後將更難啓動，民主、自由、法治、憲政都只能流於空談。依靠權勢迅速出現一批壟斷集團和富豪，一個既有權又有錢的權貴階層加速形成。兩極分化速度空前，貧富懸殊已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一元化領導體制所依靠的各級官員得到大量提升和迅猛增加，更加官多爲患。腐敗在走向制度化，一些政權行爲黑社會化，知識分子進一步邊緣化。政治和輿論上原有的一點寬鬆氣氛一去不復返，政治鎮壓和輿論控制更加嚴格。

### 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對外影響受到嚴重損害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基本穩定，輿論比較寬鬆，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讚揚，國際影響也得到空前提高。可是「六四」使專制獨裁的面目完全暴露，國際聲譽隨之大跌，不但受到西方國家制裁，還被定性為專制集權國家。由於進一步脫離世界民主潮流，對內對外還會受到長遠影響。例如妨礙對外開放和融入全球化；鼓動和助長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造成一些外交問題上的被動和增加解決的難度；嚴重挫傷台灣人民的向心力而推遲祖國統一，等等。

### 損害了鄧小平原來的崇高威望和歷史地位

鄧小平提出經濟建設第一，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國際地位，得到全國人民的尊崇和愛戴。「小平，你好！」代表了當時人民的心聲。但是「六四」鎮壓，不但表明他以前講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是一些空話，而且暴露了他推行專制獨裁的本質，因而大失民望，也必然使中國再走一大段彎路。幸虧「六四」後他還堅持經濟改革不變，又進一步提出走市場化道路。這就使鄧小平在歷史上保持了兩重身分，一方面是改變中國歷史的偉大經濟體制改革者，一方面是政治上繼毛澤東後的專制獨裁者。在下令向學生開槍和以非常手段連續扳倒三個總書記、指定兩代接班人這點上，還超過了毛澤東。

「六四」以後，由於繼續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仍然得到快速增長，國力不斷加強，國

際地位和影響也隨之提高，使一些人產生鎮壓有理的想法。實際上相反，這場風波使黨的信用喪失、社會矛盾加劇，特別是黨群矛盾、官民矛盾日益激化，只能依靠進一步加強專政和控制輿論維持執政地位。但這又反過來妨礙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因而是不可能持久的。正像中國終究要走向民主走向文明一樣，「六四」的平反遲早也會必定到來。

#### （四）十年政協委員（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

##### 社會活動的重點

無論是在日本所的八年還是在國研中心的七年，我都參加了一些不屬於這兩個單位職責範圍的社會活動和工作。而且仔細一算還真不少，單是在外的兼職就有二十多個。其中論性質最重要、對個人來說獲益最大的，應該說是當了第七、八兩屆全國政協委員。我是一九八八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推薦進政協的，所以算社會科學界，本屆五年就一直編在社科組。一九九〇年，我被推選為中蘇（後為中俄）友協副會長，所以一九九三年開始的第八屆政協我又被編入友好團體界。界別的活動，主要表現在每年大會期間的分組和小組討論上。社科界熟人多，共同語言多，開起小組會來，坐而論道，也很熱鬧。不過發言多少有點空，聽的人興趣不大。所以有兩年，在討論中大家乾脆要我在小組會上講兩個小時的國際形勢。一九九〇年我說的「蘇



聯氣數已盡」，就是在當年兩會期間小組會上的發言。參加友好團體界的後五年，雖然熟人少了些，但小組會談到的具體問題卻多了起來，特別是對外交往中的情況。而且由於情況熟，所以提的意見也比較多，包括我自己以內。對這些，後頭還會具體談一些。總而言之，當了十年政協委員，使我對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不少見識，對於關心國家大事，考慮一些問題，實在是大有好處。下面就分成幾個問題來談。

### 每年「兩會」

全國政協的全體委員大會每年一次，和全國人大同時舉行，並稱兩會。在兩會期間，政協的主要活動是列席人大的全體會議，旁聽政府工作以及財政預算、最高法院和檢察院的報告，然後分組討論和進行幾次大會發言。至於政協本身的工作報告和討論，內容既簡單，佔時間也不多，更不是大家關注和興趣的所在。所以列席人大旁聽報告和分組討論提意見，大概就是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

對我來說，開始參加兩會還感到有點新鮮，但很快就發現，無論是列席人大聽報告還是出席政協大會聽發言，都純屬形式，似乎只是爲了表演給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看的。因爲人大每項報告（政協也是），前兩三天都已發下文本，在會議上只是聽報告人一字不差地念稿子，念完散會。同時各電視台也在進行現場直播，在所住賓館聽和在人民大會堂聽沒有什麼兩樣。不同

的是，去人民大會堂在「靜街」（兩會專車隊行進時，兩邊道路不得穿行。等在路口的群眾當然不滿）的條件下，來回也得兩個小時左右。而且自己拿稿子看，又比對着電視上念快差不多一半時間。可見這個開大會，不但對公家是勞民傷財，對個人也是浪費時間。於是我在列席了頭幾次人大會後就自行決定不再列席了，好在也一直沒人管。因此，每年兩會期間我都可以抽空看一兩本書和寫篇把文章。

頭兩年，人大的各項報告我還都聽或看，後來就只看政府工作報告了。其他報告，只是隨便翻一下，既不聽，也不看。原因是看和不看一個樣，都是搞不清楚。比方說，我也算是研究過一點世界經濟的，但我國政府的預決算報告就怎麼也弄不大懂。我在對外關係的研究中知道，我國每年有不少數目的對外援助，包括無償援助（如捐贈現款、物資，免除貸款本息）、外貿中的價格優惠，無息和低息貸款、無償或低價供應成套設備、幫助建設項目等，這些在預算上哪能看得出來？特別是近幾年來，一些國家領導人出訪周邊和非洲國家，動輒都是幾千萬以至上億美元的援助，既不發消息，對納稅人保密，也看不到人大的審批手續。至於中共的黨務開支，更看不到一點影子。這樣的預算報告，看和不看有什麼區別呢？外國人很注意國防預算的增長，但也是猜來猜去，抱怨不透明，起碼不會知道建築八一大廈和各種軍官府邸的開支。大約每年人們對於法院和檢察院的報告都不大滿意，那只是發泄對貪污腐敗、壓制民主、行政暴力、司法不公等的憤懣，但報告無論如何都是會通過的。

我對兩會的興趣不大，是因為本來明白這是做樣子的，領導上也並不真的歡迎大家參政議政。當了政協委員，參加了多次兩會活動，不但更加證實了原來的看法，而且還發現其他許多人也和我一樣，對於參加會並不那麼重視。有些人似乎只是報到，卻很少參加甚至不參加大會和小組會。每年的兩會，往往出現這種情況，開始時出席人還很多，後來就日漸減少，直到閉幕會人又多起來。按我參加兩屆看到的情況，除聽政府工作報告外，前去列席人大會的委員往往不到三分之一。一個大巴士，來回只坐幾個人。即使去了人大會堂，有些人也不是安心聽報告，而是找熟人聊天。不但對列席人大的會不積極，就是對政協本身的會，人們的興趣也不怎麼大，除開幕閉幕人們還稍微認真一點外，對大會發言有興趣去聽的實在沒幾個。因為發言早已發下，當天的發言名單也得到事先通知，再乘車去人大會堂聽，實在是多此一舉。後來，李瑞環主席看到出席的人太少，會場顯得稀稀拉拉，曾幾次提出要大家積極出席，注意影響（其實他自己就很少參加）。這樣一來，參加大會聽發言就變成多少帶點紀律性的「義務」了，成爲一種無形壓力，於是一些人爲了顧全「大局」，就盡量去參加了。連我這個最沒興趣湊熱鬧、擺樣子的人，也勉強應付那麼幾次。

爲什麼一些身爲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人，對於被宣傳得如何莊嚴隆重、稱爲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兩會，竟然這樣地不積極呢？我再根據十年的親自見聞，順便列舉幾個例子作點說明。

關於代表和委員的產生，照我看來，並不是爲了體現民主和代表民意，主要還是人事上的照顧和安排。所以除了一部分必須參加的在職領導幹部外，基本上都是安排需要照顧的離退休幹部、社會名流、勞動模範等。他們也不必爲所代表的選區或界別承擔什麼義務。例如社科院幾個熟人被安排爲外省的人大代表（因爲國家機關名額有限），就是由中組部通知有關省，作爲該省任務選爲代表的。這幾位熟人直到當選後才知道自己是那個省的代表，而且除兩會期間參加有關省的小組討論等活動外，平時與該省毫無關係，既不去選區聽取選民意見，也不同選民建立什麼聯繫。至於選他們的省，不但選民不知道有這樣的代表，恐怕連省裏的領導幹部事前對他們大概也是一無所知。政協委員由於按界別分配，所以還總算了解這個界（如社科界、文藝界、新聞界）的一些情況。但他們的產生並不是本界公衆的推選，而是出於黨組織和人事部門的暗箱操作，所以代表性很有限，有些委員就很不不得人心。好在公衆和委員之間並無聯繫，所以可以作到互不干擾。

從政協的作用看，也確實只限於人事的照顧和安排。據政協機關中層幹部對我們講，李先念出任政協主席初期，政協領導曾醞釀適當提高各級政協參政議政的能力和作用，因此打算開一次由省市政協領導參加的工作會議，研究如何開展這方面的工作。經向中央請示，得到的答覆是：政協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協委員的工作。於是這個計劃中會議的籌備工作還沒正式開始就停下來了。李瑞環當了主席後，關於政協工作提了幾條原則方針，其他沒記住，但有一條



記得很牢，就是「不添亂」，意為不給黨和政府工作增加麻煩。根據我十年的經歷，也證明幾位中層幹部所講完全屬實。外國人把我們的人大說成是橡皮圖章，但它在名義上總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也經常在從事立法活動。就算是橡皮圖章，總還起點象徵性的作用，對外還可同他們的立法機關議會對上口。可是全國政協呢？起什麼作用，人們就說不清了。所以外國很少有人知道。像我這個算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人，也沒聽到過外國人士和傳媒有關政協的議論。但政協委員確實受些優待，兩會期間住的賓館一般也比人大代表好一些，每年還有一次去外地「視察」。所謂做好政協委員的工作，就是要通過他們團結各界人士。例如三峽工程要上馬，由於科技界和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反對，所以就先後組織政協委員和「教科文衛體」各界代表人物去參觀（我也曾躬逢其盛），聽有關方面講解三峽工程的必要和安全，以便通過他們影響輿論。可見委員們還是有點用，所以要做好他們的工作。至於參政議政，恐怕只是說說而已，除了少批評多擁護以外，實際上是並不希望在這方面真正起什麼作用的。

每次兩會前夕，黨內還要先打招呼。就是把人大各代表團和政協各界的黨員負責人找去開會，由總書記講話，回來再傳達給黨員代表和委員，除說明這次兩會的主要內容和重要意義外，着重要講一些注意事項，例如要照顧影響呀，內外有別呀，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呀等等。實際上就是要求黨員們在兩會期間，維護經中央審定的各項報告，發言不得出圈，遵守黨的紀律（主要是全黨服從中央）。每次聽了打招呼以後，總會有黨員說怪話，認為兩會是勞民的

傷財，多此一舉。但這個不出圈的圈卻並不明確和具體，所以開會時許多黨員還是會提出尖銳的批評和意見。據政協機關工作人員（如作記錄、編簡報的）講，每次政協分組討論會，意見最激烈、批評最尖銳的總以中共小組居第一位。各民主黨派小組的討論基調多以頌揚成績、擁護領導為主，提意見也顯得比較溫和。我兩次所在的組，都是這種情況的縮影。事實上，兩會期間我所見到的非黨人士就表現得比一般黨員好，不但發言踴躍不出圈，而且行動也守紀律。例如著名文化人唐弢，從二屆政協起就是委員，但到我當委員的第七、八屆仍然照章辦事，從不逃會。還有十年大會一直坐在我旁邊的堯西·索朗卓瑪（十世班禪的母親），因為聽不懂漢語，所以開會時十有八九是睡着打呼嚕，但仍然是每會必到。像我一樣的許多黨員，開會的積極性就差遠了。

人大的質詢制度大概實行了一次就正式取消了。改革開放初期，民主呼聲很高，政治環境和輿論管理也比較寬鬆，中央領導曾想試行大會質詢，要求政府各部門事先做準備，在開會期間回答代表們提出的問題。那次進行得還較為順利，因為有關部門都作了準備，黨內事先也打了招呼，民主人士都比較溫和，所以質詢中沒有多少過分尖銳、激烈的問題，但已經使有關部長感到十分緊張和狼狽。這當然沒有現在這種偶爾參加幾次小組會、聽聽意見、不承擔在大會上回答問題的義務，要自由自在、舒服得多。誰願意找那些有問必答，答不上來還出洋相的麻煩？好在權在黨的領導手裏，既然大家嫌麻煩，為簡便易行，有利於維護黨及其幹部的形象，

不如乾脆取消算了。單從這一點也可看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民主大概是搭不上邊的，而且是「青出於藍」，連我們搬運的原生模式蘇聯的蘇維埃都不如。當年我在駐蘇使館工作時，看到最高蘇維埃開會還有點質詢和問答，特別是批評不少，包括這個部門對那個部門的指名批評和答辯，財政部長茲維廖夫每次總是挨批最多。這在中國的人大會上是看不到的。對於這種領導來說，專制比民主實在好得多。

不過在兩會期間，中央領導確實非常活躍，常委的幾位同志每天都有「重要講話」。那些天的傳媒也是主要報道他們的講話，不但要求代表委員們，而且要求各界學習。每次領導參加小組會，都要做事先的通知和安排，連會場也都要臨時換個好的，以便攝像播放。領導同志來後，先做出聽取意見狀，很快就「喧賓奪主」，發表一大通準備好的講話，講完走人，很少看到上下交流。所以有些講怪話的人就說，這哪是什麼參政議政，只是為領導人亮相提供平台，為大家學習領取材料。而且這種普遍使用的「學習」，提法就不對。不但領導人的發言（雖然稱為重要講話），就是各項報告，都聲明是提交代表們審議和委員們提意見的，怎麼一出來就變成了學習文件？推廣來說，為什麼中共出來一個決定或文件，名義上處於平等地位的各民主黨派和非黨幹部與群眾就非得學習，還要貫徹執行？這不是把民主黨派當成了中共領導和管理下的一些小單位或小團體了嗎？非黨幹群也得履行黨員的義務？這是否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實際上只是一黨專政的點綴，根本不同於西方在代議制民主、多數民主基礎上發展

出來的協商民主。

政協委員的大會發言，在我看來，主要作用在於讓發言者亮相和表現政協的活動。每次要求發言的人確實不少，都是事先寫好發言稿，交上去由評審人員審查，再由領導上根據發言內容和代表的界別（例如每個民主黨派總會安排代表發言），挑選出到大會上發言的人。其他未被選上的稿子就作為書面發言，發給大家。當然，有些太出圈的發言稿，就根本不會印發。大會期間出的《簡報》，也基本上按這個原則辦理。因為開得最多的還是小組會，有專人作記錄，散會後工作人員將大家的發言整理成《簡報》，第二天就可做到人手一份。各組各界的發言摘要都有，摘得很少，但不一定是「要」。一些尖銳的發言大都摘成了幾句原則話和比較溫和的意見，而且先得說大家擁護政府工作報告和稱讚一年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總之，即使一些具體生動慷慨激昂的發言，但一上簡報也往往被八股化了，變成了涼白開。當然，有些被認為問題重要，應向上反映，但不宜擴散，於是印成另一種只上送不下發的《簡報》。所以，我只確知有這種《簡報》的存在，但一直沒見過。如果有人對重大問題和中央領導人有意見，並且要求向上反映，工作人員既不給記錄，更不給打印。對此有專門規定，就是由自己親筆手寫並簽名，工作人員才答應按級轉送，至於送到什麼人手裏，怎麼處理的，就不是本人所能知道的了。這種親手寫的上呈意見，我也幹過一次。

其他的例子不再列舉了。單是從上面談到的這些情況，就可證實開頭所說的，召開兩會是



勞民傷財，多此一舉。其實，這是上面也早已看出來的了，所以對兩會的時間一再壓縮。既然如此，那爲什麼還要搞選舉和開會呢？這只是爲了給一黨專政的專制政權披一件表面上看去是合法的外衣，所以還要搞這個形式，走這個過場。不妨作點遐想，如果一年不開這個兩會，而是按時把那些報告公布出來，會有什麼不同呢？我看沒什麼不同。甚至不公布也會是一樣的。因爲經過兩會討論，對報告從來都沒有通不過或作實質性的修改，何況報告提出前還一再向黨內外上層徵求過意見，已經走過一次過場了。

### 小組討論

說過大會，再來談小組會，倒還熱鬧些。因爲小組會發言，除個別人外，一般不用念稿子。而且我參加的這兩屆小組會，都被認爲是不大保險的，因此不准記者參加，多少顯得隨便點。至於發言內容，以我參加過的兩屆小組會所見，人們還是顧慮不少，以應付居多。真正肝膽相照、直言不諱、有什麼說什麼的，我連一個也沒看到。這是經過十年的觀察體會，並不是隨便說的。因爲會下談的和會上講的就大不一樣。雖然流行着「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之類的話，但是實際上就是敢於講話的人在發言中頂多也只說了不到一半真話，而這說一半真話的人又不到出席者的一半。有一次，聽了一些吞吞吐吐的發言，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在發言時引了一句《共產黨宣言》上的話，「共產黨人認爲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鄙的。」（舊譯）但作

用不大。老實說，連我自己也只能算是說一半真話的人。小組會開得倒是比較活躍，相互關係也顯得友好，但是有些真心實話總還是藏而不露。看來，不論年輕年老，似乎都被新社會陶冶成有修養的人了。只有比較熟悉也願意和我交談的，才會在會下對我說真話。所以我在政協了解了不少情況，還都是在私人閒談中聽到的。因為會上的一些發言，不是表態，就是套話，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聽來令人心煩。於是忍不住就要放炮了。這就使我成了小組的炮筒子，一方面受到多數人的歡迎，他們一開會總是鼓勵我發言（最後一次會還有幾位老大姐頗為惋惜地說，以後沒何老參加，我們這個組開會也就沒勁了）；另一方面，我的發言還促進了一些人多講了點真話，例如有位做過大使的同志，先還有點吞吞吐吐，後來聽我念了馬克思的話，也公然談了不少有關外交和使館的情況。

我的一些發言為什麼被認為是放炮呢？因為我除了和大家一樣談些一般性的問題外，有時也說點別人只在私下談而不願在會上提的事，而且是直截了當地講，所以顯得有點與眾不同。下面就談幾件還記得的這類發言，主要是在第八屆，第七屆的已忘記得差不多了。

一次發言是批評政協「大興土木，上行下效」。第八屆領導上任後，一改過去那種顯得「過時」的作風，而是大手大腳，修建辦公樓，改建大禮堂。據說，主席「辦公室」佔辦公大樓一層，除寬大豪華的辦公室設備外，還備有廚房、餐廳、包括桑拿浴、衝浪浴等幾個浴室和其他房間，但主席並不來此辦公。常務副主席佔半層樓，據說一位連看都沒看過，因為他平時

住外省。由於傳說多又神秘，連機關工作人員都不准上去看，所以我在會上幾次建議，開放一兩天主席、副主席辦公室，讓委員們參觀一下。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大概仍然沒有開放過。而且辦公樓的大門平時不開，政協委員、工作人員、來訪客人只能走兩旁的小門，只有主席有事來時才開大門。全國政協這麼大興土木，也引起一些省市和區縣的競相效尤。我們到外地去視察，有的省市政協負責人就公開說，他們老早就想改建（或另建）政協禮堂、會議廳和辦公樓，但怕挨批，所以一直盯着全國政協，這次上面一帶頭，他們就可放心地動手了。而且根據中國黨的幹部政策，主要領導人退休後都要安排，一般是書記下來出任人大主任，行政首長下來出任政協主席。所以還在他們退休前就已經商定，並且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各自經營日後要去任職的機構，那真是一個賽過一個。我們參觀過南方幾個縣區的政協，他們會議室的設備真夠現代化。例如幾個會議室，每個座位都安裝有固定麥克風。這在當時（甚至現在）的北京也是少有的。記得我們開一次學術討論會，總為擴音器發愁，往往是只借到一兩個手裏拿的話筒，由工作人員拿着滿會場跑，誰發言給誰。我問縣區政協那些會議室的利用率，答覆是會議廳一年開會一次，小會議室一季一次，平時大多閒着。我心想，這是多麼大的浪費呀！

有關「政協出訪，收效甚微」的意見，我在小組會上提過好幾次，還手寫過一次書面意見。不知是出於待遇還是什麼原因，政協主席每年要率百餘人的代表團訪問三幾個國家，最少一次，多則兩三次，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或有值得一看的自然或人文景觀的國家。由

於政協在外國沒有對口機構，洋人知道的又很少，更不了解它是幹什麼的，也不知道爲什麼要來訪問，所以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主動邀請，基本上都是由我方提出。而且往往提出後對方並不歡迎，多是托辭婉拒，需要一再交涉。有的交涉一年人家也不同意。例如有位駐歐洲一個大國的大使，早已超過任期，但是由於沒有完成讓對方邀請政協主席訪問的任務所以長期不能離任，直到交涉成才准回國。這些外國爲什麼不大歡迎政協代表團呢？因爲你既不搞外交談判，又不來做生意，還要求高規格接待（因爲是國家領導人），如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見，舉行歡迎宴會，提供演講平台、陪同參觀等。雖然去許多國家，除他們的宴會外，都是我們自費，並不讓他們負擔接待費用，有的國家頂多答應只接待少數幾個人。就是這樣，他們也不歡迎，認爲是只增加麻煩，沒什麼好處，所以傳媒也很少報道。例如八屆政協主席率代表團訪問日本，我正好在那裏參加學術交流，發現日本報紙和電台只報道了他來去的新聞，其他一概看不到。我就問日方人員，你們天皇接見我們政協主席這麼重要的事，你們的報紙和電視爲什麼也不報道？答覆是，沒有新聞價值，他們認爲並不重要。後來我和新華分社負責人談起，說這些天你們一定夠忙的。不料他卻說，代表團訪問與他們無關，一切新聞報道、會談和講演，稿子都是事先擬好留在國內，只用一下新華社的名義，按日程順序在國內發表就是了，談話內容有出入也沒關係。另外還有十多個隨團記者，盡可以各給自己的報刊寫通訊。這樣看來，政協代表團出訪一次得花好幾千萬（可以建上百個希望小學），除了國內大肆宣傳一陣外，國外基本



上沒什麼影響，這不是極大的浪費嗎？據當時的隨行人員李慎之說，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時鄧小平訪美也只去了四五十個人，現在一個政協代表團一去就是上百人！所以我多次提出，國家級的政協代表團少搞甚至不搞出訪，而多出去一些華僑和港台訪問小組，做點實際工作。主席如一定要率團出訪，最好是縮小規模、多去黑非洲國家。我要求把我的意見寫進簡報。工作人員表示做不到，說按規定，涉及中央領導的意見，必須由提意見者親筆書寫並簽名，交他們的負責同志上呈。於是我只好親筆寫出、簽名交了上去，記得大意是：政協主席出國訪問，浪費很大，作用很小。如果一定要去，建議第一，縮小規模，不用專機；第二多去黑非洲國家，去那裏，受歡迎，影響大。這次提意見還真引起了上面的重視（可見以前多次提，都沒反映上去），特派政協秘書長來我們小組作解釋。他說政協主席的出訪是中央決定，按規定，每個中央常委每年至少可出訪一次，但如無特殊需要不得超過三次。對政協主席的出訪，總書記非常重視。總理還特別交代，外國沒有對口單位邀請，可交涉由他們的政府提出邀請。他還具體講了代表團的分類人數。另外有一條解釋印象深刻，是說政協辦公大樓的大門平時不開是爲了節約空調用電。其他還講了些什麼，已不記得了。當時總的感覺是，解釋沒回答我的問題，講的那些意思也根本不能服人。本來我想在他解釋後再提幾個問題和駁回他的一些辯護，但不料人家事先已有安排。秘書長講完話就說，他還有別的事，要立即離開會場，於是大家就鼓掌歡送。後來傳出，主席說，他就是不去黑非洲，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這算是我經歷過的一次拖了

好幾年的「協商民主」。

與此相似的，還有一個「對於駐外使館，內交重於外交」的意見。我們小組是友好團體界，各人都有涉外經歷，還有好幾位是才退下來的大使（有一位因為沒有完成政協代表團出訪駐在國的任務，暫時離不開，是請假回來開會的）。拿我來說，也在外交部呆過三十年，又一直研究國際問題和外交問題，改革開放後還常有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任務。我們這些人在會上會下談外交問題比較多是很自然的。有一個意見，有人講得直接，有人講得委婉，但意思是一樣的。就是國內的腐敗和不正之風早已滲入駐外使領館，使他們往往重視內交甚於外交。因為外交上出點問題（例如接待外賓、和外國人打交道時有點失禮或有不周到的地方）當然不好，但關係不大；而內交上（主要是接待國家領導人和重要代表團）出點問題（往往不是問題，但被領導上看成是問題），那可就直接影響到官職的升降以至烏紗帽保得住還是保不住了。如果國家領導人訪問駐在國，大使「表現好」，那就可以佔大便宜。如有的大使任期或年齡已到，還想再幹兩年，對領導人一說就可辦到，因為領導人只要讓秘書記着回來後給外交部打個電話就行了。有的武官陪軍委領導人訪問「表現好」，回來也是連續晉升。有的大使在接待領導人時得到可以補為政協委員的承諾，等到回國後報了到、登了報，所在單位（也就是法定的推舉單位）這才知道。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這就看各人的原則和悟性。例如時任中共顧委副主任的王震一次去訪問日本，駐日大使恰好有重要的外事活動不能去接，而且考慮到來訪者已無

政府職務，只是掛名中日友協名譽會長，按外交規則和國際慣例也可以不去接。但結果闖下了大禍。老人家一回國立即告訴外交部，說這種人怎麼能當大使，給我馬上調回來。於是這位大使也真的任期未滿就被調回。回來後當了外交學院院長，不知是否因為此事而鬱結於胸，不久就因癌症去世。還有一位駐澳大利亞大使，總理要去訪澳，先派國務院副秘書長打前站，他問應注意事項，答覆是；堅持原則，一切按規定辦。他也從報上看到，那一陣正大張旗鼓地反對不正之風，所以還真聽了副秘書長的告誡，接待顯得簡樸了些。結果是大使任期才到一半就被很快調了回來。他只能在下面向熟人發牢騷。此風一長，各使館就競相爭取領導人的滿意，互相打探（了解領導人和代表團所好，發多少零用錢、送什麼「土特產」禮品等）、互相攀比（略勝於前一接待使館，起碼不能降格）、還要互相保密（免得傳出去被說成搞不正之風，反倒引起領導上的不滿），各顯身手。以政協代表團訪問俄羅斯為例，據使館具體辦事的人說，有關人員告知，團長喜歡存年較多的XO（酒），他們買來一瓶送上；不夠，又買一瓶。俄羅斯當年經濟落後、商品簡陋，沒有什麼特別出名可送代表團的「土特產」，但對中國客人來說，望遠鏡還過得去。使館於是每人送一隻，由代表團提供名單，望遠鏡分級贈送，例如送團長是十二倍的，部級團員為八倍，司局長為四倍等等（上述的具體倍數記不太準）。送去後，代表團覺得不錯，於是要求給每人再送一個。又如，一次政府代表團訪問埃及，團長夫人嫌總統套房裏沒放置香水，使館就立即派人去巴黎買，當然不會只是供短時間用的。類似例子，多

不勝舉，大家也只是會上會下作為談資，大約沒人想到能起多大作用。

談到對外交部提意見，最後再補一個例子。一九九五年三月十日，主管外交的錢其琛副總理要來參加我們這個友好團體界的小組會。政協行政部門給換了個大會議室，頭一天就作了通知和準備。我一聽正好，因為我本來就對外交部和錢其琛本人有些意見。雖然不能講得太多，也知道講了沒什麼用，但根據不說白不說的精神，還是搶先作了個發言，針對外交部和錢本人着重批評了一個派性。我說，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研究不可有排他性，應當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不同意見。而外交部有種空氣，就是看不起研究部門，有的人乾脆說，「別聽那些學者瞎噁噁。他們知道中央的政策嗎？」在這種氣氛下，就不重視外面的研究成果，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例如對於宦鄉這樣著名的國際和外交問題專家，外交部在改革開放後就從來沒請他參加過一次形勢和政策討論會，對他的意見也總是加以排斥和批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宦鄉提出對美國拉開距離、對蘇聯調整關係的意見就被批評了好幾年。蘇聯陷入阿富汗泥潭，宦鄉和我們大家提出國際形勢中蘇攻美守的局面已變成美攻蘇守，但外交部還堅持蘇攻美守，直到一九八四年還要說成互有攻守。我還舉了外貿部的例子，說一九八六年外貿部黨組開會研究五年外貿規劃，也從部外找了我與浦山作為學者參加。但這類事在外交部就從來沒有聽到過。除這些以外，我還講了一個問題，就是不應該拿研究等專業單位用來照顧和安排行政幹部。外交部長期以來都是把他們安排到它主管的研究部門等附屬單位。後來乾脆形成一個不成



文法：長期在研究和出版部門工作的幹部，不管你業務多麼熟，條件多麼合適，也不能擔任這些單位的第一把手，第一把手只能是要加以照顧的退下來的大使。這種幹部政策就很值得考慮了。

## 外地視察

除了每年參加兩會外，政協委員平時也還有些活動，最重要的一項是參加去外地視察。根據我的經歷，參加的視察有兩種。一種是每年組織一次的普遍視察，先聯繫好幾個省區，分期分批組成視察團，由各人報名和選擇去的地方，時間為十天半個月。另一種是臨時組織少數人就某一專門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時間不定，回來寫出包括情況和建議的調研報告。對於第一種，我是每年都參加，選擇去的地方基本上是貧困的省區如內蒙、陝、甘、寧、雲、貴等。這種視察團，每次都由一位政協副主席任團長，人數少則幾十，多則上百。每到一地，都受到地方上的熱情接待，大約一半時間是參觀名勝，一半時間進行考察訪問。省領導要舉行兩次會，來時歡迎和介紹情況，走時歡送和徵求意見。視察團一般都比較客氣，主要是肯定成績，我還沒聽到過一次帶有實質性的尖銳批評。在這種場合，我沒發過一次言，雖然我的意見不少，感想更多。最大的感想可以用一個窮字來概括，就是爲什麼我們號稱具有無比優越性的社會主義，怎麼會把老百姓搞得這麼窮呢？例如當年的陝甘寧邊區，確曾做到過豐衣足食，但是經過

五十年的和平建設，反而不如那個時候了。我們在寧夏「西海固」（寧夏南部的西吉、海原、固原三縣）訪問過一戶人家，全家八口人就擠在一個破窑洞裏，炕上只有一牀破如棉絮的被子，供一家人禦寒。這些地方，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但是縣裏對政協代表團的招待飯菜卻太豐富了，原來是工作人員爲了飯後自己瓜分。有時政協的人還沒完全走出食堂，就已看見他們在分搶了。所以有的女委員乾脆就帶幾個饅頭出來分給群眾。我也仿效了一次，帶了個饅頭交給了一個小姑娘。但她捨不得吃，說是要留給弟妹們吃，聽來令人心酸。但是不能以爲只是陝北、寧夏如此，實際上其他一些地方如甘肅、貴州等地農民也是一樣的。

農村的窮我看用不着多說，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問題是爲什麼會這樣呢？從一九六〇年幾乎餓死時起，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想來想去得出了一個結論，是我們解放後執行了一條完全錯誤的路線。現在看來，這樣說似乎還不夠，應該說，我們的路就根本上走錯了。我們建設的不但不是具有無比優越性的社會主義，而且連我們一直在批判的資本主義都不如。因爲資本主義總還是在發展，而且發展得很快，我們卻在後退，相對說來也退得很快。例如我曾多次講過的材料中，就有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人民日報》所載一項數據，一九五五年我國經濟總量佔世界份額爲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八〇年下降到百分之二點五。近日看到《中國青年報》（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一日）載文說，「據權威人士介紹，近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僅佔世界總量的百分之四點一。」這就是說，我們後來這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還沒補夠頭二三十年落後



隨全國政協委員視察團去貴州訪問，在六枝隴腳苗寨苗族布依族希望小學前留影。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



造成的差距，實在有點對不起祖先和後代。從這裏也引出來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年來，我們究竟建設的是什麼社會呢？按照鄧小平的說法，顯然不是社會主義。因爲第一，在很長時間裏，我們並沒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第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三，現在了解的社會主義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而我們的生產力卻比發達資本主義落後百年（按人均），貧富懸殊只十多年就已超過發達資本主義。這樣看來，我們多年奮鬥的結果竟然不是社會主義，那是什麼呢？有人說是權貴資本主義，有人說是惡資本主義，反正沒人能夠說清楚，確實是個值得研究的理論問題。

如果進一步考察，還會認識到，我們由於一開國就走錯了路，所以許多具體政策也是錯誤的。以農村政策來說，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是依靠農民奪得江山的，代表農民的利益。建國初期，他在訓斥梁漱溟時也曾以代表農民自詡。然而事實卻並不完全是這樣。除土改等外，整個說來，解放後農民的長期受苦和二農問題的產生，正是他的農村政策造成的結果。這表現在：第一，用戶口制把農民釘死在原有的土地上，限制了他們的遷徙自由，不得進城住，不得吃商品糧，變成二等公民。第二，實行土地國有和合作化、公社化，剝奪了農民的生產資料和基本生活資料（後者在改革開放後才有所改變），使農民從小有產者變成純粹的無產者。第三，用剪刀差和各種農業稅的辦法掠奪農民搞工業化，造成農民的貧困、農業的落後和城鄉差別的擴大。第四，向農民和農村轉嫁困難。例如三年困難時期一次下放兩千萬城鎮工人和居民，以



減少吃商品糧的人數。後來的知青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運動，辦五七幹校等，都含有這種用意。第五，在工作、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保障上實行城鄉區別對待。以工作論，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承擔了城市化的主要勞力，但他們卻基本被排斥在城市化外，逢年過節總要清查他們，被攆得到處跑。第六，改革開放以後，隨着農村機構和地縣以下各級官員的升遷擴充以及其他脫產人員的迅猛增加，許多地方的民養官已到負擔不起的程度。而腐敗的制度化，受害最大的大約也是農民。第七，城市工人還有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不管是否官辦。而農民卻無權組織農會和其他維護權益的組織。這也體現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第八，在農業、農村問題上的瞎指揮、胡折騰，如「農業八字憲法」、強行併村等。好了，列舉以上這些事例已足以說明我們建國後農村政策的錯誤及其引起的嚴重後果。具體政策在別的方面的失誤就不用再多說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黨群關係、幹群關係或官民關係。十年的視察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主要有兩點，一個是前面談過的農村窮、農民可憐；再一個就是黨群關係的淡漠和緊張。由於我做過地方工作，參加革命後又有差不多一半時間是在農村渡過的，所以對農村的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比較敏感，比較注意。例如我們視察過的一些貧困地區，一進村就可看出幹部的脫離群眾和特殊化。我去過日本十多二十趟，那裏的農村，最好的建築一般都是學校。可我們相反，一個村子住房最好、院落最大的多是支部書記的家。而學校往往非常簡陋甚至破爛，尤其是貴

州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和老百姓談起幹部，大多不願開口，而且對我們這些「公家人」，也是躲得遠遠的，何況幹部也很不願意我們和群眾接近。一元化領導體制在下面的具體表現，就是一個村莊不論有幾個黨員，也不論支部書記是怎樣產生的，他都是這個村天然的第一把手，黨政軍民學，從行政到司法，一切都管。村長和村委會，不管是真是假，總算是選舉產生的，但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書記的領導。書記中好人當然也有，但我們看到和接待我們的，沒有遇到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我們上面談農民所受待遇的不公，還沒算受幹部的欺壓和盤剝。而且許多地方發生群體事件，往往就是從對幹部的不滿和反抗引起的。因為農民看不到省級以上的情況，直接和他們打交道的就是縣區以下的幹部。如果你認真到農村去調查，就不難發現，農民實際上早已不是黨的依靠對象了，黨的依靠對象主要是各級幹部。這也就是幹部從上到下處處受到保護、照顧和優待的原因。它說明黨的根基早已不穩，四處存在着危機。這就是爲什麼要強調維持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爲什麼要不斷強化專政手段和輿論控制。

全國政協組織的每年一次視察，好處極大，使我從中學到很多東西，「走了萬里路」，了解到各方面的情況，不少思想得到檢驗，說起來實在話長，現在就到此打住。最後再談一點花絮。我參加的頭幾次視察，是和唐弢同住一個房間，後幾次是和吳祖光同屋。兩人都是著名的文化人，大好人，能談得來。但他們有個共同特點，就是高聲大呼嚕。我吃安眠藥都不行。他們入睡又很快，總在我的前面。有時我還在說話，他們已打起了呼嚕。實在忍不住，我只有敲

打桌凳，不想他們被鬧醒後，翻個身又睡着了。這個花絮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實行長期「患難與共」的政協，也得嚴格遵守中共規定的等級制。視察團出去的住房原則是，司局級兩人一間，副部級一人一間，正部以上住套間。吳、唐兩位直到最後都是司局級，所以雖然年紀大點，也只能和我輩同住一屋了。也有些年紀較輕但給某個首長當過兩年秘書，被提升為副部級幹部，退下來後又被照顧當了政協委員，自然住單人房間。這種一樣的委員、不同的待遇，引起許多人的不平和不滿。連著名的「左」翼人士原《中流》雜誌主編喻權域，才參加了一次視察（第八屆），就在回來的總結會上（我在場）對這種現象提出強烈批評。因為他也是兩人住一間房。可見所謂「協商民主」，也仍然是維護等級制和特權制的。

### 專項調查

我除了參加每年一次的普遍視察，還參加過好幾次就某個專門問題或地方進行的調查研究。通常都是十數八個人，由幾個委員和幾個政協機關工作人員編成一個小組，由地方政協接待和安排。其中有兩次是關於新移民（向海外）的調查，走的地方最多（從廣西沿海一直到黑龍江），時間也最長（近兩個月）。其他都是三五天，甚至朝去暮回，例如視察河北省的廊坊和京津的外資企業就是這樣。這種單項考察的最大好處就是深入和真實，因為每年的普遍視察多少有點大呼隆，而且定點參觀，事先都有準備，難免弄虛作假。在專項調查中，感受較深的

有這麼幾個問題。

一是新移民問題。這裏說的新移民是指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向海外的移民，以別於建國前的老華僑和華裔。建國後由於執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特別是嚴禁出國，所以前三十年的對外移民很少，還包括三年困難時期的外逃饑民（可能最多的是去香港。新疆逃往中亞六萬多人也不完全是吳冷西等「凡是」派說的由於蘇聯領館人員的煽動）。這一錯誤的閉關政策，使我們失去了一段大好的移民機會。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關卡有所放鬆，但是外國對移民的限制卻愈來愈嚴。即使如此，現在歐美國家的華僑華裔主要還是改革開放以後去的。按理，我們應該鼓勵移民，好處不用多說。但是後來外國禁止進，我們也不能不禁止出，於是就發生了我們防偷渡，他們搞遣返，蛇頭欺詐，移民冒險等一連串現象和事件。這些都是傳媒上經常看到的，這裏就無須多說了。問題是爲什麼偷渡總是屢禁不止，很多老實的勞動人民甘冒生命危險，還要向蛇頭交很多錢，到國外去打工受罪呢？一句話，這就是由於幾十年的錯誤政策造成農村貧困的結果。所以只有中國大陸的人向港台和歐美等外國偷渡，卻沒有聽說過有人從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向中國大陸偷渡的。而且只要你到了僑鄉，看一下門庭，就會具體得到感性答案，看出哪家人在國外打工，哪家沒有。如果有的村莊完全荒蕪，那就是全村人都走了。因此沿海農民出國打工，大約和內地農民進城打工一樣，都是爲了掙錢回家、置地建房，而且被認爲是件光榮的事。出去後，有些人掙到錢或因家中有事，中途回來了；有些人就定居下來，並且帶走



妻兒老小，成爲華僑或華裔。那些先走的人不但是後來者的榜樣，還可起引薦作用。華僑和華裔對家鄉的貢獻是不用多說的，所以地方政府積極支持合法移民，但又不能不制止非法移民，問題就非常複雜了。不過一個重要因素是要看各地的工作，做得好的，移民多，而且基本合法；做得不好的，移民並不見得多，還老是出事。例如我們常在報上看到破獲偷渡、遭到遣返、發生災難的，多是福建、浙江等地的人，很少看到廣東的，而廣東的移民數量反而多些。我們到珠江三角洲一個縣去考察，那時該縣的新移民已超過十萬，其中甚至還有縣委書記、縣長和公安局長等前官員。他們開玩笑說，我們可以在某發達國家某大城市開第二個縣委會，研究移民問題。事實上，這些人在幫助後來移民的問題上也確實腦子活、辦法多。而國內的縣領導也常派人去探視，內外保持着密切聯繫。這個縣的移民較多，但他們說都是合法的。由於華僑華裔多、有利於引進外資等原因，該縣的經濟、文化也發展得快，還在我們視察的一九九〇年代，它的城鄉建設和生活水平就完全可以和日本的鄉鎮媲美，只是文化差些。對於新移民的調查，最後由我執筆寫了一個報告，反映情況，提出建議。總的精神是積極支持合法移民，堅決制止非法偷渡，但強調用疏導的辦法，盡可能擴大移民數量，提高移民質量，不能只用打壓的辦法。這種報告，轉給哪級領導，起不起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二是發展不平衡問題。參加政協的視察和考察，先後去了十八個省市，看到各地發展很不平衡。這也是自然的。但爲什麼不平衡呢？有總體的客觀原因，也有本地的主觀原因。總政策

和客觀條件固然很重要，但地方上的主觀作用往往更重要。內地的一些省份總把經濟的落後歸因於不在海邊。我在一次學術會上曾指出，歐洲一些地方的情況就恰恰相反。中部的瑞士就比沿海的希臘發達得多，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兩國國內的北部也遠勝過沿海的南部。中國有同樣的情況。在改革開放頭十年，重慶的發展就比天津快，沿海的河北省也長期落在後面。可見，領導的因素決不是不重要，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說起決定作用。中國改革開放後，各地發展的快慢，就和那裏領導人的思想認識和他們執行的政策有着極大關係。一九八〇年代，廣東比福建發展的快，有的台灣報刊說原因在於：廣東是一分政策三分用；福建是三分政策用一分。同為特區，深圳的發展就比廈門快得多。大批台商不去對岸的廈門，而是跑到深圳東莞投資設廠。再如上海，由於坐鎮的陳雲和市委主要負責人思想不夠解放，幾乎十年沒什麼變化，如果不是後來開放浦東，放手改革，再過十年，這個解放前亞洲最大的商業都市就很可能被從小漁村興起的深圳超過。在開放浦東後還真實現了「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天津在一九八〇年代執行所謂「小步跑，不停步」的方針，幾乎從世界地圖上消失（這是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聽外國人說的。因為那裏長期不通空航，很少舉辦國際會議，所以知名度愈來愈低）。河北省的廊坊，地處京津之間，發展條件極為有利，但是改革開放十年後我們去考察時，卻發現沒什麼變化，還是相當落後。原因就出在河北省委。河北和山東相比，條件一點也不差，不但地處沿海，還有京津兩個直轄市的輻射作用，但經濟發展卻比山東差得遠。直到現在，我曾搞過「四

清」的昌黎，「東臨碣石」，條件極好，連接南北戴河，境內有黃金海岸，但仍不能和膠東各地相比。農村住房還有不少和我們「四清」時一樣。主要原因我看就是由於得到上面保護的腐敗墮落分子省委書記程維高十多年的統治。先不說他的其他劣跡，單是省委班子一直勾心鬥角，鬧不團結就很嚴重。據說，趙紫陽當總理時，到河北也不能同時見到書記和省長。一次我遇到當時山東省委副書記，問他爲什麼山東比河北發展快。他說，中央並沒有給他們什麼特殊政策，山東領導班子也沒有什麼特別本領，只不過他們有個傳統，就是一直比較團結。不用他說，這和河北形成了鮮明對照。最後，還可舉個小例子，證明思想和政策所起作用之大。一九九二年七月，我們考察黑龍江省的黑河，吃飯時聽到地委副書記發牢騷。他說，一九八二年前後耀邦同志視察黑河，說是從廣西到黑龍江都要開放，還給寫了「南深北黑，比翼雙飛」的題字，要我們和深圳比賽。後來聽說一九八三年耀邦同志受到陳雲的嚴厲批評，省裏也不讓我們飛了，一些工程才挖地基就又停了下來。你們看，黑河哪像個城市，仍然是落後的農村！第二天地委安排我們乘船遊黑龍江，從船上向北望去，對岸的海蘭泡（布拉戈維申斯克）高樓大廈林立，還真像個現代城市的樣子。其實應該指出，俄國並不發達，中蘇關係破裂後又停止了在邊境地區的建設。這就更顯示出我們這邊的落後。

三是黨風世風不正問題。在視察中最使我看不慣的是官場的不正之風，等級特權制度和官僚主義作風非常顯眼。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拉關係，走後門，腐敗日漸制度化，一些地方政

權和黑社會勾結等現象，可說是日有所聞。改革開放以後，原來就有的那些黑暗現象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反而大為發展。一九八〇年代初，胡耀邦曾多次提出反對特權，結果遭到享有特權和處於領導地位的一批老人們的圍攻。從此無論黨內還是輿論界，就再不提反特權了，反特權為反自由化所代替，特權二字也幾乎從報刊上消失。「八九風波」後，官僚主義和等級特權制度得到惡性膨脹。官場的腐敗，引起社會沉渣泛起，造成道德敗壞，世風日下。一九九二年，我們調查新移民問題時來到廣西，住在對外營業的省委招待所。因事先聽說此地社會風氣不大好，所以再三叮嚀電話總機，夜間不三不四的電話不要接到我們的房間來。可是當天我才躺下不久，就來了電話，一個女聲問：「先生要不要房間服務？」我一聽覺得不對頭，立即加以訓斥，掛了電話。過了一會電話鈴又響，一接，還是老一套。爲了免除干擾，我乾脆掐掉了電話。第二天聽大家嘻嘻哈哈，各講各的遭遇。一位同志躺下正在看書，聽見門鈴響，於是發生了以下的對話：問：「誰？」一個女聲回答：「我」。「你找誰？」「就找你。」「什麼事？」「請開開門，到屋裏再談。」這位老兄一看，來者不善，再喊再按門鈴也不理了。女子只好悻悻而去。爲了免除干擾，第二天向省裏提了這件事，請他們加以制止。到晚上，果然再沒有女人來電話了。可見，這旅館上下是和這些賣身女串通一氣的。

再談一個著名的珠海機場的故事。我們乘坐飛機到珠海是在新機場起降的。機場的規模和設備，據說是當時全國第一，我看起碼也超過北京機場。可是來去卻只有我們那架飛機上不多



的幾個人。機場龐大豪華的候機室、貴賓室等都平靜如水，只有不多的幾個服務員在招呼我們這些人，再就是幾隻蒼蠅飛來飛去。一打聽，才知道這是個首長拍腦門製造浪費沒人管的典型。珠海離廣州不遠，廣州有白雲機場。一過界又是澳門機場，而澳門很快就要收回，更不用說附近香港等地的機場了。珠海建個大機場，誰到這裏登機和下機呢？當時一些中外專家就估計，這個機場在二三十年內利用率也不會超過百分之十。果不其然，據說至今仍是個賠錢的大包袱。但是時任市委書記兼省委副書記的梁某卻執意要建，什麼想法，猜不透，據說要和澳門競爭。建這麼個大項目，當然要經國務院批准。但他有辦法，在珠海為當時主管經濟的王震副總理修建了一座高級別墅，連服務的一批女孩子也是從北方找去的。於是這一立項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談到這裏，還可插個花絮。卻說有一次我去看張聞天夫人劉英，她說中辦老幹局安排她去珠海休養。我就插嘴說，王震同志在那裏有個別墅，和在另外兩個地方的別墅一樣，一年到頭多半閒着，要去就住在那裏，一切都方便，我也可以沾點光，陪着去。劉英一想，倒也是個辦法，叫秘書打電話一問，對方表示非常歡迎，還說他一年頂多住個十來天。其實我說去，只是開玩笑出洋相，所以劉英後來叫秘書給我打電話，我就藉故推掉了。她自己也考慮住別人別墅不合適，轉而由老幹局安排了。可是那個大而無當的現代化機場呢？只能繼續賠下去。中國不興問責制，那位使國家蒙受重大損失的決策者，還不是像沒事人一樣，到時候抬起腿走人。這也應了中國封建時代流行的一句老話，「朝裏有人好做官」。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地

方歡迎高幹子弟去當官，而不管能力如何，只是爲了能「通天」。

在視察中，最令人感到痛心的就是這種缺乏民主法制以及由此引起的官場腐敗和世風日下。還在一九九〇年代，就已流行所謂不反腐敗中國必亡，反腐敗共產黨會亡的說法。從那時以來，一方面經濟仍在快速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腐敗在走向制度化，一些政權行爲日益黑社會化，再不進行政治改革，再不實行民主法治，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但是繼續往後拖，進行政治改革的困難和障礙也就更大了，其結果是不可想像的，也許只是我這一代人不大可能看到而已。

### （五）離開國研中心

在國研中心的七年，是我從十七歲出任抗大助教起，一生工作的最後一站，最後一個崗位。回到社科院又掛職三年，到七十七歲辦離休手續，算是正式下崗了。加起來，參加革命以後在職的工作和勞動整六十年，此後做事情已屬自由職業者。回想這最後一班崗，可以說是我一生中學術活動和社會活動最多的一個時期。這裏所說的學術活動，是指公開發表文章、作報告和參加討論會、進行學術交流之類。這些，在改革開放前可說是極爲少有的。而我的所謂社會活動，除政協外還有中蘇、中日友協和一些參觀訪問，但不能和社會活動家同日而語。不過對一個搞研究工作的人來說，能在報刊上發表點文章、出版點書、有人給提供發言和講演的平

台，就會感到十分幸運和相當滿足。所以有時也不免心中哼起劉克莊的兩句《沁園春》：「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這機會，就是指那麼一點學術活動，絕不是什麼升官發財。因為作爲一個舞文弄墨的人，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公之於世，得到社會承認，用金聖嘆的話說，已是「不亦快哉！」比給弄什麼職稱或地位還要痛快些。這是先前所不能想像的。一九五〇年代，可說是我寫作最多的十年，但是公開署名發表的，記得只有三四篇文章，而且按當時外交部的不成文規定，署的還是筆名。站這最後一班崗的時候，每年公開發表的文章當在十篇以上，還不說許多內部報告和爲某些討論會提交的論文。這種前後的差異，主要是由於時代的不同，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從個人來說，也還由於後頭不再擔任什麼行政領導工作，擺脫了一些事務，自己可支配的時間比較多了。

離開國研中心並不十分利索，還經過了一點小小的曲折。事情是這樣的：自從「八九風波」趙紫陽下台後，國研中心不久就完全由兼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副總理主管。從此外交部又多了一個可供照顧和安排某些離退休大使的地盤。所以除已經先後安排了幾位大使外，後來還想撤下來幾個人，多騰出幾個可供安排退休大使的位子，有的還給人家作了承諾。但又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答應人家後又長期沒有兌現，致使一位從來沒見過寫文章、後來也不寫文章的大使對熟人發起了牢騷，說讓他乾等了兩年也不見動靜。這種風聲當然會傳到中心。有人估計，外交部遲疑不決的原因可能出於某些顧慮。其中一個可能，也許是由於對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在

年齡上沒有嚴格的限制。例如原總幹事宦鄉和社科院院長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就都是年屆八十還在任上。而現在心目中要換下來的幾位副總幹事不過七十左右，計劃安排的退休大使也已早過六十，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別，也不敢說後者在研究工作上就一定比前者強。這樣明顯的派性和照顧關係，不是很容易讓人一看就穿嗎？我以為這種估計不無道理，要不然後來爲什麼要採取那種離奇的作法呢？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召開黨組會，黨組書記（總幹事）受命提出，用黨組成員集體簽名寫辭職報告的方式進行中心領導班子的重組，他和另一副總幹事留任，另三位副總幹事（包括排名第二的我）退出。宣布畢，我問，這是他自己的意思還是奉命而來？奉命是奉國務院的命還是外交部的命？因爲按組織系統講，中心屬國務院，不歸外交部管。他含糊其詞，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說都七老八十了，總得讓出位子來。但他老兄當時沒想一下，要退職的這三人中，有兩人還比他年紀小點。我說，離退休制度這是老早就規定並實行的，但這集體辭職的規矩卻不知從何而來？是不是學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閣總辭職，以便讓國王或總統另行組閣的辦法？而且延安整風時還規定過，黨內不興集體簽名，所以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集體簽名。現在領導上要我離開現有崗位，我完全同意，沒有任何意見，但要我參加集體簽名，那是辦不到的。另外兩位應騰位的黨組成員也表示拒不簽字。於是形成了二對三的局面，黨組書記奉命提出的建議被否決了，這事也就又拖了下來。由於我對這種作法非常不滿，哪能爲了安排有關係的人



竟然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因而決定向中組部反映意見，並立即給該部寫了一封要求接見的信。中組部倒也沒有推托，很快就回電話告知，他們近日即派兩位局長來找我談。我說，還是我去中組部見他們，不必勞他們跑一趟中心。但他們執意不肯，說是應當照顧老同志。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中組部一正一副兩位局長來談。當時作了介紹，好像是外交外貿幹部管理局的，現在已記不清了。他們是只聽（和記錄）不說。我先談了我認為中心這次提出各人簽名集體辭職的作法是不正常的，是我入黨五十多年還沒有遇到和聽說過的。要騰位子，直接發通知下命令不就行了，何必來這一套？然後提了點意見，說我以為中國黨從上到下都對科研工作 and 科研幹部重視不夠，特別是對人文社會科學。例如這國研中心，最近幾年，對研究工作，上面幾乎不加過問，一些科研成果是否有人看也不大清楚。這都是對研究工作不夠重視的表現。看來上面不是首先把中心當研究部門看待，看重的只是它可以照顧和安排一些幹部。爲什麼不從北京以至全國國際問題研究機關中，選拔比較優秀和年輕的研究人員來充實領導班子、當總幹事和副總幹事，而一定要安排一些離退休的老大使，而且半數以上是不怎麼寫文章的人？這哪裏是加強研究工作？很明顯是把照顧某些有關係的幹部放在了首位。因此，我建議中組部對中心的工作做一次調查研究，多找幾個同志談談，以便深入了解一下這個小單位的工作和幹部情況，看能不能下決心改變這種不把研究單位完全當研究單位看待，而是當作握在手中可以隨便安排幹部的場地。這個意見請反映給中組部領導，能不能做這個決定，就請他

們考慮了。至於我自己，說下就下，決不戀棧。因為做研究工作，可說下和不下是一樣的，各有優缺點。單以寫東西說，下來可能更好些。不但看和寫的時間多了，而且回到社科院可供閱讀的材料也更多，就是學術活動，也不會少（後來的事實證明，離開中心後的一九九六年，參加討論會和外出作報告反而增加，一年達二十餘次）。所以我提這些意見，倒不是表示「葡萄酸」，還想保留個人的位子，實在是對現在的幹部政策和用人看關係等不良作風早有意見，這次趁機會對組織上發表出來就是了。一口氣講了一個半鐘頭。兩人除正局長偶爾問點情況外，始終沒表態，只是最後說了簡單幾句：一定要把我的意見反映上去；他個人認為我談的對科研工作 and 科研幹部的意見是合理的；但中心歸錢副總理主管，他們不便說什麼。談後握手告辭。

集體辭職案遭否決後，雖然我對離開中心「隨時準備着」，但卻一直沒見動靜，仍然是各就各位，照常工作。又過了十來個月，到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時任國務院外辦主任的夏道生才通知國務院決定，免去我和錢嘉東、高鐸的副總幹事職務。這就合乎通常任免幹部的組織程序了，當然誰也沒話說。但是我由於政協委員尚未換屆，還不准辦離休手續，所以又回到社科院繼續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像前面談過的，瞎忙乎了幾年。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辦理了離休手續，這才基本上告別了五十年的國際問題研究，改行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開始發表一些有關中共黨史，特別是為中共一代開明的總書記張聞天撥亂反正的文章，二〇〇五年出版了上下兩冊《黨史筆記》。這一改行，得到了一些朋友的鼓勵，



莫斯科，作為中蘇友協副會長訪蘇，在友誼之家會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齊赫文，一九九〇年四月六日





人民大會堂，與張聞天的兒子張虹生（左五）、兩個女兒（右三、四）合影，二〇〇〇年八月三十日



也得到組織上的認可。二〇〇六年九月，社科院在評我為享有最高職稱和終身榮譽的榮譽學部委員時，就注明我的學術專長為：國際問題，中共黨史。只可惜改行太晚，已進入耄耋之年，時間和精力都不允許有什麼作爲了。

第十五章

離休以後

一九九九年——二〇〇七年

## （一）改行

### 學習黨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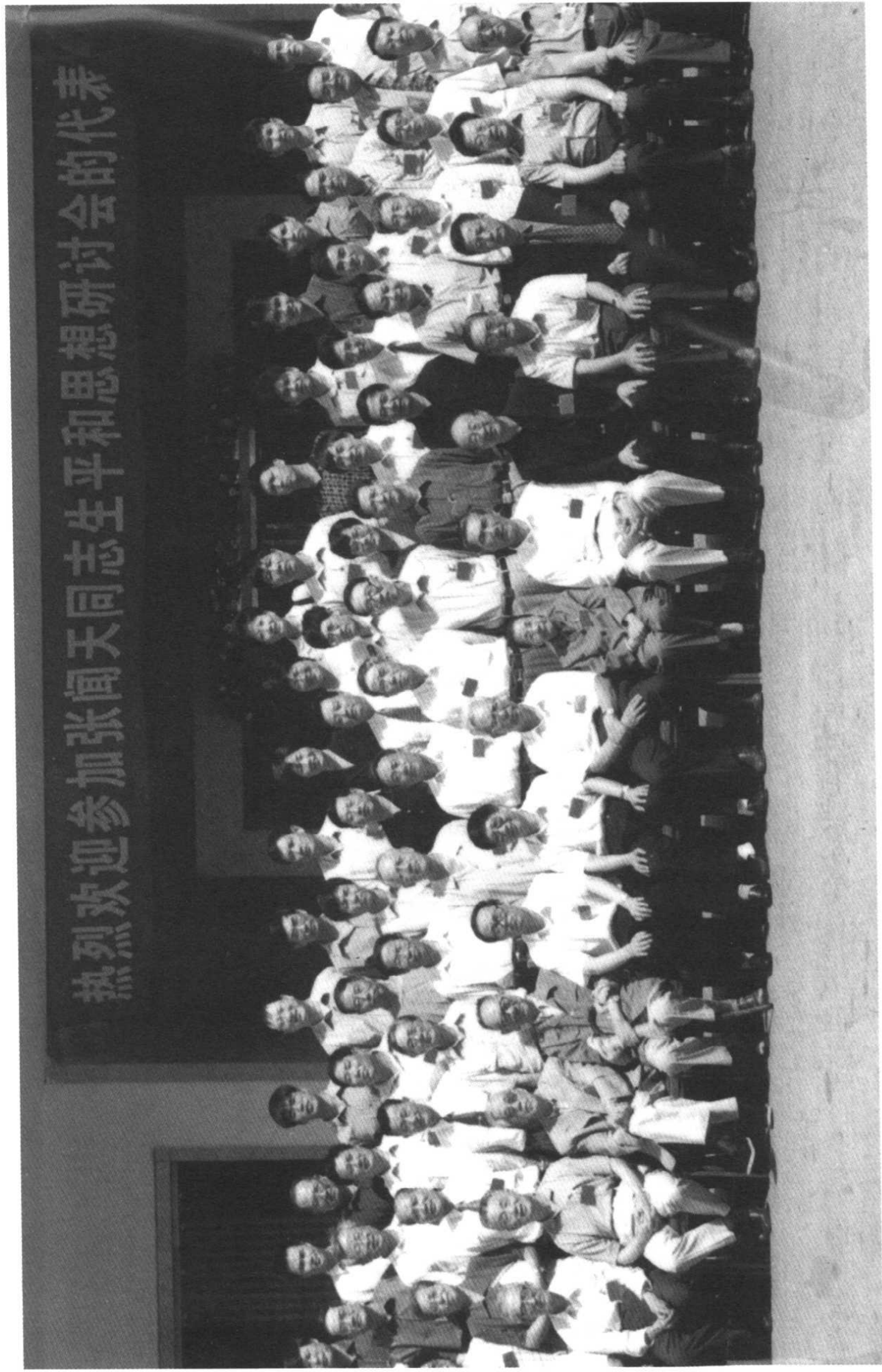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正式辦了離休手續成爲離休人員。本來政協換屆是一九九八年三月份，隨後即可離休，但社科院因在職幹部馬上有一次提薪舉措，爲了照顧一下本屆換下來的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所以就批准這些人的離退休期限延長到了年底，第二年初才辦理手續。其實在離休前我就已經醞釀並且最後決定不再以主要力量研究國際問題，而要改行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了。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我在別的地方多次講過，就是覺得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違心地參與揭發批判張聞天，造成個人平生一大政治錯誤；而張聞天又一直處於被埋沒被抹殺的地位，後來的平反昭雪也不甚徹底；所以我就想在離休後着重研究和宣傳張聞天，一則爲自己贖罪補過，二則在黨史上作點反對愈來愈興旺的造神造假工作。我心裏明白，自己人微言輕，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這樣做總可以給自己一點精神安慰，給那些有權造神造假的人們製造點麻煩。

一聽說我要改行，熟人和朋友們多數贊成，少數反對。贊成的如李慎之等人所說，早就該改行了，如果能結合個人經歷，留點真實的黨史材料，對社會的貢獻總會比搞那些國際問題大

一些。反對者則認為這是揚短避長，放棄比較熟悉的國際問題去搞黨史這門新的行當，是自討苦吃。我感謝朋友們的好意，但還是決心學習黨史了。這時正好在為紀念張聞天誕辰一百周年作準備，我一方面參加點籌備工作，主要是審閱一些文字材料，如年譜、畫冊、文章、劇本等，另一方面開始研究張聞天和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結果寫了四篇文章，分別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嗎？》，《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寫成的嗎？》，《遵義會議沒提政治路線問題是毛澤東故意所為嗎？》，《張聞天是在遵義會議後常委分工負總責的嗎？》（後來在發表時四篇標題都作了修改）。我對上述四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並寫成論文提交給在無錫舉行的張聞天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不久也分別在報刊上發表了。

我研究張聞天為什麼從遵義會議開始？因為我認為，遵義會議後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幾年，是張聞天一生最輝煌和對中國革命事業貢獻最大的時期，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一個重要轉折點。在短短的三四年間，張聞天改變了前任的個人專斷作法，實行集體領導，帶領全黨創造了一個黨內生活生動活潑和理論繁榮的局面，實現了從國共內戰到聯合抗日的戰略轉變，使黨的力量得到迅速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正統黨史教科書把遵義會議上分工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助手的毛澤東，說成被遵義會議確立為全黨全軍的領導，既不合乎事實，邏輯上也講不通。寫過遵義會議，接着就寫延安整風。這不但是由於我參加過普遍整風的全過程，有一定的感性知識，更重要的還是在我看來，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起的作





無錫，紀念張聞天誕辰一百周年，張聞天生平思想研討會代表：前排左起張培森、蕭揚、何方、曾彥修，左七龔育之、左八劉英、左十一程中原，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用會達百年之久。如一元化領導的人治、管制思想言論的「輿論一律」等，現在仍在嚴格地執行着。根據這種想法，我就以延安整風為重點，邊學邊寫，到二〇〇四年底寫成一部《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二〇〇五年五月分上下兩冊在香港出版。原來自己的定名是《黨史學習筆記》，但出版社出於市場考慮，給去掉了「學習」二字。爲什麼拿到香港出版呢？是因爲我寫的內容超出輿論一律的界限，在大陸上找不到敢於出版的出版社。但是我認爲我寫的黨史筆記並沒有超出現行體制，完全是從愛國家、愛人民和愛護黨的立場出發的，絕不能與那種反華反共的出版物相混淆，所以雖然不得不拿到香港出版，還是盡量找了個中資集團下的利文出版社，也着實費了點心思。

然而學術上的改行對我來說並不容易。因爲我一則缺乏史學和黨史這兩方面的基礎，要學習和研究便得從頭來。二則已經年老力衰，體力腦力都已大不如前。三則最難辦的是資料不好找。我既無權查閱檔案，也無力跑圖書館，只能利用可以看到的公開出版物和別人的研究成果。自己藏書中沒有和書店買不到但研究中確實需要的資料，我就向黨史界的朋友借或托他們到圖書館借。實在找不到資料，搞不清的問題，也只好放棄不寫了。另一個辦法就是找活材料，拜訪一些老領導、老同學、老熟人。這裏值得特別一提的還是張聞天夫人劉英。她是從遵義到延安這段時間了解中央情況碩果僅存的一位老人，而且經歷豐富、頭腦清醒、記憶力強，被人稱爲「活黨史」。我同她又相識早、交往深、來往頻繁、無所不談。從「文革」後她回到

北京，我們的來往（多是我去看她，一個時期住得近，平均一周起碼去兩次）決不下一百次。從我改行學習黨史後，就開始有意識地去採訪，並且在她的同意下帶上錄音機，約好每周兩次，雷打不動。因為說清楚是為的寫張聞天，所以她也願意積極配合。

不想進行了一個時期，發現一九五九年批判張聞天的積極分子、外交部一位司長柯華，又在《百年潮》上撰文不指名地批判張聞天（此前還在外交部內部刊物《外交史通訊》上先行發表）。對這種行爲，我感到生氣，就報告了劉英，並說明要進行反駁。她表示支持，還介紹了當時不少情況。聯繫到人們一直覺得雖然中央已經爲張聞天平反昭雪，但在外交部並沒有得到認真貫徹和落實的現象，我更認爲對此不應默爾而息。至於爲什麼在外交部得不到應有的貫徹和落實，這也是個普遍現象，值得多說幾句。因爲當年外交部中層以上領導，大多參與過對張聞天的批鬥，按慣例這是不用承認錯誤的，因此以前批鬥過張聞天的大小幹部，果然就沒有有一個人公開出來承認批錯和進行檢討。而且不少人還保留着當年的看法，以至在實際工作中還是以前那種盡量淡化以至抹殺張聞天的工作和貢獻的老辦法。後來進部的幹部，既不了解過去情況，自然會受他們影響，結果代代相傳，似乎也就定了型。例如，張聞天親自動手、創業建立的外交學院和國際問題研究所，在他們建院五十周年和建所四十周年編寫的紀念材料中，基本上都沒有提張聞天創建和領導的事跡。研究所最近在紀念成立五十周年時，雖經熟悉情況的人們一再提醒，還專門寫了詳細材料，但仍然被加以淡化。可見外交部批鬥張聞天的上中層領導

保留下來的影響，實在不能輕視。因此，對柯華的文章除寫信向外交部領導反映外（他們派了部領導來家向我解釋，唐家璇部長一次開會時碰到也作了當面道歉），還趕寫了一篇文章在《百年潮》上公開批駁。不料在趕寫完這篇文章時可能因為生氣而發生心肌梗塞，住院治療。由於張聞天和他早年的秘書徐達深都死於心臟病，所以劉英談虎色變，就堅決要我停止對她的錄音訪問，加之不同意有些情況公之於世，還反對我繼續寫下去。我尊重老人的想法，沒有過分勉強。我所寫《黨史筆記》除有關遵義會議的四篇經她看過並得到她的同意外，後來的稿子再沒有送她看，也很少引證同她的談話。等《黨史筆記》出版，她已不在人世了。

由於我不會使用電腦，一直採取爬格子的老辦法，加之寫黨史又是新手，所以進度很慢。具體說來，往往是打印前自己已改過兩三次，打印後再分送一些老同志、老同學徵求意見，他們先後退回，我也隨着修改，打印稿跟着重打。這樣反覆操作，至少總有四五遍。要打印，還得麻煩先後在我家幫做家務的幾個女孩子學習打字，每次打完以後又都要由我老伴校改和提意見。弄得全家三口人都跟着忙乎，特別是老伴費神不少。後來書一出來，大家也都一同感到高興。

### 「自傳」從口述變手寫

按我原來的想法，寫完《黨史筆記》，打算再寫一本有關外交的幾個問題。因為我終究在外交部呆過三十年，跟着張聞天從事過十年的外交實踐，而且我確實對過去的外交工作有一些





北京何方家，劉英來躲壽，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

自己的看法。人們常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不管這種說法是否確切，內外政策有密切聯繫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建國後三十年，我們在國內執行了一條嚴重錯誤的路線，弄得民窮財盡，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與之相比，總不能說對外執行了一條完全正確的路線。實際上是同樣錯誤，使我們白白喪失了一個大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被排除在了世界文明大國的序列之外。對於國內政策，雖然做得很不徹底，但還是進行了一定的撥亂反正，而對於外交卻幾乎沒有進行過任何清算和總結。這總不能說是正常的。所以我就自不量力，想在這方面作點嘗試。又是一個偶然的因素，使我改變了原來的打算。

兩個要好的年輕朋友丁東和邢小群夫婦，看了我的《黨史筆記》初稿，發生了興趣，認為如果能將我的經歷寫下來，也可以給《黨史筆記》補充點具體的材料。他們兩位又是大力提倡和實踐「口述歷史」編寫這一行當的著名人物，對我有着殷切的期待。開始提起，我雖覺得高情難卻，但還是有點猶豫。一則覺得自己是個小人物，經歷簡單，不值得寫。二則看到市場上流行的幾種《口述自傳》有點屬於編故事、寫小說，特別是那種吹自己、攀名人的格調更令人生厭，所以不想趕這個浪頭。但是後來又終於同意了他們的建議，那是對「口述自傳」看得簡單了一點的緣故。當時正在寫《黨史筆記》，離休後幾年來也是「八小時工作制」，整天地讀和寫也需要調節一下，和熟人聊聊個人的過去等於一種很好的休息。更重要的是我對過去的形勢和政策有些個人看法，總想表而出之，卻沒機會，夾在《口述自傳》裏邊叙邊議倒也是個辦



與邢小群合影，二〇〇五年



法。於是和小群商定，並先後談了二十多次。這對我並沒增加什麼負擔，但小群可就吃苦了。她根據錄音整理了二三十萬字的材料，但同我的想法和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原因完全在於我不會「口述」。第一遍談話事先沒做準備，東拉西扯，信口開河，神仙也難於把這種談話變成文章。加之我的鄉音未改，人們不容易聽懂。例如昨天我給郵局打電話，對方怎麼也聽不懂，最後乾脆說請你還是找個講普通話的人來。可見小群能基本上整理出來已經是實屬不易。當然這與她接觸的人和見的場面多也有關。看罷第一遍整理稿，經反思後擬了個提綱，又約小群談了多次。小群也很快整理出第二稿。但是我感到還是有距離。原因可能是由於我經歷的外交工作、研究工作等都屬具體工作，小群也許不熟悉，整理起來不容易說清楚。同時我過去搞了大半輩子文字工作，寫的都是政論性的東西，要求說理嚴格、用詞準確。長期的習慣使我不會口語化、文字生動不了。而小群則屬文人，既是學者，又是作家，所以兩個人在寫作上聯手太費勁。而且「事不過三」，小群已辛辛苦苦整理了兩遍，總不好意思再請她整理三遍甚至四遍吧？更何況她還是個大忙人，不但在不斷創作，還繼續教學，長時把她拉到我這個「泥潭」裏，既不合適，也不可能。後來也曾轉請老伴宋以敏重新整理過一遍，結果仍不滿意。正好這時我已從《黨史筆記》中脫身出來，可以集中考慮處理《口述自傳》了。開頭一想，自己不會「口述」，就乾脆拉倒，不搞這個項目了。但又覺得這樣對不起朋友的期待，特別是小群和老伴兩位勞動。於是下決心自己動手，然後請小群他們修改潤色。但我只能採用老辦法——爬



格子，而且還是老毛病，往往寫完一段，看了不滿意，就撕掉重寫。寫好後交家人打印，再分送老同學老同事徵求意見。因為每個工作階段，都還有些老同事健在，熱心的朋友會退回認真仔細的修正和補充，幫我改掉不少記憶中的錯誤，特別是時間、地點、人名等。這樣，每寫一章，改來改去，總得改個十來遍，基本上都是動手不動口的。所以我這已不是「口述自傳」，而是實實在在的「手寫自傳」。原來以為用不了多少時間，結果還是拖拖拉拉到現在，已耗去近兩年的時間，但還缺個尾巴——結束語。

不管好歹，八十多年的經歷總算整理出來了個大概。回想過去真是糊裏糊塗地過了一輩子。胡繩有一首「八十自壽銘」，說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用銘文把他的思想分成了幾個階段。我也可以說「十有五而志於學」，但經過延安整風已逐漸進入惑而不解狀態。三十沒有立，四十被打倒。此後就總有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經常縈迴腦際，揮之不去。自己又無力對它們進行研究和解釋，所以還是時清時懵地惑了大半輩子。在改行學習黨史和這次整理「自傳」的過程中，才比較明確和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特別是對那幾個重大問題的認識，進行了一點清理。是幾個什麼問題呢？歸納起來，對我影響最大、我也考慮最多的是這樣五個問題：如何看待抗日救亡運動，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如何看待黨的領導和如何看待中國今後的發展方向。對於這些問題，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專門研究過，但是改行後總算瀟

了一遍，有了一點新的看法，對個人來說也算明白了一點。至於對與不對，自己並沒有信心。下面就簡要地談一下對這五個問題的看法，算是給這部傳記作個長尾巴的小結。

## （二）如何看待抗日救亡運動

### 問題的提起

提出這個問題等於是問我，我為什麼參加革命，對參加革命後悔不後悔。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人在談到民主問題時曾直接間接地聯繫到啓蒙，在提出「回到五四」的同時，就有了「救亡壓倒啓蒙」或「抗戰壓倒啓蒙」的說法。對於抗日救亡運動，是不是也伴隨着一場新的啓蒙運動，就大有分歧了。「壓倒論」者自然不承認。官方史學雖不大講，但承認有，認爲是共產黨領導的傳播「馬列主義」的運動，因此稱之爲「新啓蒙」。據李慎之說，最先是時任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的陳伯達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得到張申府、張友漁等一些著名進步學者的響應，並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北平成立了「啓蒙學會」，發表宣言，引起思想界、文化界的熱烈響應。其實照我看來，這次伴隨救亡運動的「新啓蒙」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發動起來了，並不是只存在於抗戰前幾個月的曇花一現。何況無論中外，啓蒙都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中國如果從戊戌政變算起，經過「五四」、抗

日救亡，直到現在，啓蒙的大部分任務並沒有完成，還亟須補課。至於救亡運動，爲了方便起見，這裏也就沿用了「新啓蒙」這個提法。而這個「新啓蒙」，既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亡的條件下催生出來的，也受到世界社會主義潮流的影響，所以就表現爲對內接受主張抗日和民主的共產黨的領導，對外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也就因此同情和嚮往蘇聯。但是後來的形勢發展卻出乎人們當年的想像，蘇聯原來是個對內專制對外擴張的帝國，中國共產黨掌權後也絲毫無意於實行民主，反而更專制了。於是一些人就怪先知先覺者們的誤導，也反思自己對別人的誤導。有人公然說，我們受了騙，也騙了人。可見，如何看待抗日救亡運動和相伴的新啓蒙運動，還是個值得研究和反思的問題。因爲我也算參加過救亡運動，接受過先賢們的啓蒙，因此才參加革命，走向延安。參加救亡運動本身就說明，我也啓蒙過別人。因爲我參加的救亡運動，主要方式就是宣傳。例如跟我一起去延安的兩個年齡比我還小的同學，就是由於受了我的影響。

### 一次廣泛深入的啓蒙

在我看來，救亡不僅沒有壓倒啓蒙，而且救亡本身就包含着啓蒙，甚至可以說救亡就是啓蒙。啓蒙是有普世性的歷史進程，抗日救亡只是一個時段的主要內容。只要沒有擺脫愚昧、野蠻、專制主義、個人迷信以及民族壓迫等不文明社會的約束，啓蒙就必須也必然會一直持續下

去。我生長在西北，地處偏僻，在「九一八」之前，不但一般老百姓，連我這個私塾學生都不知道中國有個東三省。但是經過後來參加救亡運動和接受啓蒙，就不僅知道了東三省，而且下決心要爲收復失地而奮鬥了。這對我們那一代特別是大小知識界來說帶有普遍性。人們看了一些左翼的文藝作品和人文社會科學著作，就會心潮澎湃、熱血沸騰、互相鼓舞，參加革命。同學們看不大起那些不大關心國家大事、只知埋頭功課準備升學的人，斥之爲「醉生夢死」。這些人確實也是少數。我們那些中小學生正是在救亡中接受啓蒙，在啓蒙中參加救亡。兩者相輔相成，沒有一個誰壓倒誰的問題。其實，純粹的理性啓蒙，歷史上並不存在。「五四」就是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反帝運動交織在一起，「打倒孔家店」和「火燒趙家樓」同時進行的。

所以，抗日救亡運動可以看做是中國人民的一次大覺醒，其深度和廣度大大超過「五四」。不僅各種啓蒙的理論書籍、文藝作品、報章雜誌來了個大普及，而且宣傳講演、唱歌演戲還深入到了農村。以前，我們縣沒有賣新書的書店。「九一八」後出現了專賣新書的書店，連原來只賣《百家姓》、《三字經》、四書五經等私塾課本和章回小說的書鋪裏，也擺上了魯迅的《吶喊》、《彷徨》，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等新書。我們這些縣城裏的小學生還組織宣傳隊、演劇隊，經常下農村活動。單是打着小旗，喊幾聲口號、唱幾隻歌，就已打破了農村多年的沉寂，一些青年農民也開始跟着活躍起來了。或許在大城市裏感覺不出特別新鮮，但在偏僻的小城鎮和農村，救亡運動和相伴隨的「新啓蒙」引起的變化，那可太顯



著了。特別是西安事變以後，我們家鄉關中一帶幾乎等於獲得「解放」。

救亡運動不是單純地只宣傳抗日。事實上，與救亡運動同時興起的新啓蒙運動，內容是相當豐富的，不僅廣泛宣傳反對日本侵略爭取民族解放，而且也大量宣傳反帝反封建，普及了有關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知識。如果救亡內容只限於抗日，那就無法解釋大批知識青年在抗日戰爭掀起後還投奔延安和其他根據地，在歷史上培育出著名的「三八式」一代，成爲解放戰爭和後來建國的骨幹力量。他們當年離開國統區，走向解放區，就是因爲雖然國共都抗日，但國民黨卻專制腐敗，共產黨講求自由民主。

那時的進步文化人和知識青年，都懷有崇高的理想，不僅要求得民族解放，還要解放全人類。正像我們整天唱的《抗大校歌》所概括的，「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承擔。」不但中國接受和參加「新啓蒙」的人們傾向共產黨和蘇聯，而且在全世界進步知識界中認同社會主義也是普遍現象。這是中國經歷過上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的人們都曾親自耳聞目睹過的。否認那場轟轟烈烈的啓蒙和把它的參與者看成被誤導受蒙蔽，就是抹殺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和一代精英的歷史作用，也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 中華民族的最後形成

這場救亡和啓蒙運動，促成了抗日戰爭的實現。也正是經過抗日戰爭，「到了最危險的時

候」的中華民族得到了拯救並得以最後形成。在抗日戰爭之前，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在中國並不存在。至於由國內各民族結合而成的中華民族，雖然早有人提到，例如梁啟超就討論過中華民族的精神，歸納爲四點，但這個更鬆散的族群卻還處於結合的過程中，並沒有最後形成。在中國大地上，所有民族也都遠沒有成熟。人們常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各民族就已凝聚一起，有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任務。但是實際上，此後的民族鬥爭主要還是在國內各民族之間進行。不僅太平天國發動的是反滿戰爭，宣言叫「奉天討胡檄」，就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初提口號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國初年，一些少數民族痛恨和反對的仍然是欺侮和壓迫他們的漢族統治者。我小的時候就經歷過「回回造反」。西安周圍一些縣先後發生回民起義，後來大部分被趕到寧夏、新疆一帶去了。現在我們村周圍還有一些只有村名已無回民的遺址，如「回回道」。國內許多民族處於雜居狀態，但是少數民族大多被迫移居邊遠山區，中原大地和條件好點的地方在歷史的變遷中轉入漢人之手。

中國還沒有形成現代的民族國家，另一個明顯證據就是沒有固定的邊界。直到新中國成立，才不得不和周邊國家逐個經過談判、簽訂邊界條約、正式劃界，而且至今仍未完成。一九五七年中緬邊界談判時，我曾旁聽過一段。由於中國過去的中小學課本一直寫着英國佔領緬甸時搶去了我們的片馬、江心坡（其實中國的治理從未達到過這兩個地方），一些民主人士堅決要求在這次談判時收回。周恩來總理就給他們做工作，其中曾提到我們建國後仍存在「四至不

定，四鄰不安」的情況。由於邊境未定，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往往分不清自家是住在中國還是外國。或者人住這國，耕地卻在那國。這種同一民族（實際上還處於部族階段）分住兩國，在我國周邊是普遍現象，在邊界的劃分和邊界的管理上都曾帶來麻煩。

抗戰前中華民族尚未最後形成還可提出一個側面證明，就是中共曾一再公開宣告，而且不但見之於黨的某些文件、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一些講話，還載之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承認國內少數民族（蒙、回、藏、苗等）的自決權，承認它們有權脫離中國成立自己獨立的國家。也許由於情況不清，還提過允許台灣獨立的問題。經過救亡和新啓蒙運動，特別是抗日戰爭的發動，中華民族最後形成了，其他少數民族脫離中國而獨立的問題就不再提了。至於台灣，更不存在獨立的問題，因為那裏百年前就是以漢族為主，土著民族已經極少了。如果說我小時曾目睹過回族和漢族的不斷衝突，那麼抗戰爆發後所看到的已是包括五十六個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團結抗戰。從西北開往前線的藏民師、回民師等，那種慷慨悲歌上戰場的人場面至今印象仍然很深。我們那時不斷組織對他們的歡迎，還學習和從事過對前線送回來的人少數民族傷兵的護理。至於在戰場上特別是敵後，各民族攜手抗日的經歷早已載入歷史。還應一提的是，海外僑胞的抗日情緒並不遜於國內同胞。總之，經過抗戰，中華民族才真正形成了，從近代史上一個較空泛的概念變成了一個客觀實際存在。從此，中國各民族如果再有獨立傾向和獨立活動，那就不但失去進步意義，而且屬於分裂祖國的叛亂了。

歷史證明，中華民族要成爲近代意義上的多民族的集合體，必須解決兩大問題，就是對外實現國家獨立和對內達到民主統一。抗日戰爭的勝利基本上解決了獨立問題，並且成爲當時世界四大強國之一。但由於國共分裂、內戰興起，至今仍未完全解決統一問題，還喪失了大國地位。另一方面，新中國雖然成立了，卻並沒有迎來自由民主，反而走上了專制主義道路。但這不是由於「抗戰壓倒了啓蒙」，而是由於啓蒙的轉向。這就是延安整風興起的反啓蒙的個人崇拜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實行的一元化領導和輿論一律。因此，周揚、溫濟澤等人把延安整風說成是一次啓蒙，是繼五四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顯然是對歷史的顛倒。聯繫到個人，我在少年時代就積極參加救亡運動、接受先知先覺者們的啓蒙，確也是出於真心實意。之所以背井離鄉加入革命行列，也是由於懷有崇高理想，那是沒有什麼虛假的。作爲一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能在那個偉大時代，投入革命洪流，真是人生幸運，從來沒產生過悔意。至於後來陷入個人迷信，糊塗幾十年，那也是歷史的局限，雖然與主觀因素有關，但也不能過分苛求於己。

現在有些所謂的學者，不但否認抗日救亡運動的啓蒙含義，而且有時還流露出對參加抗日救亡的老一代先知和追隨他們的廣大群眾的某些不以為然，說他們「搭錯車走錯路」，耽誤了啓蒙，誤導了人民大眾，直接間接幫了專制主義的忙。這可就大不公平了，實在對不起從「五四」到抗戰的好幾代中國精英，特別是那些爲了民族解放和維護正義而英勇犧牲的千百萬烈士。難道寧可置亡國於不顧，不要民族覺醒，只談「純理性啓蒙」才對？那就真有點像《紅樓



夢》上林黛玉說賈迎春的話：「虎狼屯於階陛尙談因果。」

### （三）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

#### 過去對馬克思主義並不清楚

馬克思主義誕生將近二百年，我們先後把它定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也有幾十年了。但是直到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期間，鄧小平才說了一句老實話：「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就以我個人來說，我是從小就學習和篤信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著作也讀過不少，還給人家上過課，但實際上是一直沒有弄清楚。不但作為學說，許多問題是模糊的，是跟着領導人云亦云；一聯繫到實際，那就更糊塗了。例如像大躍進、反右傾、餓死人、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瞎胡鬧，內心實在不相信這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沒有也不敢有個人的獨立思考。比起一些先知先覺來，自己只能算一個隨大流的落後分子。只是在改行學黨史後，才對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歷史與現實問題作了點稍微系統一些的思考，現在所能談的，就只是近年來的想法了。

其實，鄧小平說的對馬克思主義並不清楚的「我們」，主要指的顯然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以及他自己那些參與中央領導核心的人，特別是一言九鼎的毛澤東，像我這種跟着跑的

小不拉子大約並沒有包括在內。而且他對毛澤東的評論也還有別的例證。一九八五年他曾對外賓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而毛澤東「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說的「我們」沒弄懂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這除了主要是由於中國社會歷史的局限和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缺陷以外，還由於中國領導人並不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例如毛澤東就沒有讀過馬克思的基本著作《資本論》（劉、周、鄧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陳伯達、胡喬木也都沒讀過），主要看的是馬恩前期幾本小冊子如《共產黨宣言》。加之他們不大了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歷史和文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流派和先期國際共運中的鬥爭，特別是對第二國際和民主社會主義缺乏研究；也沒多研讀馬恩晚年的著作如恩格斯的《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等。他們不但沒弄清馬克思主義，而且還對馬克思主義作了不少曲解、誤解、片面化、極端化、僵化、教條化，加上深受中國專制主義和歷代農民暴動的影響，結果就造成實踐中的專斷、蠻幹、胡來，嚴格的等級制度，以至大搞個人迷信等等，反而把這些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結果就鬧得許多地方自相矛盾。例如，既然說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弄清楚，又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怎麼可能說他是中國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人都必須堅持？

對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沒弄清楚，現在是不是弄清楚了？看來未必，可能是更模糊了點，有些還是爲了維護執政地位故意搞模糊的，特別明顯的是表現在造神、造假上。又如馬

克思主義的基本信條是人的自由發展，這是恩格斯經過深思熟慮的回答。可是我們能談得上嗎？如果單就言論出版自由來說，那麼從實行改革開放、進行撥亂反正那段時間算起，不是恰相反，許多方面不是收得愈來愈緊嗎？這大概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作為抽象的名詞，民主還可以在報刊上經常見到，甚至允許作點不關痛癢的討論。但是涉及自由，就連空泛的談論也幾乎見不到了，更不允許討論馬克思主義最重視的思想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問題。這些詞彙已日漸從報刊和其他印刷物上消失。由此可見，我們把馬克思主義規定為全民必須堅持的信條，但實際上卻並沒有執行甚至也不想執行。我們執行的並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還是當年從蘇聯搬來的斯大林主義（主要是政治模式，經濟體制在改革開放後已基本上放棄了）。因為正像有些人所說，以系統的理論衡量，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毛澤東思想，它只是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

### 對馬克思主義的幾點看法

雖然我對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至今仍然不十分清楚，但是經過近幾十年的實踐和反思，也可以作出以下幾點判斷，向方家請教和參加討論。不過這裏着重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這一中心課題，而不多涉及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其他領域。

### 馬克思主義掀起了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

人類有史以來，就追求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其含義雖然各地區和各人群並不一致，但是許多因素還是大同小異的，如自由、平等、公平、正義、民主、均富等。這些自古以來就有的理想，先後形成各種學說和信仰，不管叫什麼名目，是大同世界還是烏托邦，但都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隨着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到十九世紀初，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不同派別就先後興起，在歐洲形成了日益廣泛的運動。不過開始階段，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不但派別紛雜，而且思想混亂，什麼貨色都有，不光是都屬於空想社會主義，還多為一些不同的封建貴族、宗教派別和資產階級所利用。所以爲了劃清界限、不同流合污，馬克思、恩格斯在初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時有意避開使用社會主義，而用共產主義這個詞。他們起草的第一個正式文件就取名《共產黨宣言》。直到二十多年後，馬克思的思想在社會主義運動中逐漸處於優勢時，他們才更多地使用社會主義，而很少使用共產主義了。對此恩格斯曾作過詳細解釋，在他領導下創建和參加第二國際的各國黨也都以社會主義命名，如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等。興起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到恩格斯晚年即已開始進入高潮。由於運動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和推動下發展起來的，所以恩格斯臨終前不久，曾既高興又不無惋惜地說，馬克思如果能看到這種盛況該多好呀。從歷史上看，社會主義運動從十九世紀末已呈燎原之勢，到二十世紀更成爲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潮流。蘇聯東歐的變化，只表明社會主義運動中一



個派別的衰落，而整個運動仍在蓬勃地向前發展着。這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歷史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不算長的時間裏，戰勝社會主義運動中其他流派，處於優勢和領先地位，首先因為它是在當時歐洲幾門先進學說的基礎上，空前地集中、提高和發展了歷來社會主義運動的要求和理念，就是解放全人類，求得人的自由、平等、博愛、均富，建立起了一整套站在時代前沿的理論體系。也由於這一理論是一門科學，目的在於拯救無產階級和其他勞苦大眾，因此自然會得到他們以及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歡迎擁護，成為這些人的信仰。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馬克思的學說特別強調理論和實際的聯繫。他和恩格斯直接參加和指導國際工人運動，並執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不斷修正和發展自己的學說，使之愈來愈豐富、愈來愈接近真理。所以不論人們怎樣評論，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誰也不能否認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不但工農群眾，而且連西方學界也一直敬重馬克思，一再自覺自願地推舉他為「千年第一學人」的原因。

### 馬克思主義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人文社會科學，主要還是在探索真理，並沒有說已經窮盡真理。所以不能說它是「科學的科學」、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既是科學，就應進行研究和經過實踐的檢驗，凡證明是正確的，當然應該堅持；證明是錯誤的，就必須加以修正和揚棄。馬克

思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必然受到那個時代的限制，一些觀點以至基本原理的錯誤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本人就在對他的學說進行着不斷的修正，後來恩格斯獨自領導工人運動的十二年中更有重大的修正和發展。無怪乎一些人說他們的學說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些人只記得《共產黨宣言》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強調兩個「徹底的決裂」。其實馬克思老早就認為在一些民主國家如英、美以及荷蘭，可以實行和平轉變，經過普選，工人階級就能取得政治統治。到了一八七四年，恩格斯更進一步認為，「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十年後，他更直截了當地說，「歷史表明我們曾經錯了」，一八四八年時提出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陳舊了」。面對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和自我調節，他還承認，「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可以通過普選和代議制等民主方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原話是：「舊社會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他也不再堅持砸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主張繼承其立憲和共和制度。恩格斯不只在理論上修正和發展着馬克思主義，而且還同他的朋友和學生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倍倍爾、李卜克內西、普列漢諾夫等，創建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在實際鬥爭中運用馬克思主義，把社會主義運動引向高潮。

在承認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的同時，還必須承認它只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流派，既不是處在高於其他流派和壟斷整個意識形態的地位，更不能使其政治化，成爲人人必須堅持信

奉和服從膜拜，而不能懷疑、討論、批判和揚棄的教義。任何學說只要被置於高於一切的壟斷地位，加以神聖化和政治化，那它就會喪失科學性，宣布自己的死亡。

### 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回事

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所寫《論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的專論中，就提出過不能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混為一談，因為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實踐檢驗，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有些根本性的修正，並且證明這些修正有不少是錯誤的。中國一直奉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是列寧斯大林主義。中國革命的遭受挫折和走了彎路，特別是頭二十八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失敗，這是一個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有空想的成分和「左」的傾向，而列寧主義走得更遠，以致使它和馬克思主義在一些根本問題上脫節。下面我們就列舉兩者之間一些主要的區別，只是點到為止，不作旁徵博引和詳細說明。

馬克思主義是指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和理論體系。而列寧主義只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一個「左」的流派，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旨在奪取政權和實行專政的「理論和策略」。

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信條是人的解放，恩格斯用《共產黨宣言》上的話歸結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列寧主義最基本的信條是斯大林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列寧本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回答西班牙代表團的提問時也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馬克思認為，必須以社會化大生產的高度發展和物資極大豐富為前提，因此只能發生在社會主義胚胎已經成熟的發達國家；列寧認為可以在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經濟較為落後的東方國家俄羅斯首先實現。

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進行和取得勝利，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解放只能是國際事業，一國單幹必然成為笑柄；列寧主義則認為，可以先在一國取得勝利並向世界輸出革命。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普列漢諾夫臨終前曾說，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原理已經過時，馬克思本人如果健在也會加以揚棄），馬克思主義當初所提也是指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對少數資產階級的專政，而且只適用於國家消亡前的過渡時期。列寧公開主張的卻是少數人（指俄國的產業工人）對多數人的專政，進而成為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並且「只要其他社會成分還沒有服從於共產主義要求的條件，這一專政就將延續下去」。

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到了後來，特別是恩格斯晚年，已慎言暴力革命，而大力提倡爭取普選權和代議制，主張改良、漸進的「和平演變」。對於這些，列寧持批判態度（有些重要文獻如恩格斯的《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列寧在世時沒能看到）。

一九一九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徹底分裂後，主要分成兩大流派，一是宣布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二國際和各國工黨、社會民主黨，一是宣布實行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和各國共產黨。雙



方都承認信仰馬克思主義，開頭時還都自封「正統」，但卻互不承認，勢不兩立。

列寧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差別當然不止這些。對許多差別，過去說成是列寧的發展，現在看來並不妥當。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列寧熟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那時已公布的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如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和實行計劃經濟等，都是繼承和堅守的。因此只能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不能說它與馬克思主義無關。而且列寧在世時只有布爾什維主義的稱謂（近二百年國際共運中以活人命名學說的只有毛澤東一人），後來的列寧主義是斯大林的定義和系統化、還同馬克思主義連成一個單詞——馬克思列寧主義，又不斷把自己的思想追加進去，使它實際成了列寧斯大林主義。現在有些人爲了替列寧開脫，把壞事完全推到斯大林頭上。這不但不公正，也不合乎事實。

#### （四）如何看待社會主義

我們平常說的社會主義，其涵義既指思想理念（馬克思主義被稱爲科學社會主義），也指社會運動和國家制度。不過這三個涵義是密切相關而分不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都是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實踐。不同的社會主義運動或制度也就是基於不同社會主義流派思想的指導。下面我們就來談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幾個問題。

## 兩大流派和兩種實踐

興起於十九世紀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二十世紀已成爲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潮流。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兩種自覺的社會主義實踐。一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社會主義胚胎」（或因素）的迅速發育和許多新獨立國家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對這後兩種情況，下面還要專門討論。這裏只談前兩種實踐，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及其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和社會黨（包括工黨、社會民主黨等）執政的國家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兩種實踐，是在上面講過的馬克思主義兩大流派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下面對這兩者作點簡單介紹。

### 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蘇聯解體前，這些國家都按斯大林模式，經濟上消滅私有制，實行單一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除上層保有一定的等級制和特權外，群眾中多實行平均主義），國內商品短缺，對外閉關自守，但也都有較好的社會福利制度；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和黨管一切，實行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人治和個人崇拜，民主限於形式，實際上不講自由、平等、人權、公正；意識形態上實行一黨壟斷和嚴格管制，禁止思想信仰、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暗箱作業，思想僵化，不容說理，禁止爭鳴。因此，它們的經濟不發達，社會不成熟，政權不穩

定，時間一長，就難以爲繼。蘇聯和東歐國家就是在同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競賽中自行崩潰的，而不是由於外來敵對勢力的武裝侵略或和平演變。鄧小平也說，中國不實行改革開放也一定垮台。事實確實如此，共產黨執政的中國、越南由於進行了以市場爲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生產就得到飛速發展，國際地位大爲提高。但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和意識形態的壟斷仍然未變，所以問題還很多，社會並不穩定。

### 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這主要指二戰前的瑞典、芬蘭等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和二戰後工黨、社會黨幾度執政的英國、荷蘭、奧地利等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其實，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是同一回事，目前學界談論時已通稱民主社會主義，所以這裏也就把兩者合在一起來講。不過細分起來它們還是有區別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社會主義因素的多少都不盡相同。一九五一年英國工黨發起恢復社會黨國際的法蘭克福會議，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兩方面都參加了。在會議上通過的宣言中正式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是「擴大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會中共同工作」。民主社會主義爲自己規定的原則是一「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經濟上實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國家適當調節的市場經濟，建立體現平等原則和博愛精神的社會福利制度，允許意識形態多元化，上層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在淡化。雖然各國的社會主義化進度參差不齊，執行和實現的程度有很大差別，以瑞典爲

代表的北歐國家就做得比較好些，其他稱爲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就做得差些。但是它們的大方向還是一致的，社會主義的因素也都在迅速增長。以財富佔有來說，這些國家平均約有一半左右屬於國有資產、公用事業和社會福利的公共部門，其中瑞典的公共部門佔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點四，英國佔百分之四十七。在所有制問題上，瑞典社民黨還力圖進一步做到公平，設法將企業利潤逐步從資本家手中轉給工人集體。因此一九八三年社民黨執政時搞了一個「僱員投資基金制度」，規定每年從資方的超額利潤（超過五十萬克朗）中提取百分之二十交給職工集體的基金會，並將僱主代職工交的養老金提高百分之一。他們估計，經過三五十年，基金就可佔企業股份的一半，私有制就將逐漸變爲集體所有制。爲了抗議這一法案，資本家組織了一次有七萬五千人參加的全世界空前的遊行示威。但社民黨控制的議會還是通過了該法案，規定於第二年一月一日起實行。

### 兩種實踐，兩種結果

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是二十世紀兩種社會主義模式在進行競賽和比較。實踐檢驗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取得程度不同的勝利和成功，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向共產主義過渡（蘇聯開始於一九三六年社會主義建成，中國實行於大躍進時期）遭到完全失敗。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這裏就以瑞典等北歐國家爲代表和蘇聯作點比較。瑞典、芬蘭是二十世紀初歐洲最落後的國家，自然條件惡劣，但到一九七〇年代，富裕程度已名列歐洲



前茅（一九八〇年瑞典人均產值達一萬五千多美元，超過當時的美國、西德等大國），真正做到了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備、社會穩定、道德良好（清廉居世界頭幾名，貪污腐敗和犯罪率最低）、人人平等（除政治上以外收入差距也最低）。消滅了等級制和特權，總理、部長在工作時間配用專車的不到五人，首相或總理的家庭也不配備服務人員。更沒有工資的「含金量」差別極大和什麼正部長級的副部長、以及醫療、住房、用車等分類的「正部級待遇」、「副部待」這些怪名堂。基本上消滅了三大差別，做到了普遍富裕等等。以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為標準，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確的，而且成績不小。這些國家實行代議制民主，有定期選舉。這是人民管理和監督政府的好形式。有時人民不滿社會黨的政策，也會通過選舉更換政府。但是由於社會福利制度一般具有能增不能減、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特點，所以上台的無論是右派還是中間派，都不能改變社會黨的福利政策，也不能改變人民取得的基本權利和利益，結果就自然改變不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成就。瑞典中右派幾次短期執政都是證明。

相反，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原本就走錯了路，不但離「自由人聯合體」愈來愈遠，還導致經濟落後（以前公布的許多數據弄虛作假，水分很大。一九六七年官方公布的國民生產總值為當年美國的——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五億美元——百分之六十七，此後再未公布。據西方權威機構聯合調查，蘇聯解體前一九八九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五千一百二十億美元，與加拿大相當。

美國則爲六萬四千三百一十九億美元。蘇聯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可見蘇聯當年統計的水分之大。我國統計也是照搬蘇聯的。俄羅斯官方承認，蘇聯的糧食產量直到垮台時還沒趕上沙俄時的水平）、政治獨裁（專制程度和濫殺無辜超過沙俄）、文化凋敝（文學就趕不上十九世紀），共產黨領導和蘇維埃政權終於被人民拋棄。當然，蘇聯存在的七十多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績，如提高和普及了社會福利，縮小了收入差距，實現了工業化，打敗了希特勒等，但這些都付出了很大代價，且沒能避免崩潰。現在中國的「左」派人士還堅持唯心史觀，把蘇聯的垮台完全歸罪於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但據我所見所聞，蘇聯人民並不這樣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國，二戰前的經濟水平不低於瑞典、芬蘭等鄰國，地理條件還優越些，但加入蘇聯後很快就落後了。一九八〇年當瑞典、芬蘭人均產值已達一萬五千元左右時，它們只有不到四千元，還是蘇聯各共和國中最高的。至於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談不上了。所以還在蘇聯解體前，三國共產黨和最高蘇維埃就通過決定，宣布脫離蘇共和蘇聯而獨立。

在蘇聯解體期間，我有一次去了列寧格勒，那裏正醞釀投票改名問題。我曾問到堅決主張改名的一位二戰中衛城英雄，爲什麼要換掉那個光榮的名字而恢復舊名。他以沙皇時物質文化生活、在歐洲的地位和後來的蘇聯相比，無限傷感地認爲十月革命搞錯了，說二月革命後多麼自由呀，要是此後只着重於實行民主、發展經濟，俄國現在決不會處於在全歐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後地位。我們爭論許久也說服不了他。（其實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對德國革命的設想，俄國

二月革命後的主要任務也應當是反對專制、爭取民主和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通道路。）

據最近（二〇〇七年初）我國權威報告所提第一次（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和第二次（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轉化）現代化標準，我們大約二〇一五年才能實現第一次現代化（全國只有資本主義的港、台、澳三地早已實現），達到一九六〇年發達國家水平。全民消滅貧困當在二〇五〇年。北歐各國不但早已是發達國家，而且第二次現代化的世界頭十名中就有瑞典（第一名）、芬蘭（第三名）和丹麥。無論按文明和現代化的哪條標準衡量，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都大大落後於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也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決不能以起點低、底子薄為藉口，看一下南北朝鮮的差距就行了。所以兩相比較和衡量，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是勝利的成功的，共產黨領導下的斯大林模式則是錯誤的失敗的，其中沒有一個國家獲得成功。這就是二十世紀作為人類社會歷史重大特點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作出的結論。

### 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

什麼是社會主義，鄧小平說，過去我們並不清楚。因為以往對社會主義的經典理解，就是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現在要實行改革開放，這些當然都不適用了。所以不久後，鄧小平又說，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才搞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實，這個說法並不解決問題，也不

符合實際。因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近百年的歷史證明，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要做得好得多，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也一直是資產階級。談到消滅剝削，咱們以前就沒有完全做到（如官僚階層以國家和公有的名義對工農進行的剝削和掠奪），改革開放後，由於改變公有制、大量吸收外資和實行混合所有制等，已基本放棄了消滅剝削這一條。至於「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則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社會主義中國兩極分化的速度之快和程度之高，都大大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又怎樣和何時才能達到共同富裕呢？本來三個代表學說還含有混合所有制等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成分，但卻不允許作獨立研究，寫進憲法時竟禁止公民討論，原因就是它去掉了社會主義的靈魂——民主。現在又把「和諧社會」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但同時又提出「和諧世界」的口號，實在不知道這個矛盾怎樣調和。因為說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那和諧世界不就是列寧說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了？

在世界上，社會主義也是五花八門。據有人引證前瑞典首相帕爾梅的話說，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曾多達七十餘個，遍佈亞非歐拉美。如果按社會主義流派和它們的制度與政策區分，我看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大類：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和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民族獨立國家。這三類中以第三類最龐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些還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因素佔優勢）很難分，也容易變。不少國家是某個政黨和領導人上台後宣布實行社會主義，下台後是否還在實行又不清楚了。但也不能看不起這第三類社會主義國家，一則它們在三大類中爲



數最多，二則其中一些國家實行社會主義某些原則還相當認真。例如印度改革前執行計劃經濟就很嚴格，以至在某些地方或部門不允許超額完成任務。至於它們（第三類）對其他兩類的傾向性，大體說來，多數傾向於第一類，少數傾向於第二類。比如它們都基本上承認共產黨執政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社會黨就不承認，而稱之為共產主義或專制主義。不過對別國社會主義的承認，恐怕最狹隘的還是共產黨。它們主要不以社會經濟狀況和政治體制為標準，而只按意識形態的幾項教條特別是領導人的主觀意志來劃分。例如共產黨國家就始終不承認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為社會主義。瑞典等北歐國家社會主義因素再多，也被劃入資本主義世界，朝鮮窮得再叮噹響和統治再嚴酷，總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由於共產黨實行個人崇拜的人治，所以一國的社會性質還往往由領導來定。例如斯大林一發脾氣，南斯拉夫就變成了資本主義。赫魯曉夫發點「善心」，它又變成了社會主義。匈牙利事件後，它被開除了，但過了幾年就又變回來了。中國更是無原則地多變。先是跟着蘇聯「一邊倒」，從不承認變為承認。後來由於「反修」，自己又變了兩回，而且快得令人眼花繚亂，才和鐵托稱兄道弟，匈牙利事件一起，又趕緊寫了一篇「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社會主義陣營存在時期，我們稱蘇聯是「老大哥」，還勸大伙兒尊它「為首」。沒過幾年，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鬧翻了，立即定它為社會帝國主義，還是世界戰爭的主要策源地。毛澤東去世和兩國關係正常化後，又承認它是社會主義了。但在東方，我們還是有一大陣繼續堅持毛澤東的「反修」路線，例如寧可讚賞和支持波爾

布特殘暴統治下的柬埔寨爲社會主義，卻認爲多年並肩戰鬥共同反美的越南變修了（變成了資本主義），以至和它兵戎相見。

這樣看來，什麼是社會主義至今還是一筆糊塗帳。但是經過二百年的理論探索和近百年的社會實踐，人們對社會主義總可能做點初步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結論了吧。當然，分歧還會有，爭論還會繼續。但是當前的問題已不只是在理論上要弄清，關鍵是要實踐，是馬上要做。如果什麼是社會主義還弄不清楚，那麼不但寫在黨章和憲法上要每個人必須遵守和堅持的這一套變成了空話，而且反倒成了一些人用來限制人們自由和隨意整人的依據，更重要的還是全國人民不知道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只能跟着領導的說法轉。但各時期領導的解釋又不一定相同，結果就會出現重大差別。以文化爲例，遇到開明的領導，主張遵守馬克思主義規定的自由民主，那就會出現百花齊放、黨內生活生動活潑的盛世；遇到堅持專制主義的領導，就會製造各種藉口，嚴行思想管制，堅持輿論一律，結果必然是百花凋零、萬馬齊瘖。這是中共黨史一再證明了的。陳獨秀、張聞天、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就開明得多。所以研究一下什麼是社會主義，不僅是理論界的事，而且也是各級黨政領導和全國人民的事。

但是要知道，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曾一再聲明，對未來社會還沒條件作出具體的預測，甚至拒絕回答人們提的這個問題。恩格斯就曾拒絕把當時人們描繪的共產主義當做終極目標，只是強調歷史的發展和工人階級以及人類的解放。因爲科學預測不是算命，沒有充分根據，也只

能是空談和空想。所以關於社會主義的研究和討論，只要實事求是地抓住主要特點和當前爭取的目標就行了，不宜摳得太細，描述得很具體。如果那樣做，就可能限於玩弄教條和流於空想，反而於事不利。有鑒於此，我們這裏只能粗線條地列舉幾點現實社會主義應具備的條件，來進行討論。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精神和兩百年來對社會主義的研究與實踐，我個人的理解是，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大體總要具備（或正在積極創造）以下幾個基本條件。

一、發達的生產力和豐富的产品。社會主義本來就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還應繼續大力發展生產，特別是那些原先水平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使社會享有豐富的产品尤其是公共產品。這樣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條件，如消滅三大差別，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二、混合所有制和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由於發展生產和市場經濟的需要，社會主義初期必須以生產資料私有為主，然後逐漸發展到集體所有制（也就是馬克思說的社會佔有）和按勞分配為主。

三、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憲政法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而自由則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礎。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威廉·李卜克內西說，「正因為我們弄清了社會主義同民主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才稱自己為社會民主黨人。」不實行憲政法治，也會成為沒有正常社會秩序

的無政府主義。而法治又必須排除等級制和特權，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基礎上。所謂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會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謀求利益和自身發展上的機會均等，而不是物質享受和社會責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四、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會福利。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完整的社會保障。那裏有發達的科學文化，人人都有學習和深造的機會，良好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造成人際間公平、正義、互信、互助，清除腐敗、愚昧、迷信、造假。社會講求公開性和光明正大，反對暗箱作業和陰謀詭計。根據平等原則和博愛精神，建立一套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使人人享受到幸福，社會處於和諧、穩定。

以上四條也許有重疊和遺漏，但無論如何都是一些重要標誌，缺少一條也不能算是社會主義。例如怎樣對待市場經濟和單一公有制，就是近百年實踐取得的重要教訓。事實證明，不實行市場經濟、堅持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是遲早要垮台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在涵義上幾乎等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君主專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不講自由，只講愚民政策和鎮壓，當然也不是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富差距過大也不是社會主義。所以不但過去斯大林模式的國家，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這是蘇東巨變已經作了結論的。就是現在我們這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和兩極分化非常顯著的國家，不管用多少社會主義詞句，在人民心目中，中和歷史上還是不能算作社會主義。如不實行改革，遲早勢必步蘇聯東歐國家的後塵。至於改



變後是不是資本主義復辟，還可用上述標準來衡量。但是長期以來國際共運中始終只認一個標準，就是只看它是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只要是共產黨領導，不管實際上是殘暴統治、萬馬齊瘠、餓殍遍野、居民外逃，也還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因素再多，但不是共產黨領導，就只能是資本主義。這真是一種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和蠻不講理的狹隘宗派主義！因此必須改變這種只看標籤的辦法，而按客觀標準評定一個國家的性質，看它所含的社會主義因素有多少。社會主義因素多的國家，不管它是由什麼黨領導和人們怎麼稱呼，都應定為社會主義國家或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離上述標準太遠的國家，即使一切完全由共產黨控制，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只有按客觀標準為社會主義正名，才能恢復有史以來人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名譽。

### 兩種社會制度的趨同

現在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是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之間是一種繼承、發展和融合的關係，不是以前人們了解的那種只有對抗、消滅和推翻的關係。人類歷史也是循着這個方向發展的。這就是兩種制度從原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進一步相互靠攏、趨同，最後走向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是個什麼樣子，現在還只能走着瞧，但可以比較肯定的是，絕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倒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

進入二十世紀，隨着資本主義本身矛盾的加劇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資本主義內部的社

會主義胚胎也就生長得愈來愈快，實際上也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趨同或過渡。以美國為例，先是在群眾的壓力和推動下，由政府發起「進步運動」，逐步實行抑制壟斷、開放和監管股票市場、提高社會福利、擴大公民參政、增加公共產品等，已經在為趨同開路。到羅斯福實行新政，可說是更使趨同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之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雖然走錯了路，但還是顯出了擺脫危機、集中辦事、普遍福利等不少優越性。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表現出的優越性則更為突出。這些既可供資本主義借鑒，也是促使它進行調整和改革的壓力與動力。二戰後，三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大量增加，從而更加大了對資本主義的壓力和推動，使它進一步自覺地加速向社會主義學習和借鑒。例如，一九六五年資本主義國家一批代表曾聚集美國費城，召開了一個大會，叫做「世界資本主義大會」，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要借鑒社會主義的經驗。由此可以看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朝這個方向調整和改革時，雖然參差不齊，但都是比較認真的。因為這不只是社會主義國家和工人運動的壓力，而且也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需要和趨勢。加之它們的基礎雄厚，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又走錯了路，所以在二十世紀下半期，它們就在和平競賽中取得勝利，不但經濟、科技得到快速發展，還率先實現了一些原為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在物質生活、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走到了前面。

事實上，現在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即馬克思說的胚胎）就已大大高於和多於共產黨

領導的國家。當它們消滅三大差別幾十年後，也許中國才能解決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這就是爲什麼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居民長期和大量向發達國家「偷渡」和移民，而不是相反的原因。（中國的新老「左」派，對這種現象並不臉紅，反而斥之爲敵對勢力的煽動和演變。）無怪乎有些人從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國家回來對熟人說，咱們算什麼社會主義，人家那才是社會主義呢！連著名反自由化的國家領導人王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作爲主管工業的副總理去英國進行調查訪問後，對陪同人員談到他的觀感時竟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前駐英使館人員分別撰文提到的。不過王震終究是王震，所以念念不忘執政。其實按照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連國家和黨都消亡了，還執的什麼政。）隨着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趨同的速度還會加快，而且還愈來愈自覺主動。例如布萊爾和克林頓提出「第三條道路」、美國有六十一名民主黨議員成爲「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歐盟的擴大和趨向均衡發展等。看來，西方發達國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很可能在「共產黨國家」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成社會主義）之前。以人類社會發展的觀點看，前者將長期保持先進，後者必然相對落後，它們被「和平演變」是不可避免的。

從社會主義方面來說，三大類國家都在繼承和借鑒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路雖然走得

對，發展一直處於世界前列，但也必須繼續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的東西。例如瑞典等國由於稅率高和福利高，因而影響人們的工作和勞動積極性，使社會發展放慢，國家競爭力下降。後來這些國家在政策上作了調整，就又改變了面貌，芬蘭二〇〇六年在世界競爭力中已排名第一。不過整個說來，西歐國家的福利和工會問題對經濟發展上的消極影響一時還難以解決，使經濟增長和競爭力在最近很長一個時間內落後於美國。但應說明，由於這些國家都實行民主政治，有定期議會選舉和政府換屆的社會調節機制。社會黨搞不好，人民就會選保守黨上台。保守黨執政後會採取一些抑制福利和工會及其他右的措施，但如前所述，它不會造成對原有社會主義因素傷筋動骨的改變，否則人民不答應，又會把它趕下台。就是英國撒切爾夫人搞的私有化，也並不是人們原先理解的那種私有化。所以即使在右派統治下，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主義「胚胎」仍在走向成熟，只是速度被搞得慢些而已，並不能改變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至於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的趨同就更明顯了。蘇聯東歐各國採取的是徹底打破舊體制的辦法。中國、越南則是對原體制進行改革，大量借鑒資本主義的他山之石，如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多種分配、對外開放等。由於是借鑒，所以就或多或少、可急可緩。掌握得好，效果也自然顯著。

在這個借鑒和趨同問題上，還是鄧小平說的，防「左」反「左」是主要的，而且也是長期的。從《共產黨宣言》開始，百餘年來的國際共運和先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直都是吃



「左」的虧。現在中國仍然如此，「左」是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這不但是長期的思想影響，更重要的還是同當政者的權和利直接聯繫了起來。不但搞政改會削弱以至剝奪他們的權，妨害他們的執政地位，就是經濟改革的深入也會傷及他們的既得利益。這裏把借鑒和趨同相提並論，當權者和「左」派更會發脾氣。但是事實上，隨着改革的全面深入和發展，除了政治上、一黨專政及其派生的意識形態控制外，經濟社會生活已很難和資本主義相區分，人們只能多用一些社會主義的形容詞之類進行裝飾。但是請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一般市場經濟有什麼質的區別？你有政府干預，人家就沒有？這和毛澤東時代盡可能對一切都加上「人民」的標籤一樣。我就看不出我們的「人民」鐵路比外國的鐵路有什麼高明。西方國家的法院可能比我們的「人民」法院更守法、更公正、更講理。論清廉、效率等，它們的政府現在肯定比我們的「人民」政府強。可見，問題並不在乎標籤，而應以社會發展的尺度衡量。如果除市場經濟外，還把西方的民主政治、三權分立、普選權、代議制、以及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真正學到手，看來是向資本主義的趨同，但本質上就是在實行社會主義。這大概是不好公開反對的，所以只能用貼標籤的辦法，說那是資產階級的，是「西化」云云。

蘇聯東歐的變化早已塵埃落定，變不回去了。如何評價這一事件，至今眾說紛紜。堅持原國際共運觀點的人，一直把這看成社會主義事業的挫折和歷史的倒退。持社會進化觀點的人們卻認定這是歷史發展的進步，因為它結束了阻礙社會前進的經濟模式、專制體制和思想禁錮。

看來，這些國家的人民（他們中許多人在一定問題上，特別是對當年蘇聯，留戀過去也很自然）是基本上同意後一種看法的，否則他們也很容易再和平演變回去，只要選舉那些共產黨人執政就行了。這也不是空口宣傳哪個制度優越性大的問題，而是完全可以由實踐逐步證明的問題。這些國家變化的時間並不長，但絕大多數已開始顯示出比變化前要優越。不但建立了民主制度，經濟發展快了許多，而且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大多得到保留，不少國家還有所充實和增加。就拿變化中走了較大彎路的俄羅斯來說，現在情況也已好轉。二〇〇六年世界銀行先後公布了兩份有關俄中經濟情況的報告。四月十七日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增長」。十二月一日的專家報告分析，在二〇〇一到二〇〇三年間，中國經濟增速近百分之十，但最貧窮的百分之十人均實際收入卻下降了百分之二點四，全社會工資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更是多年來不斷下降。俄國經濟從一九九九年開始起飛，年均增長百分之六，到二〇〇六年經濟總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但人均實際收入卻大大超過這個增量。聯邦主體和各地方政府，以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建立和維持了一套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報告預測，二〇一二年俄可成爲發達國家，二〇二〇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接近三萬美元。去年十月普京訪問德國回答採訪記者時也說，「我們正在建設一個與我們建設了幾十年的社會完全不同的新社會。我們將盡力做到遵循現代文明世界原則和民主原則，保障我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還說，「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的是，俄羅斯不打算對國際互聯網進行監

控。俄羅斯不打算重返蘇聯時期的政治體制。我們只是在探索一種適當的體制，既能保證我國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們享有管理國家和解決各種問題的權利，同時還能使國家成爲造福人民的工具。」應該承認，俄國多數人民和普京的想法是一致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曾有幸在蘇聯工作四年，九十年代又曾三次訪俄。所聞所見也使我認同普京的談話。一些俄國學者早就樂觀地說，他們現在才是在真正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葉利欽當政時冒出來的那幾個寡頭是翻不了天的。把蘇東巨變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是不忘女當，起碼還得看下去。

發展中國家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更多，也都實行了一些社會主義措施，如不同程度的國有化、建立一定的社會福利制度等。但總的說來，它們和那些沒有宣布實行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並無本質區別，雖然孕育着一些社會主義因素，但基本上都還是在發展資本主義，客觀上爲社會主義打基礎。因爲無論如何，對它們來說，集中發展生產力和建立民主政治還是歷史必經階段，是不能繞過去的，否則不但會走彎路，還得回過頭來補課。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是馬克思後百餘年來世界經驗的總結。所以不少國家都在爲適應這一社會發展規律而進行必要的調整，例如印度的改革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調整。這種改革調整，實質上都是兩種制度的趨同。不過發展中國家數量多，差別大，發展道路和水平也很不一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抓經濟建設和民主政治，必然發展迅速，社會穩定，國富民豐；那些只高喊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卻一年到頭瞎折騰，既不抓發展生產、又反對民主政治的國家，結果一定相反，

變成極其孤立的國際乞兒。但這只能是極少數，不會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局。

看來，二十一世紀將是兩種制度不斷趨同，逐步向人道、民主社會主義過渡的世紀。長期威脅着人類的世界大戰，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大體解決（矛盾和局部衝突也許難免，因為同屬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過去還兵戎相見呢）。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發展趨勢。人類歷史的進步是愈來愈快而不是愈來愈慢。我們祖先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有可能在本世紀就會基本上得到實現。

### （五）如何看待共產黨領導

#### 從列寧的建黨學說談起

延安整風時受到毛澤東高度推崇的劉少奇的《論黨內鬥爭》中強調，中國黨是根據列寧創立的一整套建黨學說並以布爾什維克為榜樣建設的，而且始終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歐洲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影響。劉少奇是把這當作黨的優點來講的。如果從以奪取和保持政權為主要目的來講，「列寧式的黨」確實起着關鍵性的作用。但從推進歷史發展來看，列寧的建黨學說更多的是起負面作用。連胡喬木也公然指出過兩點。一是「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一是「列寧建立了一個集中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



的原則性錯誤。」「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俄國要變成全世界的統治者。」這兩條也是斯大林後來堅決照辦的。

列寧的建黨學說比較顯著的特點是：一黨專政、不講民主、高度集權、絕對服從、鐵的紀律、嚴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視人權等。應當承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正是依靠這些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斯大林和蘇共也正是依靠這些才建立起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蘇聯和保持了七十年的執政地位。

共產國際成立後，許多國家都按照列寧的建黨思想組建了共產黨。歐洲各國多是由社會民主黨中的左派先後分裂出來組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幾乎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幫助和指導下建立的。這些黨由於一律聽命於共產國際（實際上是服從蘇聯的外交政策），又把社會民主黨當成了主要鬥爭對象，所以成立後力量都不大，發展更不是列寧幻想的那樣快（他在兩次國際代表大會上都說過，他們那一代就會看到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實現）。直到一九二九年起的經濟危機和反法西斯鬥爭的開展，一些歐洲國家的黨才得到較快發展，並在戰爭中壯大起來。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在二戰後那次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積極參加了鬥爭，得到更迅速的發展，有的黨還曾掌握了國家的領導權。所有這些，就使二戰後一個時期的國際共運，不論是在一些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還是在整個國際鬥爭中，都成爲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爲維護和平、結束殖民主義、促使資本主義進行改革和調整，起了重大作用。但不久就

逐漸衰落，最後隨着蘇東巨變而趨於瓦解，即使存下來的一些黨也都放棄了國際主義的口號（中共從十三大起）。一些「左」派人士，把這次大衰落看成共運發展的一時挫折或低潮，意思是以後還會再來高潮。在我看來，這種老皇曆已經不能再用了。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國際共運被客觀形勢的發展拋棄了。這個形勢就是發達國家自行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用不着暴力革命了。例如美國什麼時候會出現「革命形勢」？是誰革誰的命？現存的共產黨領導國家已經和只能走趨同的道路，只手打天下，「赤化五大洲」，恐怕是辦不到了。二是實踐證明，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是過時了或原本就不正確，列寧的建黨思想也是一條歧路，今後再也走不通了。

###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就世界形勢說，作為二十世紀一個重要特點的社會主義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出現了一次高潮，影響急劇擴大，中國自不能例外。所以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國內形勢來說，經過長期的西學東漸和中國先進分子尋求救國救民之道的探索，加上世界大戰的影響和刺激，在中國發生了要求科學民主的啓蒙運動和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兩者合而為一的「五四」運動。這促進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階層的覺醒。在這種情況下，推行世界革命的蘇聯和共產國際主動派人傳經

送寶，就收到馬到成功的效果，不僅幫助和指揮成立了一個共產黨，還出錢出力按同一模式幫助改組了國民黨。這說明，在中國組織政黨的條件已經具備。但是中國還處在封建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很少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還力量脆弱、政治上很不成熟，整個國家沒有經過現代化啓蒙的洗禮，人民還處於蒙昧狀態。既不是現代社會，當然就不會產生現代化的政黨，也就無法實現政黨政治。列寧主義的誕生地俄羅斯，雖然比中國強，但還是被歐洲看做落後的東方，所以列寧建黨學說中一些原則，如暴力奪權、一黨專政、個人崇拜等，就很容易適合更落後的中國。在一些歐洲先進國家，卻看不慣，也難行通。像同情社會主義的法國作家紀德、羅曼·羅蘭等人上世紀三十年代訪問蘇聯的感受，在中國人中就沒看到過。一九五六年開八大時，英共總書記波立特發現他乘車上街竟有開道車，而且可以不管紅綠燈，曾很不以為然，向接待人員反映了他的不滿。

中共除完全遵守列寧建黨學說（而且主要是其中消極因素）並有所發展外，還繼承了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的傳統和遊民階層結黨的經驗，如神化領導、盲目服從、迷信武力、無法無天等等。中國老百姓缺少自己救自己的理念，總是把希望寄託在明君、清官、英雄、救星的身上。中國黨不但沒有進行肅清這些遺毒的工作，而且有時還有意繼承。例如毛澤東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接受「人民大救星」、「山呼萬歲」等反馬克思主義口號、把黨內的山頭（幫派）稱「碼頭」、要人們學《大同書》、《張魯傳》等等。農民暴動中互相殘殺的惡習也

傳到黨內。據李銳計算，十年內戰中，中共以肅反之名，在家裏自己殺自己就達十萬，而且多是精華，超過國民黨殺害共產黨人（不算戰爭中雙方軍民的傷亡）好多倍。直到張聞天當選總書記才制止了這一現象。但在毛澤東確立為領袖後，從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開始，又自己整自己，而且愈演愈烈，錯整和冤死的更多了，連黨的一些政治局委員和副主席也未能倖免。

當然，中共的先輩們和廣大精英，學來列寧的建黨學說和繼承中國農民運動的傳統，還是爲了救國救民解放人類，而且確實起到了重大作用，改變了歷史，取得了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主要的。所以不能因爲接受許多消極因素而抹殺一切。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人們一直把消極因素當作積極因素來堅持和強化，特別是執政以後更使黨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走愈遠，與時代發展背道而馳，始終不能成爲一個現代政黨，如果不及早改革調整，遲早必將被時代所拋棄。蘇共和國民黨都是前車之鑒。

我以爲斯大林給列寧主義下的定義還是準確的，說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列寧確實重視奪權和掌權，強調「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用中國農民運動的語言，就叫「打天下坐天下」。中國黨不但領會了這一精神，而且一直在照此辦理。看來，「共產黨領導」的唯一法理根據，恐怕就是這個「打天下坐天下」。俄國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也是佔少數的。中國黨統管一切，也根本不理論多數少數的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對少數的專政。可在俄國和中國，無產階級都



佔絕對少數，那根據什麼來專政呢？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又是從哪兒獲得的授權呢？所以就必須創造一個代代相接的傳承關係。這就是爲什麼現在這一代領導一上任就先到西柏坡瞻仰朝拜，去取被提出者自己早已摒棄的兩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經。這也是爲什麼要大張旗鼓地紀念「長征」、把「紅色記憶」作爲長期宣傳的主旋律，而禁止談論更近的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文化大革命等這些中國人絕對不應忘記的重大事件。因爲不管毛主席犯有多大錯誤，我們現在「坐」的終究是他老人家（包括他領導的「永遠的豐碑」中的英傑）打下的江山。

### 黨領導的歷程

由於中國社會落後，中國工人階級很不成熟，所以中國黨的建設就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黨的骨幹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沒有幾個產業工人（有的如向忠發、顧順章還叛變了）、二是缺乏獨立性，一切都得聽俄國人的指揮。這就使中國黨的領導容易脫離實際，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在廣大群眾缺乏覺悟的情況下，黨的活動又只能是恩格斯說的，「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大革命的失敗是犯右的教條主義；十年內戰的失敗是犯「左」的教條主義。在相當程度上都是吃了外國人指揮的虧。只有在土地革命中佔領了一些地盤、積蓄了一些力量，成爲後來取得革命勝利的本錢。但那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下進行的，既與工

人運動無關，也很難說是得到工人階級的領導。中國黨走出逆境，主要得力於以知識階層爲主的抗日救亡運動，特別是西安事變。黨在抗日戰爭中實行以發展壯大革命力量爲主的政策，爲取得勝利積蓄了力量、準備了條件。有的台灣學者說，中共和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都強調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有一個最明顯的差別，就是中共的組織不僅在規模上超過了國民黨，而且真正深入到了社會底層，所以內聚力極爲強固（這應歸功於毛澤東最早提出支部建立在連隊上）。其實這只是就力量的大小和穩固性而言。中共的勝利和國民黨的失敗，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共適應人民要求，提出反對專制獨裁、爭取民主自由，實行土地改革，反對貪污腐敗，以及保持聯繫群眾、艱苦樸素的作風，從而贏得了民心，孤立了敵人。

在民主革命階段，黨雖然也犯過不少嚴重錯誤，但主流還是爲老百姓做了大量好事，特別是「打土豪分田地」，因此得到了農民的擁護。那時也強調群眾作風，清廉儉樸，軍民一家。在對敵鬥爭中，作風問題是個生命攸關的問題，群眾關係搞不好就站不住腳。這種優良作風在解放後還保持了相當時間。同國民黨一比，真有天壤之別。解放戰爭中和解放初期，共產黨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知識分子和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歡迎，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從二十多年的鬥爭經歷看，一些人說共產黨代表農民的利益，倒還真有點像。但後來把農民打成二等公民、人爲地製造城鄉二元結構，就又完全不像了。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政

黨的經驗，說中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看來也沒有多少站得住的事實根據。硬要用階級、政黨、領袖的理論套，恐怕多少屬於搬用教條。例如說「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大概就是爲了說明它有權領導其他組織。若果有兩個以上的工人政黨，比方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那憑什麼你就是最高組織，我只能在下面甚至不允許存在。對此也許很難說出個道理來。所以從前的階級分析和列寧的建黨學說，還是需要重新研究。

建國後黨和黨的領導除保持原有的一些傳統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的變化來得很快，有的慢一些。這裏只能不設順序地簡要說幾點。一是改變了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和建立聯合政府的路線，一開始就實行一黨專政，黨管一切，形成實際上的個人獨斷專行體制。這有點類似歷史上某些農民起義的結局。二是改變了原先堅持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目標——爭取民主自由，事實上也從未實行，而且嚴格禁止言論、結社、遷徙等自由，公開主張「輿論一律」。一切群眾組織以至民主黨派，都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工青婦等團體只是維護黨領導（專政）的幾個環節。農民連這一點形式上的權利也沒有。三是改變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方針和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由少數幾個人（也許只是個人）決定急劇向社會主義過渡，破壞了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建國後對生產和生態影響最大的有三次運動，就是三大改造、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四是改變了團結知識分子的方針，打擊和摧殘了大批知識精英和優秀文化。五是改變了原有的一些好傳統、好作風，助長了舊社會好多不良風氣如官僚主義、弄虛作假、拍馬溜

鬚，媚上欺下、拉幫結派、貪污受賄，等等。以上只是列舉一些盡人皆知的變化。這已足以說明，建國後黨在毛澤東的控制下實行了一條極左路線，犯了黨史上一次時間最長和損失最大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糾正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錯誤路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了經濟建設上來，並在其他方面進行了一定的撥亂反正工作，使中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加上外交政策的調整，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外國人對中國也刮目相看了。但是由於鄧小平、陳雲等不敢清算建國以來的錯誤路線，不願放棄一黨專政和「打天下坐天下」的特權，因此就要保持原有的政治體制和從嚴控制意識形態，維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就使得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不能實現憲政，不能成爲文明國家，還會愈來愈多地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迴避政改，自然就要繼續造神造假、暗箱作業，把群眾蒙在鼓裏，剝奪他們的知情權、監督權、參政權，以至反映情況、申冤訴狀（如制止上訪）的權利，任憑一些官僚、權貴和惡勢力爲所欲爲，欺壓群眾、聚斂錢財。這就使經濟轉型期間，不但舊社會的沉渣泛起，而且出現許多新的問題，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腐蝕和危及黨的領導。



## 「黨的領導」存在的問題

「四個堅持」的中心「黨的領導」存在許多嚴重問題，可說是人人皆知，無法也不必要一一列舉。這裏只談幾個本人認為是最重要的問題。不過應當首先聲明，談存在的問題並不等於否認取得的偉大成績。如果說，建國以後黨執行了一條基本錯誤的路線，那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就是對這條路線的重大修正，主要表現在經濟建設方面。當然，在政治和各個上層建築領域也有不少進步，例如高唱「無法無天」，經常發動整人的運動，一句話就定人死生等現象已大體消除，但是一黨專政的根本體制沒有改變，所以必然會保留和新產生許多嚴重問題。這裏就列舉幾條，以點到為止。

一、繼續堅持一黨專政和一元化領導體制下的人治。這是產生一切弊端和不良現象的總根源，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更不相容。在這種體制下，黨自然要實行對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壟斷，要以黨代政、包辦一切，排除競爭，不受監督。由於黨是站在憲法和一切法律之上的，所以在轉型期間勢必造成權錢交易、貪污腐敗、各種歪風邪氣，產生官僚權貴階層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團。這不但會杜絕政治改革，也妨礙經濟改革的健康進行。所以這些年來，雖然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偉大成績，但卻延續着粗放經營、竭澤而漁等老路子，還造成一些新的結構性問題，阻礙成熟市場的形成，影響可持續發展，埋藏不少嚴重隱患。

二、兩極分化造成嚴重貧富懸殊，其發展速度大大超過發達國家。根據社科院的材料，二〇〇六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零點四九六，就是公認的收入嚴重不公的危險線。相比之下，印度是零點三三，美國也不過零點四六。去年美國一個公司發布《全球財富報告》說，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家庭佔了百分之七十的國民財富，比例之高也超過許多發達國家。另據官方研究機構調查，中國的億萬富豪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高幹親屬，其中的二千九百多名擁有的資產達兩萬多億元。所以不少中外學者和研究機構，都認定中國已形成一個官僚權貴階層。另一方面，中國還有幾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據世界銀行統計，到二〇〇五年還有一點三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超過一美元，有兩億多農民靠進城打工謀生。城市的失業和就業問題也很大。農村還有兩三億失業和半失業的農民。而當前的趨勢卻是兩極分化在繼續擴大。二十五萬戶富人二〇〇五年比二〇〇四年的財富增幅高達百分之十八。此外，早已官多成災，農村不勝負擔，但官員還在大量提升，數量在不斷增加，待遇也在大幅度或成倍提高。這種形勢發展下去，自然帶有極大的危險。

三、腐敗制度化和某些政府行爲黑社會化，引起人民群眾的極大不滿和憎惡。一些地方早已賄賂公行，買官賣官近乎明碼標價。腐敗現象遍佈各行各業，從上到下，無孔不入。無理有權，走遍天下；有理無錢，打官司也必輸。我就一直想不通，爲什麼想爲群眾做好事的一個幹部，給朱鎔基總理寫過信反映三農問題，還得到朱的一再批示，結果竟然在原地站不住腳，無

法繼續工作，只好另謀出路。難道一個堂堂大國總理竟管不了這點小事？保護不了一個鄉黨委書記？這裏雖然沒有聽說牽扯到貪污受賄，但是從中反映出某種腐敗恐怕是無疑的。腐敗不光是貪污。利用權力，提拔親信，排除異己，算不算腐敗？一些高幹子女三兩年就變成了大款或大官，算不算腐敗？這類事情真是不可勝數。腐敗可說是遍地開花，競相「創新」。至於「黑社會化」，也發展很快。警匪一家、官商勾結，官方僱暴徒打新聞記者或維權人士，書籍、文人被上了不同等級的黑名單等，早已不是新聞了。隨便軟禁與官方的意見不同的人，一些人被便衣看管，一些人突然失蹤，也是常事。攔截上訪，押回原地處理，我看也帶點黑社會味道。花樣還在繼續翻新，將來還會出現什麼手法，實在難以預料。按理說，統治應該是公開的透明的，何況還是「人民當家作主」！因此，除了真正的國家機密，政治上任何不敢讓人知道的作法，任何偷着幹的做法，都屬於黑社會性質。

四、繼續造神造假，實行愚民政策。爲了維護毛澤東的神聖地位，不但不能揭蓋子，還必需繼續弄虛作假，加以神化。不講理由，沒有任何法理根據，硬是禁止人們回憶和紀念自己親自經歷過的重大事件，是十足的專制主義行徑。爲了維持執政地位，不但偽造歷史，而且粉飾現實，怕人揭穿，乾脆就用專制手法，不准討論。因爲造神造假的目的無非是爲保持執政地位尋找「道統」、「法統」和遮掩錯誤、顯示正確。所以這一傳統和做法還會持續下去。除非人民覺醒到不再受愚弄，自己有權了解真相，也就是爭取到知情權。

五、嚴重的農民問題仍看不到解決。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不是在縮小，除沿海少數地區，就全國而論還在繼續擴大。農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和束縛農民（包括城市貧民）的戶口制和遷徙自由還會長期保持下去。農民工造成許多新問題如家庭分離、孩子管教、遭受歧視、欠薪不發、申訴無門，以及春節的民工潮等等，都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全穩定和道德風尚，甚至引發其他嚴重問題。在城市裏各級領導、大小官員眼皮底下，是他們幹最髒最累的活兒、拿最少的工資、過最底層生活，但卻享受不到集會、結社、集體自衛等應有的人權。連為他們說點公道話、採訪、登報、維權、上訪的人也往往受到迫害。而對他們進行歧視、騷擾、製造麻煩的，主要還是那些名義上代表他們利益的官員、軍警和部門及其領導。

六、深化等級，擴大特權。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又一特點。等級制的細緻複雜本來就世界少見，改革開放後還在不斷深化。本來，劃分等級和權力，是進行工作和維持秩序的需，為各國通行。但中國的等級是和特權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決策者就在這方面大動腦筋。為了自己終身享受、照顧親屬和爭取官心，等級就愈分愈細，待遇也愈定愈高。例如在民主國家特別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公務人員的工資和其中的「含金量」相等，可在中國，卻能有百倍千倍萬倍之差。他們的政府部長，去職後又成了老百姓，中國的官員去職後卻可享受終身特權，有些如住房、用車等還可傳給妻子兒女。在中國，等級制幾乎無所不在，不只黨政軍民學，就是市鎮、企業、寺廟等也都分等級，而且不斷創新。有的領導利用一時的手中權力，可



以創造出一些等級，例如各種正級的副職啦，在哪些國家一當大使就成副部級啦等等。此外在待遇享受上，如分房、用車、醫療等，就分得更細了。老百姓痛恨等級制和特權是因為：第一，它與民爭利。好事好物都被大官大款佔去了，低等級的人和平民就輪不到了。以看病為例。好醫院、好病房建得不少，而且愈修愈好，好的大夫也在增加。但是比較起來，這些可能還沒有享有特權的大官、大款（現在權錢相通，只要有錢就可享受高級醫療）增長得快。單從這點看，「看病難」問題就很難解決。第二是太不公平。若果享受高級醫療待遇的確是對人民有大功對社會有大貢獻的人，那人們倒也服氣。但實際情況往往並非如此。有些人能當大官，不是因為本領強、立了功，而是由於有人事關係，包括給更大的官當過一陣秘書，會拍馬溜鬚等。否則再有貢獻也不算。這就使人想起了著名的文人唐弢，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參加進步文藝活動，夏衍一再證明他那時就已參加革命，對中國左翼文藝的貢獻，特別是研究魯迅，更是人所共知。但中組部就只定為司局級，因此生病時不能住進好點的病房，而是被安置住在三四十人的大通間裏，終因醫療條件較差而不治身亡，曾一時在知識界引起很大反響。還有一位著名詩人又是老延安的嚴辰，也因為是司局級，生病只能住大通間，沒法休息，高燒不退，變成終身痴呆。第三，更重要的是，這種等級制和特權原是封建專制時代的遺毒，在西方早已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掃除，但在社會主義中國不但被保存下來，某些方面還有所發展，成為改革的重大阻力（自願放棄特權的人不多）。例如報載二〇〇四年單是公費吃喝即達三千七百億元，

使用公車費用四千零八十五億元，而一九九一年的公費出國就已到了三千億元，三項加在一起超過萬億。這些問題社會上已喊了好久，但就是不願改。還有個官員們公布個人和家屬資產的問題，也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前幾年搞的醫療改革終告失敗，大概原因也在此。究其實質，這都是腐敗制度化了的表現。

七、黨風和社會風氣走下坡路。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一切都受黨的影響，道德風氣當然也不例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黨帶頭說假話（反右派的「釣魚」，大躍進的「放衛星」等），於是說假話很快普及到全社會，現在更發展到說假話成爲常規的程度。最近在國內外造成轟動的軟禁中國「抗愛（滋病）第一人」高耀潔大夫的事件就是一個新的典型例子。本來已禁止她去美國領獎，卻要逼她說成自己年邁體弱不能去。她拒絕說假話，於是就被嚴加軟禁，切斷她對外的一切聯繫。而《河南日報》（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三日）還報道，省委副書記去看她，「高耀潔教授激動地說，感謝黨和政府的關心和關懷」。當軟禁中的高教授得知這件事後，曾氣憤地說，她一輩子都不會說這種阿諛奉承的話。雖然最後被迫讓高教授出國，但從這件事上人們已可看到腐敗墮落、黑社會行爲、弄虛作假和寡廉鮮耻的全面表現。無怪乎高老太太一再說，「現在都在缺德。」一些老人聊天時，提起現在的社會風氣就搖頭，覺得道德的淪喪應該看作我們民族的最大損失。變壞容易變好難，大家對恢復傳統美德已經沒信心了。當年我們老家（陝西）以民風淳樸著稱，經過文化大革命就已大變，現在幾乎感受不到那種淳樸

了。民風直接受黨風影響。貪污成風，可大貪污犯有幾個不是黨員？而且官官相護，有些當領導的大貪污犯幾乎人人皆知，但還是大搖大擺地當他的領導。許多貪污犯都是被檢舉過十數八年，有千百封檢舉信，但仍巋然不動，組織領導還出面爲他辯解。這種事還少嗎？直到不得不處理時，領導上不但沒有半句檢討，而且還禁止人們議論，下令傳媒不得「炒作」。由於沒有問責制，當官的可以肆意妄爲，造成再大的損失，也不追究責任，或者繼續當官，或者留個爛攤子走人。有些不大的官員可以貪污數億，經長期準備逃往外國，但沒聽說過追究領導責任的。延安整風期間提出的三大作風，本來就沒有認真落實，現在更有點反其道而行之了。例如理論聯繫實際，已經變成說的和做的一再分家。說要學習和遵守黨章、憲法，可最不遵守的正

是黨的領導。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有嗎？黨章、憲法規定，地方領導由選舉產生。我們不都是由上一級黨委圈定和任命嗎？更哪裏談得上罷免權？領導人公開談話，特別是對外，總是強調實行民主，一再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可是我們人民能享受到多少民主呢？解放快六十年了，連個村鎮領導都不能自由選舉和進行競選，人民還有什麼權！至於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現在黨群關係、幹群關係可以說已經到了相當危險的地步。爲了維持執政地位，只能加強防和壓的辦法，哪裏談得上「和諧」？而批評和自我批評作風，延安整風一開始就走了邪道，一些人專門批評人，而且亂戴帽子亂上綱，一些人只能挨批作檢討。專事批評別人的人，自己是絕對不做檢討的，因爲他自封「一貫

正確」，帶頭的正是黨的領袖毛澤東。領袖既然「一貫正確」，黨當然也不會犯錯誤了，要犯，也頂多是「一個指頭」。於是就提出了自誇自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口號。從此，黨犯再大的錯誤，也不會檢討，還不讓群眾清算錯誤接受教訓，這就只能在黨史上大肆造神造假、遍設禁區。過去常說「忘記過去就等於背叛」。不准回憶和寫作許多事過不久的歷史問題，就是有意要大家忘記過去。這難道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嗎？

八、輕視知識和壓制知識分子，妨礙文化發展和出人才。輕視知識和不信任有知識的人，這是毛澤東留給國家的重要傳統，由黨一直保持到現在。這是一黨專政的需要，是不要自由民主的必然結果。這首先表現為禁止獨立思考（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和言論自由，目的就是怕對一黨專政帶來危害。其實這並不是中國特色，而是世界通例，凡是專制主義政權莫不如此。因為先進的文化必然要講自由民主，自然會影響到專制政權，所以就要禁止宣傳先進文化的書刊出版，對互聯網設防火牆。另一方面卻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名，大力提倡復古，什麼四書五經、二十四史，盡量讓群眾忘記近代、漠視現代。這樣下去，使我們在世界文明中，不但無法走在前面，連追趕也辦不到，而只有在後面設防了。同樣的道理，專制政權打壓知識分子（御用者除外），就是因為他們有知識、腦子活、意見多，容易傷及當權者的地位和利益。這在解放後的政治生活中已是家常便飯。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嚴格限制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都是為了對付他們的。這些辦法也確使知識界大部分屈服、沉默，對眼前時弊採取旁觀態度，敢講



真話的人愈來愈少。在這種打壓和約束的條件下，科學文化很難跟上世界潮流，當然也很難培養出多少人才，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這就是中國文史哲界爲什麼建國後幾乎沒有培養出幾個大師級的人物，原有的大師級人物也很少再能寫出大師級的作品。

九、信仰危機。這是多年前媒體上常見到的話題，也是身邊的感受。近些年來，在媒體上看到的少了，但聽到和感受到的卻多了。據某權威機構對二百來名縣處級和廳局級幹部的問卷調查，認爲出現了信仰危機的竟達百分之六十點八五，比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仰非常堅定的多十倍，可見問題的嚴重。在我認識的中青年裏，就有些信了佛，皈依了基督教或天主教。報上很少看到這方面的報道和評論，也許是由於信教的人太多了（據傳，天主教稱「家庭教會」的地下教會，教徒已超過愛國教會的一倍以上，達千餘萬人），人們已見怪不怪，沒有什麼新聞價值了。更大的可能是由於黨組織和宣傳部門嚴格禁止報道和傳播這類消息，更不准「妄加評論」。信仰危機的正面表現，就是機關幹部、教員、學生和社會人士，關心政治和政治學習的興趣愈來愈小，不但很少人主動讀政治書籍，就是組織上安排的學習討論會也多是扯亂談和發牢騷。爲了調動大家參加會的積極性，開會聚餐就成爲必須有的程序。至於那些脫產學習和訓練，據說也是往往收效甚微，而且還帶來不少副作用，如傳播小道消息、交流官場經驗，以及相互拉關係，向上送禮品等。我聽到一些上過中央黨校的熟人就是這樣說的。現在無論是問老百姓還是問學生，能說出自己崇信信仰的恐怕爲數不多。當年馬克思、

恩格斯很強調有無理想對一個民族的重要，不知道我們民族算不算有理想的民族。而一個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沒有抱負的民族，是不可能跟上時代潮流、列身於世界文明和現代化民族之林的。

十、黨群、幹群關係處於緊張狀態。前面已提到，但鑑於問題的重要，這裏再稍為展開一談。戰爭時期，不但黨在政策上要反映群眾的要求（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而且黨員和幹部離開群眾也無處立身。所以那時黨群關係很好，人們比之為魚水關係。建國後逐漸變為官民關係，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以來，黨群關係又有點變好，主要是因為黨以經濟為中心的政策符合群眾利益，但黨和幹部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着兩極分化加劇、城鄉差距拉大、貪污腐敗成風、等級特權突顯、官員人數大增、群眾負擔加重（從各種苛捐雜稅到圈地掠奪），以及動用軍警打壓群眾（對付集體維權、上訪、城市民工攤販等），黨群關係又日益變壞以至在某些地方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發生需要鎮壓的所謂「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我參加革命七十年來，還沒遇到過工農群眾對黨的不滿發展到近年來這種程度。每遇到某些民工或出租車司機一類的人，就聽到他們當面罵起共產黨來，說什麼他們幹活（如挖煤、修路、開出租車）是給共產黨幹的，共產黨剝削他們，想方設法少給工錢，甚至欠帳不還。有的人談後一問，他自己還是共產黨員。至於發牢騷，那在下面，無論黨內外，已成普遍和經常現象。這大概也是嚴禁集會（更不要說遊行示威了）的原

因，說明黨群關係的緊張，上面也是清楚的，只是由於涉及本集團的利益，沒打算也沒辦法徹底解決就是了。因為領導上早已形成一些官僚權貴集團，合成總的利益共同體。所以這裏說的黨群關係，也包括這個共同體同廣大黨員群眾的關係。

### 對存在問題的不同看法

黨的領導存在着不少嚴重問題，大約黨內外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區別只在於對問題的性質和嚴重的程度看法不同。主流輿論還是以前的那套，認為方向和政策是正確的，形勢也基本是的大好，缺點和錯誤只是一兩個指頭的問題，有些還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只要加強黨的領導，就可以逐步克服和改正。這起碼是宣傳的基調或叫主旋律，至於真實的想法恐怕要複雜得多，對問題嚴重程度的估計也因人而異。不過總的說來，多數人心想的要比口講的嚴重得多，這從實際採取的措施中就可看得出來，例如嚴格預防和鎮壓「鬧事」，進一步禁止新聞出版自由等。第二種屬於「左」的看法。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借鑒資本主義和對自由主義讓步都過了頭，影響到了社會主義性質，因此應當趕快倒退，退回到毛澤東時代（主要是建國後頭七年）。持這一看法的人最看不慣向資本主義「趨同」，盡一切力量阻止改革的深化。他們還動不動來個「萬言書」，向中央和政府施壓。而領導上對他們也比較寬容和照顧，因為相互間的共同點更多些。第三種看法出自要求自由民主、實行憲政法治的人們，官方和「左」派稱其為

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他們認為，解放後黨建立的就是一黨專政的專制主義政權，實行的是元化體制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這是導致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文化長期落後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只涉及經濟，而且很不徹底，政治和意識形態還是處在黨的完全壟斷之下，使中國的政治、文化發展一直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因此，雖然經濟得到迅速增長，卻很難變成文明國家。他們和「左」派根本不同，不是主張向後看，而是主張大踏步前進，對黨的領導和國家體制進行徹底改革。

當然，這裏分爲三種看法，是就大體傾向而言的，實際上各種的內部意見也很不一致，三種之間在看法上更是錯綜複雜。例如在保持一黨專政這一根本問題上，「左」派就和當權派沒有分歧。這也是當權派對「左」派能夠寬容和有所偏向的原因。但在某些比較具體的問題上，如反對貪污腐敗、鋪張浪費等，「左」派又可能和要求民主的一起批評當權派。從根本上講，「左」派和要求民主是勢不兩立的，當權派也視後者爲主要威脅。總之，三種看法各有千秋，但也應該承認，他們之間還是可以找到共同點的。有共同點就有合作和妥協的餘地。這個問題也許更重要。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都可以通過和平演變，那麼要改善和改造黨的領導，就更應該採取和平的方式了。



## （六）關於中國的發展前景

### 中國現在是不是社會主義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性質或者所處的地位，我們定性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總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了。根據前面所提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或標誌，即生產力水平、所有制和分配法、民主法治、文化道德，中國不但頭三十年建設的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到現在也很難說是社會主義。第一，中國還遠不是發達國家，預期三五十年後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所以現在離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還相差很遠，還屬於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二，由於黨的政策和權錢交易造成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中國已變成兩極社會，即屬於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國家。除各種權力的大小和有無的懸殊外，單以財富佔有來說，在混合所有制中，絕大多數（據說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財富被極少數人（據說不到百分之十）佔有。國有企業實際上也多為少數權貴控制。廣大工農群眾仍然處在社會底層，還有一部分人生活在絕對下降，與「共同富裕」的目標愈來愈遠。第三，在專制政體下，全國各階層人民都沒有普世通行的民主權利可言，一切都是由黨的領導說了算。名義上當家作主的廣大群眾，既無權參政，也無權組織自衛，只能以很難生效的上

訪、自發的群體事件等方式維護自己的權和利。這樣就在社會上形成了各式各樣的弱勢群體和人少權大的強勢集團，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官僚權貴集團。第四，道德敗壞、腐敗成風、文化落後、愚昧盛行。這也是對經濟、政治、科學、文化實行全面壟斷，和提倡造神造假的結果，再加上動不動給自由、平等、博愛戴上資產階級帽子而加以反對，就只能助長各種歪風邪氣。

所有這些，都使現在的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上遠遠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後，哪裏還談得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爲了淡化和掩蓋這些客觀事實，我們發明了兩個用語，就是「中國特色」和「初級階段」，當作兩個筐，什麼落後的以及和自己意見不同的東西都往裏面裝。在對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閉關自守等原有的一些特點進行改革以後，社會主義除一黨專政外也實在找不出多少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爲了怕混淆，只有給許多事物貼上社會主義標籤，如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其實，真正的民主和成熟的市場經濟是沒有什麼姓社姓資之別的。要用標籤分開，只是表明社會主義民主是虛，市場經濟遠不成熟。在各種弱勢群體和強勢集團之間，黨和政府是站在強勢集團一邊的，而且它本身就屬於最上層最有力的強勢集團。例如，公私資本和勞動之間，勞動屬弱勢群體（特別是礦工、建築工、農民工等）；在公私資本之間，私營資本屬弱勢群體；在政權和群眾即官民之間，老百姓屬弱勢群體。在諸如此類的群體和集團之間，黨和政府站在哪邊，人們一般都是心知肚明的。

說在資本和勞動之間，黨和政府站在資本一邊，不僅新老「左」派不以為然，一般人中也會有許多表示懷疑。然而這卻是鐵的事實。我們不談人們都知道的具體問題，如公私礦主和礦工的矛盾、房地產商和農民工的矛盾、承包商和修路工之間的糾紛等等，只就總體來看也是明顯的。以全國而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逐漸形成兩極社會，原因就是黨和政府主要着眼於資方和權力部門的利益，而忽略勞動者的利益。這主要表现在人們都知道的這樣一個事實上，就是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並沒有隨着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增長，兩者的差距反而愈拉愈大，造成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之間的矛盾愈來愈嚴重，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之一：「日益擴大的社會生產力與不斷萎縮的社會消費之間的矛盾」。據人民銀行蘇寧副行長提供的材料，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八點八下降到二〇〇五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二。而發達國家的居民消費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左右（轉引自蔡定劍在《南風窗》上的文章）。另外還可舉一些發達地區的例子，如珠江三角洲，從過去外來打工者的過剩變成近幾年的短缺。人們不願去那裏打工的原因主要是十多年工資幾乎沒有增長。可見十多年來提倡的增加內需，其實只是空喊而已，近年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擴大投資和出口，這當然保證不了可持續發展，只會引起更多更大的矛盾。爲什麼會是這樣呢？就是由於勞動者沒權，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不能用罷工、示威之類的辦法進行抗爭。要是那樣，定會遭到打壓，帶頭者還會被判以重刑。黨和政府（包括它們控制下的輿論和媒體）站在哪邊，還不清楚嗎？

由此可見，黨不僅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而且也不代表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代表誰呢？主要是代表各級黨政幹部。黨政幹部雖然從大的方面講，是一個執政的利益集團，但是細分起來區別也很大。真正有權有勢的是上層領導，一般幹部也屬於群眾。但是基層幹部卻往往在黨群矛盾和官民衝突中首當其衝。上層領導為保持執政地位主要依靠各級幹部（不是廣大群眾），因此就要擴大幹部隊伍（例如一九八二年鄧小平提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可是八十年代後的歷屆政府卻在大力擴充脫產幹部）、提高幹部待遇、維護幹部利益。結果造成中國的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幹部的職務消費佔全國財政四分之一。二〇〇七年的政協會上有些發言說，從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三年的二十五年中，中國財政收入從一千多億元增加到三萬億元，增二十八倍。同期的行政費卻從不到五十億增至兩千億元，增加八十七倍，近年更以年均百分之二十三的速度增長。行政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以二〇〇三年為例，中國是百分之十九點零三，日本是百分之二點三，韓國是百分之五點零六，美國是百分之九點九。中國一年用於義務教育的經費為一千五百億元，還不及公費吃喝的一半。這就使官富民窮到了危險的程度，也是黨群、官民關係日趨緊張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震將軍訪問英國時談到的意思，是說我們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特點，就是共產黨執政。那麼除此以外，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還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或者說在什麼問題上比資本主義優越？難道我們當年宣誓要為之奮鬥終身的就是這麼一個社會主義？這確



實是個值得考慮的大問題。

### 問題不在稱號而在實質

對中國社會性質和發展階段有各種說法，也有些不同的提法。弄清稱呼的含義當然也很重要，但這不解決實質問題。所以我主張不要完全陷到名詞的爭論中去，還是着重討論怎樣才能解決各種實質問題比較要緊。前面講中國不是社會主義，這是帶有實質性的認識和判斷，但是大家要叫也沒關係。叫資本主義？並不完全準確，因為實際上比現代資本主義還要落後，同時人們也不容易接受。不少人主張改稱新民主主義，說是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實行三大改造以前的那種新民主主義一直延續下來就好了。其實這是個誤會。新民主主義本身構不成一個單獨的社會形態，真是發展下來也一定會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這是邏輯和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新民主主義「新」在哪裏？主要就新在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專政），至於「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那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已一再聲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專政。既然是領袖專政，自然就容不得民主，也談不上「新」「舊」，更不會允許資本家階級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存在。這是中外歷史所證明了的，而且事實上中國也沒有實行過什麼新民主主義。中央文件和毛澤東的言論，都一再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後就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主要是對這段時間跨度極長的社會無以名之，也爲了糾正

和反對「左」的急性病，並不是什麼科學創新。既然有長達百餘年的初級階段，那又何必把一個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硬要勉強叫做社會主義社會呢？還有一個長期以來為理論界誤解的提法，就是把建國後的極左路線稱作「超前」或「超越歷史階段」。例如三大改造是犯了超前的急性病錯誤，公社化也是「超前」，許多「左」的東西都被理解為超越歷史發展的「超前」。意思是，這些事情搞早了，條件還沒成熟，等條件成熟再搞就對了。這不但是錯誤的提法，而且是在為極左路線減輕罪責。因為以前搞的那些錯事，以後永遠也不會重犯了，所以根本談不上「超前」。

中國現在就是這麼個樣子，加上什麼稱呼也改變不了它的實質。現階段中國存在的實質問題，也就是當務之急是什麼呢？在我看來，就是盡快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文明化，一句話：變成發達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有一定改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有些外國人已經在叫喊中國威脅，我們也自我感覺良好，喜歡談起「盛世」和「崛起」了。但是有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才被一部分人看出來。這就是至今實行的不是可持續發展。以前的成績主要是在破壞生態和浪費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的情況下取得的。這當然不可能持久，許多嚴重問題已經逐漸顯露出來。以生態來說，破壞容易恢復難，既要花成倍的代價，也要用成倍的時間，而且有些已永無恢復之日。更重要的是人力資源的浪費，造成長期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社會缺乏監督，腐敗制度化，兩極社會形成。究其原因，根本上在於社會

權利分佈不公，勞動者參與制度缺失。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面對公私資方，勞動者的權利是什麼？面對政府及其專政工具，普通老百姓的權利是什麼？面對政府及其主管的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的權利是什麼？在諸如此類的相互關係上，現實情況中有公平、公正、平等可言嗎？

說來說去，只是一句話，當代中國存在的實質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實行民主、法治、憲政。進行徹底的民主改革，其他一切都會迎刃而解。如何搞政治改革，人們提的方案有的是，我們這裏只談幾項重要的。

### 首先必須從黨的改革做起

在中國，黨領導一切。因此要進行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就必須從黨的改革開始。現在我們國家屬於專制主義國家，誰來專制呢？黨。所以要在中國推行政改，把中國改革成一個民主、法治、憲政的國家，變成現代化的文明國家，首先就必須把黨變成現代化的政黨。怎樣才能把黨變成合乎時代潮流的現代化的黨呢？這就只能從綱領到體制進行全面的徹底的改革。初步想來，主要有這麼幾條。一是真正遵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爲此就應當早日由人大制定《政黨法》，不但使黨的存在和活動有法可依，而且還要認真落實憲法上的公民結社自由，允許成立新黨，在民主法制和黨際平等的原則下，進行相互監督和競賽。二是實行馬克思和恩格斯爲第一國際規定的建黨原則「民主制」，取消列寧和第三國際的「民主集中

制」。因爲事實證明，集中指導下就沒有了民主。三是取消黨章的「總綱」部分。這是自黨的七大起才從蘇共那裏搬來的，目的在於限制黨內民主。因此除行動上必須執行黨的決議外，應該允許黨內自由討論一切政治和理論問題，取消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必須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四是真正實行黨內的民主選舉制。候選人不能完全由上級提，應以自下而上提爲主，差額至少應多一倍。選舉公開進行，並允許競選。黨員和下級黨組織的意見可以公布，任何人和機構不得扣壓。五是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只能管本黨的事務，無權越俎代庖管黨外的和全國的事，如對黨和非黨人員進行「雙規」和處分，黨的宣傳部門控制全社會的宣傳教育等。六是各級紀律檢查機構應與黨委平行，不應由黨委領導，它們對同級黨委及其書記有監督和檢查之權。七是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任期應縮短爲七大規定的三年，並恢復八大提出的年會制。適當削減各級領導機構的權限，例如中央政治局特別是它的常委只能執行中央委員會決議，而不能在中央委員會休會期間代行它的職權，以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缺陷。八是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行我黨過去和國民黨鬥爭時一再提出的軍隊國家化。

上面提到的這些改革措施都是要動大手術的，新老「左」派當然堅決反對。而最大的障礙和成敗的關鍵，還是掌握中國命脈的當權派。其實這對黨和每個黨員幹部都是個試金石，可以測出人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真假，是學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描寫的巴黎公社對公僕規定的那些作法呢，還是抓住已有的特權和享受不放並想繼續高攀呢？入黨宣誓、政治學習和對下



級講話時，不是總說參加革命是爲了解放勞苦大眾、爲人民服務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嗎？如果多數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現在還真能抱有這種精神，改革是不會有太大困難的。

### 政治制度和政府機構的改革

人們把這兩種改革統稱政治改革，簡稱政改。官方經常提的是政權機構及其工作作風的改革。許多領導人講，我們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一直在同時進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例如國務院減少了多少個部，有些什麼部改成了總局或總公司等等，把這都說成政改的成績。機構及其職能的調整和改革當然也是重要的，但這談不上政改。政改的根本內容就在於把專制改成民主，把人治改成法治，把封建帝國改成現代化文明國家。這才是我們現在要搞的政治改革。

如果說原來的經濟改革是場革命，那這場政治改革就是更深刻、涉及範圍更廣的革命。連鄧小平發起改革也是只搞前者，不碰後者。這不但因爲他本人就不願放權，而且由於涉及的人更多，遭到的阻力更大。所以他也曾經說過不少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話，但基本上都沒有付諸實施，可見問題實在不簡單。按理說，現在要進行的政治改革，其實都是民主革命應該完成的任務。我們不是早已宣布，五十多年前就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也取得偉大的成功，怎麼現在又搞起民主革命的事情來了？這就是因爲我們對過去的歷史不准說真話，留下了一筆糊塗帳，現在要清理要補課。在我看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但沒什麼新，而且就政權更迭來說仍然是一次改朝換代。只是新朝建立了一套新機構、推行了一批

新政策，也就是從「無產階級專政」到「建設社會主義」，對這套制度、機構和政策，現在要改造反而更難了。因此我們這次要推動政改，建立民主法制的憲政秩序，就只能許多課一起補，求得收效盡量大些，不能拖得太久而被時代潮流拋得更遠。

政改的討論多少年來從未停過，做什麼、怎麼做、談論了很久，但離民主憲政似乎是愈來愈遠了。誰也不敢說我們國家已經實行了憲政。爲什麼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一開始就說爲民主自由而奮鬥，現在革命勝利已經五六十年，怎麼連個憲政都落實不了呢？原因就在於實行憲政對當權派不利。因爲老百姓要民主，當權派要專制，老百姓要法治，當權派要人治，總是鬧不到一起，而中國的事情又是當權派說了算。所以要搞政改，消極等待是不行的，必須積極起來爭取，老百姓團結起來，督促推動當權派來一起搞政改。抗戰時期，我們在延安就成立過「憲政促進會」，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我是親自聽到的。他說中國最缺少的是兩件東西，一個是獨立，一個是民主。現在抗日，就是爭取民族獨立。促進憲政，就是爭取自由民主。向誰爭取呢？向頑固派。他說，頑固派現在也口喊憲政，「他們是嘴裏一套，手裏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他們口裏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毛澤東講的頑固派，後來好像這角色換到了自己頭上。我們的憲法也搞了好幾個，但說的和做的大概不比國民黨頑固派強。因此現在對於立憲，還是

要學毛澤東說的辦法，就是要和現在的頑固派作鬥爭，希望經過「七鬥八鬥，他認錯了，就變好了」。想不經過鬥爭，自然就可以實現憲政，那只能是夢想。可惜現在許多知識分子不是對群眾進行啓蒙工作、不去同現在的頑固派進行鬥爭，而是麻木不仁、自視清高、不關心時政，「兩耳不聞窗外事」，「惑而不解」過日子。

政治改革是一場比經濟改革更爲深刻的革命，是在中國補上人類歷史必經的民主革命這門重要功課，內容豐富，涉及面也極多，這裏沒有必要一一列舉，茲根據中國當前情況和歷史背景，提幾條在我看來屬於既重要又緊迫的事來討論。

### 一、開放言路，鼓勵爭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本來就是憲法的莊嚴承諾，只是過去沒有兌現，現在應該認真履行了。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應該鼓勵人們對國事特別是政治改革發表意見，進行爭鳴，在政治生活上真正造成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禁止言論自由、實行輿論一律，既是專制主義的表現，也是爲了維護專制統治。因此要民主，首先就應解決這個太不合乎時代潮流的問題。其實，反對言論自由的只是少數，而且經過爭鳴，其中許多人還是會變過來的，因爲民主是現在世界上的一個主要潮流，正像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順便說一句，許多人引證時寫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孫先生的手跡卻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只要我們堅持鬥爭、努力工作，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是有

可能從言論自由問題上首先取得突破的。而且這個突破，對中國擺脫專制，實行民主帶有決定性。想想看，如果真的實現了言論自由，人們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這本身不就已經是民主了嗎？

## 二、落實集會結社自由，允許黨派團體競爭

這也是憲法上的莊嚴承諾，只是從來沒有也不準備實行就是了。事實上，當權派害怕集會結社自由比害怕言論出版自由還要厲害。其實這也大可不必。毛澤東過去就多次引證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難道那些人參加共產黨原來是想當「拿破侖第三」？而且成立獨立的黨派團體也不一定就是要奪你的江山。只要共產黨或者你這個黨員為人民服務得好，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無論是新成立的還是舊有的黨派都不可能對共產黨的政權造成威脅。保持執政地位只能靠為人民服務，靠鎮壓和欺瞞是不可能持久的。凡是民主的國家，都有一個以上的政黨，還經常遊行集會，也沒見天就塌下來了。恰恰相反，他們的國家倒是更安全一些，社會也更穩定一些。我們國家既然也把集會結社自由寫進憲法，那就不能只是為了對外好看，而應該是言行一致，說到做到。這對國家只有好處，也才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獨立的政黨和團體存在，起碼可發揮監督作用，大大減少貪污腐敗和違法亂紀。而且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羅森堡還強調，反對派的存在是民主的標誌。不是群眾自己組織的團體，像存在多年的工青婦等組織，除了造成浪費以外，究竟能做多少維護群眾權益的事呢？幾



十年的經驗教訓實在應該總結一下了。

### 三、爭取普選權，實行代議制

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思想。這時他們已經開始揚棄暴力革命，主張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辦法就是爭取普選權，建立議會制。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說過，「普選權就等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工人階級佔人口的絕大多數。」我們自稱早已實行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但實際上由於實行的是專制和人治，中國的勞動人民並沒享受到什麼普選權、參政權，上訴權。所以中國人民還有爭取普選權的問題。選舉要變成民主選舉，就必須反對黨組織包辦代替和干涉壓制，反對指定候選人和限制差額比例，應當允許並鼓勵不同候選人和不同綱領的競選。各級人代會，不應成爲安插幹部的機構、作擺設的花瓶和不起作用的橡皮圖章，應該成爲真正的立法機關和監督政府的機關。應該借鑒和實行三權分立，提高立法、司法機構的地位和作用。總而言之，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完全照搬蘇維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套形式主義的東西。文化大革命期間和「一九八九年風波」中人大作用，證明實在不如領袖個人說了算。因此對人大制度必須進行徹底改革，而不是搞點小打小鬧以應付群眾和輿論。

### 四、取消暗箱作業，一切政務公開

列寧說，沒有公開性就沒有民主。確實如此。一切都暗箱作業，向群眾實行嚴格保密，本

身就是剝奪群眾的知情權，還談什麼民主！提倡公開性（一些人由於對強調這個詞的戈爾巴喬夫有意見，多改用透明度）並不是一切機密都不要了，主要是表明對群眾的信任和自己的光明正大。可實際上，我們不但方針政策的制定，而且立法行政司法的實施，又有多少是向群眾公開的呢？黨內選舉和人大選舉從頭到尾都是暗箱作業，連當選人得了多少票，得票是否過半也不知道，反正公布選舉結果都是依據姓氏筆劃的。法院審訊對政治性的問題（如對維權人士）說是公開審判，但實際上多是秘密進行。而且還經常發生黑社會性的軟禁、關押、刑訊逼供和秘密處理。行政上許多直接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也向群眾保密，或者直到執行時才公布。至於立法，更是不讓群眾參加。如兩年前因「三個代表」理論要入憲而提出修改憲法，就曾明令禁止討論修憲，對此前開會討論的，還曾進行追究。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既然是代表人民的，怎麼能不信任群眾？心裏要沒有鬼，還怕什麼呢？

##### 五、扭轉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在改革開放初期，爲了盡快提高生產力，因而着重反對平均主義，在解決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時適當強調效率，這都是必要的。但是只一味強調效率而忽視公平，就使黨和政府實際上站在了資本一方。一是允許權力進入市場，搞權錢交易，造成權力和資本的結合，產生了權貴資本集團或階層，成爲加速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二是分配上沒有堅持財富社會化的原則，偏向資方而忽視勞方。例如，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外資企業年產值平均增長在百分之十以上，而

工資增長僅為百分之一至三。國企改革總是讓勞動者做出犧牲，產權總是低價向資方或權貴轉讓。這都是中國兩極分化爲什麼那麼快，經過十多二十年（主要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形成兩極社會的原因。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趕快扭轉這種趨勢的時候了，辦法主要的是遏制權貴資本，反對壟斷，扶持私人資本，支持工農商學各界群眾維權。一些新老「左」派，如這次簽名反對《物權法》的三千多位先生，卻堅持反對私有化，保護那些爲官僚資本壟斷、多數生產力低下的國有企業。這當然是明顯地開倒車了。

## 六、改變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

黨政不分是維護一黨專政和妨礙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也是政改的主要環節。這一條不改，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會落空。而且鄧小平和黨中央還在啓動經濟改革時就已提出黨政、政企的分開問題，並多次批判以黨代政。但直到現在也還是實現不了。因爲黨政真正分開，黨的權力就會遭到極大削弱，黨的領導人直接干政和說了算就要困難一些。一句話，這影響黨領導的利益特別是他們的權力，所以他們喊得再響也不會認真落實。但這又是民主政治和現代文明的大忌，要講改革就必須改掉這一條，否則仍然是專制主義。領導上要真想搞政改，就得下壯士斷腕的決心。實行黨政分開後，中國黨就可以處於一切文明國家現代政黨的地位，真正靠自己的政綱和黨員的作用在社會上起作用，而不是靠自封的特權和站在群眾和憲法之上的地位。

## 七、盡快實現政府職能的轉型

這也是黨政領導早就提出、並且多次重複、還擬了不少具體措施的問題。但實際情況怎樣呢？不但轉型慢而且還有些倒退，例如黨和政府以行政手段對市場的干預就有增無減。政府職能的越位和缺位，歸根結柢還是個利益取向問題。所以政府（實際上後面主要是黨委）在很多場合幹的是不應由它幹的事，應該由它幹的事情卻幹得不夠或力度太小。不該幹的，如直接控制經濟資源、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等有利可圖的事，政府總要積極插手。應該大力幹的，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如維護市場秩序、利用二次分配緩和兩極分化、加強教育、醫療、社保、治安等工作，但這些不是做得不夠就是完全缺位。至今中國政府的職能基本還轉不過來。這也是教科文衛和環保、群眾安全工作不但投入少而且也做得差的原因。

## 八、經過全民討論，徹底修改憲法

上面所提大多牽涉到憲法，也是憲法精神和條文的貫徹實施問題。有些應興應革的事，上面雖未提到，但很重要，也是憲法上應予增減的。總之，無論從世界潮流還是中國實際情況看，現行憲法都還沒有完全脫離斯大林憲法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精神，以前的一些小修小補並未解決根本問題。現在應該看到這部憲法的精神已經基本過時和不完全適用了，應該進行重大的修改或重訂。例如憲法前頭那個對民主精神作出極大束縛的《序言》就應該乾脆去掉。無論序言還是某些條文，都說明這部憲法不是一部民主憲法，而是爲了維持一黨專政的憲法，



不符合世界潮流和時代精神、社會發展和人民需要，因此應該經過全民討論，加以徹底修改。

### 改革補課，任重道遠

上面提到的這類改革任務，對目前的中國來說，真是既龐大又艱巨，但實際上還只是在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課。由於解放後我們執行了一條極左路線，不但在經濟上大為落後，更嚴重的是造成政治上的僵化和文化道德的倒退。二戰後許多原來和我們一樣比較落後的國家，都已基本上實現了民主化，建立了比較成熟的社會，成為發達國家，而我們則仍然處於專制主義。早已成為普世價值的人類崇高理想——自由、平等、博愛，對中國人民大約還是夢想。這就是說，毛澤東的路線使中國落後至少相當於一百年。他對中華民族犯有這些重大罪過，按理現在應當加以切實清算。然而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人們至今對他還只能頂禮膜拜，繼續神化。單是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現在還沒有為自由民主補課的想法，還要堅持封建專制的傳承性，即中國歷史上「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統和法統。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民主補課在中國之難了。而且就是有了這個補課的認識，前面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單是在物質基礎方面趕上發達國家就得費大勁邁過幾道坎兒，例如工業化、城市化、文化的普及提高、消除城鄉和工農差別等。如果說工業化還比較容易，城市化可就困難多了，要解決好幾億人的就業和住房問題。怎樣和什麼時候邁過這幾道坎兒，這才是我們的基本國情。不能只看到我們國家經濟總量已居世

界第幾位，進出口貿易已名列第幾，外匯儲存有多少，因此就頭腦發熱，作出一些不夠實事求是的重大決策，特別是在宣傳上對群眾進行誤導。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現在我們面臨的這場政治改革要比進行了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難得多。一是這要同幾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和百年以上的共運「左」傾決裂，不但要改變行多年的典章制度，而且要改變人們的思想，進行新的啓蒙。二是要觸動許多人的權利，讓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員和權貴走下台來和人民處於平等地位。這兩件事都不容易處理，而且是完全聯繫在一起的。例如黨政分開、改掉一黨專政，這就不但是個牢固的觀念問題，而且涉及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影響到權利和利的重新分配。黨政分開，黨變成現代化的政黨，這在世界多數國家已是行之有效的現實。但在中國，牽涉的問題就多了。真正實現黨政分開，請問這麼龐大的黨的機構怎麼安排？黨的活動經費從何而來？一個政黨的經費憑什麼從國庫中支出？須知那是納稅人的錢，絕大多數並不是黨員，在民主政治下，他們是有權過問的。例如一些作家的稿費是要納稅的，他們難道都願意用這個錢養活中宣部的「閱評小組」？而且中宣部處於什麼地位並不明確，誰給它的權來管全國黨和非黨的宣傳教育？稍一聯繫實際，問題就會愈來愈多。又如人民解放軍是中共中央軍委直接管的，黨政分開在這裏怎麼個分法？和前面說的道理一樣，軍費是全國納稅人出的，而不是一個黨出的；軍隊的任務是保衛祖國保護人民，也不能只是保衛一個黨。如果實行我們黨當年對國民黨提出的「軍隊國家化」，那又怎麼個「化」法？而且

黨政分開還涉及整個黨和國家的體制——從上到下的一元化領導。我這個省的人代會（假定一切都是真正按章辦事），已經選出了整套的領導班子，完全可以依法運轉，但是上面卻給派來一個省委書記，還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一把手，管起了這個民選的攤子。這是誰給他的權力？這樣做合乎憲法規定嗎？更不用說民主精神與原則了。小到一個村子的支部書記，或者真是十來個黨員的支部選舉的，或者是上面指定的，反正也是當然的第一把手，管這個村子的幾百人或幾千人。所有這些都不能算是民主政治，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黨作主，更不是書記作主。搞政改就是要把這種顛倒了的事全部顛倒過來。

有人會說，這是曲解了黨政分開的原意。我也知道毛澤東、鄧小平先後提出的黨政分開並沒有取消一黨專政的意思。但是多年來的歷史證明，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提歸提，可就是分不開。也總不能把黨政分開解釋為黨政分工，例如說中宣部在後台，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等站在前台，那可就太不現代化了，也談不上什麼民主改革。黨政分開，也並不是要取消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認為，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黨的方針路線的正確因而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以及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足以成為群眾的領導。沒有取得政權的黨，過去和現在不都是這樣進行領導的？就是執政的黨，也不一定用人民的錢（多數還是非黨員）搞一個龐大的機構系統和一大堆脫產人員。例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先後執政近百年，全國有一百多萬黨員（佔八百多萬人口的百分之十四至十五），但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經常只有六七十人，一個省委的工作人員只

有五六人，對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建設不是也領導得很好嗎？從全世界一切現代化政黨看，要取得領導權（更不用說專政了），都不能靠強加，不管是武力的還是傳承的，只能靠群眾的擁護。而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又只能靠黨的政策代表群眾利益以及黨的工作（包括同其他政黨的競爭）。中國黨要保持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也只能靠這些。那種靠武力「打江山坐江山」，用文件法規加以保證，或者申明用「槍杆子、筆杆子」維護黨的絕對領導的辦法，既已失去法理根據，也違背時代精神，從長遠看，最後也是保不住的。所以解決問題還是得從根子上做起，快刀斬亂麻，取消一黨專政。這當然極爲困難，所以叫作「任重道遠」。

既然這樣麻煩，又何必一定要搞政改呢？這也確實是說了幾十年總是改不成的原因。這次談的政改，問題比過去要大得多，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從上面提到的一些事例，已經看到我們面臨問題的嚴重了。而且矛盾還在增加，危機也在積累，例如現在的官民矛盾和黨群關係，不少地方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這種局面再繼續下去，不但影響人們最關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確實也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命運。現在愈來愈多的人出來爲政改冒險犯難、奔走呼號、獻計獻策，就是看到了問題的嚴重。

### 總的看來還是有希望的

困難雖然很多很大，但是中國的事情還不是氣數已盡，沒希望了。整個看來，還不能得出



完全悲觀的結論。這倒不是爲了循例留一個光明的尾巴，而是確實有根據。照我看來，有利於我國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條件，起碼有這樣一些：

一、世界潮流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得了。這絕不是一句空話，只要回想一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就會相信此言不虛。我在以前曾多次說過，推動國家文明和現代化有兩大支柱，一是經濟市場化，二是政治民主化。這兩化雖然遇到很多困難，但困難終究抵不住滾滾向前的時代潮流。以中國的市場化爲例，改革開放以來，可說阻力極大，但「化」的也很快。「左」派和保守勢力竭力抵制市場化，也只能做到且戰且退，最後守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陣地。可是鄧小平說過，要發展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國內就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國際市場呢？世界上的情況也是如此。現在只剩下幾個小國還在精疲力竭地抵制市場經濟，但從發展趨勢看，恐怕也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很快就會被全球化、市場化的潮流裹挾走。再以政治民主化來看，速度更爲驚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還沒有多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就是那幾個著名的民主國家如美英法，民主內涵也極不健全，單以選舉來說，就有財產、性別、種族等一些歧視和限制。當代這場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潮流，主要興起於二戰後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此後風起雲湧，到二十世紀末已和半世紀前翻了個個，多數國家民主化了，保持獨裁專制的不文明國家已變成了少數。可見這個世界潮流是不可輕視的，它是一種很大的推動力量。

中國近幾年在民主化上的一些小進步，我看主要就是靠國際力量的推動。例如許多傳染病和礦難事故的及時公布（雖然有些領導還在設法隱瞞）、死刑的盡量減少、承認普世的人權、在聯合國人權公約上簽字（雖然至今還沒有履行人大的批准手續）等。如果不是世界潮流的推動，也許中國至今還不承認具有普世意義的人權，更不會在人權公約上簽字（我看遲早還得批准，並逐漸執行，總不能一直掛着）；也許河南的愛滋病還在保密；外國記者肯定不會獲得現在得到的採訪權，等等。不要以為這些都是小可言之，其實這才是見微知著。也不可亂套內因決定論。實際上如果沒有所謂西學東漸、沒有外來影響，中國是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但談不上社會主義，也不會有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更談不到現在流行的許多思想觀念和器材用具。所以決不能輕視世界潮流對中國進步包括民主化的影響。並且應該看到，隨着全球化和我國對外關係的發展，這種影響的速度和力度還在不斷加強。這不是一些新老「左」派用反「西化」的辦法阻止得了的，正像他們制止不了自己使用外來思想觀念和多多益善的洋器具一樣。作為世界潮流的全球化，現在連新老「左」派也不得不承認了（以前是不承認的，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和帝國主義化），但是總還要加以限制，把全球化限在經濟上，只講經濟全球化，似乎化不到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去。其實全球化是全面的，我看文化就比經濟化得還要快。例如沒過多久，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就都穿起了西裝。中山裝已經近乎絕跡。政治民主化的潮流聲勢更大，正在席捲全球，中國恐怕是躲不了的。

二、群眾覺醒和民主力量成長。絕對不能低估群眾的覺悟和力量。

十多年來，我感到群眾的看法和情緒有很大變化，這包括對自己所擁有權和利認識的提高，對官場腐敗的憎恨，對社會缺乏公平正義的不滿，維權意志和行爲的增強，對時事政治的關心和議論等等。諸如此類的具體事例和現象，無論誰都可以感到和看得出。年來中央領導注意民意、強調民生和談論起了民主也是證明。因爲群眾的覺醒已在很多方面顯示出了和過去的不同。長期以來，老百姓反抗欺壓的一個主要手段是上訪告狀。這說明他們還講奉公守法，雖然對下層官員不滿，但還相信上級領導總會主持正義、講點公道。否則，他們不會花錢費事來上訪。如果上面斷絕他們的上訪之路，那只能促使他們失去那點信心，認識到原來上下一致，官官相護，上訪只是自討苦吃，那就採取別的鬥爭方式吧！這就叫官逼民反。我們一些領導機關被權力和面子（上訪對地方官名聲不好或者有礙市容）迷住了心竅，竟然攔截和禁止上訪，自己切斷同群眾的聯繫（當年張聞天把上訪叫做送上門來的群眾工作），招致群眾的更大不滿。結果也確實如此，群眾看到此路不通，只得另找別的鬥爭方式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不少地方群眾學會了運用法律手段和官府鬥爭，維護自己的權和利，如反對官商勾結圈地佔礦、破壞生態、造成污染等。這不但說明群眾知識和覺悟水平的提高，也預示着民間的民主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與此同時，黨內的民主力量要求政改的活動，如開會發言、寫文章、提建議、對新老「左」派言行的反擊等，也明顯活躍起來，參與的人也愈來愈多。這是更加不可忽

視的。除此以外，知識界特別是法學界的維權活動，不但沒能打壓下去，反而愈來愈積極愈勇敢。所有這些，正在匯合成一個推進民主改革的洪流，必將改變原先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腿行走狀況。

三、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和主流輿論要求加快和加深民主改革的言論，明顯增多和加強。這也是近來引起人們注意的新現象。在這以前，談論自由民主幾乎是個禁區，但最近的情況已有所不同。一是有些領導幹部主動談起了自由民主問題，承認我們的民主制度很不健全，不像以前那樣，一提自由人權這類字眼就一臉不高興，以至於和記者幹仗。現在這種情況少了，說明黨政領導並不都是堅決反對民主化的頑固派，起碼在程度上有區別。同時也有個識時務的問題，有些人還是看到了民主的潮流不可擋，即使思想上原來不同意，也要注意風向。而且時勢造英雄，在領導幹部中不會缺少有膽識、有智慧、有氣魄的人。一旦政改大潮湧起，這種人會成批應運而生。至於官方輿論和傳媒，歷來就是看領導臉色行事的，一發現領導在某個問題上軟了，他們也不會再硬起來。何況媒體從業人員中有許多人本來就支持政改，只是經常不能隨心所欲罷了。照我的估計，他們也和廣大知識分子一樣，多數是擁護民主的。總之，要求政治改革、實行民主法制，已成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各方面的民主力量也在增長和匯合，所謂「政改滯後」的一潭死水局面大約不能再長期維持下去了。

四、另一方面，隨着力量對比的變化，當局保持專制的招數已經不多，作用也愈來愈小。



過去最拿手的無非是兩條，一個是壓，一個是瞞。現在對一些上訪者、搬遷戶等，已出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局面。至於瞞，雖然一些黑箱作業仍然用得爛熟，但是人們現在已經愈來愈學會只看事實，有些問題你說得再好聽他也不信了。而且中國的互聯網民早已過億，不管你用上多大力量，還是封不住，總會被衝破。在信息時代，繼續採取愚民政策，完全剝奪人民的知情權，已經很難做到了。搞防火牆之類，除浪費人力物力外，還會落個罵名。這只能使得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各種傳說愈來愈多，黨和政府在全體群衆中的誠信大跌。其實，反對政改，堅持黨管一切的也並不是所有黨政幹部，只不過是其中的三種人。一種是思想頑固的老「左」派，只知抱死教條，不講科學道理，人數不多，但能量不小，原因是他們得到當局的偏袒。一種是擁有重大既得利益的權貴，他們在革命和改革中獲利最多，直接或間接的權力最大，他們的信念和權益結合得最緊密，反對政改的立場也最堅定，其中就有一批竊據要職的大貪污腐敗分子和暴發戶。最後一種是既抱保守思想又有一般既得利益的幹部群衆，人數雖多，但態度不堅決，所起作用也不大。這樣看來，政治民主化的障礙並不是克服不了的。如果現在中央主要當權的人，能夠下定決心，認準目標，放手政改，是自己的失誤，勇敢承認和改正；對極少數堅決抗拒者，公開處理，以儆效尤。這樣一來，政改就一定能夠順利展開，很快見到效果。像開始經濟改革一樣，各方人士特別是廣大群衆，既看到是大勢所趨，又得到一定實惠，因而必然會堅決擁護，積極參加。社會穩定不但不會受大影響，黨和政府威信更會大為提高，中央的

權力也自然會更爲加強。

中國現在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條件早已熟透了，不但在國內通行無阻（少數反對者總會有的，但影響不了大局），國際上更會受到普遍歡迎和支持。既然如此，爲什麼政改總是搞不起來，以致領導公開承認滯後也有好多年了。說來說去，主要原因就是兩個。一個是前面一再講到的那些權貴和重要既得利益者不願減少更不要說放棄已經拿到手的權和利。五千年來，除傳說中的堯舜以外，完全出於自願而讓位的帝王還沒聽說過，大貪官污吏主動自首的恐怕也沒有。所以有人說，今天中國的改革其實就是特權與民權的博弈。黨政領導集團，首先要保護的也是自己的權和利。他們不見棺材不落淚，只有感到不能再照舊統治下去了，才會對改革作出讓步。而中國人民和一切民主力量大約也是總會給他們留下後路，不會也沒有必要對他們作過分傷害的。所以政改的這一最大障礙，是有可能得到妥協解決的。第二是全國人都希望安定，怕改革引起動蕩和混亂。領導集團怕改革引起暴亂，會轟他們下台。人民群眾其實更怕亂，所以多年來受的欺辱也都忍耐下來了。中國學生運動一直保持的文明傳統也是世界上少見。就以十八年前那次反「官倒」的「六四」學生運動來說，可說完全遵守「理性、和平、有序」的原則，直到後來鬧絕食也沒聽說學生方面發生暴力行爲。我不但當時，就是現在還感到驚奇，一次全國性的學生運動，還沒有世界上一個比我們小得多的國家球迷鬧事鬧得厲害。被稱爲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也會希望中國保持穩定，更歡迎民主改革，難道還會趁機搗亂？有點腦筋

的人都是不會相信的。如果幹群中真有人怕改良破壞穩定，那只是杞人憂天，多作解釋特別是實踐證明，很快也就解決了。如果是以保持穩定爲名，阻撓和破壞政改，那就又當別論了。

我們現在要搞的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而改革，一般也解釋爲改良，是一種理性的、漸進的、非暴力的完善過程。過去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就說明他是改良主義。所以搞民主社會主義的那些國家就沒有，也反對用暴力手段。在這點上，修正主義和自由主義倒有相通之處。一九四八年胡適解釋自由主義的涵義，總結爲四點，即：自由、民主、容忍反對派、和平漸進的改良。我們過去雖然把胡適罵得一無是處，現在仍然不時聲討自由主義。但在改革上，我們借用他這第四點，不是有利於發展、穩定，又有什麼不好呢？反正民主化已是世界潮流，是人類歷史上必須經過的重要關口，現在已到非過不可的時候了。我們是主動用和平改良的辦法，還是被動地用毛澤東臨終前所說腥風血雨的辦法呢？這是每一個中國人，不管是領導者還是被領導者，都必須思考、回答和面對的問題。

至於這個政治體制改革怎麼個搞法，是繼續摸着石頭過河呢，還是像黨的十三大及其以後的一個短時期那樣，初步提出一些目標、步驟的設想，然後再不斷前進、不斷總結、繼續深入、繼續完善呢？在目前來說，這些都還不是問題所在。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從黨政領導集團的言行中還看不出有走民主憲政道路的意向，相反地還是繼續站在民主化的對立面，堅持原有的一套方針和措施。他們對改革確實比以前重視了點，特別是在群眾意見最大的一些問題上，

如醫療、教育、環保、圈地、肅貪、以至給群眾點參政權。這當然也是好的現象，雖然屬於治標，但總比不治強。更重要的是說明他們已感到了問題的存在和日益嚴重，比前一屆那樣過多注意製造假像、自我表揚、歌頌昇平等總還多少要強點。但另一方面，對這種治標不治本和太多空話也不能過分樂觀，像有的學者那樣，一提到「三個代表」寫進了憲法，就說，「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有財產制度是民主政體的基礎，標誌着中國從此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忘記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關鍵是民主，也不了解中國有個好話說盡的傳統習慣。再說，治標不治本最後還是不解決問題。像反腐倡廉，以為對少數人嚴刑峻法就能解決問題，結果卻是用刑愈嚴，貪污愈多。不光現在，明朝已有先例。所以要在古老的中國搞民主法制，實行憲政，實在不容易，困難還多得很。我的看法是，戰略上樂觀，戰術上悲觀。以我這樣的年齡，要看到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恐怕是屬於空想了。但可以肯定，中國必將走這條路，而且為時不會太久，這就是戰略上的樂觀。

現在人們正在熱烈討論中國應該確立什麼制度和走什麼路的問題。中央領導和全國黨政系統依舊認定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並按十三大的解釋，現在處於初級階段，走出這個階段還需要一二百年。至於一二百年後是個什麼樣子，如何命名，初級階段論者好像還沒說得太清楚，還在摸着石頭過河。不過從各方面透露出的消息看，一二百年後大約是指在經濟社會等層面上達到那時的發達國家水平。如果確實是這個意思，那這條道路（或制度）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優



越性了。因為過去不少中小國家，經過三四十年，就從落後的農業國和殖民地進入到發達國家行列。今後許多中低等發達國家趕上發達國家大約也只要三四十年。所以中國搞這麼長的初級階段，看來是不合算的。那為什麼還要走這條路呢？歸根結柢還是個民主化問題。所以有人提出恢復新民主主義，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其實，在我看來，兩者也許並沒有太大差別。就是現在的中國，必須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思想啓蒙等一起推動，先補民主革命和資本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課。在當前，應以政治改革為主，否則其他改革很難啓動或者進度太慢。例如一個既屬政改，又直接影響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物權法，由於領導上認識不清和決心不大，再加上「左」派的干擾，竟拖了十二年才得通過，還是半成品，落實起來會遇到很多困難。所以我在前面提到，叫什麼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抓改革、向前進。我們應當明確，關鍵是要爭取盡快建成一個民主、文明的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長處，如議會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市場機制、福利保障制度等，都可以拿過來、學到手。叫不叫民主社會主義，現在還不是專門爭論名稱的時候，而是集中抓民主化這個中心。只有這個問題得到解決，我們才能早日成爲發達國家，生產力有高度發展，產品有極大豐富，人民不僅可以過上豐衣足食、共同富裕的生活，還能夠享受到人類多年來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公平、正義、和諧、幸福。到了那個時候，雖然我已看不到，但總可以瞑目，也算參加革命七十年的奮鬥沒有白費。



在北京豐澤園飯廳和老同志們聚會：前排朱厚澤（左二）、馮蘭瑞（左五）、杜潤生（左六）、李昌（右六）、李銳（右五）；後排何方（右一）、杜導正（左四）、李普（左三）、吳象（左二），二〇〇六年一月

當年讀蘇軾的《前赤壁賦》，留下的一個主要印象是文章的戛然而止。也學東施，我的這本《自述》就到此結束了。

# 後記

邢小群

何方先生是國際問題研究專家。由於專業不同，我原來沒有關注過他的著作。直到二〇〇四年初，丁東從何家棟先生手裏拿到四章《黨史筆記》的複印稿，閱後，我們共同的感受是：一個高人！中共黨史研究被他刷新了。

這才想起，此前朋友們合撰的文集《懷念李慎之》裏，就有何方先生的文章。那篇文章談到，他與李慎之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就相識了，二十多年後同在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共事，研究蘇聯問題、國際形勢、對外關係；後來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共事，分別創辦了美國所和日本所。於是，我就產生了認識何方先生的願望。

不久，丁東第一次到何方先生家拜訪，與何老提到我最近幾年從事口述歷史工作，並談起能否對他進行採訪。當時他和夫人宋以敏老師表示可以和我一見。

我第一次拜訪何方先生是二〇〇四年三月。說起剛剛讀過的黨史筆記的部分章節。我問：您對「崇拜問題」發展的脈絡和幾個層次怎麼能說得那麼具體？他說：除了有限的資料，我有親身感受嘛。

何方先生的經歷的確不一般：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延安整風中被「搶救」；五十年代在外交



戰線做張聞天的助手，後來被打入反黨宗派；六十年代初在勞動改造中險些餓死；直到改革開放才獲平反。八十年代初，他與李一氓、宦鄉等人力促中央改變「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判斷，放棄「三個世界的理論」，確定「當今世界的主題和時代特徵是和平與發展」，對中國的外交與內政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何方先生既是某些重要外交活動的參與者，又是長期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的學者，經歷的豐富和思維的嚴密在他身上相得益彰，思想家氣質和歷史當事人的角色溶為一體。不論對歷史，對人物，對事件，對理論，他都不肯人云亦云，而堅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這種思考，不是簡單地出於書本和概念，而是以古往今來的人類文明為參照，以豐富的人生閱歷為依托。在世的學者裏面，當然有人比他經歷過更重大的歷史事件，但不一定願意回憶；願意回憶的，不一定具有直面真實的勇氣和洞察歷史的見識和才氣。像何先生這樣的老人，實在不多。於是我提出，能不能做他的口述自傳？

宋以敏老師非常贊同這個建議。她覺得何方先生已經年過八旬，每天伏案寫作，身心疲勞。如果口述自己的經歷，一方面可留下具有自傳性的文字與思考，一方面交談可以使腦子得到調節和放鬆。何老也同意這個建議。可謂一拍即合。

於是，從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開始，一直到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我每周去何方先生家一次，進行採訪和錄音，前後談了二十多次。

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每當上午九點，走進北京順義萬科城市花園何老家時，宋老師總是把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如她備份的錄音機，紙和筆——為的是寫下人名、地名及因何老的口音需要用筆來訂正的問題。還有碧綠的龍井茶，水果、點心和豐富的午餐。室外是明媚的陽光和一眼望去的綠地與鮮花；室內是娓娓的交談與朗朗的笑聲。每到談話的這天上午，何老就婉拒所有的電話干擾，談話歷時三個小時。自然多是何老在談，這對已過八旬的他來說，並不輕鬆。

我做口述歷史已經多年。但我畢竟是共和國成立以後出生的，何老自述中談到的多數當事人，及何老所經歷的生活環境，我都沒有感性認識。但我還能夠比較敏感地判斷傳主某種經歷的獨特價值。直覺告訴我，哪些事件、哪些人物、哪些細節，具有珍貴的意義。研究者面對它，是史料和證據；一般讀者面對它，可以感受往昔的奧秘和韻味。

何老長期從事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長於理性反思，長於分析概括。這一特點使他的自傳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常常能給人以醍醐灌頂的啟發，可視為此傳的特殊價值。但是他對某些事件的細節往往並不經意，在口述時，我往往隨機不斷地追問，盡可能使他的經歷細化、生活化，直到追問得再也想不出什麼故事來。

因為工作忙，初期的錄音整理是我的妹妹邢曉明完成的。儘管我妹妹在大型企業中長期擔任秘書工作，有較強的文字能力，我還是要求她除了重複的話語，有聞必錄，然後我再做初步

的文字梳理。

在原始記錄基礎上，我對過於感性的口語作了處理，對重複的內容作了歸併，前後次序也有所調整，整理出一個三十萬字左右的初稿。當時，何老的《黨史筆記》還沒有殺青。口述自傳初稿先由宋以敏老師整理了一遍，訂正了許多人名、地名、時間。後來，何老又和我談了幾次，補充了一些遺漏的內容。在此基礎上我又作了改動，並建議他繼續補充更多的細節。

在寫這篇後記時，我看了看初期的錄音整理稿，也是很有意思的。它保存了口述歷史的原生態，具有較多的感性色彩。但是，當事人的記憶總會有誤差，同時，對歷史事實的表達轉為書面文字，也有一個理智與分寸感的問題。

《黨史筆記》付梓以後，何老就騰出手來修改自傳了。他對原來的口述整理稿不太滿意，主要是：從史實的恰切性看，還需要翻閱資料，找活着的當事人核對；從邏輯的合理性看，還需要調整內容，看有些內容放在什麼地方講更合適；從思考的縝密性看，覺得口述時有些問題還來不及認真思考和整理。特別是有些敏感的話題，講還是不講？也需要下決心。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的反思也在深入，他的想法就一天比一天堅定了。於是，決定在口述整理稿的基礎上重新寫一遍。這是一番不小的工程！我敬重何老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只要何老精力允許，他親筆完成自傳自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事實上，本書較前的章節，多是何老在口述稿的基礎上改寫的，較後的一些章節，則是何老獨自撰寫的了。

三年多以來，無論是正式訪談還是像親友式一次次交談，我總是對自己說，認識何老夫婦，真是件幸事！不論從思想上，還是從學術上，還是從為人上，我得到的教益和啟發，都超過了參與何老自傳寫作本身。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丛书名 = 廿一世纪文库

书名 =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 下

作者 = 何方

出版社 = 明报出版社 , 2007.09

出版日期 = 2007.09

页数 = 833

原书定价 = 84.00 (港币)

DX号 = 000007635383

SS号 = 11984372

ISBN = 9789628959587

中图法分类号 = T9511

分类号 = 18

主题词 =

参考文献格式 = 何方著 .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 下 . 明报出版社 ,  
2007.09 .

简介 =